

黃紹竑著

五
十
回
憶
上冊

雲風出版社印行

黃紹茲 著

五
十
回
憶
上
冊

雲風出版社印行

五十回憶引言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話，雖然沒有科學的根據，至少可算是中國數千年來從實經驗上得來的人壽紀錄標準。假定這種標準是比較正確的話，那麼，年過半百的人，所剩下的生命，至多也不過十幾二十年。可以說是「去日苦多來日少」！

我現在已經是過了五十的人了！過去的五十年中，在國家的歷史上，經過了滿清的專制和民國的革命。在世界的歷史上，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個人的歷史上，經過了從軍，從政，辦實業，辦工程，和其他許多雜亂無章沒有系統的事情。中間因時代的演變，無論是本省外省，國內國外，都起了異乎尋常的變化。凡是生在這時代的人，無論是私人的生活，公的事業，都會受到這種繁劇變化的影響。就我本人說，過去五十年中，剛巧生活在這個時代裏。對於許多繁劇的變化，不但耳聞目見，並還親身參與了若干部分的實際工作。這不僅我個人認為幸運，咤為奇遇。我更很不客氣地說：「這許多變化的情形，實際的工作。無論對過去，對未來，對現實一切，都可作為憑弔借鑑的史料。同時對本人，對社會國家，以至整個的世界，也都具有一些記載的價值」。

我不是史官，我不必亦且不能作正式的本國或世界歷史。我希望和可能寫的，亦祇是本人五十年來由兒童生活到現階段止，這一時期中，就本身的立場，寫我個人要寫的幾種事實。論性質，像個自傳，又有些像筆記。論體裁，像個稗史，也有些像漫筆。這在中國文化史上，好像還沒有這一種前例。但我並不希望合於那一種的文章體例；我不用自傳筆記稗史漫筆那些名目。因為生平懶寫筆記，簡直是沒有日記，完全從事後回憶出來；而所寫的，又是個人過去五十年的事情，所以乾乾脆脆定名曰「五十回憶」。

一個當代的人，要寫許多與當代政治有關的史實，是太困難了。中國歷史上關於這種性質的文字獄，不知發生了多少次數。所以中國歷代的歷史，大都是當朝的官文書，或者是後人撿拾遺聞的補綴作品，很少見到當時有關係的人物所作的真實記載。即使有一二人想作這種記載，而處於專制淫威之下，亦祇好是寄託於詩詞，或其他文藝之內，隱隱約約的，稍露一些痕跡。反使後來讀者，作似是而非的揣測或探索。這真是中國過去私人對於有關政治記載的困難，亦是這種記載的最大缺陷！

現在雖然是民國時代，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但是仍然懷着歷史上的恐怖。一則恐怕觸犯了當局，二則恐怕得罪了生人，甚至恐怕得罪了與死人有關的生人。所以要寫起真實的史事來，的確有許多為難的地方。古語所謂「蓋棺論定」，照我另外一層解釋，是要等這個人死了，才好把他的事實記載出來，公開批評的意思。這種歷史遺留下來「恐怕得罪人」的心理，漸漸變成爲社會上對人消極的道德觀念，想起來真有些可笑！

我是一個當代人，而且還是一個與當代政治頗有關係的當事人。在滿清時代生長，而參加滿清的革命。在廣西舊軍閥底下當軍官，而起來推翻舊軍閥。曾與中共合作，而又與中共作戰。曾擁護中央，而又反對中央，後來仍然擁護中央。在許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變成仇敵，或者由仇敵而變爲朋友。中間的變化，是太多了。若就普通的觀點來看，簡直是一種兒戲。但是事實的演變，確實是如此複雜。這種情形，非身經其事的，不能知道，也不能描寫出來。事情是這樣的複雜，即使有一個人知道很詳細，而又是後來的局外人，要描寫這一段歷史，已很難著筆。何況是我，在自己的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立場。在人家方面，又有很多不同的關係。要處處顧到自己，又要處處顧到人家，真是要比沒有關係的局外人，難以著筆得多。

但是我必先自己設法解除本身的束縛，同時預先要求社會的讀者，也解除歷史上的束縛，然後我本人可以寫出正確的事實，讀者也可以得到正確的認識。

第一、關於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記載，我認爲過去對於「正統」與「順逆」的觀念，是太重視了。當局者或勝利者，都是要把自己的一方，看作順天應人的正統。而把對方看作大逆不道的反叛。把自己一方面的事實，就是極壞的，都渲染得堂堂皇皇。把人家的事實，就是極好的，也抹殺得乾乾淨淨。一篇李秀成的供狀，都要改得他恭恭順順，把大好的「一篇真實史跡，弄得完全變了個樣兒。此外許多乘筆作史的人，也總是先有了他自己的「正統」和「順逆」，然後依着這種標準，寫出文字來。因而使得一般讀者受到先入爲主的影響。而失去他客觀的理解。我不願再蹈這種陳套，我沒有「正統」「順逆」的成見。因爲我自己就是一個在正統順逆中間，顛來倒去的人啊。

第二、對於人的關係上，我認爲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怕得罪人」與「故意得罪人」。因爲怕得罪人。所以許多的重要事實，就要因人而隱諱，不敢公然直陳。因爲故意得罪人，許多並不重要的事實，也就無中生有，肆口謾罵。這種不誠實不坦白的態度和作風，都是作者主觀生出來的結果。並不是絕對不能解決的問題。在我們這一般人中，過去無論是由敵而友，或由友而敵，現在都在國家統一之下，成爲工作的一員。以前的事實，照我看來，已無彼此隱諱的必要。即使以後尚有爲敵爲友的變化，亦是時勢使然，於現在的記載，並不發生直接的關係。若果我們不論以前站在任何方面，都能坦白敘述出來；不作損人利己的想頭，常懷揚善存真的觀念，即使當事人讀了，既可作爲追思借鑑之資，並可作爲見面時彼此笑談材料，亦無傷於情感也。

第三、關於事的方面，我認爲以往對於事的敘述，太重視事的正面，而忽略了事的背景。往往將許多事的起因，歸之於人。所謂「一失當，則舉天下之罪，皆歸諸其人之身」。因人諱事，人與事之間，

不能得到平衡。非爲事而犧牲人的和諧性，即爲人而犧牲事的真實性。殊不知事與人皆各有其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我們若不能將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明顯看清。則事與人的是非糾紛，將一切無從判析。所以我對於事與人的關係，看得輕一些，對於背景的關係，看得重一些。希望讀者同此見解，以免這種癥結，永遠不能解除。

根據以上三點見解，作爲我寫述的立場。但是寫述的技術上能否盡如吾意，我尚不敢自信，還望讀者有以教之。

此外我尚須聲明者，我這寫述，僅是就我自己參加過的一部份問題爲範圍。在此範圍以外的問題，除了極有密切關係者，不能不附述一二，其餘一概不談。而且這是僅憑回憶的寫述，脫落錯誤，在所不免，尤望讀者予以原諒。

黃紹竑

五十回憶目次

引言

上册

一	童年生活	一
二	離家求學及隨軍北伐	一
三	在陸諱部下當下級軍官	三三
四	百色失敗與新軍合流	四九
五	出兵梧州奉命討賊	五九
六	統一廣西各戰役	八一
七	兩廣革命的統一與出師北伐	一一三
八	廣西政治設施概況	一二九
九	十五年的黨務及當時民運情形	一六七
十	新粵桂戰事	一八七
十一	海外閒散生活	二一三
十二	內政部工作時期	二二九
十三	長城戰役	二四一
十四	宣慰內蒙	二六三
十五	籌備遠征新疆	二七九

五十回憶 目次

一

116882

下 册

十六	第一次主政浙江	二九五
十七	調主鄂政與廬山訓練	三一七
十八	抗戰開始與山西之役	三三三
十九	重來浙江	三五五
二十	八年來浙江軍事	三六九
廿一	幾個政治問題	四〇七
廿二	戰時行政舉要	四三五
廿三	教育年	四七七
廿四	戰時經濟種種	四九五
廿五	所謂游擊區	五二五
廿六	業餘生活的興趣	五五一
廿七	五十的一年	五八五

附地圖七幅

- (一) 統一廣西各戰役圖
- (二) 新粵桂戰事圖之一
- (三) 新粵桂戰事圖之二
- (四) 內蒙各盟旗圖
- (五) 籌備遠征新綏路線圖之一
- (六) 籌備遠征新綏路線圖之二
- (七) 山西戰役形勢略圖

寫後的話

五十回憶

一 童年生活

我的故鄉 我的故鄉容縣，係廣西舊梧州府屬的一個縣。在唐代即已設治，名容州，置經略使。縣城名勝嶽武關，又名經略臺，為唐代建築物，至今尚堅固完好。縣境位於西江支流北流江之上游，亦即北流江之主要發源地，環境多山，勾漏山脈山西而東，為粵桂兩省之分水嶺。縣境之南，與廣東信宜縣交界，我家住容縣一里的山咀村（本縣分十里，山咀村屬於一里。）到廣東的邊界，不足十里。

祖籍溯源 自始祖釋衞公至今，已十有六世矣。照族譜所記，我先祖源出中原，因滿清入關，明社不保，乃避亂南遷，至廣東之珠璣巷，由珠璣巷再遷入廣西。始祖釋衞公兄弟二人，長兄道真公落籍廣西博白縣之車田墟，人口亦甚繁衍。釋衞公則落籍容縣，至今彼此尚有往來。

珠璣巷在小梅關南麓，（梅關即梅嶺上之關隘，土人稱小梅關。）是南雄縣極北的小鎮市，實為北人南來渡梅嶺後的第一宿站。過此則分往各地，故兩粵客來之民，問其始居之地，多以珠璣巷對，因為在他們祖先入粵以前，遷徙的經過，多難記憶了。我於民國三十三年夏，經過其地，曾下車訪問吾族故事，避市井依然，而三百年前之事，已不知滄桑幾變矣。因偶成鷓鴣天一闕，以誌感慨。

五十江湖作漫遊，珠璣巷裏溯源流，沾身粵海絲絲雨，極目中原點點愁。尋舊迹，幾荒坵，老鴉啼澈破鷓頭。欲知數百年前事，梅嶺花開幾度秋。

我族初到容縣時，當地人口，極為稀少，隣村各族姓可考的僅有數家，亦大都自異地遷來。康熙乾



隆以後，人口漸增，讀書之風頗盛。我族世有科名，因而開府作宰，亦代不乏人，我黃氏遂蔚爲縣中之望族。

先祖印川公，諱金韶，生子五人，女一人，先父少顯公，諱玉梁，爲先祖父之第三子。吾母出同里鍾姓，生我兄弟五人，紹端、紹彥、紹琦、紹棟和我，及姊二人，妹三人。我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時正甲午中日戰爭的後一年，吾父賴悟過人，幼年爲邑秀才，光緒丁酉年（二十三年）舉孝廉不仕。家居除孝親教子外，則博覽羣書，並習農工百藝以自娛。蓋憤異族之侵凌，仕途之污濁也，故號少顯；又悔誤拾科名也，別署中變，都是表示不入仕途的意思。吾父精醫理，嘗說：「良醫之功，媲美良相，爲用雖殊，其救人濟世之義則一也」。對於求醫的人，人不分貧富，時不分晝夜，無不隨請隨往，且不受診金，貧苦無力的，並贈以藥品。應診數十年，活人甚衆。曾有鄉人和吾父過去有些怨隙，患病甚重，許多醫生，都束手謝絕，請吾父前往診治。當時有人說：「此人對君無情意，可以不必理他」。父佛然曰：「是何言也？醫乃仁術，未有仁而見危不救者，彼雖對我有小怨，我決不能在他病時，存報怨的心思。而且行醫的人，對於人家的病，和自己的病一樣，自己生病，能不急急求治麼？」隨即迅速前往，診察安慰，倍加用心。這人病愈後，感激涕零，前隙盡泯。其在鄉間行事，大都如是，至今鄉人猶懷念不忘。

庚子國變後容縣興學情形 光緒二十七年，吾父遊廣州，適值庚子八國聯軍入京，辛丑辱國條約簽定的時候。當時輿情憤激，維新圖強之議，又翼然而起。清廷亦痛定思痛，於是年秋下詔興學，稍改戊戌政變後的復古風氣。吾父知科舉將廢，新學必興，乃在粵聘教師二人，回鄉教學，設館於故居之萬松山房，而自爲館長，以譚師蕩垣課國文，羅師子岳課英文算學。譚羅兩師在粵頗負時譽，常作革新的言論。設館後，邑中風氣，爲之不變。不僅吾族子弟受其薰陶，就是閩邑後進，聞風嚮往的，亦屢趾相接

，實爲吾邑興學之嚆矢。後該館改爲學校，梧州府守某曾題「容肇先聲」之匾額致贈，現還懸在校中。越年，鄉間鼠疫流行，譚羅兩師的家屬，也間有死亡，乃解館回粵。譚師後任兩廣高等師範教員，羅師後任美洲某國公使館參贊。抗戰後，廣州失守，羅師曾偕其家屬避居吾鄉，這時他年已七十餘歲，每述及吾父，頗深知己之感，而於其生平行事，有爲我們所不詳知或所知不甚確的，得其補正不少。後以老病卒於吾鄉，及今思之，實不勝其今昔之感也！

吾族當每代祖先死後，必爲立祠置產，以供每年祭掃及分餉族中貧苦孤獨之用，在宗法社會中，實在是一種良好的風俗。吾父則爲預防養成子孫倚賴祠產而乏獨立進取之精神，又慮因此而釀成族間子弟爭分祠產之惡習。爰于光緒二十九年向族中父老建議，劃祠產大部份，辦理學校，定名私立珊瑚學堂。吾父自任校長，担任教務的，多爲前在萬松山房曾受中英算教育的學生，或轉送到廣州日本再受短期教育的優秀分子。山咀和珊瑚同音，吾父因爲山咀兩字太俗，乃改用珊瑚二字。珊瑚的意義，至今我還不懂得其解，殆爲山咀之諧音，而暗示其屬地意義與族姓意義乎。後又改爲珊瑚高等小學，隨辦初級中學及高級中學，已成爲鄉間教育的中心。但因學校擴充，而學校經費，則日益困難。近年由三兄仲庵（紹培）主持其事，提議盡將各代祠產，撥歸學校，祖祠祭掃，則由學校主辦。以前因學校爲黃氏私立，學生僅收黃氏子弟，或其姻戚子弟，今則無分族姓，無分省縣，皆一律招收。以前爲祠堂管學校，今則學校管祠堂，以前爲私立，今則爲公立。這種演變，亦化私爲公之別開生面者，吾父有靈，亦當含笑九泉呢！

先君對於兒童教育的見解，吾父對於兒童心理和兒童教育，尤獨具見解。當我兄長輩在萬山松房讀英文算學的時候，我雖六七歲，尙未啓蒙，每天但跟隨父側，咿啞認字。吾父常說：「兒童讀書不可開始過早尤不可督教過嚴，過早過嚴皆易傷身心喪個性，長大必無所成。應等他年齡稍長，智識稍開，然

後隨其所喜，而添加誘導，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啓蒙時，所聘塾師，皆寬厚和平。吾父並勸他們不可輕信夏楚。所課課本，都是極淺近而易於記憶的。我啓蒙後一兩年間，僅讀了幾管三字經，和一本更鑑節要，其餘的經書，吾父皆認爲無用，尤其不適用於兒童心理，並不強我誦讀。所以在歲數相仿的兒童中，我是讀經書最少的一個，亦爲受鞭撻最少的一個。至今思之，實爲幸事！我幼時，很會淘氣，有一次，將先生的小花瓶裏放些水，再用紙團堵塞瓶口，放入火籠（鄉下人多天取燂之用）燒熱，水沸氣漲，「然一聲，紙團飛躍而出，離瓶甚遠。同學多拍手喜笑。於是把水加多，並將紙團嚴密堵塞，而置於烈火之上，料想必有更大的響聲，與更遠的飛射。不意火烈水沸，瓶子爆炸！先生聞聲前來，見而大怒，拿了一根粗繩，對我重重的鞭撻，我痛不能忍，先還希圖閃避，後來便抵抗還擊。先生恨極了，立刻報告我父，並說要辭館回去。在尊師重道的當時，我本人也成覺得當前情勢的嚴重，還不曉得我父要作怎樣嚴酷的懲罰，憂懼之至，甚至暗暗打算自殺的計劃。我父察知其事，便對先生說：「童子無知，痛極反抗，亦人情之常，既然畏罪而圖自殺，即是他悔過的表现。而且兒童無隔宿之仇恨，先生不必動怒，請放假三天，讓我作些好菜與他吃吃，讓他自己去玩玩，三天之後，自然一切舊事都忘記了。先生再慢慢的教導他能。」先生如言，三天後，仍教讀如初。此事留給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使我終身不能忘懷！至今體驗當年的情景，方覺我父對於兒童教育方法的成功，及其精神的偉大，同時亦非常記念我那位勇于受勸真誠教誨的先生。

先君對於兒童心理與生理之認識，我父對於兒童的個性與生理，至爲了解，一任他們作正規的發展，毫不加以阻礙，其見解亦多與世俗不同。嘗謂飲食男女，皆生理所必需，男子成年不娶，必自求其所愛而戀之，爲父母者宜及時爲之嫁娶，否則或有逾越禮教之情事發生，父母應負其責也。我有一個兄長，已將成年，尚未結婚，不免發生戀愛的行爲。我父知道了，並不加以責備，但很迅速的在一兩月內，

就替他完婚。在舊禮教束縛很嚴的當時，竟有這樣開明的作風，這使我們回想起來，是多麼的難得啊！我父富於常識，對農工百藝，都感興趣，晚年并借此消遣。我也常常跟着學習，往往弄得汗流滿身，笨傷累累，吾父並不稍禁，但隨時加以指導。我又喜游泳、打獵，及攀高樹採果實。登樹頂探鳥窠等，視為無上之樂。雖屢遭危險，我父亦僅預予以指示，使知所提防，絕不因偶遇危險，而永加禁止。彼認為危險乃是旁觀者的一種主觀揣測，而未必即是主觀者（即當事者）的必然事實。有一次，我潛伏水底，用手去摸石罅裏的魚，偶不小心，身體為水所浮起，手却或石隙軋住，不能脫出，不由自主的飲了許多水。在這一剎那間，急中生智，竭力使身體下沉，然後將手拔出，雖幸脫險，手背上已傷了好幾處。後來為我父所見，問悉原由，僅謂下次要小心，遇到意外尤宜更加鎮定，並無其他呵責。諸如此類危險之事，在我的童年時代，遇到很多，亦從未因此而為我父責罰與禁止。蓋兒童敢於作某種冒險。即是他對於某種行動，具有若于把握，既有把握，則危險自不易發生，彼自身亦不感覺到有何危險。我父對於我幼年之冒險行為，不加以過分之拘束，自有其正確之見解。這對於我以後之做事，得到極大之裨益。

在鄉下的兒童叢衆裏面。無論是在這一村裏的，或者是那一村裏的，都各有他們的希望和目的。為達到這希望的目的，自然會發生個人的或羣衆的競爭或鬥爭，因而無形中產生了組織和秩序的行動。同時也就產生了一個領導者。我在鄉下的兒童叢衆裏面，不論年紀比我小，或比我大一些的，我都可算是一個領導者。我之所以能夠取得鄉下兒童的領導權，完全由於我有一些技術，和敢冒險，肯努力。當秋天以後，山上野生的菓實如野柿野栗之類，都已經成熟，當然那些易於摘取的，已經為人摘盡；剩下來的，祇是生在高樹，不易採取的一部分。這一部分食品，雖然兒童們都很垂涎。若是沒有人能攀高攀摘，亦祇有望洋興嘆而已。我因為能採登很高的樹，所以這些主要任務，大都是由我包辦，而他們祇是在地面上作那拾糞或剝壳等輕鬆工作。此外孩子們們想吃到一個痛快的野餐，須要把小河裏的魚捉上來，或

是把樹上鳥打下來，或是把田地裏蘿蔔芋頭燒熟來吃，都要有人能夠將這些目的物取到手裏，才有辦法。我會潛水捉魚，我會用槍打鳥，我也會砌結焙燒蘿蔔的竈灶，這些困難工作，都是我自告奮勇努力地担任。他們祇是做些拾柴等輔助工作。因此我有極大的權威，不但可以支配他們的工作，而且可以支配各人應得的收穫物。還有這一村的孩子，與那一村的孩子，並不一定是和睦的。時常因為小事爭執，而發生很大的衝突，甚至互相毆鬥，我也很勇敢地以身率先，帶領和指揮他們去鬪爭。所以現在我的臉上，還有很多處打傷跌傷的痕跡，左手上面還有十處被刀斧砍傷的疤痕，這更是我取得小孩子們領導權的代價。我現在想想，在小孩子羣衆裏的行動，從大人們看來，也許認為是頑皮，是胡鬧，而在小孩子們，確實有他天然的意識和秩序。可是大人老人們，往往不能了解孩子們青年們的運動。也可以說大人老人們忘記了他自己孩子時代和青年時代的一切。

我在萬松山房讀書的時候，正值地方不靖，盜賊四起，不但較遠的地方有明火打劫的強盜，就是我們村莊附近，偷竊的事，也不斷發生。那些無業爲生的人，不是偷人家的牛，就是偷砍人家的樹木出賣，所以弄得附近一帶，都變成童山濯濯。這些偷牛偷樹的賊，如果被人拿着，就要受遊村的刑罰。此種私刑。比官刑慘毒得多，事主將竊犯細綁起來，滿村牽着走，執行的人，手裏還拿着一面銅鑼，一條藤鞭，敲一聲鑼，就要那竊犯將自己的姓名及偷某家的某物，高聲報告一次。如果不肯報告的話，那藤鞭就在他背上無情的打下去，打得他報告爲止。那時鄉村裏除了人命官司，或是抗糧造反之外，官府的法令人員，是不容易到達的。一切的權威，都操在有錢有勢的紳士手裏。這種作法，也不知相傳了多少年代，也許以前要比那時更爲慘酷。有一日，我們聽了鑼聲，跑出去看看，看見那被判遊村的竊犯，就是我們遠房的伯父，已經六十歲了，他的身上已是一條青一條紫，被打得狼狽不堪。他的兒子正在我家裏幫工。我們對他說：「你還不去救救你的父親麼？」他說：「偷是真偷的，我無錢代他賠，又沒有力量

他講人情，叫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實在爲那老者抱不平，恨他兒子太無用，於是同他到我父親面前，要求向事主方面講情，才把他解救下來。後來我父親邀集里中人士，訂立一個保護森林的公約，有主的林木，是禁止偷竊砍伐的，但是祇限於砍伐樹木，至於斬攀樹枝，及掘取已經砍伐的樹根，不在禁止之例，不能作爲盜竊的行爲。一方面是顧到貧窮的鄰人，不至絕了他們生活的路徑，一方面那些樹枝樹根，橫豎都要斬伐掘去的。山主的損失，極爲有限。自此以後，附近的森林都茂盛起來了，偷盜的事件也就不再發生。十七年，我回鄉下去，山上合抱的樹很多，青蔥可愛，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又一次，我自己的木山起火，燃及鄰山，鄉公所判處我家受罰。管家的人對我講，我說：「豈有此理？自己受了損失，還要處罰，我」一定不服這個公斷！」管家人說：「如果因爲我們有勢力，就不受鄉約的公斷，這鄉約就要破壞了。以後誰還肯服從呢？而且這是老宋都手裏訂下來的。」聽他說的理由很充足，使我不能答復，祇好照公斷受罰，我現在想想：鄉間自己訂立的公約，比省政府頒下的「放火燒山者槍斃」的命令要有效得多！這就是地方自治的真諦，自治的基礎工作。此事雖然很細，瑣而充之，卽是民主自治的精神。

初進學堂：光緒二十九年，我到族立珊瑚小學讀書，由初小而高小，在同輩的孩子中，我是舊書根底最差的一個。他們以前請的是舊式塾師，對於四書五經，多半背誦得很熟。很多人爲我担心，恐怕功課跟不上。但是幸運得很，學校裏的課程，剛巧改變。課目雖不完全，而修身歷史地理算學等都有了，讀經也有一科，我的經書，（書經孝經）還是在入了學校後才讀的，比較趕不上人家。但其他功課都還不錯，時時考到第一名。我想這是我受傳統不讀死書的好處。而他們呢，却沒有像我這樣活潑靈敏，也許是受了舊式教育的影響吧！在那一兩年內，族中的長輩，有的是從日本或其他各處留學回來，有的還在留學，因乘暑假之暇，回到家鄉來。他們受了文明的洗禮，唯一的特徵，是將那垂在背後的辮子剪

去。但其中亦有少數保留着的。他們或者我們的心目中，對於這些留學回來還留着辮子的少數人，都認爲是頑固的分子。他們對我們說：「辮髮就是滿清奴隸我漢族唯一的象徵，也就是外國人賤視中國人的唯一原因，在外國，祇有獸類中的豬狗牛馬，才拖着一條長尾巴！」這些話，對正在學堂裏讀書的小朋友，是太動聽了。於是他們問我們：「願意不願意剪去這條尾巴？」自然多數都是贊成的了，卽有少數不贊成的，也都不敢提出反對的表示。於是他們在口袋裏取出剪刀，把十幾個小朋友的辮子，都剪去了。有一二個內心不贊成的，也被強迫剪去，這伸手一摸，辮子沒有了，不覺放聲大哭起來！我因爲恐怕父母知道了，要不答應，當夜是偷偷的捏着已經剪斷的辮子睡覺，心裏盤算着：明早如何去見父親和母親，如何答復他們的盤問？當然，這是沒法遮掩的事情，也沒有話可以分辯。次日一早這事已傳遍了全村。動手替我們剪辮子的兄弟，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我母親急得哭起來，她說：「沒有辮子，便不能下科場，入學，中舉，中進士，一世的功名就算完了！」她一定要找到那位剪辮子的人負責續回來；就是續不回來，也要照着原來蓄辮的樣子，把餘髮理成前邊短後邊長的樣子，等他長起來，仍舊可以梳回一條辮子。正在難以解決的時候，父親過來了，他並不發怒，但也不見得很贊成。祇是對母親說：「既已剪斷，續是續不回了，剪了也省得你朝朝爲他們梳頭而傷氣。頑皮的孩子，梳頭是一件苦事，第一是費事費時，不能忍耐，第二是頭髮隔三幾日不梳，辮子很多，勉強把他梳通，有些頭髮就得硬生生的把他拔下來，使孩子們感到痛苦。男子的梳頭，與女子的纏足，都是男女孩子們不願意的事，而做母親的必認爲這件事是她對子女的日常工作，結果弄得雙方都感覺麻煩，實在也是無謂」。這一席話，把這場剪髮的風波，就解決了。

故鄉鼠疫流行與大哥之死：光緒三十二年我的大哥患鼠疫死了，這是我父母晚年最傷心的事。大哥名紹端，字佩方，聰明極了，十五歲卽考取秀才；後來在萬松山房讀書，英文算術，亦爲同輩之冠。當

年父親卽送其到日本留學，回國後，卽在家族小學當教員。他是我父親唯一的愛子，亦是我父親唯一的助手。他患病時，父親用了全副精神替他醫治，結果是沒有效力。那時候，鼠疫尙無特效藥品，真正染到者。無不迅速死亡。但是在我父親的腦筋裏頭，總以爲是自己用錯了藥，所以不能治愈。他對於這事，特別的痛心，令他精神失常，甚至忽然暈倒過去。他後來常常說：「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良醫之子，多死於病！」不知是他自慰的意思呢，還是他自怨的說法？

當時防治鼠疫的方法。鄉間的鼠疫是太可怕了！前後繼續發生了二十多年，直到民國十年之後，才告絕跡。當時蔓延甚廣，每一個鄉村，都被波及，究竟死了多少人，在那時人口生命尙無統計，自不知道確實的數字。不過據我所知，數目是相當的大，有些是全家人都染疫死亡，致令鄰近的村坊，都失去繁榮興盛的氣象！據說：「其時廣州正有鼠疫發生，或者有人傳染了回來，或者是老鼠疫蚤隨貨物過來，而由容縣城間接傳到了鄉間」。鄉下人對於鼠疫，沒有近代的科學知識，從事防避，多半藉鬼神以驅疫，所以死亡特別的多。但鬼神的說法，若以科學的眼光來分析，亦有很多地方與近時防疫方法相近似。譬如說：「疫鬼是怕白色的，家中如發現鼠疫，必須滿地灑石灰，疫鬼卽不敢到來」。又說：「疫鬼晝不敢上樓的，有疫人家，必須樓居，晚上要把樓梯抽去，最好在屋柱上纏以有刺之樹葉，則疫鬼更不敢近」。這是現時防疫防蚤之最好方法。其所謂疫鬼者，實卽今日所知的疫鼠疫蚤也。凡發現鼠疫的人家，必須立刻搬遷，及至無死鼠發現後，始能搬回。故當時鄉間空曠之地，臨時住屋甚多，皆爲避鼠疫而造者。富有之家，甚至有二三處者，以便再次遷避。至鄉間舊例，死人必須停尸三日，候親屬到臨舉哀，但對於患鼠疫死者，在病重時，卽須隔離，死後卽殮卽葬，並不等候親屬到來。舉凡種種防疫辦法，雖皆以鬼神爲對象，而實多合乎科學的道理。想神道教設教之用意，無非爲使無知愚民易知易行耳。但不知此種方法，爲何時何人所發明，而當時更無人能以科學的道理解釋而充實之，這實在是一件可惜

的事情！

投考陸軍小學 光緒三十四年，我已十三歲，那年桂林陸軍小學招生，父親的意思，是叫四兄天擇（紹棟）去考，他年齡比我長一歲多，身體也比我壯健，頗合應考的條件。我對陸軍也極感興趣，要求父親准許我同去，父親因我年齡不足，身體太小，未即允許，而我去志甚堅，爲此哭了一日，飲食也不進。父親見我意志堅決，不忍過於遏抑，也就答應下來。但我兄弟二人，剛到容縣城，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繼崩逝之耗，即傳至鄉間。父親因恐有事變發生，派人到城，追我兄弟回去。旋薄儀繼統，父親知時局已安定了，乃於宣統元年春，命次兄永邦（紹彥）攜我兄弟同赴桂林。以上所述，爲我的家世及我幼年時代可以回憶的種種事實。

一一 離家求學及隨軍北伐

初到桂林 由容縣去桂林，在我童年時代，走的都是水路。從縣城坐北流江的民船，順流經藤縣，入西江，而到梧州。再換桂江民船，逆流而上。大約需要二十餘日，方可到達桂林。沿西江一帶人士到桂林，都叫做上省，到廣州都叫做落省，蓋一則順流而下，一則逆流而上也。

桂林是廣西的省會。為全省政治的中心。但是廣西的經濟中心，却在梧州。因此梧州一帶的人，在前清時代，除了趕科舉的秀才，及考學堂的學生之外，很少有人到桂林去。我們去桂林的時候，正是宣統元年的春天。桂林山水甲天下，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尤其在春天，桂江碧綠的水，與兩岸秀拔的山，交相輝映，而更覺其美麗。二十多日的逆水行舟，應該越久越覺得氣悶，可是在桂林的江上，是越到最後越覺得有趣。所以在桂林江上坐民船，時間雖然長一些，也並不見厭煩。船到了陽朔，奇峯起伏，江水縈迴，舟子指東說西，滔滔不絕，使你耳目應接不暇。想起「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的話，是相當正確的。我們到了桂林，陸軍小學新生考期已過。其他的學堂，尚未招考。日中無事，就去遊山，獨秀峯是首先登臨的目標。這裏可對桂林的輪廓，先得到一個印象。其餘如風洞山、七星岩、象鼻山、伏波岩、月牙山、老君洞、天子田等，都是初到桂林的人，半月裏就要遊遍的。那時桂林的客寓，約分為客棧與試館兩種。客棧是按日計費的，住者多半為臨時過往的客人。試館是按月計費的，住者多半是比較久留的客人。試館的意義，是為來者考試的秀才童生而設的。後來科舉廢了，試館便成為通學學生的宿舍，因此就有改用學生寄宿舍的新名詞，以廣招徠的。我們一到，便租試館來住；那時生活程度極低。普通的試館，每月食宿僅費毫洋二元七角最貴的不過三元六角，就很講究了。一個學生一年

全部的費用六七十元，已很充裕。較之今日桂林生活費之昂貴真有天淵之別。

考取兌澤高等小學 到桂林不久，天擇四兄考取了桂林中學，我考取了兌澤高等小學。桂林學校，辦理較遲，光緒三十年，兩等小學，祇有三所。臨桂兩等爲縣辦的。蒙泉高小，在城南蒙泉書院。兌澤高小，在北門之鐵佛寺。這兩校係由提學使直接辦理，似屬於省辦者。但課程設備，比到我們族中的瑯粹高等小學，似乎還趕不上。全校僅有教師二人，爲莫師如清如達兄弟。後來鐵佛寺改爲模範監獄，該校又遷至後貢街之大佛寺。蓋當時桂林除陸軍小學外，還沒有一所新建的小學校舍，大概省山廟宇臨時改用的。我進兌澤小學，半年許，兌澤與蒙泉兩校合併爲廣西模範小學，校址設於皇城內，係將舊貢院全部拆去，而重新建築者。除中間留作廣西諮議局外，右邊爲模範小學，即現時廣西綏靖公署地址；左邊爲初級師範，即現時廣西省政府地址。規模之大，爲全省冠，亦可見當時地方當局廢科舉興學校之熱心也。

永邦二兄送我們去考學校，等我們考取之後，他就回去了。臨行時，祇交下毫洋三十元。他說：「要用到暑假，家裏才有錢寄來，你們要節省點使用」。在以前，一切的用費，都是由他經理，每月要用多少錢，我們一些也不知道。現在離開了家鄉，變換了環境，當然更不曉得每月開支的數字。對於他的吩咐，祇好接受下來。於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就單獨的開始學生的異鄉生活。同我一齊考入兌澤小學的，還有我一個堂兄次軒，他僅比我大幾個月。到了學校裏，認識兩個藤縣的同學，一個叫蒙聖隸，一個叫何強，全個學校裏，除了我們四人是說白話的下府人，其餘的都是說官話的桂林人，或湖南人。語言是人類的界限，我們少數孤立的，就往往被多數的欺弄奚落。但我在兩三個月內，已經迅速地學得很好的桂林話，打破了語言的界限，情形也就好轉起來了。那時都是走讀，我住的地方，離學校還有兩里多路。朝去晚回，在晴天雖不覺得怎樣，但在春天，桂林的雨特別多，連日不斷的下來，我祇有一件

藍布的長褂子，算是當時的制服，（那時不准穿短衣上學）每天都得穿出去，弄得泥漿滿身。當晚那來洗滌功夫，次早帶濕，也得穿去上學。我們住的自然是那三等的試館，公共伙食，比之現在的公務員雖好得多，但是刻板的幾樣菜，吃久了，也要生厭。一個禮拜內，拿一角錢加炒一大盤酸菜牛肉，或兩三角錢買一個鷄吃吃，也是不可少的。那時桂林尚未有戲園，有兩個桂林戲班，一個叫人和班，一個叫瑞祥班。唱戲都在各省的會館內，這些戲班，都是供各省在桂的官員或商人燕會時之用，（卽堂會）但却不是開放的，任由老百姓前去看戲。遇到禮拜日，我也常常去看，有錢時，就拿一個銅板買一個高樁位子（係私人出租的）坐着看，沒錢時，便在人叢裏擠來擠去。看戲雖然不用錢，但看見西廂上戴着纓帽穿着袍褂的官坐着吃着的看，心中却有些不平與難過！到了宣統二年，桂林最早成立的景福戲院開幕了。（在鳳凰街的橫巷內）這些班子都歸到那裏去唱，出錢買票，才有戲看。從此這種平民的利益，就完全被剝奪了。那時候瑞祥班有一個花旦，叫做「鴨蛋」，我總以爲他的面孔生得像鴨蛋一樣，所以叫做「鴨蛋」。前幾年到桂林，與馬君武等看桂戲，說起「鴨蛋」的事。他說：「因爲他唱得最好，長得最漂亮，能壓倒一切的花旦，所以叫做「壓旦」。「鴨蛋」與「壓旦」同音，你聽錯了！」我不覺大笑。他說：「這人姓林，已六十多歲，還健在」。有人提議要他出唱一次與我看看。我說：「人老珠黃不值錢，而且要一個六十老翁在台上男扮女裝，作那扭捏的姿態，來娛我們的耳目，不但不雅，亦且不忍」。這個提議，就打銷了。

我們的三十塊錢，不到暑假，早就用光了！還欠一個多月的房飯錢。試館老開對我們說：「再不交錢，就要停公食了」。這個最後的警告，迫得我們走頭無路。幸虧堂兄次軒他還有兩件綢緞的衣服，祇好請老開帶牠去上一上當舖，渡過這個難關。距暑假還有兩個多月，家裏又沒有錢寄來，怎樣辦呢？不得已找一個同鄉，在另外一個小學教書的梁朝輔先生處，借了二十元，這是我生平向人借錢的第一次。

在未開口之前，心裏非常難過，總怕人家不肯。即使肯了，又怕家中不認帳。但是事情出我意料之外，一說就肯了。他並且說：「你們的錢，的確不夠用，應該早些寫信回家，說明詳情，一定會寄來的」。他爲我們解釋了中心的疑慮，解決了當前的困難，直到後來，我還時刻記得他。因爲那時候，我對於這事的印象，是太深了！

廣西諮議局係於宣統二年成立，這是滿清實行立憲的初步準備。地址設於皇城正中，建築極爲莊嚴，實足象徵民意之光明正大。各縣皆舉有議員一人，容縣議員爲黃用溥先生，新學非常淵博，極爲青年所信仰，亦最爲頑固派所反對。他與藤縣議員蒙民偉先生所提之遷省南寧案，在當時曾發生重要爭辯。議長爲岑溪陳太史竹銘，我於民國廿九年回桂，參加廣西省臨時參議會，開幕時，陳太史擔任副議長，與民元後之省議會議長鳩健生張一氣兩先生，同爲參議員，聚清末及民國二十餘年之歷屆議長議員於一堂，亦議壇之佳語也！

廣西興學的兩大紀念 廣西創辦最早之學校，要算桂林文昌門外體用學堂，又名大學堂。顧名思義，當係採取維新初期的口號「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意思。當時內容，頗爲簡單，制度亦未確定，宣統後，乃改爲優級師範。在廣西興學初期的教師，多爲該校所養成，對廣西教育貢獻頗大。此係光緒二十四年桂撫黃槐森氏所創辦。其次則爲二十五年梧州中西學堂，胡漢民先生曾在該校任教席，實爲廣西興學之兩大紀念也。海豐張鳴歧氏，於光緒三十二年撫桂，彼曾任兩廣學務處督辦，對於廣西學務，進行甚爲積極；提學使李翰芬氏，對辦學亦有計劃。計先後由其完成及創辦者，有法政學堂、警察學堂及警察教練所、典獄學堂、農林學堂、優級師範、模範小學、陸軍小學、幹部學堂、陸軍測量學堂等，都在光緒末年及宣統元二三年，相繼開辦，規模皆頗宏偉。尤能於省外國外，延致名師，擔任教授。對廣西教育基礎之建立，自具相當功績。正在興學高潮澎湃之際，忽有恢復科舉之傳說，其原因爲宣統元年舉

行最後之拔貢考試。一時熟中科目名者，無不彈冠相慶，亦與學期中之趣聞也。

容縣學風興盛的地理原因。容縣在桂林讀書的學生很多，所以有「無容不成校」之語。不但省內如此，即在省外國外，桂籍之留學生，亦以容縣人爲多。究其原因，爲容縣興學，得風氣之先，光緒三十二年，已成立六十餘校。其次則因地少人多，（據最近清丈全縣耕地僅二十四萬畝，人口則有三十二萬。）謀生不易，不能不向外以求發展。當光緒中葉時候，有許多窮困的人，因迫於生計，流爲盜匪。地方發生紛亂。清廷派酷吏鮑某，前後來宰是邑，皆以嗜殺著名。因而稍涉嫌疑之貧窮丁壯，則流走南洋，以謀生路。留縣之小地主自耕農，鑑於耕種之不能溫飽，乃多變產令子弟外出求學，以圖發展。父兄對此，必先估計子弟求學時用費若干，畢業後每年收入若干，多少年後可以將所變之產業贖回，皆有預定計劃，按步實施。所以容縣學生貧苦者佔多數，而成功者亦以清寒子弟爲多。但當時在桂林容縣之學生雖多，而在衙門做事的極少。據我所知，僅封勵吾、封濁吾、葉君國三人，彼等皆留學日本，在提學使司充當類似督學之職務。後來封勵吾先生派充模範小學校長，我隸其門下者約半年。

考取陸軍小學。宣統二年春，陸軍小學第四期招生，我去應考，僥倖錄取了。以前我痛哭絕食，要求父母到桂林的唯一目的，終於達到了。當時我是如何的快活呵！但是臨入校的時候，忽又起了徘徊不定的念頭，和莫名其妙的悲感。好像入了陸軍學堂就與父母永遠不易會面的樣子！後來經好多人勸導，我才入校。這是我一生事業起點的學校。地址在文昌門外，一切建築，都是有計劃而很宏偉的。可惜學校停辦以後，這座莊嚴的校舍，却逐漸崩壞了。我時常懸念着，前幾年曾向李德鄰（宗仁）白劍生（崇膺）諸兄建議，應就學校舊址，建築忠烈祠，爲我們軍事的母校留一個永遠的紀念。

滿清的陸軍教育制度。滿清的陸軍建設，極有步驟。單就培養陸軍幹部而言，能從基本着手。陸軍小學即是培養軍官的基礎，三年畢業後，升入陸軍中學，又兩年，畢業後，再入伍半年，升入保定軍官

學校，開始分科教育，一年半畢業。合計由陸軍小學至軍官學校畢業，需要整整七年的時間。中間幾經選拔和淘汰，最後才造成一個下級軍官，自然健全可用了。這種制度，不但滿清承數千年積弱之後，應該如此，就是現在，我也主張如此。因為外國的陸軍，無不有其百數十年的久遠歷史。再加以近代國民教育的普及，與國民體格之健全，自無須再由陸軍小學入手。中國陸軍基礎尚未建立，而又加三十餘年的內外戰爭，無論在國民教育方面，國民體格方面，都受了極大的阻礙，影響於軍事幹部之基礎甚深。故今後建军工作仍須在深培基礎上注意也。

我在陸軍小學一年多當中，除了精神生活習慣，日漸軍事化之外，軍事學術，是很簡單而膚淺的。而普通的課程却居於主要的地位，其程度約等於普通的舊制中學。原來設立陸軍小學，有兩個目的：第一是鍛鍊學生的軍人體格精神，與生活習慣。第二是培養學生將來在軍事學術上必須具有之自然科學基礎。此兩種目的，由陸軍小學直到陸軍中學，都是一貫不變的。

廣西初期革命情形和建军歷史 在學校期間，我平日耳所聞與目所見的，無非當時在桂林之新軍人物。除了本校的長官之外，如兵備處督練公所幹部學堂堂學兵營等，都是這些新軍人會集的機關，而彼此接觸的機會也很多。所以對於這班新軍人物，無形之中，起了兩種感想。第一是他們外表上都很有精神，而富有朝氣，與舊軍防營的腐敗軍官比較，自然要敬此而惡彼。第二是認為他們都是革命黨，到廣西來，是陰謀革命推倒滿清的，自然更合青年學生的口味。因而許多青年人物，都在不知不覺間，和這班新軍人物，融合同化起來，終於成爲廣西革命的導火線。在這裏，我得回溯一段廣西革命初期的情形，和新軍建立的歷史。張鳴歧氏年少有爲，引用的新人物中，如胡銘盤治警政，朱文劭任司法，都是當時知名之士。尤其注重的是廣西軍事的改革，以莊繼寬爲兵備處總辦，擬定建立新軍的計劃。莊鈕二氏復派王勇公招致許多軍事人才。屬於士官派的，有孫孟戟、陳之驥、趙炎午、覃藻益、田

稼軒、雷壽榮、楊會蔚、唐之道、孔庚、尹昌衡等。屬於國內派的，有呂公望、冷御秋、劉建藩、耿毅、何遂、錢謨、林之淵、楊明遠等，共計二十餘人，皆少年新進勇於任事之輩，實為廣西革命最初發動之人物。但這班人到了桂林，莊鈺二人，因和張鳴歧意見不治，先後去職。繼其任者為按察使王芝祥兼兵備總辦，而會辦一席，則由新到的楊會蔚接任。他們對於建軍計劃，先辦幹部學校，以陳之驥任校長。繼又成立學兵營，任孫孟戟為營長。其餘和楊陳同來的人，分配學校及營部，担任教職員。

張鳴歧雖具革新政治之心，對革命排滿，却無此大志。但彼時革命思潮，日漸高漲。莊鈺雖去，他們所招致的一班新人物，大都和九龍香港一帶的革命黨人黃興趙聲等，暗通聲氣，祕密進行革命工作。原定俟幹部學校舉行畢業，正式成立新軍時，開始發動革命。不料在此期內，接連發生幾樁事情。第一是辦報被封，尹昌衡、覃蔭鑫、呂公望和先時隨鈕永建回來的趙正平等，出版指南月刊，為廣西最早的定期刊物。覃、尹、趙等分任編輯撰述，呂為經理。第一期出版銷三千餘份。因言論激烈，被巡警道胡銘盤封閉又改出南風報，亦祇出了一期。因刊載石達開「揚鞭慷慨葭中原，不為仇讎不為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斃讎悲羸馬，萬衆棲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的詩。尹昌衡並在封面插畫的竹子葉裏，暗暗畫成「民族革命」四字。旁邊還有「個公雞，像在啼叫的樣子。題為「雄雞一鳴，天下震動」。又被胡氏覺察，仍行封閉。他們又改出南報。胡氏見他們這樣倔強，因自己是嘉興人，呂公望是永康人，乃以浙江同鄉之誼，邀呂前去晤談，餉以盛餐，勸他們自動停版，不必以腦袋相拚。呂再三要求，乃以先送檢查，然後付印為條件，准許他們出版。言論既不自由，辦報問題，已實際等於失敗。第二是何遂任幹部學堂隊長，在操場演說革命，一時情緒熱烈，羣衆歡呼。何忽舉手指場中天橋，高呼：「有志革命者，可跳此天橋，以示勇敢！」一個學生因跳橋不慎，傷及腿部，事遂外洩。而幹部學校，亦便成為政府監視的目標。第三是張氏宴請尹、楊、孫、覃等。席間，張

自言：「革命並不是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情，本人有志革命，刷新軍政，即是廣西革命領袖」。說畢，又拿出他新置的手槍，給大家傳觀，說是革命武器。尹昌衡接槍在手，連放三響，將窗上玻璃擊碎。這等舉動，原沒什麼意義。但從假革命的張氏看來，多少有點刺目。當時微笑不語，散席後，每人還發送安南刀一把，以示聯歡之意。一班青年人，感情本易衝動？得此異數，還以為張氏真能贊助他們革命，情緒愈加激昂。不料張已暗約龍州講武室室長蔡松坡，（錕）及前任陸小校長被學生轟走的蔣伯器（尊）秘密到桂林。派蔡為幹部校長兼學兵營營長，以去陳之驥、孫孟戟、孫孟戟，派蔡任兵備處總辦，代王芝祥。并以隨蔣同來的董吉生（紹箕）為陸小監督，斯烈（夔馨）為提調，而將原任陸小監督的雷壽榮和兵備處經理科長孔庚，先後拘捕扣押起來。一班青年志士始知上了張的大當，一時大為不平。王勇公時任幹部學校教員，竟赴兵備處，與蔣力爭。蔣至撫署謁張請示，不得要領。張并言，明日當開軍法會審。此信傳出，羣情愈加憤激。呂公望夤夜見蔣，長跪兩小時，力求轉圜。蔣說：「大帥已吩咐下來，明天要砍幾個腦袋給大家看看，恐怕不易挽回」。呂涕泣陳詞說：「我輩在浙江時，聞秋瑾女士說總辦是革命同志，所以全體熱誠擁護總辦。現同志們有殺身之禍，無論如何，要請總辦援救」。蔣沈思良久，乃言：「我實沒有辦法，你可去求求王芝祥。他的資格比我老，或者可以說話」。呂復約同王勇公、孫孟戟、陳之驥三人，連夜謁王，苦求設法。王先有難色，後來見他們懇切情形，心為之動。即毅然說：「難得你們有這樣義氣，好好，拚我老面子不要，替你們去碰一碰看」。漏夜赴撫署，和張氏磋商良久，議定條件。限這班青年於兩月內全部離桂。特別指定陳之驥、楊曾蔚、王勇公、孫孟戟四人，在三天內先行離開桂林。王將此意轉達。並勸他們服從，一場風波也就此消弭。但廣西革命，經這班人的鼓動提倡，一般青年，尤其是學兵營及幹部學生，腦海中已注滿了革命思潮。都在磨礱豫察，等待時機的到來。

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辛亥宣統三年，首有溫生才之炸廣州將軍鳳山，繼而有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七十二烈士的成仁。消息頻傳，益發震動了桂林每一個青年學生的腦筋。在陸軍小學學生裏，由於平時言論意志之相同，進而爲團體之結合。我與胡馳、夏威、黃遠鎮、黃克毅、馮鎮邦、陸受祺、梁鎮國等八人在近松園小酒館內，經過了一次插血式的痛飲，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後在城北荒僻的園中租了一個小房子，作爲一個聚會處所，每星期大家都要到那裏去集會一次。一班小孩子，既無憑藉，又無經驗，除了酒酣耳熱作一些慷慨激昂的言論外，也想不到好辦法。但這也算得我等未來獻身國家致力革命的一個起點。這年的暑假我約同夏威君同去廣州灣一行。目的是廣州灣可以運軍火，且由容縣經高州、化州到廣州灣，路近我冢鄉，而又偏僻，不易爲人注意也。回到家裏，支支吾吾的對父親說，要去廣州灣的話。經父親一再盤詰，遂以實告。父親說：「革命革命，不要把自己的頭先革去了！十幾歲的小孩子，就講革命，究竟懂得什麼叫革命」。其時三兄仲庶正從日本回來。從旁說：「聽說凡是從日本回來的士官學生，都加入了革命黨，革命是一定要爆發的」。父親不再說什麼，我要到廣州灣的意思，亦無形中取銷了，仍舊回桂林去，照常上課。

廣西宣布獨立。中秋後，武昌起義了。首義的是第八鎮的新軍和陸軍中學的學生。這消息傳來，自然整個桂林都震動了。在以前社會上本來都把新軍及陸軍學生一概認作革命黨。由於武昌首義的參加者，更證明以前的估計非常正確。而新軍及陸軍學生，亦多以此自命。其時桂林的革命行動，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武昌方面，有陸軍中學同學代表任道方李作勳兩人，秘密回到桂林，報告武昌起義情形，人心更爲浮動。這時張鳴岐已升任兩廣總督，繼任桂撫，沈秉堃和潘台王芝祥及廣西諮議局議長等，見大勢所趨，合議響應，乃於九月十七日（農曆）宣佈廣西獨立。由諮議局推舉沈秉堃爲廣西都督，王芝祥陸榮廷爲副都督，定期舉行慶祝大會。

廣西自創辦新軍後，舊軍非常嫉視，宣佈獨立，舊軍多有不贊成。其中一部分，計劃乘慶祝大會的機會，攻擊新軍和陸軍學生。天將拂曉，陸軍小學學生整隊入城，參加慶祝典禮。行至文昌門，突遭城防的舊軍開槍襲擊，乃退集於李家村。連合新軍與叛軍對峙。結果，叛軍是被解決了。但從此新舊軍意見日深，無法泯除。適湖北方面告急，漢口漢陽，相繼失守，希望獨立各省，派軍赴援。而沈秉堃王芝祥等亦以新軍若出，則舊軍易安。因此力主北伐，同時在新軍方面，本多革命青年分子，羣以參加北伐爲榮，乃任命趙午炎爲廣西北伐軍統領，率廣西混成軍入湘，直趨武漢，其實當時廣西混成協僅有步兵三營，騎砲工輜等營隊，實力並不充實。

參加學生軍隨軍北伐。自廣西宣佈獨立後，陸軍小學已無形陷於停頓狀態。我們學生當中，有主張請軍政府繼續辦理者。我等則主張全體組織學生軍，隨軍北伐。結果，各行其是。願意留校的，任其留校，後來加招新生，改爲廣西陸軍速成學校。願意北伐者，則組織學生軍北伐敢死隊。除陸小一部份同學外，其他中學師範法政各學校之學生參加者，極爲踴躍。因經費及槍械所限，僅組織一隊，共一百二十八人，由梁潤軒先生任隊長，馬英武馬子駿封高英鄧紹伊任排長，黎福楨任特務長。彼等皆係在陸軍小學時任學長助教等職，而爲學生所信仰者。陸小同學分任班長，我亦爲班長之一。我兄天擇以及平時友好，大都參加這個組織。在隊員當中，我今日尙可憶記的，爲胡馳翼、白劍生、呂演新、伍展空（廷颺）、夏威、黃星垣、俞作柏、梁瀚嵩、黃晉、龐海鯤、李雅齋、黃遠鎮、李偉英、呂煥炎、余志芳、梁朝璣、李普生、李少漁、李造時、秦鏡、秦益厚、翟宗保、陸受祺、甘象賢、宋豫章、李朝芳、蒙志、黃燕、白書亮、劉崇、黃序達、黃良、唐瑞菁、鄧昌培、邱錦源、葉青、梁希斗、羅傳英、尹振、陳壽昌、莫奎、林蔭鴻、封傳璧、馮曉霞、吳子等數十人，其餘多不及記憶矣。當我兄弟參加學生敢死隊時，族兄曾祕密電知我家。我母非常着急，主張電追我兄弟回家。我父曰：「彼平日已大談革命，這

時何能再阻止其參加，聽其自去可也」。

學生軍成立後，經過一個星期的訓練，即隨軍出發，並歸趙統領炎午指揮。當出發時，桂林各學校排隊歡送，大有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概。乘民船經那陽、衡陽、湘潭而至長沙，換乘輪船，至洞庭湖，入長江，至湖北省會武昌西南六十里之金口鎮登陸。時清兵已據漢口漢陽，與武昌革命軍隔江相對。廣西北伐軍奉令擔負左路軍的任務。由金口渡江，經大集鎮蔡甸，威脅清軍側後。旋清軍向孝感撤退，我軍更渡過襄河左岸，經漢川縣茅神渡，折而向東，直趨孝感縣。至時，清軍已退至武勝關以北矣。時南北議和，我軍停止於孝感附近。和議告成，民國成立，軍事行動，乃告一段落。

計自十月初旬，由桂林出發，沿途都沒有停滯。在不滿兩月的時候，軍行三千餘里。其赴援之急，士氣之旺，可以想見。尤以學生軍係臨時組合者，半數為普通學生，事前皆未經訓練，沿途稍得休息時，即為補助訓練機會，比到同行的新軍，其裝具武器之負荷，行軍程途之遠近，及一切任務之担任，各事都是三一律，並無些微差別的地方。在整個過程中我學生軍無一落後者，即生病者亦絕少。此皆由於革命精神所驅使，而不由自主者也。這次，廣西北伐軍在左翼，除了前哨一二次小接觸外，未有規模的戰鬥，自無若何戰績可言，大家都認為非常可惜。在軍紀方面，比之其他軍隊，一般都好。所以沿途民衆對廣西北伐軍都很歡迎。不過在當時軍隊方面，尚無政治工作人員的組織，所以民衆對於軍隊，僅是一種消極的好感表現，而不是積極的援助。也許是民衆在滿清數百年積威之下，對於革命尚未完全醒覺的緣故。

和議告成由武漢轉赴南京。南北和議告成，湖北方面的廣西北伐軍，及我們學生軍，奉令調到南京。在民國元年的一月裏，由孝感縣乘火車到漢口，我們這些廣西的孩子們，都是第一次見火車第一次乘

火車，大家都覺得非常驚奇與快樂。武漢是革命首義的地方，而又為中國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以前都深印在每一個人的腦中，一旦到來，自然都要多方的瞻仰。其時租界尚不許帶武器的（即帶刺刀）士兵進去，我們僅能在中國地界裏行走。又因作戰時，房屋多為清兵所焚燒，除了很少的一部份外，其餘都是殘磚破壁滿目蒼涼。劫後的市民，正在瓦礫堆中，搭起臨時的家屋，以重建他們的生活基地。在他們的心中，對於清兵固然痛恨，而對於革命軍，亦不見得很歡迎。因為他們的財產，是由打仗而犧牲的呀。我們過江，到武昌城，第一個遊覽的目標，就是黃鶴樓。這是武漢則在歷史上富有詩意的名勝，在小時讀詩的時候，就留有一個深刻的印象。登樓四顧，「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詩境，畢現眼前，胸襟為之一開。尤其對於武漢三鎮煙囪林立的工廠，望得出神。聽說這些工廠，多半是南皮張之洞所手創，無形中就對他起了衷心的景仰。第二個目的，就是起義門。這是由湖南方面第八鎮新軍及陸軍中學生首先進入武昌的城門。在其右側的楚望台上，曾經架炮轟擊兩湖總督衙門，掩護步兵進攻。致使兩湖總督瑞澂倉皇逃走，完成武昌城的佔領。這種歷時不久的革命史跡，是多麼令我們注意與懷念啊！在漢口停留三兩日，乃坐長江的民船，用輪船拖帶下南京。沿途浩浩蕩蕩，每經過一個名勝地點，如田家鎮、湖口、小孤山、采石磯等處，都使我發生一種歷史的回想。到了南京，這種感想，就更加興奮了。南京是前明及洪楊時代民族革命的首都，今日又為民族革命的首都，其意義之重大，與名勝古蹟之多，又遠非武漢所結及。我家初到，駐在小營，即陸軍小學舊址。後又遷至鼓樓南小桃園之端方公館。一個滿清顯宦的安樂窩，忽然變作我們小兵的駐所，真是革命軍人最得意的報酬了。日常無事，則結隊遍遊城裏城外之勝蹟。明故宮、明孝陵、靈谷寺、雨花台、莫愁湖、鷓鴣寺、秦淮河、清涼山等，都為我們初到時首先暢遊之地。

廣西北伐軍隨後出發者，尚有兩部：一為陳裕時統率之邕龍兩標，（每標約等一團）此部係蔡松坡

在桂時，以舊防營改爲新軍者，龍觀光陳炯明曾任總統。因分駐於南甯龍州兩地，故以鬯龍標稱之。這兩標係由西江乘船至廣州，再乘海輪北上。到達南京，在我們之前。曾參加天寶城之攻擊以勇敢善戰，爲當時所稱許。另一部爲藩台王芝祥統率防營六大隊（每大隊約五百人）係由湖南湖北沿江而下者，到達南京，在我等之後，因紀律不佳，在小營被全部繳械。其後以各部桂軍合編爲陸軍第八師，由陳之駿任師長，趙炎午陳裕時分任旅長，此即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死守南京馳譽全國之八桂子弟也。

度過流浪生活後再進陸軍預備學校。廣西學生軍敢死隊以任務完畢，宣告解散。全體隊員轉送入南京入伍生隊，以爲升入軍官學校造成軍官之準備。但隊員中有許多普通學生，不願從軍而仍願繼續其未來學業者。故在南京入伍者僅半數有餘耳。南京入伍生隊爲各省學生軍合併而成，共約一千數百人。沈靜氏（靖侯）爲總隊長。分步騎砲工輜各科。我分在騎兵科，入騎兵隊。不久因隊中官長多爲他省陸軍小學的同學，學識與我差不多。而且又沒有部隊之實際經驗，全部僅有馬數匹，設備多不完全，所以我對前途，非常失望。乃請求退出廣西學生軍隊員，同時請求退出者甚多，四兄天擇亦其中之一也。

我自退出入伍生隊，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既無書可讀，又不能做事。而我又不能在一無成就之時，回到老家去，致愧對我的父母。甚至我所需用的旅費，亦不敢在家信中提及。在南京流浪了兩三個月，情緒至爲無聊。其時我族兄劍鳴及陸軍中學同學朱良祺李孟庸等，同在湖北都督府常參謀。我毫無目的，又跑到武昌去，同他們住在蛇山南麓的兩廣會館，仍舊過着流浪的生活。他們一個月祇有二十串錢的薪水，而且是一月拖一月的，才能夠領下來。自己已經夠苦，再加上供應我的食用，自然更困難了。是以常常弄得朝不保夕，有飯無菜的過着艱苦的日子。到了秋天，南京入伍生隊奉令改爲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設在武昌南湖。以前湖北南京清河各陸軍中學未畢業學生，改爲陸軍第一預備學校，設在清河（北平北四十里）。南京入伍生都到武昌集合。劍鳴兄亦準備北上入學。我這時才追悔當時不應核孟浪

請退，以至弄到進退維谷。後來由劍鳴兄設法並得李抱冰先生的幫忙，乃得復學。數月來流浪生活，始告結束。而我在這流浪期間所受之教訓，亦最深刻。所以我入學之後，就抱定宗旨不鬧風潮不參加政治活動。一直到軍官學校，我這宗旨，都未變過。因為我曾經受過深刻的生活教訓，自己學業未成。不能遂行自己的主張，卽生活亦要受種種壓迫也。

陸軍預備學校卽以前陸軍中學之變相，課程有國文、歷史、地理、物理、化學、辯學、圖畫、幾何、三角、代數、步兵操典、外國文（分英德日法俄五種任擇一種），其程度約等於今日高中及大學的一年級，兩年畢業。因入伍生隊的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有陸軍小學未畢業，或僅高等小學程度者。乃加三個月之補習課程，並舉行甄別考試，始正式上課。一切設備，皆極完全。教員亦多飽學之士。所以在短促的兩年當中，將全部課程教完畢業，考試時，全般的成績，亦都不壞。這不能不歸功於師長之熱心教導，和軍事管理的嚴密了。

我在陸軍小學時，學的是英文。到了陸軍預備學校，因羨慕德國的陸軍，乃改學德文。起初教我們的是一個德國人格拉氏先生，當我二十六年主政湖北時，他尙僑居武昌，曾來看我，已是七十餘歲的老翁了。以前陸軍學堂對外國文非常重視，由小學中學，一直到軍官學校，外國文都佔很多的鐘點，用意是在養成能通達國際形勢的國防幹部。可惜同學中精深的很少，而我更是中途棄置，及今思之，尙深悔憾！

國文也是學校裏很重視的一科，但是課本的取材，與教授的方法，是太不合理了，我記得在陸軍小學的時候，開講頭一篇國文，就是太史公的「項羽本紀」。到了陸軍預備學校，頭一篇是莊子的「秋水」，其餘都是唐宋各大家的古文。教授這種文字的意義如何，現在想起來，還是莫名其妙。當時教授國文，大約是明理第一，文法還在其次。我對於古文，也曾下過苦工去揣摩簡練，想仿效某一家某一篇的

作法，但是畫虎不成，反而類狗，白費許多腦筋，總不能有所進益，後來隨便讀些散文，隨着自己意思，自由寫作，倒反覺得易於進在步。那時候，新文化運動尚未發生，一切的記述，都要帶些古文意味，才可入眼。有一個同學名叫黃良，他把校長金永炎先生的訓話，用湖北的語調，或北京調，描寫出來，裏頭有很多「嚙們」、「你家」、「要不得」、「麼子」等字樣，這篇詳盡而很生動的日記，呈上去，教官打了很多的叉叉，同學們當作一個笑話來講。現在想起來。實在倒是語體文字的先鋒。

人類的意識，多是後天環境形成，而不是先天所具備的。我之所以反對舊學，信仰新學，是因為我自小就未讀過舊學，而接近新學的原故。有些人已經讀了舊學，因為受到一種新的實際的刺激，而感覺到舊學的空虛無用，而從事於革新運動。但是他所受的損失與困難就太大了，即就新學中各種科目而言，學生對於某一科的興趣與認識，都是先由於環境的被動，而轉變為內心的主動。我在陸軍預備學校的時候，因為聽見很多人說國文、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的重要，所以對於這幾門功課，多用一些功夫。到了軍官學校，對各種兵的分科，也是聽見人說步兵的範圍廣大重要，所以就志願學習步兵科。這並不是我不宜於其他各兵科，而是被動的走入步兵科裏而去。並認為其他的兵科，都沒有很大價值的緣故。所以我以為國家社會及學術界的先覺者，必須造成一個進步的正確的環境及事實，使後學者有認識，有遵循，而後才可大量發展他們的天才。天才不過是事後的比較的表現而已，決不是先天注定某一個人宜於某一種學科，而不宜於其他學科的。

在陸軍預備學校的兩年當中，校長換了四位。第一任為金永炎先生，第二任為應滄翔先生，第三任為史國鈞先生，第四任是解朝東先生，學生對於學校，總是不滿的，總以為換了校長，就可以滿足所冀。但是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伙食是愈換愈壞，教育用品是愈換愈少，弄到最後，大家都不希望改善，祇是希望能夠早一些畢業就算了。後來到了軍官學校，亦是同一現象。這種情形到處皆然，我不知是中國

辦事的必然趨勢呢，還是學生觀念的錯誤？這真是建國前途的極大障礙！

武漢爲革命首義之區，亦爲事變最多之地。我在那裏住了兩年多，中間經過好幾次紛擾。武昌長街樓鼓洞時時見到血淋淋的人頭，掛在那裏示衆。有一次，一個湖南人姓蔣的同學，也因爲謀亂而被拿去殺了！幾幾乎危害到全校。在我當時，因爲抱定宗旨要把學業修讀完畢，所以對於這種變亂的前後因果，一些也不過問，一些也不知道。好在這變故，結果總是政府當局勝利。所以學校也就平平安安的過去。我也得順利的讀完二年的功課，而至畢業，真是大幸！

心神不安與回籍奔喪 民國三年的夏天，學校期考已畢，就要放暑假。我忽然感得心神十分不安。同時非常想回家去一趟。而暑假的日期，祇有二十日，計算來回的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夠的。又恐怕逾期，就要受開除學籍的嚴厲處分。但是這種顧慮，終遏止不住我的歸心，弄得我好似發狂的樣子，遂不顧一切，而自行南回。及回到了容縣城，方知我父已於半月前逝世了！我得到這個噩耗，痛不欲生！自從我出門求學之後，祇回去兩次。每次見我父親，時間都是很短。不料這次短別，竟成永訣。罔極之恩，遂無從報答矣！諸兄因我畢業在即假期有限，不欲我回來，故不電知我。我亦不自知得何暗示，而毅然歸，獲盡喪葬之禮，亦事之不可解者也。留家僅數日，告筵禮成，即行起程返校。由我家到武林口乘輪船，約三百餘里，費兩日時間，就趕到了。沿途不停的由香港到了上海。其時正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戰爭爆發，協約國在黃浦江之海軍兵艦，戒備甚嚴，即行旅者，亦有所感覺。到武昌時，已逾假數日，學校因戰爭延長假期，我遂未被開除，可謂不幸之幸！

畢業後的入伍生活 民國三年冬，我畢業於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成績僅屬平平。奉令由漢口乘火車到北平入伍，一個嶺南山國的人，初次走進中原的地域，在一望無限的大地上，馳驅了兩千多里，處處都感覺得胸懷的舒服。到了北平，我分發在北苑的陸軍第十師入伍，師長是盧永祥，後來他調到上海任

淞滬鎮守使，不久，又做了浙江省的督軍。有些同學，則分發在南苑的陸軍第八師，或者是在保定。在各師入伍的同學，並不是集合在一起。而是每一連內，分插數人，與連內的士兵共同生活。但陸軍部對入伍的教育並沒有整個的計劃，祇是任各師官長隨便規定。甚至是毫無規定，祇是隨隊出操上講堂。而且當時各師長官，尤其是下級官，大多數是行伍出身，根本就不能教育或認真管理我們。各下級官對我們的態度：第一種是客氣。因為我們入伍是暫時的，犯不着認真。第二是妬忌。以為我們將來畢業後，就要爭奪他們的飯碗。第三是輕視。他們自己以為有了許多平時戰時的閱歷經驗就夠了，學堂裏的科學，在軍隊裏，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我們入伍，得不到什麼良好的效果，僅僅對當時軍隊裏好壞的情形，知道一些，就算挨過了半年入伍的階段。

那時的北洋陸軍，多半是袁氏小站練兵時候，將舊軍改變而成，在編制與形式上，倒是很整齊劃一的。但是內容與技術上，却是很陳舊腐敗。高級的將官固然大多數是短期改造的舊軍官，中下級幹部亦都是隨營學習或行伍補充的。我們在隊伍裏所最恐怖的，就是每一個營連部門口，掛着半截紅半截黑的兩條軍棍（又叫火棍），和兩個虎牌，差不多每日都有人要嘗着軍棍的滋味。視罪過的輕重，定打數的多寡，有的打得要死，大半月不能將養復元。我們那連的連長，也時常挨打，他被打之後，還笑嘻嘻的對我們說：「今天又領了二百」，在他們的心目中，對於挨軍棍是很平常的事情，好像每月領餉一樣，習為慣常，行所無事。有些甚至對我們及士兵說：「那一個大官不是由軍棍打出來的」？我們想：「這種不知羞恥的軍官，怎能為國效死力呢」？但是這種刑罰，也有因人而施的模樣。學校出身的人，受到的極少。曾聽見說：「有一個學生出身的軍官，因被打軍棍，而自殺」！想這就是由於學生能發自尊自愛的原故。

袁世凱要做皇帝，在北洋的軍隊內，很早就做了政治工作。我們在隊伍裏，每星期必有一兩次的講

道。講道時候，把袁氏的大照片擺在講台上；講道的人，都是穿長袍馬褂的文人；講的內容，都是袁氏已往的功業，及在高麗被人炸斃不死，可信天命攸歸等神話，以及對民國創造的功績。這種講演的用意，在我們心裏，自然明白。而一般頭腦簡單的北洋官兵，則不免受他的麻醉。此外還編有一些鼓詞歌曲，專門詆毀 國父及南方反抗他的革命黨人。我們聽了，不但生氣，而且感到肉麻！但就此種辦法而論，實開軍隊政治工作之先河。在袁氏則叛國稱帝，倒行逆施，終無補於失敗也！

民國四年五月九日，我們幾個同學正在閒談，忽然同學尹作翰哭喪着臉，跑來告訴我們說：「政府對日本所提二十一條款，已經承認簽字了！」好些人聽了這話，跟着痛哭起來。我狠嚴正的對他們說：「哭有什麼用處？我們應該拿出自己的力量，來挽救國家的命運」。於是我們這班同學，就開始對袁世凱起了痛恨的心理。等到他改元稱帝，反對就更加堅決了。

升入保定軍官學校 我們在四年六月間，入伍期滿了，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的第三期。我學的是步兵科，這時的校長為曲同魯先生，教育長是楊善德先生，他是老辦教育的，相當得到我們學生的信仰。那時在校的學生，有第二第三兩期。大多數都是南方人。而且大多數都參加過辛亥革命軍事的行動，因此袁政府非常不信任。遂借故將曲校長更換，而調派他的親信軍官模範團團附王汝賢先生來繼任校長。軍官模範團團長，則由袁氏自兼。團附及幹部，皆為其親信之高級軍官，學兵皆由北洋部隊保送，或在北方招考者。其目的在養成帝制之陸軍幹部，以替代軍官學校，袁氏死後，始解散。一部改為保定軍官校之後期生。

王校長不學無術，而具有十足官派。初到校，很想討好學生。對於伙食，十分注意，稍有不好，即行棍責廚司。在那時飯食一項，真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好，是值得我們贊美的。後來因為一位同學偷看順天時報，被他查出了，便引起一場很大的風波。原來順天時報是日本人在北平所辦的報紙。日本政

府暗地裏慫恿袁氏稱帝，而他們所辦的順天時報，却明顯的反對帝制。用種種方法，挑動中國的內戰，以遂他吞併的陰謀。王校長以爲看順天時報的人，便是反對帝制的革命黨，於是集全校學生，將那看順天時報的同學，大打軍棍。同學大憤，闐然喊打。王校長見勢不佳，退入校本部，並用電話調附近的陸軍，將全校包圍，所有的槍枝，都繳去了，大砲亦繳去砲門。每一班都派兵一排，武裝監視，情形嚴重已極。一直監視了一個星期，見我們沒有什麼舉動，才把兵撤退。從此我們學校就成爲一個無武器的軍官學校，一直到袁氏死了，才把武器發還。

袁氏死後，王校長也隨着調開。繼任的校長是由教育長楊善德升充。自從學校繳械風潮發生，有好多同學跑到天津，從事反對帝制的運動，我雖然知道，也有人邀我去，但是我立志要待畢業後，才參加各種工作，都一一婉言辭絕了。袁氏死後，跑到天津的同學也陸續回來。有的因爲曠課過久，而被延期畢業。

求學時代得失的檢討 民國五年的冬天，學校舉行畢業考試，我也僥倖得到一張畢業文憑。從此我的學校生活，便告終結。若講到學問方面，真是慚愧極了。原來我在陸軍預備學校，就沒有好好將各種自然科學的基礎打好。及到軍官學校，更懷了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爲一個將領，祇要勇敢不怕死，戰略戰術運用得確當，便可以克敵制勝。而忽略了科學技術，與工業物質，乃是國防軍事的基本條件。不但我們學生多數如此，即我們的教官先生，也祇祇見到一科的一方面的技術問題，而缺乏全般的綜合的基本指導，這真是數十年來中國國防軍事不能進步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在軍官學校的時候，對於含有自然科學性的幾門功課，都非常疏忽。比如兵器學，祇認爲是學炮兵科的專門技術，而不懂得武器在軍事上有決定勝敗的意義，凡是每一個軍官，尤其是高級將領所必須注意研究的。單就一門兵器學他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就包含物理化學數學氣象學地形學等許多基本的學識。若更推想及兵器製造及其來源，則科

學的範圍更是廣大而重要了。

如右所述，我的觀念雖不免有錯誤的地方。但是對於戰略戰術，確曾用過一番苦功。不但對學校所定課程，精心研究，即當時出版之此類書籍，我都瀏覽殆遍。我對戰術戰略課程，不是分數主義，而是困難主義。有時教官被我弄得很為難。這使我後來應用上得到很多的益處。至於其他的課程，就完全是分數主義了。必定到了臨考試的時候，才拿來翻一翻，把他的要點，加以強記，來應付考試。有些教官，甚至說：「祇要你不交白卷，總可給你及格的分數」。可以想見我們的乖謬；而担任本課程的教官，亦陷於同樣不重視其所授課程的毛病。其實他們的目的，祇謀課程紙面上成績的好看，對於學生真正的學業，根本是不負責任的。

先生授課的熱情與學生的學業，關係是很大的。我回想由陸軍小學而陸軍預備學校而軍官學校，許多的教官與先生，除了他所担任課程的基本學問之外，還要有豐富的熱情。如果沒有豐富的熱情，即使有很好的學問，也不容易使學生領受。記得在預備學校的時候，有一位教代數的崔朝慶先生，他的數學，在當時是很有名的。但是他已經六十多歲，熱情是很低落了。一口揚州話，不易聽得懂，面貌又怪可怕的。結果，學生都不願聽他的課，自然得不到很好的成績。反之，另有一位先生，他的學問並不見得很高明，但富於教授的熱情與方法，學生都十分願意聽他授課，而收到極好的成績。因此，我覺得一個好學者，並不是一個好先生、學校所需要者，乃是好先生，並不一定是好學者。這種情形，在高中以下的學校，尤為顯著。

學成回里 畢業後，照例要發到各省各部隊去當見習官，分發的地方，雖說由各人志願，而大部分發回本省。因當時陸軍部對於造就之陸軍學生，尙未有一個如何使用的計劃，而且北洋政府對於軍官學生，基本上就不信任，所以分發到各省去，任由各省當局，自由錄用。亦即任由這班學生自尋出路的意思。

思。

我於民國五年的年底，乘津浦鐵路南下。此路通車不久，一切都簡陋，行車時，頗覺頗爲厲害。以與今日行車設備比較，真是差得太遠了！到南京，轉車到上海，完成了一次新的陸路旅行。到了上海，改乘輪船，直駛廣州。這時的廣東督軍爲陸榮廷氏，是不久以前從擁護帝制的龍濟光手內奪來的，曾經過大半年的戰事，戰事停止，尙未很久，是即所謂討龍之役。我到家時，已經臘盡，遠方遊子，千里歸來，天倫之樂，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我自宣統元年負笈遠遊，至是整整八年，中間雖經過不少的困難波折，而在學業上，總算告了一個段落，這不僅是我個人稍可自慰，而對我泉下的父親，及堂上的慈母，更給予莫大的安慰啊！

五
十
回
鏡

三 在陸、譚部下當下級軍官

晉省報到。我在家逗留不久，就動身到南寧去報到。南寧是廣西新遷的省會，古稱邕州，在邕江的北岸。有小汽船，東通梧州，西通龍州與百色，交通頗爲方便。這是我第一次去新省會。由我家鄉到南寧，多半先到梧州，再搭輪船西上，經過藤縣平南桂平貴縣橫縣永淳等縣，全程約五百公里，爲西江上游最長的航線。可是沿途風景，比之桂江，覺得太平凡了。河道亦平暢易行，祇有橫縣下的伏波灘，最稱峻險，破舟傷生之事，時有所聞，行旅至此，多有戒心。灘下常設救生公所。我在十四年時，亦曾於此遇險，其救護至爲得力。岸上有馬伏波廟，上下船隻過灘後必鳴號以致敬意。馬伏波將軍在廣西之偉績，僅在一個河灘上，爲旅行人所景仰，亦可謂徒見其小耳！

廣西遷移省治之事，在宣統三年，諮議局已有人提議。其理由是桂林太偏東北，交通不便，軍事政治都難顧及。全省贊成者，多爲大河一帶的（即梧州潯州玉林南寧龍州百色等府屬）議員，此爲當時諮議局一個重要的爭辯案。後因政局改革，遂無結果。民國二年後，陸幹卿（榮廷）主政，乃將此案重提。陸氏是南寧武緣縣人，（後改爲武鳴）主張遷省最力。省會乃隨其人而遷至南寧。迨二十五年，又遷回桂林。桂林失去其省會資格者二十三年，至是始又恢復其地位，亦一歷史故實也。

陸榮廷在兩廣勢力的發展。在未述我在陸譚部下充當下級幹部的情形之前，先得將當時廣西的軍事政治，作簡單的說明。陸幹卿在民元末改革以前，已至提鎮地位。當民族革命高潮澎湃的時候，思想上多少要受到一些影響。廣西之宣佈獨立，他自然是一個重要脚色。鼎革之後，各省對於望風使航宣佈獨立的滿清大吏，多不滿其所爲，而攻之使去。彼輩亦甚爲願趁此下台，作保存生命財產之計。故沈炳堯

王芝祥之離桂，實勢所必然（沈以湘桂聯軍總司令名義領軍出發，至湘，卽逗留原藉。王率兵至南京後辭職），而陸氏以副都督之地位，又爲本省人，其受桂林人之擁護而得任都督，亦爲非常順利之事，而無待強求者。同時廣西內部情形，原極單純。辛亥後，新軍及各省之新舊人物多已離桂，陸氏以舊軍之領袖，經民國元二三四四年之經營，自可成立一個完整之力量。不但爲本省所擁護，亦爲外間所重視。

袁氏帝制發生，龍濟光盤踞廣東，逞兵殘暴，效忠袁氏。當時唯有陸氏之力量，足以討龍。唯有廣西地位，易於攻粵。所以胡展堂梁任公諸氏，不惜風塵僕僕，遠道入桂，無非要利用陸氏之力量與地位，以討袁討龍，遂啓陸氏軍隊入粵之始。龍氏既去，陸氏勢力，乃更伸張，而至掌握全粵。及護法軍興，力量更發展到湖南。此爲陸氏之黃金時代，亦爲粵桂戰事之開始時期。我認爲此種歷史之演變，不是出於陸氏等某一個人之本身，而是環境和機會造成之事實。古人所謂時勢造英雄，就是這個道理。我在陸譚（浩明）部下當下級官，由他全盛時期一直到他崩潰時期，雖然處在一個很微末的地位，不能全般明瞭當時之內幕，但自己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對於他們命運，都有相當的關係。

其時廣西督軍爲陳炳琨氏，省長爲李靜誠氏。陸氏於是年春間，入北京謁見黎大總統。出京後，卽奉令爲兩廣巡閱使。在表面上雖爲酬其討龍及擁護共和之功績。其實兩廣區域，盡在其個人勢力範圍之下，亦等於順水人情耳。陸氏回粵後，乃以譚浩明氏爲廣西督軍，陳炳琨則調廣東督軍，旋又調兩廣護軍使，而以莫榮新氏爲廣東督軍。

陸氏等都是舊軍出身的人物，他們的部隊，自然以舊軍爲主。舊軍的編制，卽係前清所遺下的巡防隊的組織。統領統轄兩營至六營，統統統轄兩營至五營，督帶統轄兩營至三營，管帶統轄一營。每營分前後中左右五哨，每哨官兵一百名，設正副哨官，下設哨長，每哨八棚，正哨四棚，副哨四棚，五哨爲大營，三哨爲小營，邊防用大營，內地用小營。以後復將統領等名稱改爲正司令副司令。民國初年，編

爲陸軍混成旅。嗣後又增編爲兩個師。皆係將原有巡防營改換名目而已。第一師師長陳炳焜，後改陸裕光。（陸氏長子）第二師師長譚浩明，因爲編制複雜，即在同一隊部中，其官兵多寡，亦有不同。所以陸氏當時有多少實力，確數很難知道。不過據估計，民五以前，全部至多不過兩萬人，民五以後，在粵逐漸擴充，共計不過五萬人。這是陸氏兵力的概況。

陸氏時代的政治情形，更無足稱述。民元，陸氏以督軍兼攝民政，民二至民五之巡按使或省長，如張鳴岐田承斌王祖同，皆爲袁氏北洋政府所任命。馮張鳴岐任期超過一年。張氏爲陸之舊上司，陸氏對之，尙相當敬服。其餘任期，皆爲數月。且多承陸氏之意旨，以爲去留。民五以後，如陳炳焜、劉承恩、李靜誠，皆爲陸之私人，去留動作，皆唯陸氏之命是聽，真如告朔之餼羊耳。

我在桂軍第一師見習 我們第三期的畢業同學，都分發在廣西陸軍第一師見習。當時廣西的軍隊，以防營佔大多數。陸裕光的陸軍第一師雖號稱新軍，亦甚腐舊。旅團長及許多幹部，都是舊軍翻新的。而且組織不健全，人數不充足，不但第三期新畢業回來的軍官學生，無可工作。就是畢業了好久的第一第二期的同學，亦仍在那裏充當見習官。所以大家對於前途，非常失望。

一個剛由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總是自視很高，時常抱着一種學校萬能課程萬能的觀念。及到了部隊裏去，無論是好部隊壞部隊，都有許多實際問題，與實際生活，是學校裏所沒有的，非得細心去學習不可，部隊長官亦有領導教育的責任，見習的意義就在於此。可是你到一個不健全的部隊裏去見習，部隊長官總是採用放任的態度。聽由你自己去摸索，結果，弄得有些人僅是學得一些軍隊實際生活，甚至是一種惡生活，而反把學校裏所學的基本學術，都荒廢了。這種情形不但是我們那時所感到的，就是現在，亦是如此。真是國家與個人的極大損失，以後應當如何去設法補救才好。

和盤珠那談治學 我在見習期間，因爲空閒無事，常到我同鄉盤珠那先生處談天。他是前清的秀才

，後來到美國去留學回來的。一個秀才，又是一個西洋留學生，很引起我的崇拜，我曾請教他對於修習學問的方法，並介紹一些增長學問的書籍來看看。他答復我說：「學問的範圍太廣泛了。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一不含有極大之學問。你不要以為我留學回來，便有什麼了不得的學問。其實我僅僅是學了一些農業的專門智識，其他學問，種類繁多，不論泥水木匠，和一切農工商礦人等，都各有其他專門學問，不是一個人可統統學得了的。正如你在軍官學校畢業，在我看來，你就是一個軍事專家。但是我相信你在軍事範圍之內，就未必學得完全，何況其他部門。我以為研究學問，一切不可把學問當成一個神靈，一個偶像，對他迷信向他膜拜，而祇是向很平凡的生活中去追求。能夠體察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道理，便是很高深的學問了。你更不要以為我是一個秀才，便有很多中國的舊學問。秀才不過會做兩篇八股文章，根本談不上什麼舊學。但即使舊學精通，而此等學問，亦祇是在倫理上有一些當時的時代價值。但是到了現代還有價值的，是太少了。你說要介紹學問的書籍，我實在不能指定某一種書可以介紹給你。歸根一句話，你所需要的學問，是要你自己在實際生活中去追求」。我聽了他這一番理論，細細體味，覺得頗有至理。這於我以後為學做事，有極大的裨益。

陸軍模範營成立我開始帶兵，是年夏間，當局擬創辦陸軍模範營，為改造舊軍之基礎。同時因尚有陸大及保定軍官學生也藉此設法安置，適馬曉軍先生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來，頗為當局所重視，令他負責主持其事。當時廣西士官學生，僅彼一人。彼嘗以唐人詩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入春色不須多」。自譽，蓋舊軍多綠林出身也。

後來模範營府於廣西之軍事改革貢獻頗多。而陸、譚政權最後之消滅，多出當日陸軍學生及模範營份子之手。與滿清建新軍而覆亡於新軍者，如出一轍。則又非辦理時始慮所及，殆亦為新陳代謝自然之理歟！

陸軍模範營成立，卽任馬曉軍爲營長。馬子駿爲營附羅經爲副官，朱爲珍曾致沂黃旭初蘇端爲連長，我與白劍生徐啓明、余志芳、鄭昌培、許漢深、夏威、周已任、張守義（卽張淦）陽鑑、况永、陽應照、李先復、潘啓堅、杜柏、楊幹、况淑、廖先、梁朝璣、黃中聰、徐耀祖、馮毅剛、黃駿等爲連附。這種不按編制的許多連附，完全爲安置無工作的學生而設的。招考學兵六百餘人，多爲高小畢業生。並由第一師抽調優秀士兵，先期加以訓練，派充班長。故幹部士兵程度，水準頗爲整齊，實不愧爲當時之模範也。

我在第三連充當連附，連長爲黃旭初。李先復、潘啓堅、杜柏、况永、楊幹、况淑也都充當連附，同在一連，這是我帶兵生活之開始。那時我無論在管理方面，訓練方面，都很用心去研究學習，經驗學術，增進不少。所以在短短的三個月中，頗能把握士兵心理，而得到其信仰。同時由於自己肯勇於負責，故亦頗得同事們的敬佩。

模範營參加護法戰爭 是年的秋天，模範營奉命出發湖南，由南甯乘汽船到平南縣縣間之滾江圩登陸，經蒙山荔浦湯朔而到達桂林。在桂稍事休息，再經靈川與安全州而到達湖南之零陵。本營因成立未久，訓練未完。而學兵皆爲學生，年輕體弱，官長經驗亦少。在長途之強行軍中，自然暴露很多的缺點，而以士兵落伍爲甚。到達零陵後，奉令留駐永州，繼續訓練。在永訓練期中，營內增編機關槍一隊，我與白劍生夏煦蒼（威）自己請求調爲該隊隊附。因隊長無適當人選，遂不設置，凡事皆由我們三人商量辦理。我們因歷年同學，而又見解相同，辦事頗爲順利。實開部隊無首長之先例，亦爲奠定此後統一結局合作精神之基礎。不久，三四兩連調駐祁陽，我乃離隊，仍回第三連服務。

護法之役，原起於北洋政府之毀法。一部份國會議員南下，以護法名義，在廣東組織軍政府。而出兵湖南，則由於湘軍之驅逐湖南督軍湯壽潛。湘軍力薄，屢戰不利，被迫退到寶慶及湘南一帶，乃聯合

兩廣桂軍，卽利用護法名義，出師北伐。兩廣桂軍亦恐北洋勢力南下，危及兩廣之根本，同時亦可再向湖南發展其勢力。所以願意和他們合作，雙方真意所在，固不關護法與毀法也。湘軍得兩廣桂軍之增援，將北洋軍隊及湯薊銘驅逐，收復長沙，挺進岳陽以北。譚浩明氏以廣西督軍之地位，率兩粵桂軍入湘，一切均由其支配。到零陵後，被推爲護法軍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實由其本身力量所創成也。

譚氏抵長沙後，因原有衛隊皆爲防營舊軍，難免貽笑大方。其左右獻議，聯軍總司令部應有訓練成熟紀律良好之隊部，作爲衛隊，以壯觀瞻。乃令模範營開赴長沙，改爲湘粵桂聯軍總司令部衛隊第一營。升任馬曉軍爲副司令，兼該營營長。陸軍模範營名目至是取銷。我營到長沙，除担任警衛之外，就是糾察市區之軍風紀頗得市民好評。

我在長沙不久，湘粵桂聯軍就在岳陽羊樓司附近敗潰了。潰敗的原因，據說第一是吳佩孚部隊的增援。吳氏原駐長江上游，對湖南地盤，早思染指。因礙於湯薊銘，而不能下手。湯既被逐，卽乘機南下。吳氏所部，號稱能戰，粵桂聯軍，自難抵禦。第二是由於內部意見不和。蓋譚氏不學無術，徒以桂軍力勢，遠臻聯軍統帥地位，自難得湘軍之擁戴。加以內幕人才缺乏，對於政治軍事，多屬外行。因而入湘後種種措施，每爲湘人所不滿。聯軍戰線，遂形瓦解，自岳陽潰退，直至衡山，方能收拾隊伍，略事抵抗。吳軍節節進迫，佔領衡陽後，復追至祁陽與零陵間之黃姑嶺，始行停止。

我營因係衛隊，皆未參加戰鬥。由長沙經湘潭衡山衡陽祁縣，退駐零陵之東湘橋。桂軍自經此次失敗，始漸感舊軍之不能作戰，對新軍觀念，稍爲改善。因而由我營調去很多學兵，到舊軍去充當教練，並調若干官長到部隊去當參謀。於是我營人事，頗多更動。黃旭初升爲營附，白劍生升爲第一連連長，張守義升爲第二連連長，我升爲第三連連長，寧光升第四連連長，夏煦蒼升機關槍隊長，營長仍爲馬曉軍。此民國七年四五月間事也。

東湘橋爲零陵全州間之一小鎮，我們在那裏駐防訓練的時間甚久，也就是我們在軍事上建立基礎的時期。軍民相處，猶如家人，毫無隔閡。民國二十七年，我與白劍生由南岳回桂，同到該處，訪問士紳徐敬安等，相隔二十年，瑣事猶可記憶，彼此皆不勝今昔之感也！

民國八年的三四月間，據說吳佩孚和陸榮廷彼此獲得了諒解。吳軍退出衡陽，桂軍退回桂境。一場護法戰事，無聲無臭中，就算結束了。我營亦於五月間回桂林。旋又開回南甯。我們平日無他嗜好，唯愛馬成癖，視馬匹無異良友。當排長時，我與白劍生夏煦蒼等，人各一騎，互相競賽。照陸軍規則，步兵下級軍官，本不准乘馬。馬營長因爲取締乘馬，甚至說要拿刀來斬我們的馬脚。但是我們仍多方設法，得以保留。其後在柳州附近，我復以重價購得駿馬一匹。由柳州至南甯，沿途多係坳陵波狀地。道路寬廣，甚合馳騁。我和白劍生並轡前驅，行至半岩圩附近，適值大雨，山洪暴發，路被水淹，有如湖沼一般。我們仍涉水前進，愈進愈深，竟至沒頂。劍生先我出險，我本能泅，但因全身武裝，無由用力，浮沉者再，乃大呼救援。劍生喘息之餘，亦爲武裝所累，不能下水。岸上牧人見我求救，反而逃避。我見救援無望，忽生急智，乃閉氣下沈，幸足可到地，將武裝解除，游至對岸始得脫險。現在回想，岸上的人見我呼救，反而走避，真是怪事。那裏的人，對於見義勇爲捨身赴難的精神，實在太少了。

進剿左江土匪 當時左江土匪猖獗，同正、扶南、左縣、崇善、綏綠等縣情勢甚急，乃派馬曉軍率隊進剿，初到時，因諜報佈置未妥，地形不明，無從着手，土匪劫掠如故。地方人士對於陸軍學生所訓練之新軍，多認爲不能剿匪，而橫加譏笑。同時各縣土匪，總數雖僅有數百，而分幫十餘，日散夜聚，最不易找到攻擊目標。尤其是在駐有軍隊附近的匪幫，早已散而歸農，無從分別誰是匪，誰是民。我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將匪情弄清楚。並想出最有效的剿匪方法，是夜間遠襲。因爲日間進兵匪皆聞風避去也。第一次夜襲，就選擇離我們駐地四十餘里從未有軍隊到過之匪窟弄午峯鄧爲目標。隊伍在夜裏十

一時出發，經過許多崎嶇危險之山隘，到達目的地時，已將拂曉，數十名土匪正在夢中，無法抵抗，而被我們攻破。匪衆都匿於附近山地，及黃昏以後，復集合起來，向我駐地襲擊。幸警戒嚴密，不致爲其所乘。在很短時間內，就將其擊退。但是土匪僅有數十人，而我們使用的兵力，却有三連之多，雖勝不武。次日，在匪村內搜得破槍數枝，並捕獲匪的村甲長數人。而我們長官與當地的縣長，乃多方煖染，向軍政當局報捷，竟邀嘉獎。我心中不免暗自叫聲慚愧。從此也就清楚地方政府及防軍剿匪，是怎樣的以虛偽的情節，向上峯邀功的辦法了。不過經此役後，我們知道這種夜間遠襲的方法，對剿匪確屬有效。土匪根本不能與官軍作正式之抵抗，從此乃更不敢與我隊伍對戰。以後土匪愈避愈遠，我們的部隊，遂以連爲單位，分開使用，範圍亦愈製愈遠。記得有一次，我親率本連，在一夜之間，行軍九十里，遠襲匪窠，將其匪首拿獲。次日仍回到駐地。所以各連在駐地周圍六七十里半徑之內，祇要偵實股匪蹤跡，皆用此法襲擊，使股匪不能防備，不能逃避。在兩個月之間，就把五屬的土匪全部肅清。我們紀律很嚴，第一是不准燒房屋；第二是不准亂開槍；第三是不准擄財物，當軍隊入屋搜查時，必要保甲長隨同監視。待任務完畢，在未離村之前，必將隊伍集合，召集村民，公開檢查後，方率隊回防。所以人民對於我們部隊，非常信任。一有匪蹤，無不立刻報告，亦無不立刻派隊圍捕。統計是役我營未燒過一間房屋，未妄殺過一個人，未擄過一分財物。而所有土匪頭目，除了兩個遠走之外，都擒獲正法。五屬自此以後，平靜數年。當我們部隊開回南寧時，五屬人民皆派代表到營，舉行盛大之歡送。甚且有爲馬營長建生祠者，亦可見人民對我部隊印象之佳且深矣。

新軍不能剿土匪，爲當時社會上之誤解。蓋舊軍軍官及士兵多有綠林出身者，對於匪情，自然熟悉而易於辦理。而新軍軍官皆爲學生出身，士兵皆爲安分良民，不能稔習匪情，當然不易着手。甚至如武建營（前清光緒年間湖北軍隊調廣西剿游勇）之進剿陸王發，幾至全軍覆沒。其實，舊軍剿匪多與匪通

聲氣，兵來匪去，兵去匪來，爲彼此會心的作法。官軍則藉此而邀功，人民乃因此更受其害。最後的辦法，則爲招安。所以匪愈剿愈多，從來未有遇澈底肅清之事實。我們亦深知此次爲新軍剿匪之嘗試，若不努力得到良好之成績，則新軍名譽，更難建立。故在奉命之初，無不兢兢業業，慎重將事，初期亦頗感困難。及後地方情形，日漸熟悉，股匪情報日漸明瞭，工作亦日漸開展，竟收到良好之效果。亦爲此後肅清廣西全省匪患之基本實驗也。我營自此次剿匪成功後，頗得當局信任。乃升馬曉軍爲陸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與該營原來之兩營，共編爲三營。仍由馬兼任我營營長，開赴柳州駐防訓練。此民國八年冬間事也。

當時桂軍一般的風紀 我們在柳州駐訓，不到兩個月，又奉命開赴廣東的肇慶。原因是桂軍在粵，時遭粵人與粵軍之反對。自陳炯明被迫率部赴閩邊後，繼任省長爲李耀漢氏。亦因種種關係，和桂軍不睦。因此桂軍乃派軍隊向李氏之家鄉新興縣進攻。東江方面亦步步增兵防陳氏之率粵軍回粵，我們調肇慶，就是爲接替林虎所部的防務。我到肇慶的時候，派去新興天堂打李耀漢的軍隊，已經勝利回來。他們每隊都擄了很多的戰利品，衣服布匹，家私用具，豬牛雞犬等，莫不應有盡有。我曾聽見第二軍（林虎所部稱第二軍）一個軍官說：「從前討龍之戰，有護國軍的名義，入湘之戰，有護法軍的名義，師出有名，所以官兵都很勇敢，紀律亦易維持，這次作戰，沒有什麼名義可言，祇有准許他們『發洋財』（卽是任意擄掠），才可以鼓勵士兵的勇氣」。我當時聽了他這番理論。對於軍隊要師出有名士兵才能勇敢作戰，軍紀才能確切維持，這一點甚表同意。至於要以「發洋財」來鼓勵士氣的辦法，未免太矛盾了。我不免爲在粵的桂軍起了一種憂慮。雖然李耀漢的問題，表面上是解決了，但照這樣的作風，如不急加糾正，怕的是沒有問題的事情，也要發生問題出來。這位軍官的見解，真可代表當時駐粵桂軍的風氣。後來東江之役，也因同樣的作風，引起東江人民之強烈反抗，而與粵軍聯合爲敵，以致全局失敗。所

以我認爲桂軍在粵的失敗，不是在兵力的不足，而是在軍紀的太壞。不過我得聲明，當時桂軍亦有一部份軍紀是好的。我在廣州撤退途中第一軍的士兵，因爲擄取人民的蕃薯，而爲軍長馬濟民所槍決。這等軍紀，的確算得嚴明；不過懂的軍隊太多，卽有少數好軍隊，亦被反對者一筆抹殺了。

桂軍在粵失敗的情形 當時桂軍在粵共有三個軍，第一軍馬濟，駐省城附近。第二軍林隱青（虎）駐肇慶西江一帶。第三軍沈鴻英，駐東江一帶。此外尙有劉志陸中傑藩等粵籍桂軍。粵軍回粵，沈鴻英首受打擊，其餘各軍，亦都開赴東江增援。

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氏，於民國九年秋，率師自漳州回粵，倡言粵人治粵。粵人久處桂軍積威之下，皆起而響應。桂軍中之粵籍部隊，大都脫離陸莫之關係，而倒戈相向。莫榮新氏自動去職，桂軍在粵之勢力，遂告瓦解。

我們在肇慶住了大半年，約莫中秋節的左右，忽然奉命開赴廣州。這是我第二次到廣州，與前數年的景況，是大不同了。路面寬闊，交通便利，市面也驟然繁榮了許多。這都是楊暢卿（永泰）魏邦平等不顧一切的阻撓開闢馬路的功績，中國歷史上許多奇蹟，都是在不顧一切困難的努力中得來的呀！在廣州市內住了一夜，第二日的夜裏，我連又奉令開赴東郊的農林試驗場已取銷的軍政府內，向瘦狗嶺石碑方面，担任警戒。蓋當時東江方面桂軍着着敗退，廣州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矣。我在廣東大約半個月的時間，東江潰敗的桂軍，已退到廣州附近。將帥意見分歧，兵無鬥志，已不能再戰。乃分路向北江西江撤退。我們沿粵漢鐵路，經軍田銀盞坳，過四會縣，向肇慶退却。不意在四會肇慶間之蓮塘坳附近，卽遭遇粵軍之截擊。但旋卽爲我前方友軍擊退。我軍退至肇慶峽附近，該處有林隱青所建之洋灰鐵筋堅固工程，原擬憑險固守，因粵軍尙有一部，從四會，經石狗，出綠步圩，包抄肇慶之後路。於是又奉令向梧州撤退。此時各高級軍官皆乘船先走，各軍隊伍混亂已極，但我營紀律，仍舊很好。到肇慶峽附

近時，住在一個棚內，該處人民，以養鵝爲業者很多。一棚之內，養鵝數百令。後奉移去，我們第四連一個士兵，將一個鵝活包在軍毯內，希圖果腹。爲慮連長所察覺，而大打軍棍。但隨後到來之友軍，則將鵝棚的鵝，全數撲殺。鵝飛槍響，成爲奇觀。兩軍相距不遠，相形之下，真使我們啼笑皆非也。入夜，友軍駐地火光熊熊，到處都是，不稍隱蔽。我對團附黃旭初說：「這算是什麼？」他說：「這就叫做露營火。（陣中要務令術語）」大家相顧而笑。行至綠步圩附近，已有粵軍佔領綠步圩東南端高地，阻斷我們退却路線。未能通過者，尚有萬餘人，多係由下級官長統率的隊伍。我營除第二連及機槍隊外，第一連第三連第四連皆未通過，我們三個連長（白黃廖）商量結果，決意由右翼向敵側後進攻，協同正面攻擊之韓彩鳳李宗仁等友軍作戰。激戰至黃昏時候，始將敵擊退，全部安全通過。這次戰事是模範營成立後之首次作戰。除第一連因作戰時間較長，略有傷亡外。其餘皆全師而退。當日間作戰之時，聞空際有嗒嗒之聲，沿江而上。及近，始知爲粵軍之飛機。飛行甚低，速度甚慢。機上既無機關槍，亦無炸彈。僅用木壳槍向我們疎落的射擊。因此我們不受一些損害，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得的威力。這是我見到軍用飛機的第一次。後來飛到德慶附近，爲桂軍散兵用步槍擊落。可見當日飛機在構造方面，技術方面，尚在幼稚時期，決料想不到其在今日軍事上，會有如此重大之價值。

我們進到綠步圩時，已是黑夜。敵人雖然退去，而大火正在燃燒着，把街市的道路阻塞了。成千成萬沒有隊伍沒有官長的兵伙都混做一團。老百姓一個也看不見。打門破扉的聲音，與槍聲火聲交響着。我當時覺得通過這屋焚人亂的火線，比通過敵人的火線，還要困難。萬一敵人夜裏反攻，情況就不堪設想了。這時我連與同營的第一第四兩連，都已失去聯絡。於是我整頓自己的隊伍，官兵手拉手的，緊挨着前進。在我前面的大部隊伍，雖已勉強通過了。但隊尾及我，終於被大火所隔斷，不能不繞道圩後，以致與隊伍脫了一節。當我深夜重復回到所取之道路時，在路旁找到了自己的部隊。他們正以整齊的隊

伍，在那裏等待着。我問他們：「爲什麼還停留在這裏不前進」。他們說：「在連長未會找到之前，我們不能去開連長而擅自退却！」我在這次退却中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而且很知道我的隊伍可用，自信平時的統御訓練，是相當成功的。

次日，我們退到悅城圩。這裏有座龍母廟，是廣東第一個迷信的淫祠。每年陰曆五月間的龍母節，東西北三江，以及廣州香港的善男信女，都要到這裏來進香。相傳最靈驗是求子嗣。無子的人，飲了一碗龍母水，就會生子。無論男女，皆有效驗。所以龍母廟井水，每碗要賣一毛錢。這年的龍母節，我正在肇慶，在那三數天內，把東西北三江的輪船拖渡，不下二百餘艘，都集中到那裏去。輪拖上滿載進香的人，省港澳的大輪船公司，也加開進香專輪。船上鼓樂喧天，笙歌聒耳，把一片廣闊的江面，擁擠得水洩不透。真是我所見的空前熱鬧。他的號召力之大，恐怕要超過抗戰後的總動員！據說那幾天進香的人，總在三十萬左右。他們直接間接的費用，也就難以計算。尤其廟祝們收入的數目，更當非常可觀。據說：這個賺錢的好差使，必須出很多的錢去奔走、鑽營，才可以得到呢！

我們那時覺得非常詫異，因爲沿途的市鎮，都遭受了兵劫，獨有悅城是例外。不但那個龍母廟，未受士兵糟蹋，就是鎮上亦私毫沒有損失，那些散亂無紀律的士兵，到了那裏，也就自動的拘束起來了。當地的老百姓，更是神態怡然，一些沒有驚慌的現象。他們以爲這是洞天福地，龍母會保護他們。因此我深深感覺到中國神道教的力量，要比政治的力量強大得多。政治的革命，要從迷信的改革着手。換言之，欲完成國家建設，若不在教育和科學的根本上加緊努力，則一切均落空談，而無裨於實際也。

調駐百色 我們沿西江撤退，到了粵邊的都城，精神上才脫離了粵軍的威脅。其實當時粵軍亦沒有能力追至綠步圩以上。其他入粵各軍，在是年年底，都退回廣西邊境，重新部署改編。我們第二團起初調駐桂平。不久，調駐百色。百色是廣西西北方面一個衝要的地方，爲通雲南貴州兩省商業上的重要口

岸，亦是滇黔兩省煙土及貨物入口的集中地點。我們揣度當局調遣部新軍到百色去，其用意有二：第一、當時販運鴉片，表面上仍是禁止的，或者需要數軍去作禁煙的工作。但是當局絕無澈底禁煙的意思。第二、當局懷疑這部份新軍人員，會與粵軍勾結，所以把他們調至滇黔邊境，使與粵邊隔絕。這個用意，後來證實了。當民國十年，粵桂戰事吃緊的時候，就把原來第二團的兩營調去作戰，而把一個馬團長及原來之模範營，仍留百色。並且派蒙仁濟的舊軍，同駐一地，形同監視。

當時的百色，是一個最污濁最黑暗的地方，無論什麼隊伍到來，駐防不久，即有許多商家，或商會會長士紳等相與應酬。在應酬場中，花酒煙賭，是必不可少的。其目的是要得到軍隊的允許，或協助他們販運煙土，他們可以給與很大的報酬。甚至可以答應你在運出大批煙土之後，以一小部分作為公開的緝獲，使你在公事上講得過去。百色有句民話：「無煙不成商，無商不是煙」。的確，右江好多條小河輪船，由南甯到百色，終年都載滿了各種外來品入口。但是由百色出口時，却都是空船。其實並不是空船，而是將煙土秘密裝在船的夾層裏，所以百色這個地方，從表面上看一般商業情形，簡直是難以維持的。但是他的情形特殊，永久是這樣維持下去。無論商人及水陸運輸的工人，靠煙土生活的太多了。煙幫有他的組織，有他的自衛武裝。由百色出發，至雲南或貴州時，都是大批棉紗布匹及其他工業品，浩浩蕩蕩，在白天公開的作合法的行動。由雲南或貴州回來，就帶了大批煙土，偷偷摸摸，在黑夜裏秘密的作違法勾當。他們在途中，如遇到小的阻力，即以武裝強行通過。碰到大的阻力，則用賄賂疏通的手段，或繞道通過。有時還會勾引士兵，盜竊槍械，來加入他的集團。我們的第一連，就發生過這種事情。我同白劍生費了很多的時間，很大的力量，才把逃兵的槍枝，追了回來。

百色的瘴氣，也非常厲害。滇黔的商人，都要等到秋末才敢到來，春末就要回去。據說：從前有一個鎮台，帶了兩三千湖南兵，來駐百色。一兩年後，調防他處，僅僅剩了幾個吹號揀旗子的人。不但百

色如此，即龍州方面，亦是如此。記得我前一年在左江剿匪，第四連屢連長頭一日通報我說：「士兵病了三分之一以上！」過了數日，接到他的第二次通報，說：「病了三分之二！」不久，又來第三次通報說：「全部都病了！」請我派兵幫他警戒，隨後我第三連的士兵，病的死的，也就不少。於是不能不將隊伍撤退。那次我們在左江剿匪，沒有一個士兵陣亡。而病亡的，却在百人以上。我們因為左江有了經驗，抵抗力已增強了許多，所以到了百色，染病固仍不免，而死亡率就大為減低。其實這不是瘴氣，而完全是惡性瘧疾。各地瘧蚊，非常之多，一到夏天，即行繁殖。所以滇黔商人，春末回去，原為逃避瘧蚊。冬初再來，則瘧蚊已絕跡也。（惡性瘧疾對於外來的人，特別容易感染，其死亡率也特高。本地人因天然之抵抗力較強，為害較輕）。

革命軍西征陸譚政權崩潰，自桂軍由粵敗退，除了一部份粵籍軍官所統率的部隊，撓降粵軍外，其餘撤回桂境的，尚有數萬人。以廣西之貧乏，當然養不起這許多軍隊。而且戰事雖一時停止，政治上根本的矛盾，無法解決。甚至日益增加其程度，潛伏下次戰爭之機。本來陸氏對北洋政府，早有默契。自此以後，乃更投入北洋政府之懷抱，以自促其最後之崩潰與消滅！

民國九年的冬天，國父開府廣州。欲率兵北伐，因桂軍與北洋政府勾結，恐其乘機進襲廣東根據地。為免除後患計，乃徵調粵黔滇之兵，先行討桂。桂軍方面亦積極部署，以陳炳焜出駐梧州，當西江方面。譚浩明出駐玉林，當南路方面。以沈鴻英駐賀縣，當北江方面。各路共計尚有四萬餘人。雙方厲兵秣馬，一觸即發，粵方以革命為號召，師銳氣旺；桂方則師出無名，意志消沉，謂者早知其不敵也。

民國十年四五月間，陳炳焜親率粵軍第一軍，附以江防艦隊，及飛機數架，溯江西上，集於邵城（粵境梧州下九十里），首破大坡山桂軍防線，直趨戎圩（梧州上游十里）。陳炳焜因梧州腹背受敵，無險可守，不能再戰，倉皇逃遁。所部韋榮昌等，稍抗即退。劉震寰率數百人響應，梧州遂為粵軍佔領，

爲時僅十餘日耳。北江方面，許崇智率粵軍第二軍及滇軍一部，向富賀西進。沈鴻英首鼠兩端，通電請陸榮廷下野。蓋欲取而自代，以周旋於粵桂之間。但內無應者，而外又受粵軍之壓迫，乃率部逃入湖南，依附吳佩孚。粵軍遂進駐平樂桂林。南路方面，桂軍雖一度攻至高州化州，後亦挫敗，退回桂邊，粵軍遂乘機滲入。陳炯明既佔梧州，復揮軍西上。祇在藤縣稍遇抵抗，遂直迫桂平貴縣。陸氏見四面受敵，孤立無援，乃放棄南寧。率其親信，退保龍州。其餘則聽其各自爲謀。桂局至是，遂形瓦解。駐南寧桂軍將領韋榮昌黃培桂等見大勢已去，爲維持地方計，遣使行成。粵軍乃不費一彈，不傷一卒，從容入駐南寧。委韋黃分任善後督辦會辦。但後來又將他們所部，包圍繳械。他們還有許多部隊，散處各地。見韋黃繳械，乃益走極端，遂至無法收拾矣。

我們脫離陸、譚走上新的坦途。我們當時遠在百色，對於這次的戰事，僅知其大概。及至南寧陷落，馬君武充任省長，劉震寰充當桂軍總司令。委馬曉軍爲田南警備司令，將我們原日的部隊，及由南寧退來平日意氣相投的工兵營韋雲淞水警隊管帶陳乘文及陳濟桓等部，合編爲三營。我當第一營營長，白劍生爲第二營營長，夏煦蒼爲第三營營長。韋雲淞爲工兵營營長，陳傑夫爲機關槍連連長。此外復收許炳章一營，共約五營多的兵力，駐紮百色城及附近各縣。自此之後。我們便脫離陸、譚的部屬關係，而轉入一個新的前途。

陸、譚的政權，雖然是崩潰了。而我對於他這一段歷史，因爲知道較詳，就純客觀的看法，其盛衰興亡，都是很自然的。他們能使廣西的老百姓，很平穩的過了九年。雖然沒有什麼建樹可言，在歷史的觀點上，却不無可原諒的地方。尤其對於帝制之反對，共和之擁護，亦有不可掩沒的功績。至於因入粵之演變。而致全局潰敗，入桂同遭浩劫。這是。他們本身知識水準問題，在那一個時代裏面全國各省，都無例外。自不能單獨對他們有所苛責。這是我寫完這段經過後的一種感想。

五
十
回
憶

四 百色失敗與新軍合流

黔軍東窺百色。我們在百色易幟後，所有的部隊，都集中城區附近，對於各方面的情形，多不很明瞭。在這年的六七月間，突然有貴州的隊伍，由南籠、八渡、羅里、陵雲，向百色開進，計三團，共約三四千人，由旅長胡瑛率領。據說是奉令入桂，討伐陸譚者。但我們事前並未得到南甯方面的通知。其實當桂局潰亂之際，鄰省軍隊欲乘機向桂省發展者，實不乏人。而且百色為滇黔烟土出口要地，極易引起軍隊之垂涎。討伐陸譚，祇是一種表面文章，藉以對外標榜而已。當其到達時，陸譚已經下野，我們亦已易幟。雖無所藉口，而彼戎戒備，非常之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後因黔軍兩團長陸西川劉莘園，皆為保定軍官同學，彼此因學誼關係，感情日漸融洽。同時粵軍蘇廷有所部，同駐百色，互為排解。且陸譚舊部，紛紛向百色方面集中，雙方同感威脅。乃將相併之意，化為相倚之勢。黔軍在百色，適值夏秋之間，病死半數，所餘者亦皆病兵，已不能行軍作戰。乃奉令由水路乘船開柳州，轉回貴州。在途復遭陸譚餘部襲擊，打死病死者甚多。聞到柳州時，僅餘八百餘人，亦云慘矣！

進剿陸譚殘部 自南甯陷落，陸譚殘部都向龍州及南寧以北之思恩府屬退竄。有一部數百人，竄至東蘭縣，散兵無餉無食，劫掠自所難免，東蘭屬田南警備範圍，我奉令率本營及新收許炳章一營，馳往剿辦。當地人民因久受散兵之蹂躪，對於進剿部隊，非常幫忙，伏役飲食，盡力供應，情緒之熱烈，實為我帶兵以來所僅見！我在中途墜馬，受傷甚重。然仍扶傷進剿，蓋不負人民之渴望也，在東蘭附近經過數小時之激戰，卒將散軍驅逐。因尚有其他方面散軍，多向百色集中，復奉令回駐百色，以固根本。撤回時，人民恐慌萬狀。蓋深恐以前歡迎熱烈之程度，即為散軍復來報復之藉口。人民在無政府保障

狀態之下，其啼笑皆非的情形，真堪令人浩歎！

我們在百色的失敗。我率隊回駐百色以前，駐百色之粵軍，已退回下游。而散軍之聚集百色附近者，約五六千人。有由南甯思恩方面竄來者，有由龍州靖西方面竄來者。因粵軍正從那兩路進攻，使他們不能立足也。散軍首領爲劉日福、陸雲桂、馬玉成等，初到時，因彼此同屬桂人，尙覺相安，但新舊之見極深。尤以我軍易職，爲彼所最恨。而南甯方面，亦派代表前來，接洽收編。彼等原無誠意，起初則虛與委蛇，後來散軍愈集愈多，我軍更形孤立，而且我新收各部，及臨時補充的新兵，大多傾向舊軍。劉日福見有機可乘，乃將我軍包圍繳械。當時我軍數量，相差太遠。加以內部軍心不固，竟至不能抵抗而瓦解，這是我們帶兵的最大之失敗與恥辱！考其原因，第一、對彼我之力量，毫不顧及，既不能以力取勝，又不肯退避以保存實力。第二、一般心理不明瞭。陸譚雖下野，但多年歷史情感的關係，不但舊軍懷念故主，憎恨粵軍。即我們自己的部隊，在平日既不能作公開之反對。改編後，亦未有新的認識。一旦形勢轉變，自難把握得住。第三、劉日福以舊軍宿將，欲強其在新進者之下，收編就範，實係妄想。有此三大錯誤，因而招致失敗受辱，亦可謂咎有應得，非偶然也。

「廣西自治軍」之產生。劉陸等既將我軍繳械，並將南寧代表驅逐，自稱爲「廣西自治軍」。由各散軍首領公推劉日福爲自治軍總司令，組織總司令部，進兵平馬（恩隆）。與思恩方面林俊廷、陸福祥、陸雲高、蒙仁潛等相呼應，勢力頗爲浩大。

桂軍雖屢次戰敗，除了劉震寰所部及我們所部接受新政府編制之外，其餘皆散處各地，數量並未減少。復因粵軍在桂，紀律極壞，燒殺極慘，致使人民憤恨。廣西民槍極多，一經團結，立可起事。廣西自治軍之名義與組織，亦遂應時產生。所資以號召者，即爲反對客軍入境，共圖自衛自治。當時發展非常迅速，數月之內，遍及全省。粵軍無法收拾，被迫撤退廣西。在這種混亂局面之下，復經過數年之

久。

自治軍的敵對目標。所謂自治軍者，雖以自衛自治相號召，實際不過地方強烈仇恨意識的表現，並無真正的自治主張與計劃。他們第一個敵對目標，爲客軍。粵軍滇軍黔軍等，皆無妥協餘地。其次，則爲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編之隊伍。馬省長君武爲當時一省人望，亦幾遭不測。餘如劉震寰馬曉軍等，及其所部，皆爲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紹儀（伯山）、譚元翰（伯章）、甘尙賢、甘振賢、黃形燭，何其多。梁培、譚葆謨等，皆與陸譚有鄉土的私誼，與多年部屬的關係，因陸譚已潰，不忍地方糜爛，與新政府接近，而有意收拾改革者，皆竟爲譚浩清等所殺。彼等對這班人統名曰「反骨仔」，即反叛的分子，得之即行殺戮。我與白劍生亦曾爲彼等所獲，竟能脫險，真是萬分僥倖的事！

我們脫險與會師百色。我軍除大部駐在百色城之外，尚有工兵營及第二營之一連，分駐百色通貴州的各路。當城中部隊被繳械時，白劍生、夏煦蒼、陳傑夫皆先後脫險，奔聚於工兵營章雲崧駐所。並率幾部移向黔南之坂壩鎮，暫避其鋒。劉日福亦派隊至西舊州一帶追堵。我爲自治軍所獲，監視極嚴。陸雙桂亦有將我搶斃的意思，後來想盡種種方法，始得隻身逃往離百色百餘里的黃蘭鄉下。身邊僅有士兵二人，以米壳槍一枝。此時黃蘭上下皆有自治軍把守，不能再進與白夏等會合。就在黃蘭附近，料合凌雲、西林紳士岑學三、黃炳煊等，將民團編爲隊伍，不久即集合了二三百人。事爲自治軍所聞，乃派人四出緝拿，我夜行查伏，艱苦備嘗，幸朱再爲所獲。同時西隆方面，發現自治軍與白夏所領部隊作戰，亦幸將其擊退。白劍生因夜裏巡查步哨，失足墮岩，竟將肋骨跌斷，不良於行。這時粵軍因劉日福自治軍擴充百色，並進駐平馬，與林俊廷等部相呼應，乃派熊略爲總指揮，率兵向平馬百色進攻。並令馬司令曉軍隨往，率領我軍，會師百色。我軍奉令向凌雲縣附近集中，計舊有與新收，不過八九百人。乃分爲兩個統領，每人領三營。我爲第一統領，轄馮春霖、黃炳煊、岑潤博三營；白劍生爲第二統領，轄夏威、陸

炎、章雲淞三營。我們以新軍的典型，一變而爲民軍的作風，至今回想，覺得多少有點滑稽。

當我軍在凌雲集合時，適唐繼堯率兵回雲南，驅逐顧品珍，亦路過凌雲。我軍派代表和他連絡，並得知其概況。原來顧品珍倒唐後，唐部將領鄭成勳率部山川經貴而入柳州，沿途集合流散，爲數尙屬不少。唐氏到柳州後，卽誓師回滇。由柳州經慶遠都安東蘭鳳山等縣，而至凌雲，人數號稱數萬，但至多亦不過萬餘人。除一部尙稱精練，槍械亦較爲整齊外，其餘多爲附近糾合之衆，武器亦甚窳劣。然而入滇後，卒將顧氏驅逐，其中原因甚多，頗難盡述。

由百色退至南寧。我軍開抵百色時，劉日福自治軍已爲陸部擊潰，分向各邊地逃竄。我軍進駐百色城。並另委莫某爲田南警備司令。馬曉軍亦奉委爲第五路司令，調駐平馬。我軍到平馬後，白劍生因足傷，乘船赴邕，轉廣州醫治。途中爲自治軍所獲，幾遭不測，所部皆爲我一人統率。在平馬駐紮不久，粵軍復全部撤回南寧，左江方面，交由馬司令與莫司令負責。莫司令全無基本隊伍，所收部隊，時在動盪之中。馬司令所部我軍，亦甚殘缺。所以粵軍退後，各處自治軍，復紛紛起來，希圖重佔百色平馬兩地。其一部且迫近平馬北面的七里圩。我率馮春霖營將其擊退，但上至百色，下至南寧的道路，皆被他們斷絕，糧餉無着，形勢非常危急。當時曾有人建議馬司令，改換自治軍旗幟，反擊莫司令，而佔領百色，既可見諒於舊軍，復可得一餉源充足的地盤，爲我所反對而未實現。這時全省各地自治軍風起雲湧，普及全面，粵軍僅能在一點駐守，各方交通，全被梗阻，應付非常困難。復以陳炯明阻撓北伐不遂，稱兵背叛。粵軍內部問題發生，勢不能不全部撤退。（此時馬省長亦早乘船回粵，中途爲自治軍伏擊，死其愛妾，他本人亦僅以身免。）南寧方面僅留劉總司令震寰所部駐守，兵力單薄。乃調我軍及龍州方面之黃明堂所部回邕。我軍自平馬沿江東下，經果化、果德、隆安，沿途爲自治軍攔截，非作戰不能通過。到達隆安縣時，自治軍據城阻塞，士兵積數日之怨憤，於攻入縣城時，大肆劫掠，我未能卽予制止。

，實爲當時惟一憾事，亦爲我此後決心整飭軍紀之主因。隆安縣以下，一日須經二三次戰鬥，始能到達目的地。我軍一方面須掩護船上之行李眷屬，一方面又要作戰，行程甚緩。退至三江口時，（左右二江會合處離南寧六十里）兩岸皆有敵人，又無船隻可渡。而後面自治軍，仍緊追不捨。真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情形危險已極。我乃下令全部反攻，將追兵擊退。然後退集兩江間的狹小正面扼險防守，等待行李船隻的到來。入夜後，抽選精幹官兵，由我親自率領，乘行李船隻，秘密渡過右江左岸，將士兵一字排開，齊上刺刀。並禁止開槍，向敵人所佔之山嶺進撲。自治軍本烏合之衆，警戒毫無，當我軍到達時，彼輩尚在夢中。除擒獲舉斃者外，餘皆乘夜潛逃。我軍乃確實佔領該山，掩護其餘各部渡江。渡完天方黎明。

我軍既渡過右江，即向南寧進發，沿途尙有小接觸。到達西鄉塘附近，（距南寧西南十里）停止候命。馬司令同我入城，謁劉總司令震寰請示。這時自治軍林俊廷、陸福祥、陸雲高、蒙仁潛等，自武鳴方面進攻南寧，劉部節節敗退。敵軍先頭已抵三塘，城內可以聽到槍聲，各方面皆開始準備撤退，秩序非常混亂。我們此來未得要領，并見火勢已去，急急歸隊。下令徵集船隻，由西鄉塘渡過邕江南岸。那時隨隊的高級官長祇有我同韋雲淞、馮春霖、陸華甫四人，其餘皆因事因病，不能相隨。這是我由百色退至南寧的經過，時民國十一年三四月間事也。

我軍放棄南寧與馮營長陣亡。我軍退過邕江南岸後，劉總司令所部及黃明堂李蔭軒所部，亦同時撤退，南寧遂重爲自治軍所佔領。次日，我軍本擬同劉部向欽州廉州前進，但行至綿羊吳村圩以後，我見隊伍混亂，紀律毫無，人民逃避。而且餉項全無，沿途伙食，亦成問題。乃決心轉而東行，經那馬圩、那樓圩、太平圩、陸屋圩而至靈山縣城暫住，稍爲整頓休息。可是行至那馬圩時，自治軍之追兵已到，前面爲水所阻，適雨後山洪暴發，涉渡甚爲困難。乃令馮營長春霖率其所部，拒止敵人，掩護渡河。全

部將次完畢，馮營長於最後渡過時，爲敵殲擊，覆舟陣亡！

馮營長爲廣西橫縣人，畢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堂。旋至桂軍唐伯山部下，充當下級官，以驍勇善戰聞。桂軍潰敗後，輾轉退至右江一帶。因不欲與舊軍合流，率部投我爲營長。相從患難流離之際，不以挫折而稍變其志。自平馬回邕，沿途作戰，多賴其力。中途成仁，至堪悼敬。而我軍卒賴以脫險，其功尤不可沒也！他的幹部如劉劍奇等，後來對於統一廣西，亦各有建樹。

我軍經粵境赴玉林途中，我軍渡過那水後，進入粵境。自治軍亦不再越境追擊。是夜，宿於粵邊之那樓圩。雖去敵軍之威脅，又增餉食之憂思。蓋孤軍退入異省，既無負責之長官，亦無從依賴政府設法籌措，其窮迫之情形，與新敗之淒楚，大有石達開所謂「萬衆棲山似病猿」之感。實非我今日筆墨所能形容也！我乃不顧一切，仍向靈山前進。每日到宿營地時，必整肅軍容，申明紀律，並嚴爲戒備，使人民不恐怖，不逃避，然後派代表向商會或士紳說明原因，請其資助。要求數目不多，僅以官兵兩日所需伙食爲限，一次乞作兩日食。軍隊食用有着，紀律甚佳，人民負擔不重，故樂於相助。計自南寧退出，直到玉林爲止，軍行數百里，歷時一月以上，皆用此種方法來維持。途次陸屋圩，我派陳傑夫去欽州見劉總司令，請示以後行動，及補助餉項。據告，彼部即開梧州，希望我部亦同行。至於餉項，則謂自顧不暇，愛莫能助。我見彼既不肯切實負責，祇好自己打算。我對於回梧州，甚有決心，因離我家鄉很近，多少可以想點辦法。不過我決單獨行動，以防彼吞併我的部隊。我們許多同志，五六年心血之積聚，數千里顛沛流離，僅剩下這一點的基本，我不能不盡力負責保持也。

隊伍到了靈山縣，在那裏休息整頓了半個月。然後經由北寨圩、武利圩、張黃圩、公館圩、白沙圩、山口圩、青坪圩而到江城。本擬再經高州、信宜縣城，而折入桂境邊界之黎村圩，這是我的家鄉，再沿桂邊經岑溪縣而達梧州。到廉江城附近，忽然碰見四兄天擇。我覺得非常詫異，不知他無緣無故，到

廉江來幹什麼。當衆又不好問他。到了晚上，他才悄悄對我說，是受了李德鄰的委託，來這裏等候我。他在李處不負任何職務名義，（此後一直到現在都未受過政府任何職務和名義）爲了朋友之誼，和手足之情，特地祕密來此等我。又因不能確實知道我行程的緣故，已在這裏等了好多日了。他又告訴我玉林方面的情形，與那些朋友盼望我回去的好意，使我非常的感動。我於是召集我重要幹部會議，將情形告訴他們，都一致贊成，議決之後，祕不宣布。次日，仍不動聲色的向信宜方面前進。那晚在石角圩宿營，第二日，我忽又下令向廣西博白縣的車田圩前進。變更路線的原因，不能不向部隊扯一個謊說：「粵軍對我不懷好意，要繳我們的械」。的確，我到廉城江時，駐軍不許我進城，祇准我們駐在城外，而且戒備很嚴。自然這是對付潰敗下來的軍隊應有的辦法。經我說明要到廣西境內暫避的理由，他們也很相信。於是在很緊張情形之下，渡過了正在漲大水之石角河。不久，就到了廣西境。是晚，宿營於車田圩，那裏附近人民多是姓黃的，就是我始祖釋養公同胞兄弟的後人。四兄與族中叔伯兄弟都認識，他將我來到的經過，告訴他們。他們極表歡迎，予我種種的幫助。並且陪了我去祭祠堂，拜祖坟。在離亂飄泊之中，不期而然的到了祖宗廬墓所在的老家，使我格外增加了游子天涯之感！

我接受了李德鄰的委任，李德鄰繼續派夏煥蒼送伙食來接濟，並且委我爲第三支隊司令。此事除了幾個重要幹部知道大概之外，其餘尙未清楚其中內幕。至是我不能不向大眾公開宣佈。內中有與我部同時退出南寧的陸統領清，是廣東欽州人，亦革命老同志。我們在粵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將實情告知，此時他自然有些不滿，說我騙賣他。我在當時情勢之下，爲防萬一起見，不能不將該部百餘人繳械。又有馮營一個班長，帶兵數人，自由行動去了，我派人追去勸他。他說：「如果要在廣西當自治軍，就不必退出南寧，行乞到這裏了。」這事，我至今猶耿耿不忘。因爲他們的見解，是有相當理由的啊！

李德隣爲我陸軍小學同學，由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一向在林隱青部下工作，以勇敢善戰聞。身受兩傷，於民國八年，已經升當營長。原來在舊軍裏面，非有特別的關係，就須有超越代價的功勞，才可以得到營長的地位。所以他在我們一班同學中，也算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了。民九桂軍由粵回桂，又升爲幫統。想係報酬他歷次的戰功，以及在綠步之戰，擊退粵軍，掩護許多友軍安全通過的緣故。民國十年，桂局瓦解，彼率殘部回駐玉林。粵軍委他爲粵桂邊防第三路司令，已經接受委命，後來粵軍知道他部內有山炮兩門，視爲至寶，一定要他繳出。他知道粵軍對他並不信任，一味敷衍推延。同時請馬君武省長維持。及至粵軍退出廣西，他也與自治軍聯絡，并被舉爲自治軍第二路總司令。後來因見自治軍各將領爭權奪利，全無政治頭腦，復與脫離關係。所以，那時既不是自治軍名義，亦不是服從粵軍，而祇是一個地方性的司令，所部分兩個支隊：第一支隊李石愚，轄二個統領，第一統領爲俞作柏，轄兩營，李明瑞、林竹舫。第二統領鍾祖培，轄兩營，劉志忠一營，自兼一營。第二支隊係何武，第一統領爲伍展空，轄尹承綱一營，自兼一營。第二統領爲陸超，亦轄二營。及我回去，遂編爲第三支隊，不設統領，直轄三營。第一營夏煦蒼，第二營陸華甫，第三營韋雲淞。這是民國十一年六七月間的事。後來德隣統率的部隊，又改編爲獨立第五旅。三個支隊改爲三個團，我是第三團。這個番號的山來，連我也弄不清楚。

六年艱苦的收穫 計自民國六年陸軍模範營成立，我躬身軍旅，隨軍征伐，北至長沙，西至滇黔，南盡海隅。地經數省，跋涉數千里，在六年的時間當中，歷觀軍政局勢之轉變，親嘗種種艱難困苦，犧牲不少忠勇同志，所收穫者，則爲殘破不全之部隊與官兵之寶貴經驗耳！

由各處陸軍幹部學校畢業之廣西學生，在陸軍時代，因遭舊軍嫉視，極難發展。全省部隊中，陸軍學生稍爲集中，而能直接帶兵，略有實力者，祇有模範營，及林隱青所部之一部。民十桂局崩潰，雖經

困敗，尙能掌握一部份實力。更能於流離顛沛之中，合而爲一。正似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殆造物者將以統一廣西之大任降於其身，故折磨之、困憊之，使其有動於心，能忍其性，以完成其偉大之使命，非偶然之故也。

駐防容縣 我部自陸川改編後，即開至容縣駐防。容縣爲我的家鄉，我一到來，地方父老首以剿匪爲請。蓋本縣自民九以後，股匪叢起，縣城東北，很多鄉鎮，爲股匪所佔據。劫掠財物，坐收行水（土匪設卡收稅謂收行水），到處皆是。我無論在公的方面，私的方面，都義不容辭。首先對於力量最劣吳亞龍一股，我親率韋雲濠營，將其圍困谷底孤立之家屋內。照我在左江剿匪之經驗，自可一網全擒。但該匪沉着異常，歌唱自若，當我軍接近其屋時，始開槍還擊，傷亡官兵頗多，無法攻破。乃取久困辦法，使其坐斃，但在夜間，仍被突圍逃竄。經此役後，始知以前在左江剿匪的方法與經驗，多不適合於容縣。蓋各鄉富戶從前多築碉樓以自衛，民十以後，私人之防衛力量，多爲土匪所擊破。土匪反得佔領此等碉樓，與我軍頑抗。我僅憑步槍火力，實無法擊破。後雖用土礮轟擊，命中亦屬不易。此時軍隊中尙未有手榴彈，我用毛竹筒在兩節中間，實以火藥，插入一條很長的藥引，燃着後，投入匪屋，不久轟然作響。尙有相當威力。這是我因爲剿匪而對於武器研究之開始。但這種毛竹彈，對於堅固的高樓大屋，極少作用，相持甚久，仍不能攻破。後來調軍中僅有的兩門山炮去轟擊，始將其擊潰。但所得效果，僅是將容縣部份，驅逐出境，而岑溪縣蒼梧縣之匪，以後還費了很大的力量，與很長的時間，才得肅清。我們各部自經多次戰鬥，槍枝損失，子彈消耗甚多，補充至成問題。當時在容縣、玉林各處，都有單擊步槍製造廠。所出的單擊步槍，都是用極簡單的土法製成；子彈係用舊壳翻造，火藥起初用黑土藥，後來由廣東方面運入一種白色的硝化棉來充用。彈頭用鉛質，或銅質，祇要似一枝槍，似一顆子彈，能夠打得響，就視爲至寶。至於他的效能，與其安全的程度，都不計及了！這種困難情形，與這種幼稚

的方法，都是後來我們自己設廠製造槍彈的動機。

中立的玉林集團 當我回到玉林之後，除了梧州仍爲粵軍駐守，其餘都是自治軍的旗幟。表面上是林俊廷當自治軍總司令，其實僅僅名目相同，內容都各自爲政，各不相下。大家奪着割據地方，魚肉善良，對於廣西之政治軍事，並無全盤的打算。尤其是沈鴻英所部，分佈桂林平樂一帶，已公然反對陸譚之系統，而欲自露頭角。他對於桂方則自認桂人，對粵又自認粵人，此種騎驎作風，無非想同時取得粵桂地方主義者的擁護。同樣也派代表到吳佩孚處，希望得到北洋政府的援助。玉林方面這時介於自治軍與粵軍之間，無形中成爲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中立者。故對兩方面都敷衍。兩方都派人來聯絡，大有舉足輕重之勢。我記得陳炯明派某君代表持函到玉林，希望我們出兵打滇軍。並答應在梧州給我們十萬發子彈。並不談名義和隸屬問題，祇是利用廣西反對客軍的心理，帮他牽制滇軍。我方則以得到子彈爲目的，也不管他什麼作用和企圖。於是派陸統領超帶兵出岑溪，去接護子彈，不意空跑一趟，毫無所獲，真是失望極了！

滇軍是楊希閔、楊如軒、楊池生、范石生、蔣光亮五部合成，由楊希閔統率。當時稱爲三楊范蔣，人數約有兩萬左右。於民國十一年秋天，由貴州方面，轉入柳州。他們入桂的原因，大約是唐繼堯回雲南後，被迫而出走的。到柳州後，奉孫大元帥之命，入粵討伐陳炯明。經過桂境時，廣西自治軍不明真相，以爲又是客軍侵略，一路皆有無組織之戰鬥。即玉林方面亦派俞作柏參加。後來交涉明白，始行停止。滇軍力量頗強，自非自治軍所能擊敗，但沿途作戰，亦不免飽嘗痛苦矣。

我在玉林方面的時間，約爲八九個月。在這個團體裏的人，都希望做好，不要錢、不怕死、肯有犧牲、富進取是他們的長處。至於政治軍事方面，除了努力剿匪，使人民得以安居，財政公開，使部曲苦樂平均之外。其餘一切，或限於時間，或困於環境，並沒多大成績可言。但僅僅這一點，也樹樹成了以後成功的基礎。

五 出兵梧州奉命討賊

出兵梧州的動機。梧州處於西江上游，是兩粵交通之咽喉，是廣西全省經濟之吐納口。在軍事上，無論以桂圍粵，或以粵圍桂，梧州都是必爭之地。當我離開南寧，即決心退至梧州。並不是我那時便有掌握梧州經營八桂的企圖，因我回玉林後，雖然將以前的名義改變，但是我的主張，並未改變。在容縣駐了八九個月，起了很多的感想：第一、玉林五屬及容縣的收入，雖然可以勉強養活我們的部隊，但是要發展則很難；尤其是槍械子彈，無法補充。第二、保境安民，形同中立，終久不是個辦法。我們必須有光明的途徑，嶄新的作風，才能開展。第三、我受自治軍的恥辱，亟思打倒他們。認定梧州是衝鋒的地方，廣東方面，也總要比自治軍好些。必須出梧州，方可以接近廣東，才可以打開新的局面。但是我懷着這些念頭，並不敢貿然表示，貿然行動。我必須待粵方的聯絡成熟，並且要等候時機的到臨。

白劍生去年就到廣州養病。陳傑夫後來也到廣州去。當時大家雖沒有若何約定，但我相信他們必定能為團體而努力，並且是朝着新的方向努力，我必須等候他們的信息與意見。因為這個團體，歷來都是我們幾個人支持的，而且是相當民主的。不久，他果然有信來。對於我暫時率部回玉林是贊成的。同時希望有機會同李德隣全部出梧州。廣東方面，由他担任聯絡，並取得名義。這階段經過，我是否向李德隣表示過，現在已記不清楚。但是我曾對伍漢空、俞作柏談過，他們都很贊成。

偽投沈鴻英。這時，適值沈鴻英勾結吳佩孚，出兵窺粵。沈鴻英由西江，方本仁鄧錫如軍由北江，會攻廣州。梧州為沈之後方基地，派師長鄧瑞徽駐鎮。但主力總在前方作戰，梧州極為空虛。沈氏昧時志在廣東，對於廣西，亦時刻不能忘情。故極力拉攏廣西部隊，以圖擴充實力。其時我族兄紹憲在沈幕

內作祕書。他知道我有些力量，由他介紹於沈，委我爲第八旅旅長，希望我帶部隊到梧州。

我當時判斷沈軍攻粵，遲早必敗。當戰爭緊急之時，梧州部隊必盡調前方，我若於此時進駐梧州，乘其敗而襲之，不但可佔領梧州，並且可獲得許多械彈輜重。同時，我對於革命工作，亦可有所表現也。待時機相當成熟，我才將此中經過，及我的判斷決心，向李德隣詳細商談。他的意思，以爲任何人賦予名義均可受，惟有沈鴻英賦予的名義，萬不可受。因沈反覆無義，人所共棄，一旦受了他的委任，則沾上了終身污辱，不易洗磨得去。其次，沈鴻英未必即敗，我之如意算盤，未必打得很準。萬一事機不密，沈多疑好殺，反遭其害。他以仁厚長者的性格，發爲正義誠摯的理解，使我非常感激。但我的見解，以爲任何人給我的名義，均須考慮，才可接受。沈鴻英賦予的名義，我竟要毫不考慮的接受下來，這爲我根本是要借他的名義，來打擊他呀！至於我的判斷，能否正確，必須事後才可以證明。軍事上的行動，也祇好就判斷來決定。雖有「計出萬全」的古話，其實那裏有一定萬全之計。至於個人危險層層累更非我所顧及，有謀人之心，而先慮人之害我，必致氣餒胆寒，而無事可爲。他對於我的解釋，仍舊懷疑。我最後表示堅強的決心，並請求他兩點：（一）我如果失敗時，設法收容我的部下。（二）在我未曾得到着落時，一切的給養，仍照常撥給。均蒙他答應。

我與白陳的密議，我辭他回到容縣，就準備出發。祇帶了一個營去，暫留兩營在容縣。這時由容縣經岑溪、藤縣到蒼梧境內，股匪多如牛毛，每日都要開火，才能通過。到了離梧州五十里的新地圩，比匪將我包圍於圩內，希圖繳械。我營皆久經戰鬥的官兵，沉着緊守，絕不隨便開槍。候匪十分接近，槍聲發，擊斃甚多。隨即向外追擊，將其衝散。自此之後，股匪聞風逃避，不敢同我對戰。首先樹立我的軍威。次日，到達戎圩，將隊伍嚴密佈置，以防萬一。我則單身赴梧州，由族兄介紹見鄧瑞徵，鄧希望我迅速全部開往梧州。這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遂滿口應承，他也十分滿意，盛筵款待。席間稱揚我如

何忠實，如何勇敢善戰。我心裏非常好笑，於無可如何之下，亦惟有盡情作虛偽之應付而已。駐梧有馮旅長葆初，據他自稱，他的槍械非常精利。他希望與我換帖，結爲異姓兄弟。其實他換帖的兄弟，不知多少，他專以這種辦法來拉攏一班人，作爲他的黨羽。我心裏想：「換帖換帖，不久你的槍枝，我就要來收接！」我在梧州住了數日，白劍生、陳傑夫由廣州到來，在我族兄的公館內，祕密將廣州的情形告訴我。並說大元帥委我爲廣西討賊軍總指揮。原來是委爲廣西討賊軍第一軍軍長，手令已經下了，後來白劍生覺得不妥，又到石龍去見大元帥，改爲總指揮。並希望我們迅速佔領梧州。（廣西討賊軍第一軍軍長的手令，廣州淪陷後，散失民間，爲廣西銀行重價購得，民三十三年我到桂林，才見到。現在由廣西銀行保管，此係國父遺墨，擬獻呈黨史委員會保存。）關防委狀，都由他們隨身帶來。我當時非常着急，覺得太危險了！萬一洩漏，不但全盤計劃，都要失敗，大家的性命，也要難保！那日正是端午節，在族兄家裏，很匆忙的吃了飯，我們便搭船回戎圩。族兄還要留看龍船，不知我們心內懷着鬼胎，那裏還有這種閑情呢！原來我內心的計劃，總沒有向族兄表露過。事後，他很埋怨我，以爲是我騙買他，使他幾乎陷於致命的危險，其實這種陰謀反叛的事，那裏可以隨便告訴一個不同意志的人。况且他是信仰吳佩孚、沈鴻英的呢！幸而在相當的時機內，他也離開梧州，不致發生意外之事。

我同白劍生仍回容縣去，陳傑夫是否同行，抑或仍回廣州，就記不清楚了。我回到容縣，一切的經過，都由白劍生向李德隣陳述。但是我約同侪伍展空兩位的隊伍出梧州的事，並未得他同意，這點曾引起很大的誤會，其實這事也確難報告，并也確實難以得到諒解。後來經了很長的時間，這種誤會，才算消除。

我的隊伍全部出發。侪作柏的兩營，伍展空的一營，也先後跟着出發。侪部出發的情形怎樣，我已記不清楚。伍部在出發前，是公開向李德隣報告過。但也僅僅是報告，而沒有奉到他的命令。這種自由

行動的行爲，就軍隊紀律上講，實在有些不大合理。李德隣身爲長官，當然是不允許，不願意的。但是事實已經如此，亦就無從阻止。好在我們的結合，都是在患難之中，在感情上，道義上，都不致劍拔弩張，武裝相見。李德隣並派李司令石愚隨同出發，負聯絡調處的任務。其寬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真使我感佩萬分！

我的計劃，是先將部隊秘密集結在戎圩（梧州上游十里）新圩附近，等候時機。一方面使人與鄧瑞徵敷衍，並要求他補給彈藥餉項。在那時候，「走民軍攪」（從事民軍活動收編之謂）的習慣，凡來就編的人，總說自己的人數如何的衆多，槍械如何的犀利，戰鬥力如何的堅強。等到真正點驗起來，人數槍枝都要大打折扣。自然鄧瑞徵未必十足相信我族兄及我說的那樣好法。我爲堅定他的信念起見，特別挑選一連最精銳的官兵，下梧州去，請領餉彈，並且請他檢閱。這連人，不但在我部是精銳，就是在整個廣西軍隊裏，也要算是極出色的了。他見到了，自然很喜歡。並且開動了梧州城，都歡迎我的部隊到來駐防。因此就接到許多餉項子彈。他希望我立刻通電就職，並將隊伍開往梧州的前方。我始終以後面部隊尙未到齊，萬一通電就職，必使玉林方面懷疑而不能行動這些鬼話相推託。他也頗爲相信。其實我的隊伍早就到齊，正在那裏等待發動的時機呢。

乘機解決沈部。沈鴻英在廣東，終於不出我的所料，被革命軍打敗了。他的部隊分由西北及廣寧懷集兩路退却。在梧州方面，已有好些輪重船隻退到。我們認爲機不可失，即時發動。當時在戎圩同駐的，尙有沈軍旅長黃炳勳所部約五六百人。在一天拂曉，將他全部繳械，無一漏網。於是我們將梧州上游的水路交通斷絕，凡是經過的船隻，一律扣留。由梧州上來的船隻，多半是沈軍的行李輜重，一併爲我們所獲。並且派俞作柏率兵一部由陸路進至撫河（桂江）右岸，將沈軍向平樂桂林退却之路路截斷。鄧瑞徵知我軍有變，一面通知沈鴻英及其部隊，不可向梧州退却。他自己也就向賀縣、八步連夜逃走，我

的部隊沿江而下，到達三角咀（蒼梧城撫河對岸）。遙見下游方面的粵軍兵艦，及運糧軍隊的船隻，正沿江上溯至鸚鵡洲矣（梧州下游七八里之小洲）。

以梧州為中心的革命勢力。是時我先行派員前往聯絡，隨後親自督謁魏指揮邦平於永翔兵艦（卽中山姐妹艦）。陳傑夫亦隨軍同來。我與魏以前雖未相識，但頗耳其名，相見之下，其亢爽的性格，與活潑的風度，為我初次與革命軍方面人物接觸時，發生與舊軍不同的感覺。其參謀長為保定戰術教官楊言昌先生。經其介紹，彼此即儼如一家，不因初次見面而稍存客氣與隔閡，其後續部隊與長官，亦陸續到達。計有陸軍第一軍軍長梁鴻楷，第一師師長李濟琛，第三師師長鄧潤琦。而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鄧演達，戴戟，繆培堃，黃鎮球，薛岳，徐景唐，蔣光鼐，李揚敬，李漢魂，嚴重，錢大鈞，陳誠，黃琪翔，何彤，李文欽，鄧世增，馮竹萬，馮竹賢，香翰屏，蔡廷楷，陳勁節等，皆為當時革命軍軍重要幹部，因到梧州會師而相見者。海軍方面則有陳策，金彥文，孫祥夫等。彼此皆以除舊革新為目的。故相見之下，備極誠摯。又因多數係前後同學而更加親密。此於後來兩廣局面之發展，有極大之關係。

這時廣東滇軍雖驅逐陳炯明，擊敗沈鴻英，方本仁，鄧瑛如。然而革命軍之基礎，尙未穩固。一般革命軍人認為廣州之局面，尙須改造。而苦於實力未充，時機未到，必須有適當地方，補充整理，方能發展。在西江方面之部隊，實粵中之精華。他們最後目的，為廣東全省之革新。故對於梧州之進駐，僅為暫時，而非對於廣西有何野心。同時對廣西必須得到一個可靠有為的朋友，乃無後顧之憂，並可收彼此相助之效果。在我們方面的目的，是在廣西之改造。我們必須以梧州為根據，逐步向西發展，以完成革命政府所賦予之討賊任務。我們對廣東，決不求敵而須求友。同時我們的力量太單薄，亦必須求得有力之朋友，予我們有力之幫助，方能使我們的工作順利進行，而有恃無恐。雙方在此種共同意志與各別的情形之下，遂無形中成爲以梧州為中心，彼此背靠背而不可分之團結。故在梧州的廣東同志，隨處皆

以客體自居，凡事予我助力。而我們亦能盡地主之誼，禮遇賓客。此種情形，完全基於革命同志間之互信共信而分工合作，此為歷史的際會，於以後革命進展，關係非常重大。三十二年我赴重慶開會時，以前在西江共事過的同志，多為今日之顯要，曾舉行一次大聚會，彼此相見之下，實不勝其今昔之感也！

組織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 我軍到梧州後，乃實行組織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我任總指揮。白劍生自回隊後，雖然未曾露面，而一切參謀規劃，都由他主持。至是乃推他為參謀長。黃玉培為秘書長，龔傑元為參謀處長，呂競秋為副官處長，白博九為軍法處長，黃維為軍需處長，胡宗鐸為參議，陳傑夫為駐廣州代表。部隊則編為三團；俞作柏為第一團團長，伍展空為第二團團長，夏熙蒼為第三團團長。這是我軍初出梧州時之主要陣容。

我們這時的名義，是討賊。我們的任務，亦是討賊。所謂賊者，自然是指一班反對革命之自治軍，與殺人越貨的土匪。我們祇知秉承大元帥與革命政府的意旨，作軍事上之努力。對於政治的理解，還很幼稚，更談不到有什麼主張。不過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條，就是力反陸、譚、沈及自治軍之所為，創立我們的新作風：第一、是整肅軍風紀。我們的部隊，一向都是依附在舊軍裏面生活的，自然會傳染一些不好的習慣。自從脫離舊軍的關係，在一個大大的變動中，一切的紀律，自會發生廢弛的現象。在百色南寧轉進的中間，我自己的軍隊，曾經發現過很大的劫掠行為，我不能及時制止，是我治軍一個最大污點。由玉林參加的部隊，多為前桂軍第二軍所改編，中間也不免有敗壞紀律的地方。所以到梧州後，我們對於紀律的整頓，認為急先之務，決定作為治軍建軍的中心工作。一次有個人，犯了軍法，這人的哥哥，是我們重要的幹部。我防他來說情，立刻將這人槍斃。從此以後，紀律日漸嚴肅，我們更不斷的在訓練方面，執法方面，繼續努力。才將十數年來沿習的壞風氣，轉移過來。第二、是重質不重量。我們對於散軍土匪，不主張收編，而實行剿辦繳械。即使一時收編的部隊，如果他的質不合我們的要求，亦

不因顧全小信而不加改編改造。所以量的發展非常緩慢，而質的方面，則漸見充實。尤其是高級幹部，不務虛名，不作大官。俞作柏、伍展空、夏煦蒼等，除了臨時賦予指揮其他部隊名義之外，一直到廣西統一，他們都是營團長。這三個基幹部，負擔一切的重要任務，形成了我們中堅的力量。後來雖然增加幾個團，仍舊是本着這種作風去建立。所以到廣西的統一成功，我們建軍的基礎，亦就鞏固了。第三、是武器彈藥的製造。我們認爲戰爭之勝敗，人的因素，祇佔一半，物的因素，也佔一半。數年以來，飽受彈械缺乏之痛苦，雖然我們一向都「拿前方補充向敵人奪取」的口號來作鼓勵，而收到相當的效果；但是亦須要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玉林、容縣，雖然有土造槍土製彈的設備。但是技術上、質料上，都不合要求。到梧州後，對於製藥製彈造槍種種條件，都相當具備，而須努力進行，以爲長久補給計劃。第四、是官兵共同甘苦。我們對於歷史上的名將，如吳起、岳武穆之與士兵同甘苦，至爲景慕。對於舊軍高級長官之窮奢極慾，不恤士兵的情形，深表痛惡。而我們當時以經費的困難，更無多餘的款項，作爲軍官的薪俸。所以我們規定士兵的伙食餉項爲毫洋二角，官長不分等級，每日餉項伙食爲毫洋四角。這種生活，自到玉林之後起，一直到廣西統一止，足足維持三年多，而未變更。第五、是培育幹部。「幹部決定一切」的理論，當時我們已有深刻的了解。而舊軍的失敗，多半是由於幹部的腐敗。這種事實的教訓，更加深了我們對於幹部重要的認識。我們的幹部，雖然有許多的陸軍學生，以及一些受過新軍教育而富有作戰經驗的行伍軍官，然猶認爲未足。此後跟着局勢的開展，更須大量的補充。除了設法招致陸軍學生外，更創辦幹部之訓練機關，不斷的培育訓練。我們對於支配幹部的的工作，及階級之升遷，一概都以人才爲標準，而不稍存私意。平時幹部的選拔，都採納最高級幹部的共同意見，及一般的評論。第六、是財政公開。財政不公開，是使團體離心離德的重要因素。我們所有的部門，都是採用公開的投標商辦制度。因爲在陸、譚時代一切稅收機關，都作調劑私人之用，任其中飽

，不加釐整。在人的信用尚未建立，監察制度未臻完善以前，投標商辦，一則可予各人有競爭參加之機會，而免個人支配之嫌疑；一則可以由私人屢次競爭，而使公家得到較大之收入。這種辦法，在當時確有其相當之價值。至於支出方面，則各高級幹部，皆本其良心，不敢尅扣中飽。第七、對陸、譚不作諷罵攻擊，對自治軍不作全體之敵視。因廣西軍民對陸、譚九年來之過去，尚多懷戀；若諷罵攻擊，易引起粵軍入桂時同樣的反感。假以時日，使彼批政的害處暴露愈多；人心的厭惡愈甚，可不攻而自破。當時我軍之力量有限，舊軍之勢力，十數倍於我，若全體為敵，不但難以制勝，且易招致極大之危險。惟遠交近攻之方法，最適合於當時之形勢。記得當初起草討陸、譚的宣言，總不免蹈以前檄文捏造事實信口謾罵的陳套。我將文字改了又改，始成定稿，原稿是我的秘書長撰擬的。這位秘書長，是我的叔叔，舊學根底是相當好的。他對人說：「我的文章，他（指我）也要一改再改。」意思表示我這年輕的老粗，不配改他的文章似的。我轉告訴他：「因為我是總指揮。」第八、對廣東方面之友軍，除形式上很顯明的站在同一陣線之外，並力求彼此之衷心諒解，而達到互信互讓互助之目的。蓋我軍力既屬有限，地盤亦僅雙方共有之梧州。互信不堅，則互相猜忌，而不能對外。稍不相讓，則互起爭論，而自相火併。尤其在我們，必須得到友軍之幫助方能發展。第九、是養成各人自尊的人格，各盡各人應盡的責任。我們是各方集合而成的團體，在表面上雖有階級之分，而實際上許多重大的問題，大家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但是到了決定之後，大家都應就自己範圍之內，盡其最大之努力。所以在整個過程中，絕少用過很嚴厲的命令。大家都是本着自尊的心理，發揮自動自覺的精神，任何決策無不貫徹實施，收到完滿之效果。以上所述各種方針與措施，雖未明定成文之政策，建立具體之制度，而在當時情形，必須如此，則為我等所深刻瞭解。故此種方針與措施，一直到統一廣西的時候，未嘗改變。亦可以說這是廣西統一成功的主要因素。

初見李任潮 當梧州會師之後，我方與粵方彼此的感情上雖極融洽。但軍政號令，尙未有統一的規定。此時魏邦平總指揮已回廣州，其他部隊，亦多東下。大本營乃任命李任潮（濟琛）爲西江善後督辦，設督辦署於梧州，並留第一師之大部駐梧州。李督辦爲梧州人，在粵革命軍中，有悠久之歷史。我們素不相知，更未曾謀面。我心裏想，在那粵桂交關的時代，一個廣西人，怎能在粵軍中取得領導的地位。待會面之後，才覺得他的人格偉大。欽慕之心，油然而生。我現在回想，假使當時駐梧州的粵軍首腦，不是他而是別人的話，廣西統一的局面，未必能如此順利進展，甚至還要影響到整個革命的進展。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廣西統一的工作，而實是幕外最關重要的人物。因爲他和第一師重要幹部，對於廣西之改革皆非常關切，得其助力特多。更難得的，他除了幫助之外，一切都尊重我門的意見，任由我們去進行，不稍加干預與掣肘。這是廣西改革史中的重要關鍵，而使我對於他這種偉大精神，永難忘記的。

計擒馮葆初 當粵我兩軍會師的時候，原駐梧州之沈軍旅長馮葆初，因不能撤退，而且不願放棄梧州的地盤，不得已向粵方投誠。馮爲人善於取巧拉攏，此次投誠，非其本意。其所部數量相當的多，而紀律甚壞，留之必爲後患。我乃密請李任潮，將其繳械。馮部多駐城市，又恐戰事發生，市民遭受損失。遂用誘擒之法，迫其下令所部繳械，以免發生戰事，驚擾市民。當時共同密議者，僅李任潮、葉竹漢、鄧演達、黃鎮球及我數人而已。其時鄧演達爲廣東陸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率其所部，担任梧州軍警督察處的任務。乃假傳命令，將鄧團調回廣州，而以我部代其任務，進駐梧市。蓋我部以前尙駐於三角咀及戎圩附近，特設此烟幕，以掩飾其行動，不使馮部見疑也。部隊佈置就緒，於花舫中設宴，爲鄧餞行。並邀馮及陸海軍將領商界領袖作陪。梧州花舫皆集中於撫河裏面，爲當時一般商人及軍政人員遊宴應酬之所。入夜，水碧燈紅，笙歌聒耳，實爲黑暗世界中別一天地。兩軍將領雖抱革新之志，而對於數千年遺傳之酒色英雄的舊觀念，尙極濃厚。故當時上而將帥，下而紳商，一切公私應酬，多在此中舉行。

，而恬不爲怪。我前年與黃琪翔兄談及此事，彼深覺以前這種生活的腐化。我說：「這也許在當時是一種正當的娛樂。因爲這是封建社會必然產生的畸形現象。封建社會裏的舊禮教，對於男女授受不親，講究太嚴，所以就有娼妓的出現。而一般人反以爲娼妓是正常的合法的，對男女的自由戀愛，反認爲不道德的行爲。又如前清北平官僚，法律禁止他們玩娼妓，但又允許他們玩相公。實際是越防越橫決。所以必須在道德的根本，有了合理的解決，這些腐化生活，才可革除。否則在那一個階段裏，他就算是正當的了。」花舫的宴會，皆在午夜舉行，有至通宵達旦者。我們原擬將馮葆初羈縻到佛曉，等我們部隊佈置就緒，再行宣佈，將其扣留，並迫他令飭所部，自行繳械。不意事機不密，正在飲酒的時候，他已得到報告，決意與辭離席。經多方解釋挽留，都屬無效。我見時機已迫，即起立拔槍相向，要他將隨身武器繳下。並欲將李督辦扣留之命令宣佈。彼竟毫不畏懼，向我力撲，奪我手槍。我這時既無宣佈命令之機會，又不能開槍將其射殺。蓋原意乃在生擒，不欲致之死亡。而當時陸軍將領等隨從之武裝士兵很多，佈滿左右。我若開槍，彼等不知原委，必至互相射擊，而同歸於盡。同席諸人除鄧演達外，其餘的人，又皆不知內容，疑爲酒醉互毆，均來勸解。後經鄧演達說明，並率同衛士，將馮擒住，加以綑綁。一時城內我軍進攻，與馮部抵抗的槍聲，亦若斷若續的響着。幸馮已被擒，所部指揮無人；至佛曉，已全部爲我軍所解決。我與鄧演達巡視城內，見商民尙未受到若何損失，頗爲欣慰。事後同席的人，很埋怨我不事先告知他們，幾至釀成極大的危險！也有人說：「這種措置，太過冒險。身當一部主將，萬一危及本身，則全部將受挫折。」我對於前者的責備，自願接受，而頗覺抱歉。但我當時確有不能預先告知的苦衷。對於後者的說法，我認爲一個人做事，先顧慮本身的安全固然是應該的。但這祇是在某一種限度內的說法。若是超過了這個限度，則變成了自私畏縮的行爲。所以我對於他們這種見解，並不完全同意。而我以前經過的事實，在某一種狀況之下，對於本身安全，均未嘗顧慮。因此而得到很多人的

敬仰，尤其是幹部與士兵。這就是我成功的一個因素。

鄧演達無論當時在梧州粵軍將領中，在以後的革命過程中，都是一個令人注意的人物。他有魁梧的體格，飽滿的精神，處處表現勇敢負責革新進進的氣概。自從同我擒拿馮葆初之後，更增加了友誼的深切。後來他離開了第一師，到蘇聯去。在出國之前，曾有一封很長的信給我。從歐州的文藝復興，談到中國的改革。他不但不滿意國家現狀，並且不滿意廣州，及他自己。所以他要到蘇聯去，充實自己，然後回來改革中國。很多的理論，雖也有獨到的地方，但總有點過火，或不切實際。

攻佔藤縣——自從馮葆初解決後，梧州已成爲很純粹的革命策源地。廣東第一師的重心，向肇慶移動，其目的在廣東之改革。至於我軍目光則向梧州上游移轉，而展開軍事行動。這時藤縣城（離梧州九十里）附近有自治軍旅長盧得洋及司令黃超武駐紮，而平南、桂平、貴縣沿江，更有陸雲高之主力。我第一期作戰目標，必須將這些部隊解決，佔領沿江富饒的縣份，以充裕我的餉源。並且可與玉林李德隣方面水陸打成一片，然後再作第二期的打算。於是我們首先作進攻藤縣之計劃。

藤縣城在大河（西江梧州以上之總稱）與北流河之合口處。依山濱水，形勢至爲險要。盧得洋黃超武等部進駐該城即爲扼守大河水道，阻止梧州方面之進攻。故山水路正面進兵，殊覺不易。若陸路進攻，則須渡過大河北流河，亦非易事。且遠道行軍，敵軍將先爲準備。我們再三籌議，用陸軍由水道並進。這時正值仲夏，河水大漲，即較大之輪船，亦暢行無阻。我方汽船及拖輪甚多，乃將全部軍隊，用船船送；並請粵方派小兵艦兩艘爲掩護，先在戎圩附近集中，於次日半夜，順一三圍之次序出發，期於黎明到達藤縣江。我與白劍生、俞作柏、夏煦蒼等，皆隨隊出發指揮。船隊到達縣城下游附近，乃下令將船靠江之左岸，開足馬力，向敵人火線衝過。軍艦軍艇則列於船隊左側，實行掩護。並發砲向岸上守將轟擊。時當拂曉，多數敵軍，尚在夢中。先對我軍顧慮船隊通過火線們。若受敵軍密集射擊，必多損

害。蓋以當時火力非常薄弱，且水漲江闊，步機槍火，全無效力，不易抵抗也。可是因為時機適當，乘隙進襲，不為敵軍發覺，竟能毫無傷亡，就在敵人火線正面，安然通過。船隊超過藤縣城五里附近，已進入敵陣後方。令各靠岸部隊，一湧登陸，佔領城後一帶高地，背水為陣。士懷必死，勇氣倍增。城內敵軍見後路為我所斷，盧得洋率部出城，向我迎擊，為我擊敗，盧亦陣亡。殘部希圖奪路向上游逃走，為溪水所阻，被我部隊追及，將其全部繳械。乃將城裏敵軍黃超武所部圍困，準備攻城。黃超武與我有交，且屬青年，有志上進。當派代表出城，表示願意收編。我見其頗具誠意，准其投誠。編為廣西討賊軍第四團。此役自午前八時開始，至午後四時結束。將自治軍二千餘人，全部解決。除收編者外，逃脫者僅數十人。繳獲槍枝及戰利品甚多，戰果非常完滿。其原因，第一為敵人對我企圖行動，不甚明瞭，且太恃正面江河之險阻，而疏忽側後陸上之警戒。我軍反利用多數船舶運輸，衝過正面火線，在其側後登陸，殊出彼等意料之外。第二，為我軍蓄銳既久，官兵初戰，皆如出林猛虎，遠非散漫無紀律者所能抗拒也。

赴廣州謁見總理 佔領藤縣後，我將各種事務，處理完畢，仍回梧州。溯我軍在梧州舉義兩三月間，初解決馮葆初，繼解決盧得洋黃超武，佔領藤縣。頗為各方所重視。陳傑夫任駐粵代表，由廣州來，建議我到廣州去見 孫總理，及中樞各要人。並請接濟械彈餉項，以為第二步討賊工作之準備。我對於他這種意見，甚表贊同。而在梧陸海軍將領，亦多主張我去廣州，向 總理報告討賊經過。乃乘海軍差遣艦東下。同船有海軍代表孫祥夫，總參議胡今予及陳傑夫等數人。時正夏秋之間，江水陡漲，黑夜行船，方向難辨。行至東西馬寧附近，忽然轟聲大作，船身震動，將我等摔移數尺。船上燈火，盡皆熄滅。繼而槍聲突起，我等出艙查問，始知係與另一差輪相遇，因各不相讓，以致互撞。此處為匪船出沒地點，往往黑夜騎劫商輪。雙方又皆誤為匪輪，開槍互擊。追問明原故，始行停止。我輪船堅力猛，尚

無大礙，彼輪則船破人傷，擱淺江邊矣。

我到廣州，首先去見廖仲凱先生。他當時爲財政廳長，我們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向他交涉。他對於我們，也非常關切。隨後由他介紹去見孫總理於河南士敏土廠。總理身着中山裝，態度和藹嚴肅，令人一見，卽爲其偉大精神所感召，自然起景仰之誠。我將過去奉命討賊之經過，作概要報告，並講求接濟與指示。仲凱先生並從旁加以補充。總理聽完我的報告，頗爲欣慰。並加指示：「革命黨是不是一切憑藉的。一切都要自家去創造，自家去發展。革命主義、革命精神、革命黨員就是本黨一切力量的源泉。你們決心參加革命，首先要明白這道理，其餘的問題，可與廖先生去商量。」我聽了這偉大的指示，就同廖先生興辭退出。這就是我第一次看見總理的情形，也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總理的情形。因爲自是年的冬天，總理北上，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就永無見面的機會了！在過海電船中，廖先生曾告訴我，廣東財政困難的情形。言外之意，財政並不在財政廳手裏，而是在滇桂軍隊的手裏。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廖先生仍然撥助我兩萬元。並另外設法，撥我兩萬發子彈，盛意真可感謝。前年（三十二年）我在重慶，與羅翼羣先生談起往事。他問我：「還記得民國十二年在廣州撥你兩萬元的事吧！你不要以現在眼光，看這兩萬元。當年我們不知費了多少方法，才能籌到這筆款子。當時的價值，恐怕比現在二千萬還要大呢！」那時羅先生協同廖先生，辦理財政，參與此事，故知之頗詳。我在廣州，曾經會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及大本營秘書長楊滄白，軍政部長程潛。無非是照例的應酬。不久，就回到梧州去。

與李氏合力解決陸雲高部。這時在平南、桂平、貴縣、賓陽、橫縣等地之陸雲高所部，大有進犯梧州之勢。而且扼守全省交通重要的地區，實爲我們當前的最大阻礙。陸氏爲以前廣西第一師的旅長，他的部下，有兵三團，約五六千人。而且槍械相當的充足、整齊，並有若干經過訓練的隊伍，實力自非慮

得洋、黃超武等可比。我們自度力量不能單獨取勝，乃有聯合玉林方面，協助進行的計劃。我軍自出梧州，迭獲進展。但對玉林李德隣處，尙未正式派人報告解釋，此時我便派伍展空到玉林，向他說明過去的一切，並商量合力解決陸雲高問題，獲得他的諒解和同意，並派鍾祖培與伍展空同到梧州報請聯絡，順便觀察實際情形。兩方合作的形勢既成，對解決陸雲高的計劃，亦經商定。當時陸的部隊，東至平南之大安圩，西至賓陽橫縣，沿江數百里，盡爲其所竄佔。我們乃決計將貴縣以東，先行解決。因其主力在桂平江口之間也。玉林方面由興業縣進兵貴縣，然後順流東下，直搗桂平。梧州方面，則沿江而上，會師桂平。分爲兩路：一由夏煦蒼指揮第三第四兩團，及機炮連，由藤縣循陸路，直趨大安圩，撲滅當前之敵，然後向平南前進。一由白劍生指揮第一第二兩團，乘輪溯江而上。在白馬附近登陸，向平南進攻。夏部到大安，敵軍不多，稍戰即退。遂亦渡江，與白部會合，向平南搜索前進。到平南後，偵知陸部全部集中江口，希圖與我作孤注之一擲。我乃乘其部署未定，急行強襲。陸軍初由桂平到達，猝未及備，倉皇應戰，不久卽行潰敗。這時李軍已佔領貴縣，襲取桂平。陸進退失據，乃引殘部向蒙山方面逃竄，復遭我第一團俞作柏在馬練圩附近阻擊。陸與旅長張春如，轉入鵬化，據險頑抗。兩軍乃會師攻擊，將其擊潰。陸率少數殘部，向遙山逃永安，往依沈鴻英。此役我俘獲大砲九門，大鷄兵艦一艘，陸部營長蒙志、王讚斌、王飛虎皆率部向我軍來歸。軍隊傷亡逃散者，其約半數以上，從此遂一蹶不振矣。

鵬化在桂平、平南兩縣的交界處，距江口平南桂平皆數十里，洪楊起義的金田村，卽鵬化附近的一個村莊。該處教堂擁有教徒甚多，傳係洪秀全在此傳教所致，至今父老尙有能道述當年遺事者。我們此次戰事頗與金田起義時情形相似，陸雲高、張春如的地位猶如洪、楊，我們的地位，猶如烏闌泰，然而時異勢殊，師有曲直，勝負之數，遂亦不同矣。

我軍自這兩次勝利之後，聲威大振。大河一帶的散軍，紛紛請我收編。我們對於這些善意來歸的人

，自然不能完全拒絕。於是將他們編爲游擊隊部，以示與基本的團部有區別。計有第一游擊司令馮夏軍，第二游擊司令何正明，第三游擊司令封輔年，第四游擊司令蔡振雲，第五游擊司令黃桂丹，第六游擊司令陳錦華，第七游擊司令盧文駒，第八游擊司令陳濟桓。這些人都是以前的老軍官，或是當地有武力的士紳，乘時崛起，聚衆以附者。其人數或千餘人，或數百人，多寡不一，槍枝亦參差不齊。就此可見當時民軍名目的衆多，與情形的複雜。但在戰事進行時，若善於運用，亦能搖旗吶喊，幫助聲勢不少。此外尚有游擊司令羅經，爲初到梧州時所收編者，羅爲模範營的營副官，係我們的老同事，不幸在容潭剿匪（藤縣附近）中彈陣亡，這是我們高級幹部中最先陣亡的一個。

解決陳天太部 這時廣西在粵部隊，除劉總司令震寰之外，還有直屬於大本營的第七軍軍長劉玉山。他也是廣西革命的老同志。所部師長陳天太者，實力頗爲充足，以在粵不能發展，久懷回桂之心。尤其梧州是其主要目標，志在奪取，苦無名目進行。乃假借開赴南路爲名（粵之高雷欽廉），偕將部隊集中梧州下游的都城。（粵境市鎮距梧州九十里）並約自治軍陳先覺等爲內應，既無大元帥府的命令，都城又不是他們南下必經的地點，我們及粵軍第一師，先已接得情報，至是更明瞭其陰謀。李督辦與我商量，決心會同將其全部解決。粵軍第二師及海軍由都城下游登陸進攻，我軍由梧州向都城進攻。我於是將梧州上游部隊，盡數調回戎圩集中。並請李德隣派得力部隊，到梧州增援。我軍除以伍展空第二團駐守梧州，防陳先覺外，其餘皆向大坡山（戎圩都城間圩市）集結。隨分三路，向都城進擊。以俞作柏所部第一團担任右路，夏煦蒼所部第三團担任中路，白劍生指揮黃超武所部第四團，及蔡司令振雲所部，担任左路。我在中路指揮。次日黎明，各路皆到達都城以北地區。中路因路程較近，接觸最早，節節進展，已迫近都城。左右翼未能趕到。陳天太見我中路突出，乃集中兵力，三面向中路猛烈反攻。我前頭部隊兵力既單，立脚未穩，遂被擊退，傷亡極大，一直退至我指揮所在地。這時我僅有預備隊一連，

乃就地展開抵抗，以掩護由前頭退下之部隊。陳天太率隊緊追，距離不過一二百米遠，彼此面貌，皆可辨認清楚。若再退却，敵將中央突破，轉而繞攻左右兩路之側後，必至全軍潰敗。其時右路已在相持，左路及粵軍第一師，尚未到達。我既認清當前情勢，且斷定白劍生一定可以依預定時間到達，相去祇一小時。在此一小時內，無論如何困難危險，必須盡力支持，方能等待左路及粵軍趕到，發揮分進合擊之效。故決心與敵作最後之搏鬥。於是令衛士廿餘人展開，我自己亦加入火線，敵方人數衆多，攻勢猛烈，向我陣地之鞍部踐踏，屢次衝鋒，皆爲我軍遏止。我當年槍法極準，射殺甚多。手槍損壞，乃執士兵步槍，繼續射擊，敵人攻勢頓挫，遂成相持狀態。此時遙見左路我軍已到，並分向敵後挺進。敵軍乃不得不抽調主力，向左路迎擊。且料我傷亡重大，決無反攻能力，僅留一部與我相持。我見敵人動搖，乃親率未傷亡之官兵，竭力反撲。隨同我最先前進者，僅連長李耀宗、馮璜及衛士長牛德才衛士莫世才、廖正光五人而已。夏煦蒼將收容餘部，及右路我軍，亦隨我跟着反攻。敵軍不能支持，向都城方面潰退。此時粵軍第一師亦山下游追近都城，陳部及其官兵多爲桂人，陳天太乃率殘部突圍，向梧州方面逃竄。

我佔領都城後，查點衛士傷亡十餘人，第三團亦死傷過半，戰鬥可稱激烈。中路之挫折，由於攻擊時機過早，致使敵人得集中全力反攻。而粵軍又因爲溪水所阻，不能及時由後側夾攻，各方失却聯絡，幾致全軍潰敗。然始終信任友軍，以少敵衆，拚命支持。等待友軍到達，反敗爲勝，亦云幸矣！

敵軍既向梧州方向逃竄，我亦急由都城趕回梧州主持。但因連日作戰，體力疲憊。第三團傷亡過重，須加整理。於是先率第三團乘船回梧州，而以白劍生任追擊指揮，率左右兩路，及粵軍第一師一部，跟蹤追擊。敵竄至大洲圩附近，飢疲不堪，復爲我民團所阻，我追擊部隊，亦隨後追到，乃全部繳械。陳天太及其剩餘全體官兵二千餘人，盡爲我俘獲，解至梧州。除士兵分發各部補充外，對陳天太及其高

級官長，特加優待。並發給川資，放回廣州。我次年回廣州，在東亞酒店，復遭其襲擊，幾至喪命，可謂以怨報德，小人之尤！此時尚有一事值得紀念者：當事機緊急時，我因兵力單薄，電請李德隣協助，蒙派鍾統領祖培，率部星夜馳援。在中途得知陳部已完全解決，即折回桂平。玉林與梧州兩方面雖是分立，但患難之際，則互相援應，實爲合作統一之先聲也。

肅清大河一帶土匪 這時大河一帶，自貴縣以下，蹙盡入玉林及梧州方面之掌握。而散兵土匪，橫行各縣，民不聊生。梧州至藤縣，水程不過九十里，土匪收行水的關卡，亦有數處之多。有一次，我與孫祥夫乘海軍內河兵艦，由藤縣下來，亦爲土匪所擊射。經船上開砲，始將其擊退。其他商輪，不納「行水」者，無不遭其轟擊。傷人劫貨，殆爲常事。我與李督辦商量，趁軍事稍暇，實行全面進剿。蒼梧境內，由粵軍第一師之一部担任。藤縣江至岑溪一帶，由我第三團担任。藤縣以下，至梧州水道，由第二團担任。藤縣以上至平南，由第四團及蔡司令担任。匪幫佔據堅固民房，頑強抗拒，非逐屋進攻，不能將其掃除。步槍火力不及，則繼以手榴彈火砲。往往匪在炮樓之內，將其頂樓轟毀，則退守二樓。二樓再毀，則在地上掘壕，在牆脚開砲眼，仍行抵抗。被困甚久，既不遠竄，亦不投降。火攻不可，乃用救火洋龍，以水注射，始得逐出。尤以藤縣之波塘村，有碉樓十餘座，房屋至爲堅固，圍困竟達八十餘日。後由韋營長雲濬用各種障礙物，將其封鎖，然後掘坑道至碉樓下面，用火藥轟炸，土匪數百人，盡行殲滅。自此之後，匪乃不敢固守，而終被肅清。總之，當時土匪竭盡其防守之能事，而我軍之攻擊，亦用盡各種方法。在這剿匪期間，工作之困難，與官兵傷亡之大，實較以前各次戰事爲甚。卒使土匪認諱官兵之不可抗，土匪之不可爲，實爲奠定以後治安之最大收穫。同時我軍亦獲得實地之演習，與戰鬥之經驗，裨益以後作戰更屬不少。

槍械彈藥補給的來源 在這一年中，因作戰而損耗彈藥極多，無法補充。我們雖然以「在前方補充

「的口號來鼓勵士兵，但是以前廣西並無製造彈藥之廠場。陸、譚時期，積聚一些子彈，都在歷年的戰爭中散失或消耗。與我們對戰的軍隊，彈藥缺乏，比我們還要厲害。前方補充，既不可能，祇得向後方請領。而廣州方面情形，也復如此。不得已祇好自己設廠製造。中國內戰時代，本來就是外國的軍火市場。在國際條約上軍火雖然是禁運品，但祇是表面文章，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自有方法，逃避國際條約的約束，而做成他們的交易。拿子彈來說，他們可以把子彈頭、彈壳、火藥三樣拆開，將彈壳的底火除去，以彈頭彈壳作廢銅鐵發賣，大量的公然運載入口。無烟火藥，亦可用其他方法運進來。據說：這是外國已過保管年齡的廢品，照例是要銷毀的。他們却賣給我們，換取我們的金錢。而我們則視為至寶，作為利器。我們得到這些現成製品，祇將底火重新配好，火藥彈頭重新裝上，就是一顆可用的子彈。後來我覺得無烟火藥購運比較困難，而且往往霉壞。於是自己設廠製造，由王應楡兄主持其事，因製造彈藥的原故，繼續設立了硫酸廠硝酸廠，以自製彈藥的原料，從此槍彈補充，遂不感困難。

我研究槍榴筒的開始 我們因作戰剿匪，極需要砲彈，與手榴彈，我們在敵人手裏，奪獲好多門舊式藥包山砲，但是砲彈極少，砲兵營長詹乾能將砲炸砲彈，製出試用，頗為滿意。但炸藥又成問題，無煙藥雖有，不能作爆炸之用，黑色炸藥亦感威力不大。遂聘請三個德國人，一個叫做雪倍，他曾在石井兵工廠做過工程師。其他兩個名字不能記憶。這三個德國人都是化學的專門人才，由他們担任製造高級炸藥皮克林酸（即黃色炸藥）。有一個因失慎，炸斷右手，成為殘廢！我們有了炸藥，不但砲彈有法補充，並能製造手榴彈。不過當時並無新的式樣，祇是在鐵壳內充滿炸藥，並插入慢燃導火索。用時，將火索燃着，然後投擲，這雖是很簡單很拙劣的方法，然而在當時內戰及剿匪，都收很大的功效。後來遠試驗過從手榴彈後面加一條尾巴，插入槍管內，用子彈射出，有時射得很遠，比手榴彈效力好。但是往往把槍管炸壞，並炸傷射手，以後就廢止了。這是我研究槍榴筒的起點。

至於槍枝之補充，亦同樣困難。廣東石井兵工廠雖有槍枝出產，但是不易領到。我們用了很多人情，出了很高價格，才買到很少數目。此外還向中國軍火商設法向外國購買。但是騙局太多，我們很困難的節下來十萬元港幣，被一個姓彭名競武的一騙就騙去了。此事係白劍生的姪兒某經手。他的確被騙，而當時紀律很嚴，軍法官竟將他處了三年的徒刑。後來我們便自己購置機器，設法製造。以上所述，為我們當時槍械彈藥補給情形，隨時都在艱難困苦中經營創造。雖規模簡陋，出品未精，而在軍事上之收穫則頗大。亦為廣西軍事工業之萌芽時代也。

我們的五項財源 當時我們的財源，大概可分為五種：第一為防務經費。兩廣人民好賭性成，民元以後，賭風大開，城市鄉鎮賭館林立。有番攤館、寶館、山票、花會等等名目。不論輸贏，皆抽征什一。美其名為防務經費，實則賭捐也。此為歷來收入之大宗，我們亦不能即時禁絕。此種賭餉，皆係招商承包，按期繳送。第二為保護費，即係對商船商幫，派兵保護其運輸，不致為土匪劫掠，其征收方法，則為按貨收費。當時土匪橫行，肆意打劫，勒收「行水」。保護費的辦法，頗與行水相似。不過商人僅繳納一次，即可免土匪之劫掠，與繳多次之「行水」，故亦樂於輸納也。此種收入，多由軍隊直接辦理，繳呈公家。第三為禁煙督察經費。民元以後，煙禁已弛，雖表面上仍維持禁煙名目，實則藉以籌餉。廣西為雲貴兩省煙土出口必經之地，除在就地銷售一部份外，大多數皆向廣東方面運銷。禁煙經費，分為兩種：一為煙土過境費，就運輸過境之煙土，每兩收費若干。一為煙燈捐，即本地吸食者，按月納捐若干。此項收入為數極鉅。廣西統一後，全省統計年達千餘萬元，可知雲貴煙土運銷於兩廣者，年達數千餘萬兩之多。為害之烈，自不待言。而飲鳩止渴，亦屬不得已也。第四為釐金，援滿清前例，設關收稅。我到梧州後，改為商包，收數增至三四倍，而包商仍有利可圖。商貨受其苛抽，則自所不免。第五為各縣糧賦。廣西田賦額甚輕，而當時所轄者僅梧州屬五縣，故為數不多。以上所述，各種收入，為全部

軍費之來源。皆由各收入機關，直接解繳指揮部，軍需處，隨收隨用。收支既無一定預算，會計審計，亦無制度可言，僅憑人的信用而已。斯亦草創時期之必然現象歟。

陳天太的暗算 自從我到梧州不滿一年，前後幾次戰事，皆獲全勝。力量日增，各方皆極注意。而在廣州之桂軍，製造謠言，謂我與北洋政府聯絡，反對革命。或謂我為一個地方主義者，祇知有廣西，有個人，而不知有革命政府。這種謠言，皆為陳天太所散播，意圖中傷我們的。這時我尚未入黨，尤為攻讟的主要理由，粵軍第一師許多朋友都勸我到廣州去解釋，即在廣州入黨。我服從 總理出兵討賊，已有半年，入黨自不成問題。但我頗慮陳天太在廣州，尚有武力，即其他桂軍對我亦無好感。他們都以為自己是廣西革命先進，廣西的事，應該由他們來包辦，而今反由我這年輕後輩，佔有廣西富庶衝要的地盤，駭駭有統一廣西之勢。因妬生恨，自屬意中之事。我如赴廣州，祇能帶少數人員同往，對於個人安全問題，實不能不顧慮及之。許多朋友中，陳伯南主張我赴粵最力。並謂第一師第三團駐廣州，其他粵軍，為數更多。他本人並陪我同往，安全問題，絕對負責。我雖知必有危險，而衆議難却，遂毅然起程，用小火輪拖帶花舫東下。同行者有陳伯南黃劍靈（鑰球）陳傑夫、葉潔如諸人。行至德慶附近，天黑風大，航線難認，所拖花舫，誤觸礁石之上，黑夜沉船，方向不辨。伯南、劍靈、傑夫、潔如雖幸獲救登陸，然均飽嘗水中滋味。我本會游泳，但黑夜中不敢下水，乃堅踞船頂，船未盡沉，我亦安坐無恙，次日，改乘他船至三水，搭車到廣州，由陳真如伴我到各方行動。午後，真如有事，又由伯南伴我到胡展堂先生公館。其時 總理已經北上，由其代理大元帥職務。同座談話者，有許汝為、廖仲凱兩先生。我除將經過陳述外，對廣西以後問題，亦經談及。彼等對以往一切，甚為了解。希望我此後對廣西問題，多負責任，以鞏固兩廣革命基礎。廖許並答應為我入黨之介紹人，定次日同到中央黨部填表宣誓入黨。談話完畢，我與陳伯南同回東亞酒店二百零五號房間寓所。蓋在梧州時，彼答應担負我的安全責任。

，故日夜皆與我同伴，以防不測。此種誠意，真使我永難忘却！我隨身僅帶衛士六人，皆久經戰事，而忠實勇敢者，住於我之前房。這時已是十二點鐘，我回房後，甫卸衣襖。忽聞槍聲大作，向我房射擊。衛士長牛得才腿部中彈，尙臥地還擊。其餘衛士亦仍相繼開槍，幸不爲所傷。我這時已知爲陳天太所暗算，情勢危迫中，惟有督率衛士，堅決抵抗。而對方人數甚多，（事後查知爲三十人左右，附近各方俱已佈滿。）攻勢猛烈。在狹隘的地方，衛士僅能死守房門，無法回旋。幸我當時極爲鎮定，雖發起倉卒，仍能沉着應付，毫不並慌。知旅館房屋，皆鋼骨水泥所造成，衝之不破，火之不能，即剩我一入一槍，亦尙可與之相持。若能支撐到天明，則粵軍必來救援。如此激戰達數十分鐘，伯南已偵知從後窗可以翻過先施公司後樓。並謂：「既有路可避，死拚實爲不智。」遂相偕翻越鐵棚，進入先施後樓，適爲公司職員高君義安夫婦之臥室，彼等先開槍聲，已極驚惶。繼見我兩人持槍闖入，以爲行劫，戰慄不能出聲！我等乃將事由說明，請其帶路，至潮音街警察區者。這時我兩人身著睡衣，無鞋無襪，至爲狼狽。經以數十元向工友購得便衣鞋襪，化裝步出。夜深人靜，彼輩僅向前方進攻，後方並無圍阻。我們到達區署後，伯南即打電話報告粵軍總部，旋即派汽車來接我等到舊省議會內粵軍總部，至是乃告脫險。我等行後，衛士等尙繼續抵抗，但敵人太多，前仆後繼，仍然圍攻。衛士見我已出險，遂亦由後樓退出。衛士長牛得才身中十餘槍，當場陣亡。衛士覃立佳，身負重傷，仍能跑至高第街辦事處報告，隨即倒地身死，忠勇殉職，至堪悼念！其餘皆人槍無恙。後查悉兇徒三十餘人，傷亡十三人，並談傷茶役李牛一人。戰鬥自十二點鐘開始，至三點多鐘才停止。這可算得廣州市內的一場小激戰。

宣誓入黨 我到粵軍總部，次日，軍政要人皆到來慰問。劉震寰見面時，握手大笑道：「我早防到此事，好在已脫險，事情你也明白。不然，這個膏藥，又要貼在我身上了。」范石生說：「廣州太不成樣子！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不止一次。我們已司空見慣，所以昨夜的槍聲，大家並不覺得驚奇。」

「許廖並問入黨是否即舉行。我含笑答道：「祇要我尚未死，一定入黨，決不因此而稍有猶豫。」彼大加贊許，謂這樣才是革命者的態度！於是填寫入黨表及志願書，由許、廖簽名介紹，在大禮堂舉行宣誓儀式，由胡展堂先生監督，並拍照留為紀念。是晚，胡、許、廖為我設宴、招待、洗塵、壓驚、歡迎的意義，兼而有之。同席的除各軍政要人外，還有蘇聯的總顧問加倫將軍。這次的菜肴中，有蛇肉一味。加倫將軍大概是初次嘗食蛇味，食後，許汝為先生問他：「好不好」？他說：「很好」！然後告訴他這是蛇肉。他很驚訝！加倫將軍出並示蔣先生致許先生一封很長的信，內容怎樣，我不知道，祇聽得他們說：「介石的理論，自然是不錯，但是事實上，恐怕一時做不到！」這時蔣先生正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並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兩內所說，想係軍事改革問題。

在黃埔初見蔣先生 次日，我起程回梧州，許總司令派龍驤兵艦送我回去，由粵軍總部至東山碼頭，皆由我軍特別戒嚴。許先生同我乘汽車登艦，並陪我到黃埔，在一個陳設很簡單的房屋內，會見蔣先生。這是我同他初次會面，當時感覺他的態度嚴肅而剛毅，與其他的軍事長官，頗有不同的地方。他將辦理黃埔及建立革命軍的意義，很簡略的告訴我。我因急於回梧州，不及參觀，乃興辭而出。自己乘艦到肇慶，改乘他輪，回抵梧州。此事經過，我雖處之泰然，而部屬真相不明，焦急萬狀。我回來後，彼等始覺放心。我這次赴粵，性命幾遭不測，承粵軍將領，患難與其，並得其種種關顧，不僅私交上成爲莫逆，在公證上亦更增密切關係。而當我加盟入黨之時，竟遭逢此種險惡風波，在我個人歷史上，亦爲值得紀念之事件也。

六 統一廣西各戰役

玉林與梧州之合作 玉林與梧州兩方，因已往出兵梧州問題，彼此總不免存有多少芥蒂，後來雙方屢經派人疏通，因而有解決陸雲高、陳天太兩役之合作，不但前嫌盡釋，而且充分表示患難與共的精神。雙方根本上之主張，與敵對目標，亦益趨一致。不過在方法和手段的運用上，彼此略有不同而已。

民十粵軍入桂，因紀律太差，遭桂人的全體反對，和民九桂軍入粵，遭粵人全體反對，如出一轍。因此凡接近廣東方面者，無一不受桂人及自治軍之盲目攻擊，劉震寰的不能在桂立足，馬曉軍及我等亦幾為衆矢之的，都是這個緣故。

玉林方面對於自治軍，尚無若何的惡感，若用粵方名義，則必增加他們的反對。雙方爲求工作進行之順利，名義雖異，而相約互爲表裏。對廣東，由梧州出面負責；對自治軍，則由玉方出面敷衍。在實力未充，時機未到的時候，用這種手段分途並進，目前既可減少反對之目標，事後仍可收統一之效果。故玉林方面自稱爲「定桂軍」，以示與梧州方面之受命討賊者有別，李德鄰自爲定桂軍總指揮，並以黃旭初爲參謀長，黃子敬爲祕書長，李石愚、何武分任支隊司令。兩軍既名義各異，所用旗幟，亦各不同。討賊軍用白邊紅心的方形旗幟，中書白地「黃」字。定桂軍用黑邊紅心的方形旗幟，中書一黑地「李」字。這是緣用舊軍的封建習慣，各以主官的姓字代表其所領率之隊伍也。

兩軍各有其防地，定桂軍爲玉林、北流、陸川、博白、興業、貴縣、桂平等七縣；討賊軍則爲蒼梧、藤縣、容縣、岑溪、平南、信都等六縣。兩軍在自己防地內，不論軍事上政治上，凡用人行政，各有其系統，各有其作風，而不相統屬，但彼此在此階級中，對於共同之主張，和共同的目標，皆本其團結

精神，爲最大努力。其在軍事上所表現之合作的事實，比到同名義同系統者，無稍遜色，或更過之。此爲當時之特點，實爲以後統一之基礎。

我們的政略與戰略 我們估計自己的實力，與陸榮廷，沈鴻英兩大奮勢力相比，所差甚遠。我們對於整個政略戰略原則之決定，爲先陸後沈，各個擊破。第一個階段爲聯陸制沈，第二階段爲聯沈滅陸，第三個階段爲滅沈。所以當我們出兵梧州襲擊沈軍時，陸氏方面並不作任何攻擊，且由玉林方面，對他竭力求敷衍。陸氏當時亦當引以爲快！

民國十三年春，陸氏受北洋政府任命爲廣西善後督辦，由湖南回駐桂林。沈氏自民九以後，早欲脫離陸氏，而自樹一幟。這次陸氏重行回桂，有久駐桂林之意，沈軍防地被佔，遂發生利害上之衝突。沈乃率兵圍攻桂林，彼此以城爲戰，幾及半載，桂林人民，乃飽受其荼毒。而在我們方面，則認爲各個擊破他們之大好機會，並計及陸若得勢，他在省內之號召力量，比沈氏要大得許多。如前所述，我們在戰略上，必須制止陸氏之復起；而在戰略上，則須聯沈以敗陸。沈氏對我，雖恨之切骨，今既目標相同，自然極表歡迎。故我之聯沈敗陸計劃，自有其最後之目的，而在表面上，則做得頗爲自然，使人家看不出我用意所在。因此社會上有一些人深爲詫異，對我與沈氏合作的舉動，頗有非議。

我在政治的立場上，對陸氏已往並不採取文字謾罵的攻擊，而是對於其新受北洋任命，自毀其辛亥首義與反對帝制的歷史，深爲惋惜，勸其勿再作馮婦，而見機勇退。在陸氏能否感動接受，固不可知，在我們則不欲落捏造對方罪狀抹殺事實的檄文陳套，而予其餘衆以反感。我們在軍事上之計劃，是先佔領南寧，把握全省政治中心，使陸氏不能再藉此以爲號召。蓋陸氏在桂，一般人民對他並無十分惡感。若果重到南寧，號召力自必更夫，故須趁其與沈軍在桂林相持不下之時，先發制人，將南寧佔領，使其陷於進退維谷境地，然後方易將舊勢力分別掃除。我們當時的「討陸宣言」，僅是輕描淡寫，很簡單

幾句話：

各縣知事轉地方團體父老公鑒：我桂受兵禍十三年於茲矣！往昔客軍入境，幾同竭澤而漁，因之羣盜滿山，直爾安巢無鳥！補瘡孰從剜肉，同室忍再操戈？乃者，百色重鎮，大劫揚灰，八桂舊部，無端流血。摘瓜豈將抱蔓，折枝寧不傷心？某某早濫覆車，力圖保境。覺迷途其未遠，冀省治之重光。何其人面不同，魯難未已！僑將被壓，虜慮先亡，民其何辜，各將誰屬？用是會師邕甯，謀庇本根。杜彼政參，歸諸民治。所願邦人厭亂，多福原在自求；須知天道禍淫，惡力終歸自殺。卽時大覺，還我太平。謹掬苦衷，敬祈亮督！總指揮黃梗印。

我軍驅陸和會師南甯 自陸氏在桂林與沈鴻英發生衝突，相持不下，陸氏向北洋政府請援，北洋政府派湘軍一旅入桂。旅長桂人葉琪，是我們同學，彼亦不願捲入陸沈旋渦。師次全州，卽不復前進。陸氏所部，乃不得不向柳州方面集中，欲與沈氏爭一日之短長，而不虞吾等襲其後也。當時，他們的軍隊，如譚清明、韓彩鳳駐柳州、慶遠，陸福祥駐遷江，賓陽，林俊廷、蒙仁潛駐南甯，劉日福駐百色，譚浩澄、譚浩清駐龍州，總數不下三萬人。但分駐各處，每處皆係數千人。而當時我們討賊、定桂兩軍，合計可用的兵力，不過八千餘人，故必須集中使用，先將南甯方面擊破，然後再分向柳州桂林進擊。

戰路既定，乃於民國十三年五月間，將兩軍主力，在貴縣附近集中，隨分爲左右兩路：左路軍由李德隣指揮討賊軍伍展空、夏煦蒼、蔡振雲所部，定桂軍李石恐所部，沿江而上，直攻南甯。右路軍由白劍生指揮定桂軍何武、鍾祖培所部，討賊軍俞作柏所部等，攻擊賓陽遷江之敵，佔領賓陽、遷江、上林之後，乃轉向武鳴、南甯，與右路軍會師。我則指揮其餘各部，作爲策應，兼顧後方，仍駐梧州。左路軍於六月四日佔領南甯，擊斃蒙仁潛。林俊廷率殘部逃往那馬、都安，省長張其鏞亦棄職潛逃。南甯自民國十一年五月間爲自治軍盤據後，已整整兩年，至今乃獲解放。右路軍方面戰事，雖較激烈，但進展

亦極順利。攻佔遷江、賓陽、上林各縣後，陸福祥率其殘部與山南甯北沿之林、蒙殘部，退據武鳴以北之都安縣一帶，與柳慶方面之譚浩明、韓彩鳳仍連成一起，與我對峙。

我軍會師南甯，能如此迅速順利，一則由於自治軍之散漫頹喪，各自爲謀。陸、譚雖回桂號召領導，仍不能團結振奮。二則由於陸、沈相持，彼所注意者，爲當面之沈軍，對我們並不十分重視，不料我異軍突起，竟覆其根本，使其進退失據。三則由於我們用兵秘密而神速，集結而銳利，使其戰前不知預防，戰時不能援應。這是我們與陸、譚正面衝突的開始，而即獲此重大之勝利，對未來桂局關係的鉅大，自不待言。

以情感作用造成軍政統一 當定桂、討賊兩軍會師南甯之後，許多複雜問題，亦即隨而發生。第一，關於政治的，南甯是全省政治中心，對於政治應如何處理，不僅有關整個對外的號召力量，亦爲自己內部極容易引起磨擦糾紛的原因。而事實上，我們內部因財政和稅收機關問題，各級幹部已發生權利衝突，幾當當面之敵人於不顧，而劍拔弩張的在那裏拚命爭奪。這是我們到南甯後，急待解決的事件。第二，關於軍事的，以前一時的局部的合作辦法，已難應付此後複雜而擴大之局面，故必須有統一的指揮機構，才能集中意志集中力量，進行全省的統一工作，而且兩軍幹部以前的芥蒂，亦須由指揮機構之統一，方可達到澈底泯除之目的。李德麟身當其衝，非常焦急。乃電我前去商量，我趕到南甯，一切問題都尚無頭緒，而敵軍與我正在相持狀態之下對峙着，情形頗爲嚴重。於是先商討軍事統一指揮問題，決定組織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部，由李德麟與我召集兩軍重要將領會餐，席間我起立說明必須組織聯軍總指揮部之理由，並推戴李德麟爲總指揮，我自願爲副指揮。並說：「我原是李德麟部下，因爲出兵梧州，權宜自樹一幟，今既會師南甯，正宜乘機回復舊時組織，以期統一指揮，進一步而統一廣西。要是彼此不能相下，必至自相火併，而與舊軍閥無異。我們今日幸乘陸、沈相持，佔領南甯，獲得勝利。陸、沈

前車之轍，是不可再蹈的。故我們無論在任何狀況之下，亦祇得服從李總指揮，方為合情合理。我的部下，如有不服從李總指揮者，即等於不服從我一樣，必為團體所共棄。一我並且瀝酒為誓，表示誠意。大家見我如此，自然一致感動，毫無異議。繼由李德隣起立致詞，勉以精神團結，共成一廣西之大業。次日即於當年的督軍府內，成立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部，並任白劍生為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黃旭初為副參謀長，胡宗鐸為總參議，俞作柏、夏煦蒼、伍展空、蔡振雲、李石愚、何武、鍾祖培等為縱隊司令，而繼續進兵，展開以後的各戰役。這件事實為玉林、梧州兩方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經過。其間並沒有什麼命令法律的依據，而完全由於我等之情感作用。我現在回想此種舉動，好像梁山泊裏衆義士推尊晁蓋的情形一樣，自吹自擂，滑稽好笑！但在當時，亦確非如此做法不可。這就是統一廣西的一個最重要關鍵。

至於政治問題，我們以為在這階段內，尙是軍事時期。一切政治的建設，尙談不到。第一是我們對於政治無經驗無興趣。第二、我們都要親自指揮部隊，與敵人拚死拚活，那有工夫分身去管理政務？倒不如在省內物色較有名望的文人，去當省長，以避免所謂軍人干預政治之指摘。那時廣西尙有一個省參議會存在；議長張一氣氏，聲望尙孚，於是由省參議會推選他担任廣西省長，負行政上的責任。實則廣西省長，在陸、譚時代，已如告朔餼羊，無一不在軍人支配之下。此時未脫軍人割據時期，張氏雖坐上這把交椅，實際他的政令所及，真限於極小的區域而已。

決定第二步作戰計劃——先聯沈討陸——自軍政機構組織完竣在南甯成立後，省內人士觀感為之大變，我們在軍事政治上的地位與聲望，也自然增高了許多，同時自治軍內部的心理，日漸動搖，我們必須趁此時機，加速進擊，以促其瓦解，而收拾亦比較容易。隨即決定第二步作戰計劃，將軍隊分為三路：左路軍由白劍生指揮夏煦蒼、何武、鍾祖培、章肇隆等部，並與沈軍聯絡，進攻柳州。這時陸沈正在桂

林相持，陸氏主力，大部在桂林附近，柳州守兵不多，我軍遂於八月十一日佔領柳州，敵向慶遠逃竄。次日即向柳城、慶遠追擊前進，迨師次柳城，偵悉陸系健將韓彩鳳，率譚占榮、黃日高、鄧定邦等數千人，由桂柳，希圖襲取柳州，夾擊我軍，已經到達中渡東泉附近。白劍生乃停止西進，轉而向東迎擊。韓軍知我回師，乃佔領上雷、大茂橋一帶陣地。因韓氏爲上雷附近人，既佔地利，又得人和，所部本極耐戰，我軍攻擊至爲艱苦，最後，白劍生親率衛士，加入火線，始將其擊退。彼此傷亡皆甚重大，其激烈情形，實與郟城之役相髣髴。韓軍雖敗，仍退集於大浦、沙浦之附近，扼險固守，以待由慶遠方面來援的部隊到達，再行反攻。此時我軍在柳城附近，處於前後受敵之形勢，不得已遂撤回柳州。

陸系健將韓彩鳳之敗 沈軍師長楊子德、旅長沈錫剛、駐軍鹿寨附近，持觀望態度。一因沈軍對我本無好感，此次因一時利害關係，聯合作戰，實欲收漁人之利。其次爲沈軍對韓軍頗懷畏懼三則。韓沈兩軍所部，多爲柳城人，皆有鄉土的關係，不肯輕於破面。且沈軍志在佔領柳州，現柳州已爲我軍所有，大失所望。我軍當時，以大敵當前，沈軍又居心難測，形勢至爲不利，故必須使沈軍積極參加作戰，方能化險爲夷。我們的計劃首先須使其知道韓軍已爲我所敗，以滅除其畏懼心理。但正面通告，難以取信，白劍生乃使彼此電話線接在一起，使他們從偷聽中得到實況，並且答應解決韓軍之後，以柳州歸其管轄。彼見有機可乘，有利可得，遂接受指揮，進兵中渡，向大浦、沙浦攻擊韓軍的側翼，我軍同時由正面猛烈進攻。韓部受創實重，乃向慶遠潰竄；我軍跟蹤追擊，將其圍困於慶遠城，旋即攻破，俘獲甚多。陸氏在柳慶勢力，至是完全崩潰。韓彩鳳治軍頗嚴，能與士兵同甘苦。民國九年，桂軍由肇慶撤退時，高級將領不脫離隊伍者，僅韓氏一人。且沿途作戰，皆極盡力，各軍卒賴以安全退回梧州，及陸氏完全失敗，乃率殘部退入湘境，始終不肯投降改編，其忠貞亮節，在對人的舊觀點上，是值得贊美的。十六年以後，解甲爲農，安貧守法，不因私怨而稍有越軌行動，公私分明，恩怨不苟，誠爲舊軍人中之

懊惱。我於三十三年路過沙浦，見其墓木已拱，追思往事，不勝景仰！

收編劉日福部 中路方面，由俞作柏率其所部討賊軍第一縱隊，及討賊軍第四縱隊蔡振雲等部，由武鳴出發，向那馬都安進攻，肅清當地之敵後，再轉向果化恩隆，肅清右江之敵。這時，林俊廷及陸氏心腹健將陸福祥，與蒙仁濟殘部四五千人，盤據都安那馬一帶，常有乘隙窺伺南甯的企圖。右江方面，劉日福亦擁衆數千人，佔據百色，態度模稜不定。南甯爲我政治中心，右江爲我餉源要道，故必須將他們殲滅，以解除南甯的威脅，保護右江的餉源。八月初旬，俞指揮親率所部，向那馬進攻，陸福祥亦親臨督戰，憑險頑抗，戰事極爲激烈，雙方傷亡，皆頗重大。後陸福祥感部受傷，卒至潰敗。我軍乘勢追擊，再戰於都安，又將其擊敗。林俊廷率殘部退都安以北貴州邊界一帶，我軍乃捨而不追。陸福祥率殘部經果德渡過右江逃鎮靖西，而隻身入安南，不復再出。我軍尾追陸福祥，佔領右江沿岸的果化隆安兩縣，轉向上游的恩隆進逼。劉日福見大勢已去，乃向定桂軍投誠。劉爲人頗誠實，無野心，頗得百色一帶商民愛戴。我亦不欲再向西深進，即將其收編，仍令其負右江一帶的治安責任。於是中路軍旋師南甯，右江軍事，遂告結束。

譚清敗逃入安南 左路方面，由胡宗鐸指揮討賊軍呂煥炎所部，及定桂軍劉權中所部兩縱隊，溯左江而上，直搗龍州，並與進入右江方面的蔡振雲縱隊，取得密切聯絡。由果德鎮結向都安，以切斷其向靖西逃走的道路。這時，縱據龍州一帶的陸譚殘部，爲譚清、譚浩澄所率領，二人都是前督軍譚浩明的昆弟，花花公子，全不知兵，而且暴戾殘忍。唐紹慧、甘尙賢、譚元翰等比較進步的人物，皆被他慘殺。在地方上更是任意妄爲，無惡不作，所以我軍一到，除了崇善縣附近稍有戰鬥之外，皆望風逃竄，或投誠收編。兩譚皆隻身逃入安南，他們早在那裏備有退避之所。胡指揮遂於八月中旬，進駐龍州，右江軍事，至是亦告結束。當委胡爲邊防對訊督辦。這個名義是前清以來就有的。除督辦之外，並在重

要的地方設對訊員，係專管廣西安南邊境人民往來之查驗與治安的責任，似有國際警察的性質。

陸氏二度下野 我們第二步的軍事行動，自五月間發動，至九月間全部結束。十月，陸氏在湘發表下野通電。在這短短的五個月中間，我們以八千多人的兵力，掃蕩三萬餘的優勢敵軍，雖然尚不能算根本的肅清，但已使其從此不能作有組織的抗拒。這樣，便底定了廣西四分之三的土地，（除桂柳平三屬外），奠定了廣西統一的基礎。這不能不歸功於政略戰略的配合適宜；而兩軍在名目各殊系統各別的情形之下，能毅精誠團結，同仇敵愾，兩軍將士亦能戮力齊心，勇敢犧牲，皆為成功的最大因素，亦為廣西統一的奇蹟。

陸氏在桂林既為沈軍所困，南甯及左右兩江各地又為我聯軍所佔領，知事無可為，乃再作第二次之下野，仍由湖南退走滬上作寓公，以終其餘生。其所部除馬濟率領一部入湘之外，留桂者遂日漸解體，不復有組織之行動矣。

陸氏在桂的行政實況 陸氏之政治生命，既告終結，他的生平事蹟，自有其時代的背景與價值。我在當時，雖處敵對地位，但未嘗謾罵詆毀。今日回憶往事，亦雅不欲多所論列。然而對於當日他們的行政實況，則須略為敘述，以供後人之參考。總括一句話：在陸氏主持桂政的一個時期中，雖談不上如何建設，而廣西人民却得到八九年的安定生活。考其原因，約有三端。

第一是用人行政問題。當民國元、二、三、四年間，全國統一局面，尚未打破，袁氏的中央政權力量，尚能到達各省。除擁有兵權的督軍任免稍有顧慮外，各省省長（先稱巡按使）皆由中央任命，且定軍民分治之制，以防武人干涉行政，民二、三、四年之廣西省長張鳴歧、王祖同兩氏，皆前清疆吏出身，對陸氏有部屬與舊誼關係，不致過分干涉其職權。張氏在宣統元、二年間，對廣西銳意興革，已稍具規模。到他再度來廣西的時候，雖當鼎革之後，權力財力皆不能運用自如，然猶能維持現狀，不致過越

常軌。即以縣知事的任用而論，對於資格與政績，均尙相當注意，並確定署理期間爲一年，期滿按成績之優劣，再定實授與否，仍循前清之舊例。民國五年後，省長爲李靜誠氏，此時中央權力，國家制度，已不是省長所能憑藉和運用，而但憑陸、譚兩氏個人之意志爲從違。最重要的縣知事任用，其署理期間，雖仍爲一年，但極少由署理而獲實授的。因他們都把縣知事一缺，作人事上應酬之工具；知事的任期愈短，更動愈快，則應酬之機會亦愈多。（這在當時，固不免引起多少的物議，然猶有一年的確定時間，較之以後的一年數換者，又勝一籌矣。）我在當時，聽到一般當過縣知事的談論，多認爲這是上官予他們生活的調劑，而不是做事的機會。的確，在一年的時間裏面，一縣長官是不能有什麼成績做出來的。所以我主張縣官要久任，但也要有個任期，到期嚴予考績，以決定其連任與否。此卽古人所謂：「三載考績之意。」

第二是金融貨幣問題，廣西原無本省鑄造的貨幣，以前社會上所流通者，都是廣東所鑄的毫洋。陸氏時期創辦的廣西銀行（係以前清之官督局所改組者），曾發行一元、五元的紙幣。當時信用頗爲堅固，不但在桂境內通行，而且隨着他們軍事勢力流運到廣東、湖南。廣西原爲貧窮省份，清代皆向廣東協餉，財政始能維持。民元以後，協餉來源斷絕，省內支出固賴銀行紙幣以爲補助，卽陸氏的入粵援湘，亦全賴紙幣的運用。民國十年的冬季，陸氏勢力崩潰，廣西銀行發行的紙幣，卽隨而破產。後來粵軍在桂，曾發行軍用鈔票，亦因粵軍勢力的動搖而不能通用。最後沈鴻英、林俊廷相繼發行軍用票，同因軍事失敗而失其價值。人民痛遭損失，對於紙幣毫無信用，相反的，對於硬幣信用日好，於是各方皆減少成色，私鑄銀毫。初則廣西僞毫與廣東銀毫價格相去頗遠，繼則廣東僞毫亦充斥市面，商民無法辨別，於是相率拒用。此爲廣西金融混亂時期。陸氏在民十以後，雖屢次對外用兵，而廣西人民的負擔，並不加重，頗爲人民所懷念。陸氏歿後，章太炎替他作傳，有「不加稅而費用足」之語，卽是指陸氏發行紙

幣之功。然而民十後，紙幣破產之損失，則爲桂人重大之負擔。陸氏仍不能不負大部份的責任也。

第三爲地方治安問題。廣西素稱多匪之區，但在民十以前，全省人民皆能安居樂業，並不是當局對於地方治安有何賢明的設施。最大原因，還在收撫土匪。民五以後，陸氏勢力正向外發展，其兵員之補給，除招募無業壯丁之外，卽爲收撫土匪，編成軍隊，而開出省外。因而省內受土匪之騷擾較少。然而爲匪者，既不以爲匪爲可恥，亦不以法爲可畏，視反而此爲進身之終南捷徑。民十以後，此種份子隨陸氏之失敗而重回廣西，「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仍舊在廣西各地幹他本來的勾當。自民十以至民十四，所謂自治軍者，無非是此輩借自治名目，作爲害地方的行動。我們之統一革新運動，卽完全以他們爲對象，艱辛剿辦，一直到民十五年，才將其肅清。不特地方得以安全，而社會觀念亦賴以糾正。

以上所述，用人行政、貨幣金融、及地方治安三項，爲陸氏政治方面頗足稱道的成績，而比較有利於地方者。但皆僅爲一時的，而非永久的。同時利之所在，弊亦隨之，爲功爲過，正復難定。要之，身歷其境的廣西人民，當必有正確的認識耳。

沈軍三路反攻與我方對策 自陸氏再度下野，桂林、柳州、平樂各地，遂盡爲沈軍所獨占。陸氏餘部，亦多爲其吸收，勢力日益強大。沈氏明知與我勢不兩立，而且梧州爲全省經濟中心，民十二年爲我襲取。一段舊恨，時刻不能忘懷。此時見我軍西越南寧，認爲奪回梧州的最好機會，乃秘密將軍隊分向賀縣及柳州蒙山三處集中。賀縣一路，出信都攻擊梧州，由其子沈榮光指揮。柳州一路，出武宣攻擊潯州，由鄧瑞徵、鄧右文指揮。蒙山一路，出潯江截擊平南、藤縣水道，由陸雲高、陳春光指揮。我等對於沈軍的計劃，早在意料之中，而其軍隊之行動，亦不斷得有報告，便用最敏捷之戰術，攻佔南寧，肅清左右兩江。除以一小部駐守南寧及各要點外，其餘主力，皆調回梧州潯州。蓋我們早料沈軍必有此一着險棋，而預爲佈置也。

聯軍總部取銷後的統一新陣容 自民十三九月間，陸氏在湖南通電下野，軍事暫告結束，我們在廣西的聲勢，甚為各方所注意。各方面都有代表，同我們聯絡。我們也不能不派代表和他們敷衍。這在那時環境，是不得不如此的。因為討賊定桂兩軍的名目不同，聯軍總指揮部的組織亦是權宜的辦法，特別引起廣東方面許多謠言與誤會。十一月間，胡展堂、許汝為兩先生，曾有電邀我同李德隣赴廣州有所商洽，當時由我代表前往。同時，大本營方面，對於我們的發展，極表欣慰，並希望我們在革命政府之下統一起來，將聯軍總指揮部及定桂軍討賊軍的名義取銷，由大本營另給名義，以示統一。商量的結果，委李德隣為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兼廣西陸軍第一軍軍長，我為會辦兼第二軍軍長，於十二月一日在南寧宣誓就職，隨即將以前定桂軍的隊伍，改為第一軍，以前討賊軍的隊伍，改為第二軍。一幕梁山泊式的趣劇，至此改易面目，另換一個新局面。左表所列即為我們那時的陣容。而真正實力，每軍不過七八千人。表列各番號，亦有大小強弱的不同。

廣西全省綏靖處督辦 李宗仁

廣西全省綏靖處會辦 黃紹竑

參 謀 長 白崇禧

警衛第一團團長 郭鳳岡

警衛第二團團長 陶萬鈞

第一軍軍長 李宗仁兼

參 謀 長 黃旭初

第一縱隊長 李石愚

第二縱隊長 陸超

統一廣西各戰役

五十回憶

第三縱隊長
第四縱隊長
第五縱隊長
第六縱隊長
統領
第二軍軍長
參謀長
第一縱隊長
第二縱隊長
第三縱隊長
第四縱隊長
第五縱隊長
第六縱隊長
邊防第一司令
邊防第二司令
游擊司令

鍾祖培
劉權中
何中權
韋肇隆
封高英
劉日福
黃紹竑
白崇禧
俞作柏
伍廷颺
夏威
蔡振雲
呂煥炎
羅浩忠
徐啓明
龍得雲
馬夏軍
何正明
陳秀華

盧文樞

余志芳

封輔軍

陳先覺

黃桂丹

岑孟達

陳濟桓

統領

支隊司令

聯合粵軍消滅沈部 我們兩軍的兵力，合計起來，還不及沈軍的半數，如果要和沈軍開火，獲勝的把握，是很少的。這時粵軍第一師，尚有一部留駐梧州，沈軍若將我軍擊敗，粵軍亦難立足，並且影響廣東甚大。我乃商准李任潮增援，共同出兵。以粵軍第一師第二旅及我第二軍夏煦蒼所部為右路軍，向賀縣、八步之敵攻擊，由陳伯南担任指揮。第一軍主力及第二軍呂煥炎所部，為左路軍，向武宣、柳州之敵攻擊，由李石愚担任指揮。第二軍俞作柏、黃超武等部為中路軍，向蒙山之敵攻擊，由俞作柏担任指揮。李德鄰、白劍生皆親赴潯州指揮中左兩路，我則率領其餘部隊担任各路策應。沈軍對我仇恨既深，蓄力亦久，交勢至為兇猛。而我方將士，都知此役為生死存亡關鍵所繫，無不勇敢奮鬥。在幾度艱苦危難之情勢下，卒將各路敵軍擊敗，節節進展。

右路軍方面，佔賀縣、八步之後，隨向平樂進攻。中路軍佔領蒙山後，隨向潯浦進攻。敵軍希圖在潯浦附近，再作抵抗，我中右兩路會合，將其擊敗，敵遂向桂林方面潰退。粵軍第一師抵達平樂後，即班師回梧州。此役得他們助力不少，公誼私情，至今猶難忘懷也！

左路軍自武宣附近激戰後，續向石龍柳州城追擊，敵軍因主將鄧右文陣亡，兵無鬥志，便放棄柳州

，分向桂林及長安方面潰退。我乃重新部署，以白劍生爲前敵總指揮，率第二軍之主力及第一軍之一部，向桂林攻擊，在桂林城附近，復將其擊敗，乘機佔領桂林城，沈氏乃率殘部向全州湖南邊境潰退。我們爲澈底解決起見，由白劍生率兵直追至湖南境內之城步附近，再將其擊散，沈氏僅率其少數親信逃入湖南，投依吳佩孚。這一段工作，完全由白劍生負責，中間還經過不少的艱苦鬥爭。因我未嘗在前方親自參加，現在也無從詳細追記了。我們另以李石愚率領一部追擊向長安逃竄的沈軍，直到貴州邊境。自此以後，沈氏在廣西之軍事勢力，亦繼陸氏而宣告終結！

擊敗自治軍殘部 當我沈兩軍正在激戰的時候，南甯一帶自治軍林俊廷等殘部，由都安、武鳴方面向南甯進迫。我守軍伍展空所部，人數無多，竟被他們圍困。當時我沈兩軍相持甚苦，勝負未決，不能抽兵前往增援，祇好令其固守待援。迫我軍各路已獲勝利，我乃親率徐啓明、何正明兩部，乘船到貴縣，由陸路向賓陽、南甯前進。林俊廷知我援兵將到，乃解圍退去。我回到南甯的時候，大約是十四年二月下旬，不久，又回梧州，因桂柳方面的軍事尙未結束也。

對沈軍的戰事，發生於十四年一月下旬，我們到處都是採取主動的攻擊，所以很快就將其擊敗。到了二月中旬，他的主力已經完全崩潰。雖然殘部還待肅清，但已經不能爲我們大礙了，我們所以要那麼迅速的作戰，固然是用兵的原則，應該如此。同時也爲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敵人，更大的戰役，緊隨在後，不容我們稍有猶豫。這敵人，就是唐繼堯及其派入廣西的滇軍。

唐繼堯派人游說 十三年冬天，我在梧州，忽然由雲南方而來了一個姓文的同學，並帶有唐繼堯的信件，信內無非是些應酬聯絡的話，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表示。但我却料定他此來用意，志在窺察兩廣方面的行情，當時也祇好同他敷衍一番。不久，又派一個姓高的同學，帶有川滇黔聯軍總司令的委任狀，擬委德隣同我爲他的部屬。並且同我商量，共同出兵入粵，解決在廣東的滇軍。同時還帶着煽惑恐嚇的

口氣說：「沈軍和在粵的滇軍桂軍內部，都已有秘密的聯絡。」態度非常傲慢，令人難堪。而且開口「聯帥」，閉口「聯帥」，好像我們已經是他部下似的。我們那時因對沈的軍事，正待發動，也祇好隱忍在心，和他鬼混。同時密電廣州方面，預籌對策。等到對沈軍事發動，那姓高的知事無可望，乃蕭然溜往香港，而滇軍亦即由滇黔各地分途向廣西進發了。

粵方派范石生部協助討唐。廣州方面接得我的報告，亦認爲情形非常嚴重，若待滇軍迫近廣東，始行派兵堵擊，則內部問題必多，反難着手。即徇我們的請求，派滇軍第二軍軍長范石生，率部援桂。蓋范氏主張滇軍回滇最力，反唐亦最堅決。若能在桂將唐軍擊敗，自可長驅回滇，以遂其願，故以范軍援桂驅唐，實在是最妥當合理的辦法。

原來唐氏自四川失敗之後，爲顧品珍反對，一度下野。民國十一年，謀刺顧品珍成功，重獲雲南地盤，但對四川已不敢再事問津。同時貴州方面，也和他處於敵對地位，而且地方貧瘠，不能發展。他雖然自稱爲川滇黔三省聯帥，實際僅祇有雲南一省歸他統轄，當然不能滿足他的野心。正值國父孫總理逝世後，兩廣局勢混亂，不覺動了染指之心。以爲失之川、黔者，若能得之粵、桂，未嘗不可稍償其願。便以解決入粵滇軍爲名，（三楊范蔣皆爲顧品珍所部，因反唐而入粵者。）定假道桂省，進取廣東之計。同時夜郎自大，料我懼於聯帥威名，必能受其委任，就彼範圍。並以爲陸、沈餘部，尙有很多力量，即不能兼收並蓄，總可得一方之用。殊不知廣西軍民，對客軍入境，已深惡痛絕，我等負責本省軍事，豈能容他竄入。況陸、沈殘部，已爲我解決，能爲其利用者，僅零星之雜色部隊，發生不出什麼力量，這是唐氏始料不及的。

唐師東犯與我方部署。唐氏侵粵入桂的部隊，用建國滇軍的名義，分爲兩路；唐繼虞爲第一路總指揮，約三萬人，號稱五萬，由貴州之榕江向桂邊桂林進發。第二路總指揮龍雲，約三萬五千人，亦號稱

五萬，分由百色龍州向南甯進發，聲勢甚為浩大。第二路軍在十四年春天進迫南甯時，南甯守軍，仍爲伍展空所部，僅二三千人。我軍主力則在湘桂黔桂邊境，追擊沈軍，正當九初一笈之際，抽調尙須相當時間，乃用省參議會及民衆團體名義，去電阻止。唐氏復電，有一「本帥大計已定，師行在途，不便中止。」等語。那時形勢，至爲危急，我等仍竭力隱忍，除暗中積極準備外，一面暗示民衆團體，和他敷衍。一面令伍展空保存實力，待彼軍迫近時，卽行退出南甯，向賓陽方面逐步後撤，不必和他破裂。務使他們不明我的態度，以長其不戰而定廣西的驕志。要是破裂太早，彼必積極進攻，我軍部署未妥，自難和他應戰。同時，並令俞作柏部由桂林方面星夜向遷江集中，和伍部取得聯絡，一面電大本營，促范軍迅速西上。唐軍見我撤退，仍步步進逼，前鋒直抵賓陽附近。此時俞部已在遷江相近，和伍部取得聯絡。范軍亦由梧乘船西上，至貴縣集中。我率羅浩忠、鄧竹林等部，與范石生同抵貴縣，會商作戰計劃，並發表討唐通電，時五月九日也。

（銜略）去歲曹吳未滅，我大元帥孫公，以北伐討賊爲職志，東撤惠博之圍，予陳炯明以自新；西顧副元帥之命，予唐繼堯以振拔。陳旣負固東江，不自悔悟；唐復按兵滇境，嚴拒寵命。及至曹吳覆滅，我大元帥節從北上，號召和平，爲國憂勞，以致薨逝，正舉國地裂山崩，痛悼哀毀之際，唐繼堯乃敢妄冀非分，擅自稱尊，出兵邕龍，圖佔桂粵，希冀顛覆我革命政府，搗亂我西南和平。凡有人心，莫不髮指骨裂！本月佳日，奉讀譚、楊、許、程諸公江日通電，殷殷於繼續大元帥遺志，努力革命工作，並力開唐假借名義，禍國叛黨。足徵輿情紀綱，義正詞嚴。宗仁等不敏，誓當督飭滇、桂子弟，力從諸公之後，爲擁護我黨主義，先驅殺賊。海枯石爛，此志不渝！謹佈區區，諸維亮察！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范石生、楊峯同叩。（按此電爲石生親擬，彼固好弄筆墨，常以「軍中一范」之圖書示人，亦可見其抱負也。

我軍圍攻南甯失敗。我軍由賓陽以北，范軍由賓陽以南，向唐軍包圍攻擊，彼方知我兩軍兵力，僅五六千人，乃向賓陽以西之山地撤退，在高田圩附近，據險扼守。我伍部亦跟蹤前進，於高地圩附近，展開激戰。我到前線觀察，認爲正面山高地險，不易進展，卽令俞作柏率一四兩團，由右翼繞攻古溝關，直搗崑崙關，深入其側背，敵軍乃倉皇撤退。我軍銜尾直追，至八塘又與其增援部隊展開激烈戰鬥，雖又將其擊敗，但雙方傷亡，均極慘重。同時接得李德鄰電報，謂唐繼虞、吳學顯等滇軍三萬餘人，已由貴州開動，向廣西邊境前進。沈軍殘部，復由貴州邊界回竄。柳州兵力單薄，囑我抽兵回柳。此時范石生及其所部，亦陸續到達，我卽同他商量，希望他接替我軍，繼續向南甯攻擊。范部久未經戰，驕氣逼人，彼見我部兵力不強，槍械又非犀利，亦能獲得勝利，可見唐軍戰鬥之力薄弱。以彼軍人數衆多，（四個旅約萬五千人），械彈充足，自不難一鼓而下南甯。因此對我之要求，並無難色。並謂桂軍祇要留少數到南甯，足能維持治安的兵力卽可，其餘儘可抽調。我卽時下令俞作柏所部，開回柳州，僅留伍展空、羅浩忠、鄧竹林等部，作爲第二線協同作戰。唐軍由八塘撤退，至二塘附近，與南甯部隊會合，重新部署，扼險防禦，范軍自晨至申，尙未能將其擊破，馳文通報，希望我部參加攻擊。至翌日午後四時，始將敵人驅入南甯，據城固守待援。我與范軍追抵城下。南甯城南狹長，南端面臨邕江，北端與長崗嶺上之鎮甯砲台銜接，城之週圍，皆有壕塘，敵軍據守鎮甯砲台，我向城垣攻擊，至爲不易。范軍担任東門北門及鎮甯砲台之攻擊，我軍担任南門及水閣門之攻擊。圍攻半月有餘，因缺乏大砲，僅賴步兵進攻，雖屢薄城邊，終於無法攻破。而且傷亡極大，相持日久，唐軍援兵胡若愚部萬餘人，已進入桂境，向南甯前進。我得報後，急電李德鄰，仍將俞作柏所部，由柳州調回。俞部尙在途中，胡若愚的軍隊，已先到達南甯。守城唐軍得到援兵，乃由鎮甯砲台及北門方面突然出擊，將范軍擊敗，旅長楊萌陣亡，官兵傷亡慘重。長崗嶺一帶高地，皆爲其佔領，將我范兩軍壓迫至邕賓路以南及邕江以北地區。范

軍隊伍，非常混亂，情形頗爲險惡。沿江河港甚多，退却極爲困難，幸當日唐軍因激戰之後，不敢猛追，因此我軍尚有整理佈置之機會。否則，全師潰散，不堪收拾了！

再度圍攻邕城唐軍 當時，我退到離南甯七八十里之蒲廟圩對岸，和范石生及其總指揮楊泰會商，認爲我軍應即渡過邕江，到南岸稍爲休息整理。因我控制輪船極多，渡河極易。萬一追到，彼無涉水工具，亦唯有望河興嘆而已。范、楊對我計劃，極表贊成，乃分配船隻，分別渡河。我的部隊在黑暗裏很靜肅迅速地退到南岸，范軍則燈火燭天，擾攘終夜，直至次早方能渡完。我對范軍當初頗信其能作戰，自經二塘之戰，邕城潰退，蒲廟渡河，乃深知其將驕卒惰，軍紀廢弛。而且高級將領以至士兵，多染有烟癮。我從前看我佛山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其中描寫滿清時代綠營的腐化，說是一個兵有兩枝槍，是大槍、烟槍。當時以爲必無此事，不料十四年所見的滇軍，也竟有這等同樣情形。而且滇軍每一士兵，還帶着一盞烟燈，在黑夜行軍的時候，活像一個提燈隊，行列漫長，煞是好看。這是當時滇軍的「特色」。由此亦可測知他們的前途。

唐軍知我范兩軍，已渡到南岸，沿河船隻，又盡爲我控制，尾追無益，乃退回南甯城。復由城南架浮橋渡江，沿江南岸向蒲廟猛追。我們本擬在蒲廟附近，佈置陣地，再行迎擊。經我和楊泰同到前方視察的結果，見敵軍先頭部隊，已漸逼近，而范軍佈置尙未完畢。要是輕率從事，貿然接觸，必至隊伍散亂，難期良好的戰果。於是我復提議：兩軍連夜渡至邕江北岸，並由我部輕裝連夜進襲南甯城，范軍跟隨前進。因唐軍主力已離南甯城，由南岸向我前進，城內必然空虛。我由北岸偷襲，沿途皆無阻礙，若能偷襲成功，則可反客爲主，我即固守南甯城，將敵逼退。即使偷襲不成，彼主力必須回救，也難再向我追逼了。計劃既定，我軍由伍展空親率襲擊隊，星夜進行。於次日黎明，到達城門附近。城內敵兵雖少，但閉門防守，一時亦不能衝進，遂在城郊附近，再展開攻城戰。范軍亦接續趕到，重將南甯城包圍

敵軍進撲蒲願，空無所有，及知我軍圍攻邕城，亦遂急由南岸救援。數日之間，我軍在邕江兩岸，旅進旅退，使唐軍往返追逐，捉摸不定，好像迷藏兒戲一般。而唐軍反因此不敢再行離城追擊，一直相持到中秋後撤退爲止。其實，我范兩軍，久戰疲勞，傷亡亦大。攻城既不可能，又須抑止其順流東下的企圖。乃採用這種避實擊虛的戰法，使敵不能判明我的實力和企圖，攻勢便因而頓挫。此種戰術，固極巧妙，而危險程度亦很大。不是我熟悉地形，情報確實，亦不敢出此險着的。

正當我軍再圍南甯的時候，俞部亦由柳州趕回，但仍未能將南甯攻破。我們恐頓兵堅城之下，仍蹈上次失敗的覆轍。乃採用楊葵的計劃，將南甯城東南之圍撤去，轉移所有兵力於城的西北方高峯嶺至甘圩一帶高地探險扼守，並遮斷唐軍對百色、龍州之交通路線。此計劃之特點：第一、我將正面放開，唐軍若不顧我而東下，則我攻南甯而蹙其後，成爲前後夾擊之姿態。第二、唐軍若向我攻擊，即使能將我擊退，甚至向我追擊，我軍可向西北撤退，則唐軍反因追我而趨向西北，與其東下之目的相反。第三、地形險要，兵少易守，可以休息整頓，維持一個相持的局面，而使我軍在其他方面有迴旋轉動之餘暇。這個計劃，可說是相當妥善的。

范石生因上次的失敗，深知自己部隊的不能作戰，乃竭力整頓軍紀。先作戒烟運動。范楊等高級官長，以身作則，首先戒除，然後及於下級官長與士兵，收效頗大。其次，爲整訓工作。范楊等親自朝夕督率，極爲認真。可惜積習太深，改變不易。而楊葵尤操之過急，處罰不當，致結衆怨，爲其部下所刺殺，深堪惋惜！

柳州解圍 這時，我因身體不好，回梧州休養，由李德隣親率鍾祖培前來接替。回梧不久，柳州又告吃緊，唐繼虞、吳學顯兩部，先後由貴州進入桂邊，李司令石愚率部在邊境阻拒，因衆寡不敵，節節敗退。我急電白劍生率部由湘桂邊境趕回柳州，並電李德隣將伍展空、鍾祖培所部由南甯調柳州，電李

石愚縮短防線，固守柳州待援。不幸李石愚中彈陣亡，僅有張任民、石紀龍、石楚琛等一班幕僚在柳主持。而白劍生所部，又僅有呂煥炎縱隊趕到，主力尙在途中。我因柳州指揮無人，兵力單薄，情勢已危險萬分，不得已力疾從戎，由梧州乘輪趕赴柳州。此時吳學顯部七八千人，已圍攻柳州數日，我並偵知唐繼虞主力已到達長安附近，距離柳州不過四五日行程，形勢愈加險惡。幸伍、鍾兩部，已由南甯趕到。我遂決定計劃，不待白劍生所部到來，先將吳學顯敵軍擊破，以解柳州之圍。這樣，我的兵力始能活動。若遲延時日，唐軍主力到達，即使白部到齊，勝利仍無把握。我本南甯攻城失敗之教訓，料定敵軍攻城日久，兵心已懈。且不知我援軍到達，必無準備。乃不稍猶豫，當晚即下令出擊，以一部由柳江南岸繞至馬廠附近渡河，向他們側後進攻。其餘主力，於拂曉時，分兩路突圍而出。敵軍猝不及防，倉皇退走，爲我擊斃甚多。後經我馬廠附近之部隊包圍伏擊，遂潰不成軍，向沙塘沙浦逃竄，與唐繼虞主力混合。是役我以迅速之時間，密集之兵力，突破敵陣地之一點，收獲極大之戰果。敵軍傷亡被俘者，達半數以上。

沙浦大捷 我判斷敗退之敵軍與其主力會合後，必來再攻柳州。爰以一部仍固守城防工事，其餘伍展空、鍾祖培、林竹勳、呂煥炎等部，由我親自指揮，向沙浦追擊。進至上雷附近，知唐繼虞主力已過長安，向柳州前進，留一小部份軍隊，向沙浦方面警戒，與敵保持接觸。同時以主力轉向東泉推進。因當時我與白劍生尙未取得聯絡，若再向沙浦前進，和敵人接觸過早，敵我兵力懸殊，不免被他各個擊破。故暫停追擊，而以主力轉向東泉，期與白部靠攏。如果敵人不發覺我主力所在，而直下柳州，我城防守軍定能和他抵抗相當時間。我以主力從後面夾擊，自可將其消滅。要是敵人不向柳州，而向東泉進攻，我與其支持若干時間，白劍生所部，定可趕到，亦可兩面夾攻，將其擊破。戰略既定，開始動作，到達東泉的第二日，白劍生才率部趕到中渡縣，敵人先頭亦將到達沙浦附近。當日晚上，我走了三十餘里

的黑路，與白劍生在電話中商量。他的意見，是要把他所部山中途迂迴至沙浦的後面，作大包圍的態勢。這個意見，未嘗沒有理由。但我以為敵人力量，遠過於我。且我軍屢經作戰，傷亡亦多，萬一正面先被突破，此種迂迴戰術，不獨無效，反要遭受危險。彼此爭持甚久，最後我要他尊重我的意見，以主力向沙浦前進，以一小部作小迂迴，向沙浦後方配合正面攻擊。

這次我與白劍生在作戰上意見的爭執，恰如我們兩人平日下圍棋一樣。他一向用的是包圍戰術，總是喜歡把對方包圍殲滅；我是慣用突破戰術，看準對方的弱點突破後而反包圍之。自然這兩種戰法是沒有絕對的利害的，所以我同他下棋，總是相互的大勝大敗，不是我被他包圍得水洩不通，便是他被我先破得零落不堪，從來就不易得到平手。但是用包圍戰術要有優勢的兵力，而我們當時却是劣勢。所以我同他爭執得很厲害。

當晚回到東泉，已是午夜二點多鐘，即下令向沙浦攻擊，以鍾祖培担任左翼，林竹舫担任中央，伍展空担任右翼，呂煥炎為總預備隊。自次早七八時起，即在沙浦以南地區接觸，戰鬥非常激烈。中央林部為敵人抑制於小河溝之下，情形頗為不利。右翼伍部與敵人爭奪白馬山，五得五失。自晨激戰至午後兩點鐘，總預備隊亦使用毒蟲，情況未有進展。敵仍不斷渡過沙浦河，向前增加。午後三時，白劍生之先頭部隊夏照奎兩團已趕到，即令其增加右翼，始得確實佔領白馬山。此時我炮兵亦已趕到，在白馬山上放列。我與白劍生皆親至砲兵陣地指揮，即下令全線進攻，並令左翼鍾祖培分兵一部，由沙浦下游渡河，繞攻沙浦之後。同時發砲將敵人所架之浮橋擊斷，並轟擊其增援部隊，砲彈皆極準確。敵見左右側後皆為我包圍，正面攻擊又非常猛烈，遂不支潰退。及至河邊，浮橋已斷，被迫下水，掩斃者二千餘人，器械被俘者二千五百餘人，死傷於陣地者亦千餘人。我軍傷亡亦極慘重。此實為廣西統一戰史中最激烈之戰鬥，亦為俘獲最多之戰鬥。唐吳殘部，乃向長安沿路逃竄，因時已入夜，亦不便追擊。這時，簡

甯范軍，因氣候不宜，病死甚多，亟欲得雲南子弟補充。我打電話告訴他，擄獲二千五百雲南兵，送他補充。他當時頗不相信，還以為我是哄他的呢！

柳州地形，易守難攻，因為柳江由北向南，至此忽作一百八十度的彎曲，轉而由南向北流去。流域中間，形成一個狹長半島，柳州城就在這半島的尖端上面。城北兩江間之距離，不過兩三公里，是最適宜於少數兵力防守的地方。我們將他從沈軍手裏奪過來的時候，就知道這裏是桂林南甯間的樞紐，在軍事上有重大的價值。所以早把防禦工事，建築起來，除內外戰壕之外，並在四週地面深插尖銳的竹籤，作為副防禦工事。這是我們歷年用以圍困土匪有效的障礙物，現在利用作為自己的防禦工具，亦同樣奏效。南方部隊向來都穿草鞋，對於埋在草地內之竹籤，既無從認辨，又無從躲避，隨時有被戳破腳底的可危。唐軍首先吃了這種苦頭，便被我們阻擋，而不得進展。但是後來我軍出擊，也費了很多的方法，才得通過（係由木板敷在上面由板上通過）這個障礙地帶。有很多粗心的士兵，腳底也吃了這等竹釘的虧。

沙浦勝利，真使我興奮極了！拚命苦戰，數晝夜不得眠息，仍不覺疲倦。大家手舞足蹈，幾把平時下棋的姿態都醜態流露出來。我對白劍生說：「看誰的棋子厲害？」大家狂笑，以鳴得意。甚至老百姓更是成羣結隊，不遠數十里，跑來看俘虜。因為他們也知道這是決定廣西命運的戰役，而他們是首先得到解放者，從此可不再受客軍蹂躪的痛苦了！當初，他們還不很相信有這樣大批的俘虜。有的人說：「就是螞蟻（即青蛙）也不能一下活捉得這許多！」

柳州沙浦之戰，為當時廣西全局勝敗存亡之關鍵。我很自負的說：「這是我指揮的敏捷和謹慎，未嘗發生若何錯誤，有以致此。」然而不是我軍官兵之勇敢犧牲，將領之協同無間，亦不能收此偉大的效果。民國三十三年，我與黃旭初伍展空兩兄同到沙浦視察水利工程，戰場憑吊，感慨滋多！二十年前將

士之碧血，今竟化爲人民生產之甘泉，亦差可告慰我泉下先烈之英靈矣！我並提議在白馬山水閣處，立一沙浦戰役紀念碑，以垂永久。並題「破陣子」詞一闕，以寄興云：

二十年前戲戰，追憶往事甚驚。白馬嶺揮兵督陣，沙浦河掩唐氏兵，盡沙白骨撐。放馬歸牛及早，從來夢幻功名。莫再任光陰浪擲，五十猶餘人半生，薊田正待耕。

唐軍殘部回竄雲南 唐吳所部滇軍，自經此兩次失敗之後，死傷失蹤和俘虜，約在半數以上，但殘部尙近萬人。他們退到長安附近，因爲貴州的周西成對他們素表反對，不敢向貴州境內退去，而轉向慶遠西竄。我們忖度他的企圖：第一、向南甯與龍胡所部會合。第二、由河池、東蘭、鳳山、凌雲竄回雲南。最可慮的，是他向南甯與龍胡會合。所以我們不再尾追，將主力撤回柳州，在其南側並行西進，以截阻其竄往南甯之路。我到達柳城，舊病復發，將前方指揮任務，交由白劍生負責。白劍生對我說：「敵人雖然敗了，但是剩下的力量，尙不可輕視。必須再有二三次激烈的戰鬥，才可將他殲滅。我不是推卸責任，恐怕你回去之後，士氣要受影響呢！不如你帶病在前方，由我負責實際指揮的責任。」可見我們對滇軍並未一刻輕視。後來，果然在慶遠、懷遠等處，尙有兩次激戰，我們復將其擊敗。敵人殘部不過五六千人，由東蘭、鳳山，凌雲逃回雲南去了。

十四年七八月間，我由柳州乘船回梧州，固然是因病，糧餉械彈也得我回去籌劃。途中腹部疼痛不堪。又不知是什麼病，應吃什麼藥，祇有不斷注射嗎啡針，麻醉自己的知覺神經，以減少痛苦而已。到達梧州，入思達醫院，檢查，才知道是盲腸炎。經醫治調養，不久即告健復。

這時，慶遠方面，仍繼續作戰，南甯方面，敵軍又死守不退，而餉精浩繁，羅掘俱窮。各處請餉之電急如星火，眞是「韓信前方叫，急得蕭何要上吊。」我們數年以來，一向保持不向人民借錢、借米，不向商家攤派款項的宗旨。除了一些各地捐稅來源之外，眞是一籌莫展，我正極度困難的時候，恰好南

甯滇軍，輸運出一大批鴉片烟土，約有二十餘萬兩，爲我截獲，得以渡過難關，豈非天助？

以前由雲南向外省出發的部隊，軍中都帶有大宗的鴉片烟土，不但是隨軍事的進展而獲得極大的利益，並且就以烟土作爲糧船，發給士兵，叫做「黑糧」。我想甯的滇軍，也許是因爲我們把東南正面的圍撤去，所以趁此機會，將隨軍帶來的「黑糧」運出變賣，以充餉項。戰爭時期，作戰部隊的武裝走私，今昔中外，似乎都是一樣的。

桂境客軍的肅清，固守甯的滇軍，自從我們改變圍困的方法，既不敢東下，又不敢向我新陳地攻擊。猜度他的用意，大約先是期待柳州方面唐吳軍的勝利，再行發動。等到唐吳在柳失敗，又想等待唐吳殘部來甯會合。不料唐吳又被我軍敗於慶遠，殘部已向演遠逃竄。而且廣西西部氣候惡劣，至不適於滇、黔兩省士兵的生活，我們移軍作久困的計劃，而不急於攻城，也就是要等候惡劣季節的到來，使他們爲病魔所困，而日漸死亡，自己消滅。我們軍中盛行的一句話：「等到吃黃瓜，送你回老家。」就是說：夏天時候，黃瓜旺盛，夏秋之交，惡性瘧疾，便流行了。滇軍愛食黃瓜，食後便會病死。其實並不是黃瓜會害人，而是黃瓜旺盛的季節，便是惡性瘧疾最猖獗的時候。在六七月間，我們就接得報告，滇軍在南甯病死的很多，商會代爲埋葬的屍體，已有四千多具。後來染病的人越多，病死的人也越多。到了八月間，情勢更爲危險，若再坐困下去，必至死亡淨盡而後已。於是不能不棄城狼狽逃回雲南。我們遂於十四年的八月中旬收復南甯。一面派兵分途追擊。這時，他們在右江方面的退路，早爲我所遮斷，而駐在百色、平馬的自治軍劉日福所部，亦爲我所收編，劉亦做了我軍的旅長。所以滇軍僅有龍州一路可以退走。龍胡所部三萬餘人，經先後戰死及病亡，退走時，不到半數，亦云慘矣！

范軍分由龍州百色兩路尾追龍胡殘部，我方亦派劉日福等部協同追擊，直至逼離桂境而還。至是侵入廣西之客軍，始完全逐出境外，而內部之自治軍及沈軍等殘部，亦解決者解決，改編者改編，僅餘極

少部份，仍逃入湘境。不久以後，亦相率就範。廣西自民十以後，整整的混亂了五年，我們以微弱的力量，崛起於玉林梧州，經五年之艱苦奮鬥，卒將客軍、自治軍、沈軍陸續驅逐和消滅，廣西統一，始告完成。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兩個巧合的趣事 當十四年春，我正要出發攻擊南甯滇軍時，曾找一占牙牌的人，預卜前途勝敗。其卜語曰：「倒退如牽上瀨舟，黃楊厄閩苦虔劉，須知柳暗花明處，乃在山窮水盡頭。」我當時具有勝利的自信心，對這種卦語，僅以一笑置之。誰知始而南甯失守，再而圍攻南甯不下，繼而柳州告急，真如倒退之上瀨舟也。而是年僞歷，適有閏五月，我們所遭遇的艱苦戰役，皆在一個月內進行着。黃楊樹逢閩而厄，戰事亦竟逢閩而苦於虔劉。我們那時，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忽而反敗為勝，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造成統一廣西的新境界。具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實這種占卦，或扶乩，所得的迷信詩句，都含有正反兩面的意義，而模稜其詞，使適合於任何事件。人們事後推詳，往往斷章取義，以彰其靈異。即就上面的卦辭而論，前兩句是正面的意思，後兩句是反面的意思，不過這次戰時的經過，恰巧與這個詩意差不多。故事後頗覺其靈驗。其實任何一次戰事，何嘗不是先難後勝呢！此外尚有一個故事：在我未出發以前，那個卜卦的人同我看相，我問他前途勝敗如何？他說：「勝是勝的，總要到八月以後。」我大不以為然。因為我們每一次戰爭勝敗，都是三四個月就解決了。所以對滇軍的戰事，也是同樣的打算。他見我不以為然，就說：「我等到八月中秋以後去南甯領賞，但是要加十倍的賞錢。」我也有口無心的回答：「好！好！好！」他就回去了。等到克復南甯，他果然來了。我祇好補給他五百元的賞金。其實這些走江湖的人，他看事也有些眼光，而且當時我至多給他五十元，如果他的話靈驗了，就可收到十倍的利益。這種放長江釣的辦法，何樂而不為呢？這都是在那次戰爭時期的趣事。

拒絕川軍假道 當我軍驅逐滇唐部隊、出境之後，境內戰爭已告結束，本來可以很多的力量，幫助

范石生回滇，將唐氏根本剷除。可是八月間，就接得情報，說是駐油、黔邊境的川軍熊克武部，已向油黔桂三省邊區移動。我們對於這個態度不明向我邊界移動的部隊，自不能不加注意，而妥爲防範。所以當南甯克復之後，即將所有部隊調回柳州方面，對於助范回滇這一個道義的任務，祇能責成駐在百色的劉日福部去担任，而當時范軍見唐軍殘敗，尾追不停，亦似不甚需要我們幫助，即可單獨入滇。可是後來在滇境復爲唐氏所敗，重行退回桂境，因此對於我們不無怨慰情形。其實我們亦是屢戰之餘，疲憊無力，本來也不能越境作戰。加以川軍壓境，自顧不暇，確無餘力助人。這種苦衷，當時亦正難得人諒解呀！

熊克武係國民黨的老前輩，自十三年在四川失敗後，率部寄駐於湘西黔東邊境。十四年八月間，就將部隊向湘黔桂邊境移動，並派代表來桂洽商假道入粵。據說係奉中央命令，其內幕究竟如何，我們亦不甚明瞭。拍電請示廣州的大本營，亦未得到確切的答復。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祇有一面作軍事上的佈置，同時以滇軍初退，地方瘡痍未復爲詞，拒其入境。熊軍見我防備甚嚴，亦未敢作過分之要求與深入，而祇是由桂北之三江、全縣、興安、潯陽轉入湘南之道州、藍山，而入駐粵北之連縣、陽山。我們對於過境的客軍，一面盡地主之誼，一面盡防衛之力，這一個川軍過境問題，總算很順利的結束了。

廣西統一後首次越境驅逐川軍。這時，廣東方面，情形極爲複雜，外面則陳炯明在東江之勢力未消，內部則楊、劉正醜釀着事變。川軍駐在粵北，對各方影響非常之大，熊氏在廣州，忽然被大本營扣留起來，其中的原因，我到此時還很不明白。他的部隊由湯子模羅觀光統率，復向湘桂邊界回竄。大本營派軍由北江追擊，並電廣西方面出兵截擊。我們奉令後，即派夏熙蒼、鍾祖培、蔡振雲三縱隊及陶鈞鄂鳳崗兩警衛團，由白劍生指揮，分爲兩路，一由賀縣出桂嶺連山，一由富川出江華，向其退路截擊。熊軍亦頗能作戰，在二三次接觸之下，彼此都很有傷亡，但熊軍以避戰爲主，我軍亦不欲深入湘境。熊軍

遠道後，我軍亦班師回桂。這是我們在統一廣西時期中，第一次的越境作戰。這一次戰役，雖然是奉令進行，但我們軍隊的作戰精神，就不如在省內各戰役那樣自動的犧牲了。可見戰爭要有自動自覺的內在要求，才能發揮高度的戰鬥能力，這是一定不易之理。

奉令協助粵軍肅清粵境叛軍 十四年冬天大本營以廣東東江的叛軍已次第肅清，而南路的欽廉、高雷、兩陽、三羅，尙爲陳炯明餘部及由廣西竄入之陸譚餘部所盤據。其將領鄧本殷（總指揮）申葆藩（副總指揮）尙擁衆兩萬餘人，爲革命軍的障礙。乃任李任潮爲粵桂軍聯軍總指揮，分四路進剿。以陳章甫爲第一路，自肇慶三羅進攻；以陳真如爲第二路由新官向兩陽進攻；俞作柏爲第三路，由陸川向高雷進攻；以胡宗鐸爲第四路，由上思向欽廉進攻。第一第二兩路爲粵軍，第三第四兩路爲桂軍。

此次戰後，除俞作柏進攻高州城較爲激烈外，其餘皆順利進行。蓋此種殘餘軍隊，無組織無團結，械彈又極缺乏，一經接觸，卽行敗退，紛紛請求收編。故經過時間甚爲短促。至此，兩廣舊軍之殘餘，乃告完全肅清，這是我們在統一廣西戰役中的第二次出省作戰，亦爲陸、譚殘餘勢力的最後消滅。蓋鄧本殷、申葆藩等，那時雖爲粵軍粵人，而以前皆與陸、譚有甚深厚之關係也。我們的部隊，自軍事結束後，立刻班師回桂，地方政府問題，皆由粵方處理，絲毫不加干預。一則不欲留給粵人一個不好的印象，二則本身亦急待整理也。

統一廣西後的感想 我自民國十二年六月間出兵梧州起，至民國十四年年底止，不但把在廣西省內的陸、沈舊勢力及散兵、土匪肅清，同時將包藏野心據桂窺粵的強大唐軍擊敗，驅逐出境，完成廣西的統一。並且協同廣東驅逐川軍，定南路。在這短短的兩年半中，經過了五次的大戰，差不多平均每半年便碰到一次。而零星小戰，則多至不可勝計。我們在這個時期內，不論是高級的長官，或下級的士兵，無一不是時刻過着單純而緊張的戰鬥生活。也可以說：「這緊張而單純的戰鬥生活，便是完成廣西統一

工作的一個潛在而偉大的力量。」

一個正在衰退着腐化着的舊勢力或舊組織，其當局者也許知道他的本身已到處都是弱點，到處都在腐爛；也許完全不感覺到他自己有弱點，自己在腐爛，而依然泄泄沓沓的過日子。此種舊組織或舊勢力，往往以其一貫的舊方法，來挽救其垂危的命運，其結果一定是愈弄愈糟，終至一敗塗地！所以我們在中國四五千年的歷史中，所見到的「中興事業」，真是鳳毛麟角，這便是一般都逃不了前面所說歷史公例的緣故。即使我們的歷史上有漢光武唐肅宗那些輝煌的中興事蹟，而其中興的主角與其所用的方法，必與舊的完全不同。昔人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種撥亂反正的工作，非新的人物與新的方法，決不能有所成就。所以這也祇可以說某一舊朝代之中興，而不是某個舊人物的中興。漢光唐肅都是承前代之敝，當衰亂之後，困心衡慮，舉賢授能，研求前代所以衰敝亂亡的原因，一反其道而行之。政治循軌，民心歸順，師行所至，無不壺漿以迎。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纔能收撥亂反正的效果，亦所以造成一代中興的偉業。陸、唐兩氏，欲以其正在崩潰腐爛中的舊基礎，與曾經失敗過的舊方法，妄冀東山再起。縱然給他一度的重張旗鼓，結果祇等於迴光反照，仍逃避不了敗亡的劫運。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必然的道理。再從反面說來，一個面對着正在崩潰腐爛的舊組織舊勢力之新的集團，其結果所獲，恰恰與此相反。凡是舊的方面認為沒有辦法的地方，正是新的方面最有辦法的事情。如果新的方面時常針對着舊的方面的弱點去追求新的方法，來健全自己，並對着敵人的弱點進攻，這就是革命成功最有效的手段！

我們這一輩當初不過是幾個三七八歲尉官階級的陸軍學生，行動上既無組織，社會上也沒有甚麼地位與威望，各人祇是具備一副稠潔的胸懷，熱烈的情緒，與敏銳遠大的眼光而已。我們在極端腐敗的舊環境中，不曾為它所融化，而是深遂的審察環境，不斷的陶鍊自己，使自己不斷的獲得進步。我們的

結合，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因為那時由於各方面的壓迫，使我們不得不結合在一起，以求自存，其中雖因出兵梧州問題，而發生類似分裂的現象，然終於在會師南寧的時候，把它彌縫過來，成為更雄厚更堅固的團結。這是雙方共同一致的密切聯合，而不是一方面的單獨企求。回憶我們在初期複雜的結合，與複雜的環境之下，不免有少數人發生自私的權利意念和行爲，我們都是以善意的自然的方法，逐漸予以革除，隨時予以糾正。所以在這一個階段裏，雖然淘汰了很多人，但均係自然的落伍，而不是勉強的犧牲。所以我們一方面得到人事上的調和，同時亦不妨礙我們順利的進行，而尤其使我念念不忘的，乃是李德隣的仁厚、坦白、公正、誠懇、不念以往之瑕疪，力求事後之改進。當兩軍復合之後，選對於自己所部之陳舊落伍份子，盡力淘汰，絲毫不存私意，使彼此成爲嶄新的進步的整體。這真是他最偉大的地方，值得我們欽佩的！

講到我們那時的力量，實在是太渺小了。當初，我在梧州帶出來的部隊，不過一千人，槍枝又不齊全，即使和桂林方面聯合起來，亦不過三千多人，不足二千枝槍。而這時，我們敵對方面的力量，多至二十餘倍。可是我們並不自餒，且具有「自反不縮」的勇氣。我們對於龐大的敵人，真是莊子所謂「自無全牛」的精神。照我們所定的計劃和步驟，一塊一塊的把他支解下來。雖然我們也費了很大的心思，與很多的时间，終於把衆多的敵人，完全殲滅。而我們的鋒刃，不僅不使其稍挫，並且不斷的鍛鍊，不斷的磨礪，以加強我鋒利的程度。我們是一面打仗，一面整軍，整軍一次，打仗一次；打完一次仗，又整一次軍。到了戰事終了，我們的整軍工作，也大致完成了！總計近十萬名的敵人，到了我們掌握最後勝利的時候，加以整編，連我們原有的力量，合計起來，也不過四萬人左右。我們的不需多兵，和屢次的以少克多，都是因我們的力量是整個的、團結的，在任何一個場合裏面，固然是各人各盡其當前所負的責任，然而並不是祇顧自己，坐觀勝敗。遇到友軍危急的時候，便不等上級的命令，而自動的去協力

援助，盡其最善最大的努力。我們上自總指揮，下至士兵，沒有一個不是戰鬥員。每當危急的關頭，我與德隣、劍生都免不了手執火器，親冒鋒鏑，同士兵一樣的在火線上作最後的搏鬥，決不稍存顧惜自己的打算。這都是我們優於敵人的地方，也即是我們獲得勝利的主因。

我們在用兵方面，決不單靠精神的力量，對於物質亦非常重視。在這短短的兩年半時間之內，建立規模相當完備的製彈廠，造槍廠，製藥廠，炸彈廠，是以我們的槍械彈藥，雖因不斷的作戰，而大量消耗，但仍得不斷的補充，不斷的殺敵。當時，我方彈藥的儲備，比任何一支敵人都來得充足。這也是我們以少勝衆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我國地理上看，重要河流的發展，都是由西向東。而翻開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進化史來看，文化的發展，則是由東而西的。廣東處於珠江下游，也就是廣西的東面，首先接受了西洋的物質文明。陸氏雖以一時的武力，侵入廣東，可是因為不能順應世界潮流，求其本身的進步，以之改造廣西，遂陷於敗亡的結局。這是我們所親見的。假使我在當年不出兵梧州，就不能接受向上流發展着的新文化，也就不能發生革命的新力量。可是我們在當時已正確的認識，不再像陸氏那樣祇求武力的向東發展，與文化革命的潮流相背逆，而必須順應文化革命的潮流向西挺進，以求廣西的改造。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當革命的初期，在封建的落伍的舊眼光看去，雖然有許多不習慣不順眼的地方，因而引起若干不良的批評，或足以引起各方指摘的不良事實。然而革命的前途，始終是光明的；革命的工作，畢竟是進步的。那些不正確的批評，和若干必有的瑕疵，是掩蔽不了它的光芒，阻礙不了革命的進步的呵！當我出兵梧州接受了革命的使命，不但廣西那些舊軍人，要責備我出賣本省，就是玉林方面，在當時也未必能完全諒解。處在這新舊潮流匯合的箭頭的尖端上面，雖然我的箭頭是正確的向西進指，但是在某一時期，與某種場合之下，就不能不作適應的迴旋，藉以減少可能避免的障礙。否則不顧一切，逕直衝去，也許要因各

方的不認識不諒解受到極大的挫折，而不能順利的到達目的。而這種迴旋的手腕，無論是對舊的方面，或新的方面，都是一種極困難的工作。革命的力量，實在是太偉大了，他賦予了我百折不磨任勞任怨的勇氣和精神。不論物質的，精神的，有形的，無形的，一切困難，都爲我所克服，一切勝利都爲我所掌握。我始終不忘在梧州與粵軍將領的合作，得到他們很多的助力。尤其是李任潮的寬厚明察，他對廣西沒有私心，他不拘束我，不干涉我，任由我自己的發展，比之用實力幫助尤爲偉大。固然在私人情感上，是值得記念的事，而處在潮流顛逆革命成敗的關鍵上，尤爲值得記載和稱頌的事實。此外，我們那些幹部，始終是追隨我們，奮鬥到底，中間祇有來歸的人，而沒有離異的人。無論任何一個戰役，他們無一不盡其最大的努力，而繼之以犧牲。中間沒有那一個人，從戰事中發了財，或得到了僥倖的際遇。都是由同甘共苦共奮鬥而造成他必然的地位。後來雖因清黨及外界的誘惑，一時有極少數的幾個人離異了，但不久仍又團結回來，這不僅是一段完全的歷史，他們亦都不愧是明大義全始終的人物。這都是使我最難忘懷的啊！

總之，廣西統一運動之能迅速成功，固不僅限於上述的幾點意思，而上述的道理，亦不止是廣西統一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實爲整個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在寫完統一廣西各戰役之後，特將這幾點重要的意義敘述出來，亦兼作這個重要階段的結論。我想人們一定不會批評我有所誇飾罷！

五
十
回
憶

一
二
三

七 兩廣革命的統一與出師北伐

李任潮等由粵來粵的兩重使命。當我軍克復甯、廣西全境軍事政治已告統一的時候，廣西革命政權的本身，正在繼續着重大的變化。而廣西的統一，又在廣東之先，自應得各方非常之重視。大本營特派西江善後督辦李任潮同馮竹萬、鄧世增、李長欽等到南海。這大約是十四年九十月間的事。他們此行的意義，公認私交，實兼而有之。私交方面，為訪問馮勢性質，公認方面，則含有兩項使命：第一，因為廣西的高級將領，除了我個人之外，其餘大都尚未加入中國國民黨。而當時在廣東方面的桂軍如劉震寰、劉玉山等部，以及幹黨務工作的桂籍人士，兩三年來，隨着我們勢力的發展，散播了很多的空氣。不是說我們是聯省自治派，就說我與段祺瑞等北洋派有勾結。並指我同李德鄰分別用着討賊軍定桂軍的旗幟番號，表面是分道揚鑣，實際却都是狼狽為奸的做法。在羽毛尚未豐滿的時候，就用我來接近革命政府。現在廣西統一，力量已經充實，不久一定是要背叛革命的。這些說話，歷年以來，我們聽得很多。因為要拚死拚活不斷的與很多的敵人打仗，那裏有閒工夫去理會他們。至於革命政府當局是否會聽信這種謠言而懷疑我們，就無從知道。在這等環境之下，我們只有竭盡自己的力量，為革命盡其最大的貢獻，所謂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不過他們所放的空氣，也有一部分很易使人信以為真。即如我們為應付起初艱難的局面起見，梧州與玉林，確曾採用兩面不同的作風。不但是對省內如此，就是對省外亦是如此。因為在那個縱橫捭闔的時候，自己的力量，又那麼薄弱，稍一不慎，必將招致極大之挫敗。到那時又有誰來同情我們，援助我們呢？而我對於那時在粵的桂軍，及吃黨飯的桂人，也確是太冷淡了。使他們的面子過不去。他們因為這個關係，便搗弄出許多是非來中傷我們。其實我們在那時對他們既難敷衍

，也不願敷衍。因為彼此利害的衝突，好像敵人一樣，他們事事中傷我們，破壞我們，甚至我的性命，也幾乎傷在他們的手裏，那裏還談得上敷衍兩字呢。

李任潮及粵軍第一師的將領，是我們最相得的朋友。他們不但在軍事上以實力幫助我們，而且還替我們向各方解釋許多誤會。可是萬一我有了什麼相反的轉變，他們對於革命上所負的責任，也就太重了。所以李任潮在公誼私交都得來南甯一行。他們是希望我們將整個的廣西統一在革命政府的旗幟之下，改變以前兩面不同作法。其實我們自廣西內部肅清後，對於那種作法已成過去，對統一原則，一致表示贊同，入黨則更不成問題。

李任潮來邕第二項使命，則為商量共同出兵解決盤據廣東南路的鄧本殷、申葆藩的軍事問題。鄧、申原為舊粵桂的殘餘勢力，盤據粵省的三羅、兩陽、高雷、欽廉、瓊崖各地，合起來也有近兩萬人。他們在那裏苟延殘喘，等候捲土重來的機會。在廣西未統一以前，由廣東出兵南路，有很多不便的地方。現在廣西已經統一，自然是解決南路最好的時機。這種義務，是我們最願意履行的。因為南路的粵桂舊軍勢力一日不清，則廣西邊界，一日不安。而且粵軍第一師以前給予我們的幫助，我們還時刻不忘，出兵南路，正是我們報答他們的最好機會。我們本來要派白劍生赴粵報聘，並作具體的商量。所以李任潮等此來我們至表歡迎；可是不幸的廖案發生，他們又奉命匆匆回去了。繼之又有出兵東江及楊、劉事變，以致統一及其他許多問題，又延擱相嘗的時候。

中央軍政制度的革新 十四年年底，東廣方面討伐東江南路及楊、劉川軍等軍事行動，皆已結束，胡展堂、許汝為同時出國，中央對黨政軍制度大為改革。在軍事方面，舊日之粵、桂、湘、滇、鄂等地方性之軍隊番號，一律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共編為六軍，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譚延闓為第二軍軍長，朱培德為第三軍軍長，李濟琛為第四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五軍軍長，程潛為第六軍軍長。此外復

設置黨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員，各師皆採用三團制，將旅的一級廢除。蓋採取蘇聯之編制也。政治方面，則將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但對於地方的政治制度，尚未有明確的規定。汪精衛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主席，實爲當時惟一之軍政首腦。

汪、譚、甘來梧的任務 十五年一月間中央派汪精衛、譚延闓、甘乃光三委員到梧州來，他們屈駕降臨，使我們非常的惶恐。於此亦可見中央對於廣西的重視。我同李德鄰等，由南甯趕到梧州歡迎，他們乘坐的是江防艦隊的江防兵艦。當兵艦入口時，岸上排立着很多的行列，及看熱鬧的民衆，數年來梧州因受軍事的影響，景况非常慘淡，至是才充滿和諧活躍的革命新空氣。這一個歡迎，也就是梧州空前未有的盛會了。他們這次來梧，表面上雖然未曾明白表示銜有什麼使命，似乎是一種訪問巡視的性質。其實他們此來的主要目的，是欲促成廣西對於革命統一的表面化、具體化。其次是商談出師北伐的根本問題。這都是我們正在準備着期待着的幾件大事。當時尚有唐孟藩的代表葉琪，及貴州方面的代表龐漢章，在那裏一起見面，於以後革命的進展，有很大的關係。

在梧州並不舉行何種正式會議，而是分別的商談。我們對於統一與北伐，都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可以說他們的目的，已完全達到了。他們在梧州逗留了兩日，除了商談議會之外，大部的時間，都用在宣傳式的演講上面。這時梧州人民團體的組織，已相當發達，工會、農會、商會、婦女會，無不應有盡有。此外還有軍政機關的職員，無一處不開會歡迎他們去講演，他們也無不應邀出席。講演的內容，無非是三民主義與當時本黨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農工）以及本黨的革命歷史國民革命的前途等。這些題材，在現在看來好像已成爲刻板的革命八股，無足希罕。但在那時候，却是非常新穎，極受民衆歡迎與擁護的。

汪精衛先生之名，我已久聞，這次來梧，初次晤面，見他魁偉的丰采，委婉的言辭，熱烈的表情，

再加上那一幕親自拿炸彈去炸攝政王的動人的革命史劇，自然能博得許多人尤其是一般青年的欽仰。誰也想不到後來當全民族抗戰的嚴重關頭，汪精衛突於二十八年十二月間，背叛黨國，出走河內。使我想起了這一段歷史，不禁引起無限的感慨！

譚祖應先生以前在廣州的時候，我曾見過幾次。這次更多接談的機會。他為人幽默圓到，使人很願意和他親近。有一次，在宴會席上，他問我：「你這個大名的駁字，爲什麼不用英雄的雄字呢？」我說：「這是我父親命名，取任重致遠意思。」他又問我父親在前清有沒有功名，我告訴他，是了酉科舉人。他哈哈笑道：「我也是丁酉科舉人呀！我現在同你不但是革命的同志，還與你合尊是滿清的同年呢。我一見你用這很冷僻的駁字爲名，就猜想這位命名的先生，對於舊文學，一定有很深的修養。現在果然不出我所料。」有一日，在一個小花園裏，叫做同園的地方議會。汪、譚兩人的酒量均宏，但在那次狂飲痛飲之下，都醉了。席散出門時，汪問我向左還是向右。我說：「向右邊走。」他說：「你認錯路了。革命那裏會向右走的呢？」結果他向左邊走去。但是向左的路是走不通的，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甘乃光先生是廣西岑溪人，一向在廣東讀書。在廣東做事。彼此都不甚熟悉，而同我還是在初見面。大家好像有些陌生的樣子。他這次回來，對於黨務方面所負的責任，比較多一些。因爲廣西當時的黨務，尙未展開，而需要他來指導。他們本來還想到南甯去，因爲冬天水淺，舟行往返，需要近十日的時間。汪譚因職務上的關係，不能久留，就回廣州去了。留下甘乃光一人，同我們去南甯。甘乃光到了南甯，也同在梧州一樣，開會演講，幾無虛日。直到他患了肺炎，口啞聲嘶，才停止。總之：他們這次來桂，就各方面來看，都是很成功的，尤其是一般民衆，自民國十年飽受粵軍的痛苦以後，以爲那時候的粵軍，就是革命軍，而革命黨的言論行動。就如洪水猛獸的可怕。這次汪、譚、甘等到來，民衆見了才知道所謂革命黨，也不過和普通入一樣。革命的道理，很合乎人情，切乎需要，不特使無知的人民，感情

改變，而於此後廣西黨務的展開，亦有極大的關係。

他們三位到梧州來，雖然是半公半私的詢問性質，但他們都是中央特派大員，汪氏又是國民政府的主席，中央黨部政治會議的主席，自然算是國家元首的地位了。那時我們對於此種接待元首的儀節，並沒有正式的規程，但是我們却是熱心表示得非常隆重。在該會席上，我們的樂隊演奏起以前袁世凱時代的舞雲閣公樂，繼而復演奏汪復旦公樂的國歌來。汪對我說：「這國歌是舊的！」好似表示不相宜不接受的意思。可是他又說不出一個新國歌來。因為當時不但汪氏主義，吾黨所奏之國歌，國歌尚未製定，即在廣州最流行的「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吾黨所奏之國歌，在梧州也頗不很通行。祇好將舊的拿來應付應付，現在回想那個「舞雲閣公樂」的國歌，頗確內涵沒有什麼意義，但是那個調兒，却頗有些悅耳的地方。

自劍生赴粵報聘並商說統一汪、譚、甘回粵之後，我們在粵召集重要的幹部會議，對統一問題加以討論。并推白劍生前往職聘，以同時商榷一切具體聯合的態度。於是便便提出滇底統一的意思。中央亦因此專設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這個問題。他並將擬定情形，電告我與李德輝，亦電告省軍政前途，今後仍循七革命軌道。前電經已略陳，請為鈞處所明察。欲負掛英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務。在理論與事實上，均非將軍民財三政與廣東鏡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為功。政治關係省內，抑亦關係全國。自成風氣，實不可能。軍隊更應編制，尤與財政關係密切，即以軍隊而論，廣東革命軍確實與粵軍兵生活，月領十元至十二元，且各省將領財政自理，對於士兵生活問題，必難解決。結果必爭戰愈神，而於政治建設方面，結果亦將演成閉門造車之清境，將來必為革命之阻礙。而吾國家革命進，必因而延滯。連日與中央諸公磋商，若吾省能將軍隊依照廣東編制，政治則接受中央策略，財政交中央支配，則一切問題，當能與中央合轍，由中央統籌編制，互相調劑。此後對於革命任務，誠屬共同負擔。

而於補助接濟方面，亦已痛癢相關，不能秦越相視矣。辯知兩公對於革命重要，早已深刻認識！對於革命工作，已有堅確決心。歷年奮鬥，其目的在救中國，非救區區之廣西也。辯抵粵以來，見中央對廣西，僅抱聯合的態度，一切設施，規模太小，目光在粵省，不似統一全國機關，於將來革命政府之發展，諸多妨礙。已對汪、蔣，謂諸公自動提出，先將兩廣確實統一。此種主張，駐粵各方，極端贊許，想兩公必欣然贊同。現因體念上級官長，以國節省電報來往時間起見，由汪先生發議，組織一中英特別委員會，討論兩廣統一辦法。先將軍事財政統一，次再及其他各件，議決案由蔣帶回南粵，交兩公核奪認可後，交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議決，由國民政府執行。巧日開始討論，兩公有何意見，請速電示為禱。白崇禧叩頌印，我們當時復電同意，但是問題尚不能很痛快地解決，於是他就回來了，他在這個備電上所說的主張，在粵不但不能澈底的解決，反而生出若干的誤會。其主要的理由，就是財政的統一，與軍餉的提高問題。因為廣西是一個窮省，滿清時代素來是受外省協餉的省份。那時廣西的士兵月餉祇有六元六角，官長不論階級，一律十三元三角。如果要士兵提高到十元至十二元，差不多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開支。官長的新俸增加數目更鉅，在廣西當日的收入，自然負擔不起。而廣東當日的財政，比廣西還要困難。自顧尚且不暇，何能再有力量來負擔廣西的軍費呢。因此就有人誤會我們的目的，在要求增加廣西的軍費。所以到後來財政統一軍餉劃一的問題就根本不談了。北伐軍出發，廣西軍隊（第七軍）的軍餉，完全由廣西負責，士兵的餉項，亦與各軍不同，就是這個原因。

統一前提下廣西方面的五個問題：白劍生回南粵後，我們再從長討論許多問題。關於統一的原則，我們早已同意，不必再去考慮。但是尚有幾件重要事項，亟待研商：第一是全省軍事機構的名義問題。自楊、劉事變之後，粵軍、桂軍、湘軍、滇軍總司令等含有地方性的軍事機關名義，已一律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四、五、六等軍，直屬於軍事委員會。廣東既沒有全省性的軍事機關，

廣西能否單獨設置，殊成問題。李德鄰的意見，廣東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在地，各種問題，可由軍事委員會負責處理。廣西情形不同，如果沒有全省性的軍事機關負責辦理，則全省治安，以及軍隊整理，都有許多困難。故竭力主張設廣西全省善後督辦，來担负這種責任，理由是充足的。第三是軍隊編制問題。我們的部隊原來由定桂討賊兩軍組成，後來又改為廣西陸軍第一軍、第二軍。我們仍希望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九軍。第五為行政機構問題。廣西民政長公署本來是我們自己設置的，祇要中央行政制度確立，即可取消。在中央行政制度未確立前，暫仍其舊。第四是財政統籌問題。財政統籌，軍餉劃一，這個原則，我們十分贊成。如果中央對此尚有顧慮時，則仍由廣西自行負責統籌統支。第五是黨務問題。此後廣西的黨務，自然要竭力展開。我們所願慮者，是以前在廣西沒有信用的人，抽來抱持，不但黨務無從展開，而且還要引起內部軍事上的政治上的許多糾紛。總之在一個大的轉變之序中，一切枝節問題，自所難免。好在我們大前提已經決定，那些枝節，亦祇好隨後陸續設法解決。於是改由我負責代表到廣州去進行這個革命統籌的工作。

我赴廣州續商統一問題。我於民國十五年三月裏偕同內子蔡鳳珍，及秘書黃華表等，由梧州乘輪赴三水。再乘廣三鐵路火車到了廣州。我自十三年東亞酒店被陳天太襲擊之後，差不多兩年沒有到這個地方，晚在那裏的風氣，是大大改變了。自從駐粵的領軍桂軍，相繼解決之後，所有以前市內各省各色各樣的號號旗幟，已沒有了。武裝擁護馳驅過市的要人汽車，亦很少看見。這種風氣的改變，恐怕不單是廣州市民的心理上，要覺得輕鬆一些，就是我也感到非常愉快。相類的鬧市通衢上，增加許多遊行民衆的行列。因為自十三年之後，各種民衆團體組織，非常發達。加以這時香港天龍王風潮，尚未解決，市內的工人特別多，真可算是勞工神聖的黃金時代。在遊行的羣衆裏，手裏拿着五顏六色寫着標語的紙旗，口唱着一聲工兵學，一聲工兵學，要團結，要團結，大家堅持到底，大家堅持到底，必裁防

並作補充的說明，才告禮成。廣西統一問題，至此就成爲具體化了。我回到廣西會館，接着就有許多報館記者，與民衆團體代表，到來訪問。我又將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的大意，作成一個書面的談話，交各報館發表。這段經過的事實，就成爲那時候新聞的最重要資料。

第二日，蔣先生從黃埔到廣西會館來看我。這次我到廣州，因爲頭幾天事情很忙，尙未得暇去拜謁蔣先生，而蔣先生却先枉駕過訪了。我將這次商談統一的經過，向他陳述。他表示這次廣西統一的意義，非常重大，這是主義信仰的結果，不是革命武力的結果。以主義的力量收服人心，比之用武力去征服一省兩省的地盤，價值偉大得多。他又問起我未回廣西做事前求學時期的情形，我將在陸軍小學參加辛亥革命學生軍敢死隊的故事，說了一遍。蔣先生卽告別而去。他這時已辭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職務，擔任國民革命軍總監的要職。這個名義，不很公開，而且時間也很短，所以知道的人是很少的。

汪精衛對我留鬚的趣談。我在廣州的那段時間，應酬很多。不是這裏開歡迎會，就是那裏請客。記得某次大議會上，大家都有了一些酒意。我對汪精衛都非常敬重，稱之曰汪先生，譚先生。他倆說：「此後大家都是同志，不要太客氣了，你就叫我們精衛組庵吧。」那時我的鬚鬚很長，汪問我多少年紀。我回答他是三十三歲。他笑着對我說：「我以爲你快到五十了。」他又問我，爲什麼這樣年輕，要留起鬚子來？我說：「因爲民國十年被自治軍繳械，是我莫大的恥辱，我立誓要把自治軍肅清，才剃鬚子。現在已經五年了，未曾剃過。」他說：「你現在可以剃去了，」我揣測他的意思，必以爲革命是要青春的。他比我年齡大得多，還沒有令根鬚鬚，我那滿面長鬚，看起來，確實有些礙眼。譚先生很幽默地說：「留起來，也很美，你須知道有些人是愛好這樣的美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中國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卽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選舉第一屆執監委員。廿五年一月，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同李德鄰都被選爲中央監察委員。

參加北伐會議 我這次到廣州，也是首次參加中央黨部的會議。此外並參加最重要的北伐會議，係在大東路體育場對面汪精衛公館舉行。會議廳的兩端，相對地掛着兩幅大照片，一邊是總理的遺像，一邊是列寧的遺像。這好像是聯俄容共政策之下必然的格式。到會的人員，除汪精衛外，有蔣先生，蘇聯軍事顧問奇山加將軍，此外則爲重要的中央委員及各軍軍長。由汪主席。在討論的時候，雖然也有人認爲時機太早，力量太薄，希望慎重將事的。但蔣蔣先生及奇山加分別說明後，這一個出師北伐的大題目，終於決定了。汪隨後問我：「廣西可以出多少兵？」我回說：「當時可以編成三個師的一軍，即係全省部隊的半數。若稍假時間，將地方治安辦好，部隊編整完畢，尙可陸續增加。但對於雲南方面，不能不留多一些隊伍，以爲防備。」大家亦甚以爲然。

鄧演達的最後會面 這時鄧演達已由蘇聯回來了。在黃埔軍校任教育長，好像還兼任了其他的重要職務。他邀我去參觀黃埔軍官學校，到了學校門口，最觸目的是「真革命的站攔來，不革命的滾開去」這兩條好像大門聯對式的大標語。回來的時候，我們坐在一艘很快的小汽艇上，看見前面同方向去廣州的車船，一係民船，無漿楫，在尾後裝有拍槳式的車葉，用數千人輪班踏轉，鼓盪前進。乃廣州附近介乎輪船民船中間的特種船只，每小時可行十五六里。一步一步的落後了。他說：「中國與外國相比，就好像這船和那艘車船一樣，真是落伍得太遠了。許多人在那裏出了死力，流了臭汗，結果還是趕不上人家一副小引擎。」他暢談蘇聯革命建設的情形，語意中似乎主張中國革命也非採行蘇聯那樣的方法不可。我回廣西的時候，他還很懇摯的走來送我，這就是我和他最後的一次會面了。

回到廣西 我在廣州逗留了兩個多星期，才回廣西。來的時候，隨帶人員很少。回去時候却多了，內中有蘇聯的軍事顧問，政治工作人員，及黨務人員，男男女女，差不多坐滿了一個內河電船。這些男女青年的工作同志，都是那個時代的革命者解放者。在船上談談笑笑，唱歌唱唱，在長途的水程上，排

成了旅行的寂寞。把我幾年來戰事緊張的孤獨生活，也改變了許多。我回到南藩，將在廣州所決定的情形，向李德鄰及重要的幹部報告，他們當然都是同意的，而且表示非常的高興。

我們的新的努力，我們的精神和工作，立刻又向新的方面活躍起來了。的確，自從統一廣西的軍事結束之後，我們的敵人已消滅了，目的已達到了。此後無論團體方面，個人方面，都失去了目標，如果不能迅速地找新的共同方向，新的共同目標，就會走到各走各的路線，而把團體的數量漸漸分散起來。到那時候，就容易發生不幸的事件。這種情形，在歷史也不乏先例。所以要求一件事業成功，在每一個階級內，都要詳細的考慮其謹慎的安排，繼續的努力，不斷的前進，才可以順利的得到最後的成功。我們對廣西統一，雖已達成任務，如果沒有革命的統一與出師北伐兩個大目標，那麼我們的後果，豈非再會發生不幸的變化，就很難逆料。

出師北伐前的軍事部署，我們在軍事上首先着手的工作，就是改換名義，改組部隊。以前我們是在全省綏靖督辦之下，分置第一第二兩軍。現在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公署改為廣西全省軍務督辦公署，祇換了兩個字，再把以前定桂討賊兩軍總指揮部的老班底充實到軍務督辦公署裏面去，機關改組，就算完事。此外復另行編組一個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部，準備於出師北伐時，負指揮的責任。在後方，概以軍務督辦公署來處理全省的軍務。二十六年後全省軍務督辦名義取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部。這個易名改組的工作，很迅速地完成了。至於我們的部隊，在統一戰事結束之後，差不多已籌備完成。一共為九個旅，各計一個團，及砲五等營，第一旅旅長俞作柏，後來改任李明瑞，第二旅旅長白崇禧，第三旅旅長劉旦福，第四旅旅長黃旭初，第五旅旅長伍廷勳，第六旅旅長夏威，第七旅旅長胡宗鋒，第八旅旅長鍾祖榜，第九旅旅長呂煥炎，第十團團長李明瑞，第十一團團長龔壽儀，第十二團團長陳恩元，第十三團團長蒙志，第十四團團長張國柱，第十五團團長許崇武，第十六團團長葉義華，第十七團團長李素琴，第十八團團長陸宗輿，第十九團團長陳朝城。

第十一團長韋雲淞，第十二團長李朝芳，第十三團長陶鈞，第十四團長楊騰輝，第十五團長周祖晃，第十六團長尹承綱，第十七團長楊義，第十八團長林竹舫。獨立一團長陳濟桓，獨立二團長羅浩忠。入伍生團長呂鏡存，砲兵營長羅傳英，工兵營長馬興符。這就是我們在三四年間將廣西所有的舊軍，與入境的客軍十幾萬人，或予以消滅，或予以擊潰，經幾次淘汰整理，所剩下來之精銳。這些幹部，除了三三入外，都是正式軍官學校出身。全部官兵，約在四萬人左右。

當我們的部隊接到中央命令出師北伐的時候，因時間短促，未及照新編制編組就緒。即調第一第二（後改韋雲淞為旅長），第六，第七，第八五個旅長，率領第一、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及獨立第二等十一個團參加北伐。其餘各旅團，仍留廣西。後來前方各旅，改編為三個師，以夏威、胡宗鐸、鍾祖培為師長。後方各旅，亦改為三個師，以伍廷翼、黃旭初、呂煥炎為師長，這是軍隊編配的情形。

黨代表制度 在軍黨代表之下，設政治部，各師亦設政治部，團設政治指導員。黨代表及政治部為當時新創設的制度。黨代表與軍長，處於同等之地位。對於部隊，代表中央黨部，有監察的責任，軍長所下的一切命令，都要黨代表副署，才發生效力，可說這完全是採蘇聯的辦法。這個制度，在若干部隊裏，部隊長官與黨代表，往往會發生嚴重的衝突和磨擦，而在第七軍裏面，德鄰和我，却精誠相見，毫無隔閡。從全軍的官兵看起來，名義上雖有不同，實際上也是一樣的服從。他在前方，可以帶着我的圖章，代我行使黨代表的職權，我在後方，也能夠帶着他的圖章，代他行使軍長的職權，一點也沒有窒礙或發生阻力的地方。這種和諧的精神，完全是公私歷史造成，而不是其他所能做到的啊。政治部的主任，係由總政治部派充。第七軍政治部主任黃日葵同志，很坦白，一見我就說，他戴的是紅帽子。他祇是幹他責任以內的工作，絕對服從我的意旨。的確，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工作者。自從政治部成立之後，

各部隊的精神生活，表現得非常活潑，北伐之所以順利的成功，部隊政治工作的成功，占很重要的因素。蘇聯顧問也是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必須設置的條件，第七軍的蘇聯顧問，叫做馬邁也夫。原是一個打鐵工人，後來投入紅軍，經過軍官的訓練。據說當過一任旅長，在克里米亞作戰時，曾經受傷。這人頭腦簡單，在軍事上也不見得有何特長，不過在當時祇要能夠把一些很膚淺的技術，或新式的編制，介紹給我們，也就算無忝職守了。記得他初到的時候，祇和我談過三三制師的編制問題，以後並無若何的建議。在軍隊裏面，彷彿是一個備員而已。

出師北伐，我們軍隊部署完畢以後，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領的問題。北伐是一個新的工作目標，有遠大的前途，各級幹部，都是爭先恐後的，要求參加，不願意留在後方。幾經斟酌，才決定了前面所述的這個安排。至於領導的高級將領呢，白劍生因為蔣先生要他去擔任副參謀總長的任務，必然的要離開我們的部隊。我因為要主持廣西全省行政事務，事實上也很難離開廣西。所以領導廣西軍隊出師北伐這個任務，祇有請李德鄰擔任了。李德鄰自民十以後，從未到過廣西。這次出兵北伐的大題目，雖然是決定了，但是關於軍事上還有許多枝節問題，非他自己去與中央方面詳細商量不可。於是在四月間，就同白劍生前赴廣州，當然又有一番熱鬧的場面，這裏不便細述。他不久也就回來了。七月九日，廣州舉行北伐誓師的隆重典禮，蔣先生擔任國民革命軍的統帥，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等六個軍，進行北伐，在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幟下的軍隊，除了第四軍之一部，（李任潮奉命留守鞏固革命根據地）第五軍（好似亦有一小部分參加），及第七軍之一半，留在廣東及廣西，保障革命的犬後方，其餘全部出發了。這是中國國民黨革命過程中一個最重大關鍵，不僅是震動兩廣社會的霹靂，也就是北洋軍閥的喪鐘啊！那天，我們在梧州，也開了一個極大的出師北伐大會，由李德鄰親自主持。到會的人，非常擁擠。一般民衆對北伐的官兵，寄予無限的期望，與歡送的熱情。廣西的社會，從此又

改換了一副新的面目，發皇着一種新的空氣！我們的部隊，早就準備好了，集中桂林，陸續北上，展開了廣西部隊光明燦爛的革命歷史的新頁！

前方的進展，與後方息息相關，參加北伐的部隊，固然負荷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後方的工作，亦極度緊張。第七軍北伐的部隊，所需要的糧餉被服械彈等，都是由廣西自行籌劃接濟，飛芻挽粟，人馬補充，工作繁重，概可想見。廣西自民十以後，禍亂頻仍，地方元氣大傷，但對於革命的貢獻，不敢稍落人後。一直等到革命軍進展至武漢南京之後，這種負擔，才得減輕。但因前方的勝利，使後方的民氣，更加發揚。同時主持的人，亦愈覺易於推動。革命初期的軍隊與民衆，是真正的打成一片。所謂軍民合作的精神，在那時候，可說是達到最高度了！

五
十
回
憶

八 廣西政治設施概況

民選省長張我自我國十三年六月間出兵梧州，至民國十四年九月間裁陸廣西全省，爲時三年又兩個多月。在這三個階段內，每天過着緊張的軍事生活，以不斷的從事戰鬥的工作。除此以外，實在並沒有時間去追輯政治與研究行政上的種種問題。所以在那個時期，我們就是提出一些有關軍事的膚淺的政治主張，與配合軍事需要的行政要求，其他則並沒有什麼政治或行政上的成績表現出來。至於各縣防區之內的各縣行政工作，也祇是剿辦土匪，籌措軍餉和協助軍事這三個簡單的項目。在我們的機關組織上，祇未設有管理行政的機構。一切途憑我們的意志，由各縣知事負責辦理，縣級行政官署與我們之間，並不發生組織上的關係。而那時的縣知事，亦大都沒有什麼政治素養與行政經驗的。到了十三年夏天，佔領南寧之後，這是廣西全省政治的申述，於是不能不有行政機構的設立。但是我們仍專心致力於以後軍事方面的發展，不願意過問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長，棄而不做，而由省議會選舉當時的議長，一氣來担任。我們對於這位民選的省長，很尊重他，凡是省長分內的事，都不加干涉。但是在那個時期，政治離不了軍事，所以我們雖竭力尊重省長的地位，而省長却不能不倚賴我們的武力。張一氣對於我們，固不致如李靜誠等當省長時那樣完全仰陸、譚的鼻息。但事實上他如果不得我們的輔助，一切政令，便也無法推行。

廣西省政機構的崩潰與再建 十四年一月間，滇唐軍隊侵入桂境，進據南寧，張省長杳然離去，不知所往。他在職的期間，不過五個多月。十四年五月以後，至九月以前，廣西又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十四年九月，我軍克復南寧，統一廣西，全省的最高行政機構，又不能不重新組織起來，以担负主持。

省行政的責任。那時我還在梧州，李德隣來電邀我到南甯商榷這件事。大家的意見，都希望我出來擔當這個重任。我雖竭力推辭，終以沒有相當人選，而不能不勉任其難。其實我在當時，對於政治工作，那裏有什麼研究與經驗呢？

「我開始主持廣西政務，一個全省行政長官的重任，出乎意料的，落到我的身上來。「初生之犢不怕虎」，我是大膽地接受了。但是這等於法無據的任務，並且在無法可據。那時還沒有被我們認為一種合法的法令的時候，我這個全省政治舞台的主角，應該以何種方式出場，以何種名義出演，又成為麻煩問題。北洋政府，我們是不承認的。他們固然不會委任我，我也萬不能接受他們的委任。由省議會推舉吧，雖有前例，亦頗困難：第一，當時省議會的議員已星散各地，一時不能召集。第二，張省長是由議會推舉的，他既未曾向議會辭職，似不便要議會另選。第三，省議會的議員，可說已是「三朝元老」，不能代表革命的民意。而且這個時候，廣州正在多事之秋，劉揚事變後，又發生廖仲凱被刺案。革命的中樞，尚未建立政治制度，地方政府自更無從遵循。因此我主張不稱省長，而以廣西民政長名義，暫負廣西全省行政的責任，既免當時各方的指摘，以後如有什麼更改，亦較有迴旋的餘地。大家都以我的意見為然。於是我即用白銀鑄造了「廣西民政長」的印信，於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宣佈就職，開印視事。一切的組織都由我自行擬定：民政公署裏面，設政務會議，下設內務、財政、教育、建設四廳。所有人員，均由我任命；以梁威為內務廳廳長，蘇紹章為財政廳廳長，甘浩澤為建設廳廳長，盤珠祜為教育廳廳長，朱朝森為政務會議秘書主任。這個「自立為王」的政治機構，一直到次年六月兩廣統一，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省政府委員組織省政府之後才結束。那顆自鑄的「廣西民政長」的銀質大印，亦由我自己保管起來，它倒不愧是廣西政治史上一件「替天行道式」的紀念物。可惜歷年奔遷，不知失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過渡時期的行政設施 在這一過渡時期內，行政上自然還談不到如何的設施，而祇是從事那種過渡的統一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政與財政的統一。以前在討賊定桂兩軍的防地內，民財兩項政務各有各的系統，到了聯軍總指揮部與綏靖督辦公署的時期，隨着軍事的進展，而逐漸統一起來。所以在十四年一月以後九月以前，雖然沒有全省的政治機構，凡是我們的力量所到達的地方，各項行政已統二在軍事機構之下。因此民政公署應行掌理事項，祇要向督辦公署方面接收過來就是了。不過行政系統中斷已久，好多法令規章已不適用，而當時中央又無法令頒行，足資遵循。於是訂頒了一個行政會議條例。這個條例的本身，固然也沒有法律的根據，但是沒有這個無根據的根據，則其他的法令規章，更將無所依據，而一切不能運用。所以這個行政會議條例，在當時就算是我們自行創制的母法，其他法律規章，都從這裏產生出來。這是我們大胆的創作，以現在的目光看起來，自然是很可笑的，不合法的。但在革創的時期，除了這樣便宜行事，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原來革命就是破壞陳腐的現狀，建立適應時代潮流的新秩序。這種創制，正是我們革命過程中的一種主要的工具。

財政廳長辭職的兩個原因 民政公署成立不久，財政廳長蘇紹章呈請辭職，由我自己接替兼任。蘇廳長辭職的原因：第一、因為軍費需用孔亟，支應困難。同時全省稅務機關已由督辦公署方面接收過來，而其下級機關，仍多為有力者所把持，而不易控制得住。所以蘇廳長辭職後，非由我親自兼理，難期澈底的統一與整理。第二、爲了祭孔問題。自從民十以後，本省軍事擾攘不定，祭孔典禮，停頓已久。全省統一後，好多人提議恢復祭孔，其中以蘇廳長主張最力，他並且要由我主祭。我對此事，本是無可無不可的。等到祭孔完畢之後，南甯民國日報乃大肆譏許，認爲這是復古的舉動，不是革命的行爲。蘇廳長爲前清的拔貢，是我的父執輩，對於尊師重道，非常認真。他看了報紙上批評孔子，認爲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說：「辦報的都是讀書人，我不料讀書人首先把自己的祖師反對起來，這簡直是忘本！」

人心變得這樣壞，還成個什麼世界？說時慷慨激昂，形於詞色；並要求我立即密辦那報前的主筆陳勉恕。我對於祭孔也是初次參加，著了長袍馬褂，必恭必敬的行完了三獻禮，足足費了兩三小時，這種繁文縟節，感覺非常麻煩。如果年年這樣行下去，我也不耐煩參加了。所以我對他的要求，並不十分贊同，祇是答應諾誠報館，此後不再作類此的批評。他大不以為然，帶着責備的口氣，說道：「你父親也是一個讀書人，有過前清的功名。你雖然是一個武人，也會讀過孔子的書，你縱然不禮重先師，難道就不體念你先人禮重先師的意思麼？」其實，我父親並不是禮重先師孔孟的人，我更不知道那一套。我聽了他這番教訓式的話，又好笑又好氣，不過他總是我的前輩，在舊的觀點上看，他的確也是一時的人望，不願使他難堪。但也不能因此而改變我的主張，遷就他的意見。於是他就憤而辭職，我也祇好由他自便離去。這一點小問題，在那時竟會釀成一個很大的風波，可見政治革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從此以後，祭孔這件事，也就無形廢止。而且後來還把莊嚴的孔廟改為中山公園。然而時至今日，全國對於孔子，還是那樣的重視，國家特設官階很高的奉祀官，由孔子的後裔世襲其位，每年在國庫中支出一筆可觀的經費。而担任奉祀官的及在奉祀官府有職司的，大多是年輕學淺的人，連孔子的學說是怎樣的，不知弄得清楚弄不清楚。我在浙江見到孔子南宗後人，完全是一個蠢無所知的平庸百姓。可是他卻懂得遇到變亂，可以向中央請發應變費，逢到災歉，可以向中央請發振濟費，要求的數目，不是十萬，就是五萬。保守着「曾孔子的楮木像，當作他的吃飯傢伙，視為傳家至寶，輕易不肯給人」看。偏偏還有許多人亦視為傳國至寶，威儀肅穆的前去瞻仰。這等崇拜偶像的舉動，實在有些可笑！因此我對於紹興的大禹後裔，及龍虎山張道陵的「第幾世祖師」，頗替他們有些不平。

整理廣西金融，廣西自陸，譚崩潰之後，以前所發行的紙幣，已成廢紙，無法維持。加以民十後，兩廣各地私鑄銀毫甚夥，成色低劣，價格混亂，我認為非立加澈底整理不可。於是在梧州設立造幣廠，

鑄造兩角的廣西嘉禾銀幣，統一形式，劃一成色。一面將以前各種形色不同成色參差的雜幣，按其成色分別收回改鑄，共計鑄造了六百萬元。並於十五年五月間，在梧州成立廣西銀行總行，委黃維、廖喬松爲正副行長，發行伍元、二元、五角、二角的紙幣，即以所鑄銀毫爲發行準備金。數年以來，人民既苦於陸、譚紙幣之貶值，復苦於鑄偽私毫之充斥，自經此次整理之後，廣西境內流通之貨幣，遂有劃一之價格。貨幣在民間之信用，亦重復建樹起來。廣西貨幣之整理，與廣西銀行之設立，對於以後廣西的各種政治建設，幫助極大。而貨幣之信用鞏固，一直到十八年事變，才大受打擊。在這一段整理貨幣的經過中，尚有一件趣事可以敘述的：我既決定了整理廣西金融的政策，便開始鑄造銀幣，成立銀行。可是又從那裏去籌措這筆必需的資本呢？原來在那個時候，廣西境內的鴉片烟，是公運私禁的。當軍事初定時候，私運鴉片，在所不免。但是以經緝獲，卽予充公。駐在百色的旅長劉日福，恰在那時候緝獲了一大批私烟，約有一百多萬兩。劉氏以前爲自治軍領袖，曾經繳過我的槍，我還做了他的俘虜。他歸編我軍之後，對我們非常恭謹，緝獲了這大宗私貨，絲毫不敢截留，全部繳解政府。我除了照例犒賞他的部隊之外，卽予變賣，得價二百多萬元，全數作爲造幣及通貨發行基金。以黑貨變成白銀，作爲銀行的資本，使廣西金融基礎奠定下來。飲水思源，劉氏是有功績在裏面。我於此就想起現在的某大銀行，好像也有過性質類似的事情，這也算得「無獨有偶」的趣事。

我們往明悉知事的標準，我們自出兵梧州，到統一全省這個階段中，對於各縣的吏治，始終未曾注意。一縣政治的良窳，完全繫於縣知事個人的身上。當時我們遴選縣知事，有兩個條件：第一是要他在地方上有聲望，最好還具有相當的經濟基礎，能在我們軍需孔急的時候，設法週轉或籌墊。第二是要在地方上擁有相當的武力，而且還要有胆量，與地方的民團要有良好的關係。並能隨時呼應，遇到匪警或有軍事行動的時候，能協助軍隊，剿辦土匪，不致朝風日落，棄城先逃。因爲要求具備這兩項條件，首

先便打破了規避本籍的慣例。固然我們並不一定要選派本籍的人充當知事，但在這種要求之下，在半封建的社會裏面，不豪爽則不能領導羣流，非縉紳則不能孚治衆望，所以豪紳在某階段內，是有他存在的地位與必要的。後來革命的口號是要打倒「土豪」「劣紳」，好像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樣子。這種看法，實在有欠公道。即就我們那時候的縣知事人選來說，自然有好些是要不得的，但是也有若干是良好的。在那時候，貴縣的知事劉晉臣，就是一個很好的豪紳，也是一個很好的知事。他一面能達到我們的要求，一面又能顧到老百姓的利益。而他自己呢，不但沒有貪污的行爲，并且把一份很大的家當，都賠光了。所以不僅我們要派他主持一縣的行政，連老百姓也一致希望他當縣知事啊！

當時的縣制，到了全省統一，上述的作風，便改變了好多。首先規定縣知事人選，要迴避本籍，非萬不得已，不用本縣人。但是機關編制與人事銓敘的制度，都未建立。縣以下各級幹部的任用，及用人的多少，都由縣知事作主，上級官署，並不過問。縣知事以下的人員，大都是世代相傳的書吏房科，一部份是縣知事隨任來去的師爺官親。可以說由前清而至民國，由陸、譚而直到我初任時期，都是陳陳相因，尙談不到制度的改革與建立。縣公署的經費是採用包辦制度的，那時規定每月大縣五百元，中縣四百元，中小縣三百元。在各縣應行解省的稅款項下，每月照縣的等級，扣除這個數目。縣公署的費用，不論薪俸公費，都由縣知事全權支配。此外縣裏自己徵收的雜捐，及其用途，祇要經縣參議會通過，即可動支，省裏亦不去過問。至於各縣徵收田賦，縣知事照例坐支八厘徵收費，有的提出一部份補助機關的經費，有的是完全放入私人的官囊去。我現在想想：這種舊時代的縣政，雖然有很多的缺點，但是在土的監督機關，既可執簡馭繁，在下的縣知事，亦可自由的發揮其才能。祇要縣議會健全的話，一切的弊竇，亦不致發生。現在的縣制度，對於縣政府是束縛得太厲害了。不但省要管，中央亦要管，將來縣參議會成立之後，民意機關更要管，縣政府就要成爲一個三管的機關。縣是一個自治的單位，抑是一個多

治的機關，就有些費解了。

我是一個對於政治毫無研究與經驗的人，一旦肩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祇好一面做，一面學，有時自己在暗地裏摸索，有時請教請教自己的僚屬。在那時候，自己祇有負責的勇氣與毅力，並不顧慮自己身體的辛苦，與責任重大的危險。現在回想起來，將一省政治的重責，放在一個毫無政治素養與行政經驗的青年軍人的兩肩，由他去摸索試探，是何等不合理而危險的事情啊？固然，在那一個階段裏，是無法避免的事實。而在今後，我們須要從事現代的國家建設，若政府不注重保育政治人材，個人自己不注意政治修養，國家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這是我過了橋才知道過橋危險的說法，不知道未曾過橋的人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廣西省政府成立。十五年六月，廣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就將過去「自立爲王」的民政長時代結束了。省政府設省務會議，爲全省行政最高權力機關，下設秘書處、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國民政府任命我爲廣西省務會議主席兼財政廳長，粟威爲民政廳長，甘肅澤爲教育廳長，盤珠那爲建設廳長，朱朝森爲秘書長。這是國民政府首次公佈的省制度。而廣西省政府又是國民政府統治之下，最先成立的省政府，（那時廣東省政府因種種關係尚未成立）當然我就是國民政府最先任命的省政府主席。我們以前在軍事時期，對於省內各項大事的處理，都通過合議制的形式。民政公署成立後，設立政務會議，已具合議制的雛形。現在省政府的組織，也採取合議制，我們施行起來，自然感覺得很順利。不過一切重大問題，都由主席決定，會議不過是集思廣益採納大眾意見的集議機構而已。

破除迷信運動。這時政治改革的洪流，已滲透了全省各地。在各種政治建設尚未開始之前，首先對於迷信的破除，下了一番極大的工夫。是年七月，我通令全省各縣，毀寺廟偶像，以祛除社會迷信。除孔廟關帝之外，一律不准保存。這個破除迷信的社會運動，係白劍生所首創。他在一月間驅逐川軍出境

之後，駐軍桂林，便下令給各部隊官兵，將桂林城郊附近的寺廟會館所有的佛像，一概搗毀。他曾對我說過一段趣話：「當搗毀城隍菩薩的時候，那些士兵，都有些畏懼，但迫於命令，又不敢不打，當執行之前，有些士兵上了香，磕了頭，口裏喃喃自語：『城隍爺爺不要怪我，我是奉了軍令，身不由主的啊！』這可見軍令的威嚴，亦可見迷信的力量了。」

然而迷信的力量，畢竟敵不過軍令的威嚴，城隍爺爺終於被打倒了。自從省政府通令破除迷信之後，全省各地，除了鄉僻地方仍有未能澈底執行外，大多數寺廟裏的偶像，尤其是在城市的都已不存在了。記得那年回到鄉間，我母親對我說：「你連年在刀槍炮火裏過日子，我非常擔憂，曾在關帝菩薩面前許了好多福（即許願），保佑你逢凶化吉，身體平安。現在你平安得勝回來，我已燒全豬，為你還福，你可同去叩謝菩薩」。我聽了她的話，為難極了。要想向她解釋，這是迷信吧！他已這樣年邁，那裏會聽信我的話。如果違拗她吧，心裏又實在不忍。只好含糊答應說：「我心到就是了，菩薩我不要拜，陪你到那裏去玩吧！」她心裏也許不很喜歡，但也並不十分勉強我。到了那一天，陪同她到鄰近的關帝廟去，見那關帝神像的身上，已換上了一套華麗的新衣，神龕上面，張着一幅極大的彩緞橫額，題着：「佑我平安」四個大字，下款寫的是「黃門鍾氏敬獻」等字樣。我母上了香燭之後，不管我拜不拜，自己就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口裏喃喃的念着聽不清楚的話。我在旁邊忍不住的笑，但羞又不敢笑。等她向各處一一叩拜完了，才陪她回來。那時我心裏想：好是在關帝廟，不然我對於自己所發布的命令，簡直要成為立法犯法的罪人了！我現在回想起來，好些過去我們所頒行的事，以至現在一般軍政機關所頒行軍令政令，在倫理上或心理上，不免要遭遇到多少的障礙或阻難。上述趣事，即是一個例子。

出巡龍州。自從李德鄰、白劍生他們出師北伐之後，省內的黨政軍一切的工作，都由我個人負責。

平日除了處理輯集的經常事務之外，忙於應付的，就是開會講演。那時的民衆團體及機關，常常召開大會或慶典及會議。每一個機關團體的集會，都帶我去主席或講演，我自己也以爲非親自出席不可，好像一切的重要工作，都須透過開會演講這程序。否則就彷彿沒有盡到革命者應盡之責任一般。如此日積月累，我的身體漸漸的支持不下了，患高度度的神經衰弱症。醫生勸我少做事，每日學打網球兩小時，來調節精神與肌肉。我的打網球，就是在那時開始學習的。醫生又勸我到外縣巡視，以轉變生活的環境。因此巡視龍州的三項工作，於是我就決定在某月間出巡龍州。我之所以選擇龍州爲首次巡視的自標，第一因爲龍州是陸軍系多數人物聚集地，自他們失敗以後，多半避居安南，並不啻在中法邊界上滋擾，須親去察看情形，以定應付方針。其次，廣西各重要地區，都有我的足跡，祇剩龍州，尚未去過。第三，龍州係中法交鋒之區，自從我們統一廣西之後，安南政府尚未澈底的了解。尤其是本黨的聯俄容共懸三大政策，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府，所最表不滿，亦最畏懼的。所以我去巡視龍州，確實含有政治軍事外交各種的意義。所謂遊歷地方轉變生活環境，反成無足輕重的問題。同行的除少數行政幹事級者外，本都是黨務宣傳人員。他們都視龍州爲廣西神祕的地方，男男女女三大禁，都爭着要去。到了龍州，第一項工作就是召開民衆大會。我從大會裏通告統一廣西的經過，與參加革命的必要，並宣佈婚嫁後的行政方針。那些同行與佳會場的工友同志，便分頭在各種民衆團體裏活動宣傳，使龍州人民的覺醒大開，並引導他們的思想在王孫的大道。其次，招待法國領事，龍州海關稅務司，及外國商人。這機關會，在對流背辦公署內舉行。這時的對流背是異常燥熱，那位法國領事，和那些外國商人，對於我們初到龍州那兩日的舉動，似乎頗有懷疑與害怕的樣子。我對他們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軍閥。廣西統一之後，中越的邦交必比以前更加親睦。他們提出當時所唱的革命歌裏：「打倒列強」這一句譯來問道：「列強是不是都要打倒？中國能不能夠打倒列強？」我祇是很勉強的回答：「所謂打倒

列強，是要打倒侵略中國的列強，而不是世界上的列強都要打倒的意思。至於侵略中國的列強，能不能打倒，你祇要看我們打倒廣西軍閥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了。當初陸諒的勢力很大，爲什麼終被我們這小力量所打倒呢？革命的勢力，是不可以尋常的方法來計量的啊！我雖然這樣的解釋，而他們的心裏，總是懷疑着。過了幾年，仍未了解。民國十九年，李明瑞會作豫在左江宣佈實行共產，因此安南政府就將邊界完全封鎖起來，斷絕桂越的交通，至幾個月之久，這是以後的話。在當時他們心裏，雖存懷疑，但在宴會席上，總是很快樂的樣子。他們說：「在龍州住了好多年，從來沒有和中國的小姐太太同過席，今天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法國交際的宴會上，沒有女人，簡直是罪過。中國的革命，能使男女社交公開，真是極大的進步」。法國的白蘭地、葡萄酒、香檳酒喝得太多了，大家都有了醉意，法團領事起來要求同席的幾位女同志跳舞。那幾個女同志都未曾學過這一套，亦居然有勇氣不成步法的跟他們跳舞起來，這可算是廣西省內國際社交的新紀錄了。

我在龍州的第三項工作，就是視察鎮南關要隘防務情形。廣西省與安南接壤之區，約有四百餘公里，中間犬牙交錯，關隘甚多，自東南至西北，有鎮南關、平而關、水口關、婁湯隘、婁洞隘、平孟隘、白懷隘、枯柴卡、弄江卡、每關或隘卡，因交通的重要，設有對汛員或對汛兵把守，屬於廣西邊防督辦署管轄，專司兩國人界在邊界上之往來交通稽查安事宜，近似邊防警察的性質。在中法戰爭前後，各關隘皆駐有軍隊，執行國防的責任。各重要關隘，皆建有要塞砲台。以目前的形勢來說，自然以鎮南關爲最重要。因法國的鐵路之狹軌，早已築至離鎮南關五里外之同登，由同登入關，有汽車路直通龍州，於是鎮南關便成交通上、商業上、政治上、軍事上的重要地區。鎮南關離龍州約五十餘公里，汽車三小時可達，我們到了那邊，先登大連城小連城兩要塞，這是各個要塞之中心，控制關的南北兩側，形勢至爲險要。要塞上面，有很多堅固的工事兵房，但是年代久遠，多已崩壞。還有好多門德國克虜伯廠六

八九年製造的要塞大砲，其口徑有二十一生的，有廿五生的，但皆鏽廢不適於用，亦無人管理，至滿漢橋上清末申法戰役，提督馮子材，即以大小連城爲反攻諒山的據點。當戰事初起的時候，我軍先受挫折，馮氏持槍佩刀，在此督戰，終於反敗爲勝，在我國邊防史上留下極光榮的一頁。其後提督蘇元春，銳意經營，購砲築壘，完成沿邊各要塞。到了今日，這種要塞，固已陳腐得不堪使用，但在五十餘年前，則確有其重大之價值。蘇氏鞏固邊陲之功，亦至值得後人稱道。雖然他後來爲奸佞所參，死於天牢，然而他留在邊塞之遺跡，是永久不會湮沒的啊！

善官腸炎赴粵就醫。我由龍州回到南寧，這時國民革命的北伐義師，已由長沙岳州進佔武漢，捷報傳來，豪情激奮！便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祝捷大會」。在一個慶祝宴會席上，同席的范軍長石生，前由雲南敗退回來，殘部駐在平馬，這時特來南寧，與我商量接濟善後種種問題。他觸景傷情，想起我不能全力助其回滇，中心非常憤懣。雖沒有說出對我不滿意的話，但我可以從他的表情上體察出來。而我呢，又不便向他訴說我的苦衷，求其諒解。在飲酒的時候，他一定要和我對飲一大玻璃杯的茅台酒，那時我尚有相當的酒量，本來可以應付。但這一天我已喝得差不多了，如果再來這一大杯，頗覺無此勇氣。我便要他先說明必須對飲的理由，並希望減少一些。他激昂的說：「我和你同過戰場，共過患難，難道這一杯水酒，就不能同飲下去？你若不飲，就夠不上朋友了！」我知道他心中正在煩悶，要將這一杯烈酒來澆他胸中抑鬱。便不再推辭，也就借這一杯烈酒向他表示歉意，希望將彼此不能以言語形容的介蒂，都溶浸到酒杯裏去，乃各舉杯一飲而盡。真是入口如醇，入腸如火，當場就支持不住，扶醉回到家裏，腸痛大作，體溫亦突然增高。次日請小樂園的美國醫師來診治，毫不見效，病勢有增無減。我問那位醫師：「是否盲腸炎？」他說：「是的，而且快要化膿了！」我又問他：「能不能在南寧開刀？」他很坦白的回答：「他是一個見習醫師，不敢施行這種大手術，而且他的醫院裏，也沒有大手術的設備，力勸我

趕快離開商籍，到廣州或梧州去才有辦法。我很感謝他誠懇的態度，不像一般江湖醫生，一點米價都攔有，却不顧人家的死活，專賣誇包醫疑難雜症，其人格之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了。我於是在兩點鐘之後，就乘了最快的江風輪船動身。巧值江水大漲，不過卅一小時就到了三水，轉乘火車到廣州，暫住西關源慶的樓上。即請德國醫生盧奧林過來診視，後來又入仰光醫院診治。那時我的體溫到了四十二度，夜裏神經已發生錯亂，亂說話，亂打人。我的妻子蔡鳳珍亦正在那裏就醫，醫生對她說：「病已萬分危險，一時不能開刀，因患處業已化膿，開刀更屬危險。祇好用水泵及蒸熱藥劑，以漸將膿度降低，才有辦法。若不照此辦理，當立刻開刀，以避我最後的人事，但願上帝保佑。」平到第三日，熱度漸漸降低了，轉志也清醒過來了。醫生得定開心，但說還要過很久的時間，精神恢復一些，然後再開刀去膿，作根本的治療。所以我在廣州留醫院，住了四個多月，直到年底五個面而露，當我在廣州養病的時候，有許多人家學問界，最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當時國民政府的蘇俄政治期間領事，他在魏炳房中，大談廣西社會的經濟情形，尤其注意資本家本地主。我談：「廣西根本沒有錢業家，一般都是小商人在最大的地主，每年收入，至多亦不過三兩半担租穀，而且這樣的地主為數極少。」他很不以爲然，駁復我的話道：「廣西一共有多少家資舖？那些都同那剝奪農民的租谷的組合。大地主雖然沒有廣東那麼多，但是廣西的耕地也比廣東少得多。那些擁有三兩半担租穀的人家，已可算是大地主了。」我很爲詫異，他對於廣西一般的體形，都很明瞭，也許比我所知道的還多一些。末了，他請我注意農工的利益，與農工的政策。此又返有政治部代表許紹楙等來慰問我，那時我正在病中，印象非常模糊，到了浙江之後，我與許君閒談之間，提起以往的情形。他說我的外表與以前完全兩樣了。從動身後，鬚鬚很長，不多說話。那時我的確是這個樣子，因為正在大病之後，精神體力自然都要差一些。胃病本是一極極痛苦極危險的事，又因在廣東養病，而捲入廣東軍事政治的漩渦，以後不斷發生比書病更危險更痛苦的問題，身體材料根本動

的啊！

省政府改組 自從十五年六月，廣西省政府成立後，至十六年五月又重行改組。中央任命李德鄰、白劍生、粟威、黃薊、伍展空、俞作柏、雷沛鴻、朱朝森和我等九人爲廣西省政府委員，我和粟朱二人爲常務委員，我任主席，並兼軍事廳廳長，粟威兼民政廳廳長，黃薊兼財政廳廳長，雷沛鴻兼教育廳廳長，伍展空兼建設廳廳長，俞作柏兼農工廳廳長，朱朝森兼司法廳廳長，並兼省政府秘書長，這是國民政府在省制上一個重大的改革，把軍事司法行政皆統屬於省政府之內。（但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之訴訟判決仍是獨立的，不受行政的拘束）使全省政治軍事司法皆爲省政府組織之一部，而形成類似中央政府之形式。（此時中央五院制尙未成立）我以爲這種省政府組織法比較合理，因既名省政府，就是整個國家組織中之第二級政府，其內部的機構，應爲中央政府的具體而微。後來省府組織幾次演變，成爲今日之狀態，稱行政院分部，尙且不可，而仍名之曰省政府，未免名實不符。現在若干政論家或政治家，對於省政府之名實問題，發生很多議論，而終不能獲得滿意的結論。因此回憶往事，認爲頗可作爲我們的參考。十六年公佈的省政府組織法，並未持久的徹底實行，軍事廳司法廳不久就撤銷，農工廳在清黨之後亦撤銷，其業務歸併民政建設兩廳辦理。若干省份還設立土地廳，但不久亦都撤銷。廣西省政府的人事方面，不久亦有更動；教育廳長雷沛鴻辭職，出洋考察，由黃華表繼任；農工廳長俞作柏辭職，由蘇民代理，旋即撤銷。雷俞等皆因十六年清黨之後意見不合，而自行引退的。

舉辦縣長考試 廣西的省政機構，經過三度改革後，規模已甚完備，各項政務之推行亦極順利。民政方面，於十五年八月間，成立課吏館。但規模簡陋，並不招收固定的學員，而是將那些類似候補縣長的失業人員，每月命一兩個課題，責令他們自己去用功研究。既無一定的授課時間，亦無一定的講師指導，祇就他們所呈之課藝，作文字上的考核，或口頭的詢問而已。究竟他們的課藝是否自做，抑或請人

提刀，當然無從查考，也沒有人去查考，所以談不上什麼效果。遂於十六年三月間改為廣西地方政人員講習所，我自兼所長，招收學員，集中管教。規模雖稍完備，但所收的學員，教育水準很低，大多祇能充任縣以下各級幹部，其中才能卓異，堪任縣長者，殊不多覩。辦了兩期之後，亦即停辦。省政府爲慎選縣長人才，決定辦理縣長考試，於十六年十月成立縣長考試委員會。我爲委員長，各廳長爲委員。考試於十七年春間舉行，這是國民政府成立後最先實行國父遺教的一次縣長考試。但是考試的結果，令我非常失望。應考的雖有一百多名，錄取的僅十五名。（廣西大事記上記載錄取六十五名想係訛誤，尙待查考補正），考其原因；第一有資歷有學識的人，大都已有固定工作，而不願參加考試，或學殖荒疏，而不敢應考。第二那時正當新舊時代交替之際，新的人才，尙未培養起來，舊的人才，多已落伍。而那些應考的人，則多半是落伍份子，希望於此中僥倖博取資格，以爲進身的階梯。察閱試卷內容，多是一些光怪陸離不合時代的陳腐濫調，實在無法錄取。那個考第一名的是陸川人，姓羅，他的名字，我已記不起來了。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語體文很好，近代知識亦頗豐富。其餘的也都是富有新知識的青年，榜發之後，那些落第的舊人物，見錄取的都是幾個「黃口小兒」，忽視了他們的「真才實學」，認爲有失公平，這也只好由他們去。但平心而論，考試制度，不過是比較客觀的一種選拔人才的方法，並不是絕對的能選取真正人才。尤其是單憑幾篇一問一答的文字，來決定優劣與前清科舉時的八股考試，也相差無幾。我以爲要徹底推行考試制度，必須經常的舉行各種測驗，以鼓舞一般有志從政青年治學的興趣，好像清代士子應考那般的狂熱起來。同時在考試的方法上，應加以改進，使學識、才能、品德各方面的高下，都能衡量出來，而不僅憑書面文字的優劣爲標準。能夠如此，考試制度庶可成爲選拔真才最有效的方法。那次考試錄取的十五人，並不即以縣長任用，而是先分發他們到各縣去見習。見習期滿，考核他們的心得，再分別予以實際的工作。現在這幾位考試及格的人員，還在廣西服務，聽說那姓羅的

榜首，尙著有相當的政績呢！

改土設縣 廣西境內，還有許多未曾設縣的地方。這些地方，都由土司官在那裏治理。有的於土司官之外，復由省另派一種土司彈壓委員，相當於各省設治局的性質。土司官完全是封建時代的遺制。相傳宋朝時候，狄武襄征服儂智高，那時南甯的西北兩方，多半尙未設縣，狄武襄卽劃土分封，給隨征有功的將士，以爲酬庸之具。在劃封的地域內，由受封人全權治理，這便是他的封邑。此後凡是他所需要的，無論公用私用，皆向區域內的土民攤征。對於上級官吏，除年終貢獻一些土儀之外，沒有其他的關係。所有人民生殺予奪之權，皆操之土司官之手，其黑暗自不待言。世代相傳，以至於今。好多人以爲土司都是土人，其實土司之祖先，皆爲北方人之隨軍南來者。但因年湮代遠，都已土化了。「改土歸流」爲歷朝治邊的一貫政策，由滿清末季而至陸、譚時代，都向着這個目標進行。到我任裏，尙有好幾個土司區域，未曾改縣。考其原因，不外兩種：第一、因地廣人稀，改縣後經費入不敷出，不免要加重省方的負擔。第二、以前省之權力，尙未能達到那些偏僻的地方，而土司官世襲迄今，已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惡勢力。如果治理不當，極易引起反抗，所以歷來對於改土歸流的工作，皆採漸進的政策，而不敢孟浪將事。我主政後，深知這種殘餘的封建勢力，已到了沒落時期，決無復興的可能。而且在革命政府之下，更宜及早革除，使得被土司官壓迫着的人民，早日獲得解放。目前雖加重了省府負擔，但事關施政大計，亦不必多所顧慮也。於是將忻城土司改設忻城縣，太平、安平、下富三土司併置雷平縣，上龍及金龍崗兩土司，併置上金縣，這都是十七年上半年的事。

辦理獠民教育 廣西尙有兩種原始的民族，卽獠民和苗民。這些原始的民族都是散居山僻高地或邊鄙小縣的高山上，而以平南、桂平、武宣、象縣、修仁、蒙山六縣交界之大獠山，爲獠人最集中之地區。在廣西地圖上，特別用空白來表示獠山的區域。就是因爲山高地僻，獠民與外間往來極少，外人無從

詳悉其内幕，所以不但外省人以為這是一塊神祕的地方，就是本省人也有些莫明其妙。苗獠大都住在高山的上面，度其極艱苦的原始生活。有人說：「他們因為受不了平原上的熱氣，所以要住在高山上，那裏的氣溫，比較涼爽，才能適應他們的生存」。這種說法，是不成理由的。我以為往昔他們都是平原曠野的主人翁，後來漢人南下，他們在經濟上文化上，都不能相與競爭，於是不能不退到貧瘠的高山上以圖苟延殘喘，後來便成爲山居的習慣。這總逃不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想起來是很可怕的呢！據劉介氏（著有廣西特種民族的研究）的調查：廣西境內的苗民苗民，約有二十餘萬人，這些可憐的原始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之下，政府自應設法教育他們，開化他們，使均能進步，成爲中華民國的一員。所以廣西省政府於十七年五月間，通令全省有苗苗縣份的縣長，參照前清平樂知府歐陽中鶴創辦苗學計劃，辦理苗民學校，即由劉介氏主持其事。現這個學校，尙繼續辦理。我於卅三年回桂時，問及劉氏。據云：「苗民受教，成績頗佳」。可見「有教無類」的道理，是十分正確的。

廣西語言的分析 廣西的人民，除了上述的苗苗之外，如果要詳細的分析起來，還可以由語言及其居住的區域，而得到許多顯明的區別。廣西的語言，可以分爲土話（即諺話）、官話（即普通話），白話（即廣東話），俛話（即客家話）四大類。土話爲土著原有的話，這種人是住在廣西最早的人，後來由東北的湖南方面，及東南的廣東方面，到來許多外省人。時代愈久，移來愈多。這些外來的人，文化水準，自比土人爲高，而且還有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力量爲其後盾。昔日的土人，自難和他們競爭，祇好向西北方面敗退。僥智高與狄武襄的戰爭，即是土著人民反抗外來人民的武裝衝突。南甯龍州一帶姓鼻的極多，原係有人旁之「僥」，據傳即僥智高之後裔。不幸僥智高失敗了，因而更受壓迫，千餘年來，在中原的政治文化統治之下，表面上雖稱同化，但仍保存着固有的語言。此種土著言語，又可分爲兩種：一是平話，是土話白話混合而成的。通行於南甯附近的鄉下，及左右兩江的沿岸地帶。一是純粹的

土話，僅保存在更邊僻的地方。官話是湖南以北傳來各省不同的方言，在桂林省會地方，起了一種中和的作用，經歷代演變，而成爲桂林官話，亦卽爲南方官話的正宗。腔調平和，字音正確，很容易懂，亦很容易學，由桂林爲中心，一方面沿漓江（卽桂江）向平樂發展，南至荔浦、修仁、蒙山、昭平之間，東至賀縣，鍾山、富川。在這個言語交界的區域內的人民，都是官話白話併用，甚至與挨話並用。一方面向柳州發展，南至武宣，西至南寧都是官話白話兩用的地方。白話的發展，完全以西江爲主流，由下游而漸及上游，以梧州爲起點，沿江兩岸的區域，如蒼梧、藤縣、容縣、岑溪、懷集、平南、桂平、貴縣、北流、興業、橫縣、永淳、賓陽，以及沿江的各縣，都有一大部或一小部是說白話的地方，它一面是溯江而上，一面是沿江的兩岸向兩側深入。此種白話，是廣東原來的語言，年代最早，其向廣西進展，自較官話爲先。而且西江水道交通方便，故「白話佬」向廣西移民，要比說官話的人來得早，來得多。挨話又名客家話。客家話的意思，無論在廣東或廣西，都是表示由外省遷來不久的客人的言語。據傳客家話本發源於河南，後來逐漸向東南方面發展，如江西的贛南、福建的閩西、廣東的北江，東江都是客家話盛行的地方。並循海轉到南路的欽州、廉州、化州等處，再由江北的連縣，陽山而轉入廣西的潯賀縣、信都、昭平、蒙山、平南的北部，桂平的北部，武宣的南部，此爲客家話進展的北路。更由此而入柳慶各屬之一部。另一方面由欽州、廉州、化州向北至廣西之博白、陸川兩縣的全部，北流、玉林、興業、永淳、橫縣、南寧、上思、綏濠、各縣的一部，皆爲客家話的區域。「客家佬」入廣西的時期，比較的遲，所以純粹客家話的區域，都在邊境的地方，或是官話白話交界的地區。但是客家人刻苦勤勞，富於冒險精神，竟有少數滲入，直至雲南貴州邊界上面。他們的生殖力與進取力，亦極爲迅速。

我雖以語言的不同，來區別廣西人民來源的差異，但是並沒有什麼種族的觀念，或種族間的問題。祇是藉此說明廣西人民在歷史上地理上變動與分佈，和語言生活習慣上差別的情形。我們在這裏，可確

實知道，兩個或數個語言習慣不同的人民，因經濟交通的關係，彼此會逐漸溶化，而形成另一種混合的產物。所以現在廣西，有好些地方，通行着二種或三種言語。這些地方，必將產生出另一種混合產品的語言。今後交通日益方便，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則此種變化的更迅速，更複雜，不似以前那樣的單純而易於辨別，殆為必然之事。

禁止公娼與解放婢女 十六年五月，通令全省，廢娼及解放奴婢。本省原有花捐收入，全年達二十餘萬，我不稍顧慮而全部放棄，另籌抵補辦法。娼妓是肉體的買賣，奴婢是人的買賣，在人類平等與道德的觀點上說，都是非及早廢止不可的。政府更不應該以那種錢，來充行政經費。我們在那個革命高潮澎湃的時候，首先實行了這個主張。但是效果並不十分圓滿，事後反引起許多的批評，所以民二十年以後，就局部的恢復起來了。一般對於廢娼的批評，主要的理由，是公娼雖然廢了，私娼却盛行起來。政府對於公娼，可以集中管理，而私娼的管理，則更為困難。因為良賤不分，花柳病的傳染，更加厲害。而公娼廢止後，娼妓的生活問題與嫖客的性慾需要問題，未得適當解決，仍非合理的辦法。這種說法，表面上雖未嘗沒有若干理由，殊不知有公娼的時候，私娼也是一樣的盛行，如禁了公娼，而不禁私娼，那是關大門開後門的辦法，不在進一步禁止私娼方面着眼，而徒謂公娼之不應禁，是無異提倡設娼，而不是主張禁娼。至於私娼能不能禁，那是方法的問題，而非是與否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的。就方法來說：男女生活和性的需要，都是必要的條件。政府對人民，尤其是女子職業，要有解決的辦法，同時對男女的性生活，要使他們得到正確的觀念，然後禁娼問題，方可迎刃而解。中國的娼妓，可說完全由失業造成。因失業而生活困難，不得不出賣婦女們的皮肉，以維持必需的生活，所以人民，尤其是婦女職業的解決，實在是根絕娼妓的基本辦法。單言禁娼而不從這等基本問題着眼，當然不能達到徹底禁絕的目的。但因職業問題一時不能解決，而諱言禁娼，則近於因噎廢食，必致流弊更甚，為害社會亦愈大。

我那時見解如此，現在的認識仍如此。如果職業問題解決了，男女雙方本着性的需要，自可以正當的途徑，求得共同的解決。關於解決這一問題，本來比較容易，但在中國舊社會的觀念，還有必需加以糾正之點。原來男女雙方為求滿足性慾的正當行為，不能與買賣式的玩娼嫖妓相提並論。可是社會上一般的觀念，却認為娼妓是正當的營業，而以男女為滿足彼此性生活的自由戀愛，無論為臨時的或由臨時而變為永久的，都是不道德的行為。記得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有兩個青年男女工作同志，在梧州北山公園有些戀愛行為，為人發現，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因為這個男的青年，是做工人運動的，那些有錢的老闆及紳士，平日都非常忌恨他。現在發生了這個事實，便認為這是敗壞社會風氣的大逆不道，全體聯名要求政府懲戒他們，以維持社會道德。而我駐梧州的高級軍官，與勞資兩方，素無關係，也加入了紳士老闆的一方，一致主張幫同紳商們出氣。可見舊的道德觀念，對於男女自由戀愛是認為不當的行為，而對於一般人進撫河裏的烟花館，與娼妓公開的飲，公開的唱，公開的嫖，反覺得是正當的，道德的。而且他們自己也大都在那裏度這種荒淫的生活。如果這種基本觀念不改變，反對廢娼者，自得有所藉口，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以阻撓廢娼工作的進行，這實在是不揣本而齊末的胡鬧舉動。

解放婢女亦與廢娼的情形差不多。記得小時候，我家裏也養了好多婢女，尤其是某一個大荒年，賣女作婢的特別多，祇要六七千文錢，或兩担穀子，就可以買到一個七八歲的婢女，有的還祇有四五歲。這樣小的年紀，不易找到買主，他的父母，情願白白地送給人家作奴婢。這些孩子們的父母，往往對人這樣說：「不賣她，無力養活，終要餓死；賣了她，不但她得活，連我們也得活了」。出賣女兒的人，除了因女兒生離，天性上受了一些痛苦之外，祇是自怨命苦，決不會怨收買的人，甚至反而感謝他們。所以收買婢女的人，亦都自命是一種慈善的行為，並不是不道德的事情。因而有人對於政府的解放婢女，認為無異是一種虐政的確，如果政府沒有善後的辦法，這事要徹底實行，是不容易的。因為一方願

買，一方願買，不會有人來報告，也沒有人願意檢舉。政府自然不能派許多人去稽查，即使不預一切的強制執行，也決不會得到良好的結果。但是政府如果知道賣兒鬻女的，僅是少數人，而他們所欲得的，祇是維持一家性命的人肉代價，為數並不很大，那末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救濟，也並不是一樁很困難的事。如果政府能指導人民，在農業或工業的技術方面，加以科學的改良，以增加生產，使人民生活得以充裕，就根本不會發生這種悲慘的問題，這都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啊！香港政府執行婢女解放，非常認真，家庭裏查出有婢女，一定要吃官司。婢女如向香港政府控告，官司一定是贏的。所以居住香港的中國人，對於婢女，都以義女的名義養着，不敢過於虐待。香港政府解放婢女的政策，雖不能澈底實行，但是住在香港的婢女，已經得到很大的恩惠。因此我常時感到一個政府，如果不能解決人民的職業，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一切冠冕堂皇的政令策政，都是紙面文章，無裨實益。豈僅廢除娼妓與解放婢女兩事為然？我檢討本人以往的行政設施，所以事倍功半，或未著成效者，其主要原因，亦在於此。

禁止賭博 許多人以為賭博是兩廣人的特殊嗜好。的確，兩廣社會的賭風，是比他省為盛。我自孩提粗識事務以來，就知道我們很偏僻的鄉下，風行着各式各樣的賭博：如花會呀，插三萬呀，（係以五個銅錢，由一定的高度擲下，着其正面與反面，取三勝二負制）打天九呀，（即打骨牌）開肉飛呀，（係以不知重量的豬肉一方，懸於當眾賭者，納票底後，即猜其重量，以數目最接近之前數名為勝利而攤分其票底之所入）番攤寶館，闍姓山票，以至鬥鷄，鬥蟋蟀，鬥畫眉，莫不應有盡有。麻雀牌還是光緒三十年才傳來的。本省的禁賭，我記得以前會厲行過一二次，但所禁的祇是雜賭。闍姓山票、番攤等，一般認為是「正當的賭博」，不在禁止之例。而且禁止時候，也很短促，至多不過一年或幾個月，就開放了。禁令也不嚴厲，在城市裏不過徒具形式，鄉間仍和不禁一樣。民國以來，這種賭博的規費，竟視為正當的餉源，而且是極確實極容易籌集的餉款，乃美其名曰「防務經費」，公開徵收，全省每年約有

三百萬元之鉅。就是到了我們的軍事時期，亦是以此種收入爲軍餉的重要來源。十六年我曾訂定分區禁賭的辦法，於十七年元旦，通令全省施行。除在梧州、南寧、桂林、柳州、平樂、玉林、龍州、百色這八個城市中劃定區域，准許開設番攤、寶館兩種賭場外，其餘各縣以及上述八縣的鄉間，無論何種賭博，都在禁絕之例。這種辦法，在當時就表面上觀察，自有其特點：第一、賭的範圍及區域縮小了，易於管理，而「賭稅」收入並不減少。第二、其餘大多數的城市鄉村，不致再蒙賭博的害處。所以我離開廣西之後，這個辦法，還是繼續實施，直到抗戰之後，才行廢止。我現在回想起來，這並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好辦法，而無異於承認一個正當的賭區，與合法的賭博。比到以前的情形，祇能說此善於彼而已。

十七年的大飢荒 十七年廣西大旱，災區約佔全省之半，尤以毗連貴州邊界一帶爲甚。以前雖連年遭罹水災旱災，但災區都沒有這次的廣大，而且在那兵馬倥傯之際，實在沒有機會與款項去設法賑濟。省會各界特組織籌賑會，向各方募捐。省府並通令全省公務人員減薪助賑。但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慶遠，河池，南丹，一帶米糧沒有了，繼以草根樹皮，最後把農民賴爲生產動力的牛隻，都吃光了，而仍不免於死亡。有些偏僻的山村，直到好久，才發現村子裏的人，全都死光。一個房屋裏或帳子裏，都是餓死的尸骸。我們駐在那裏的部隊，都要到柳州以下來運糧補給，糧船到了飢荒區，那些飢民，有的手裏執着板刀，有的是徒手，蜂湧着要來搶糧。官兵告訴他們：「我們手裏有步槍機關槍，你們這個樣子，可以搶得到糧麼？」飢民說：「希望你們開槍，把我們擊斃，否則就要把糧給我們吃，我們寧願槍斃，不願餓死！」人類是有同情心的，官兵在戰陣上無論如何的勇敢，但是對於這手無寸鐵的飢民，是不肯忍心將他們擊斃的，結果是分了一半給飢民，安慰他們回去。這個官長的處置，我認爲很得當。記得小時候我父親對我說過：「在大飢荒的時候，飢民聚衆開倉，（即將富有的倉廩打開搶食）是不能算做犯罪的」。我當時不能了解這個道理，自經此次大飢荒之後，才恍然大悟，在現代法律上，因正當防

衛而至殺人，是沒有死罪的。這等注意，實在很合理。多數的人，因為要救自己的性命，被迫而強取一些食物，確是一種正當的防衛。而且保障人民生命，是政府的最大責任，政府既不能盡到自己的責任，還要以法律去懲治他，理論上也覺得說不過去。回憶我父親這個啓示，使我在政治上了解不少的真理。

創立村政學院 縣政的基府組織的重要，我在那時也已經注意到了。爲培植縣政基層幹部起見，於十七年的九月，創設村政學院於桂林良豐，聘劉仁航爲院長，這是廣西村政建設之開始。在此以前，鄉村組織及幹部，都是沿用舊的方式與舊的人員，自然不會有若何進展。以後又因不久即發生十八年的變動，以致村政學院僅成爲一個始基，而未著宏效。而且就我的觀察，劉仁航一流人的學問道德，雖然很好，但所講述的理論，未免近乎迂闊，更談不上實際的經驗。他們是純粹的村治主義者，將上級的關係，看得很輕，似乎近於「無政府」的主張，所以即使有機會實行起來，收效如何，也是一件沒有把握的事情。

組訓民團 十九年因軍事的挫敗，亟思統一組訓全省的民團，以爲軍事的補助。四月間成立全省民團總指揮部於南寧，我任總指揮。白劍生任副總指揮，全省劃分爲十二區，設區指揮官副指揮官各一人。各縣置民團司令部，設司令，副司令各一員，以縣長兼司令，這是廣西統一辦理民團之始。經以後多年的改進，成爲以民團爲中心的廣西縣鄉鎮組織。但是我担任總指揮的時間甚短，而且並不切實負責，以後的改進工作，都是白劍生、黃旭初、雷殷三氏董成其事，與我並無多大的關係。

創設行政督察委員制度 廣西地面遼闊，人烟稀少，加以那時除了幾條勉強通行的河道之外，陸路交通十分艱困。省會南寧，地位偏處南隅，省政府對於全省九十餘個縣單位的指揮監督，自感困難，尤以桂林、柳江、田南（卽百色）鎮南（卽龍州）各區爲最甚。陸譚時代的道尹制度，於民國十年的時候取銷了，要把他恢復過來，固有困難。而且距離省府較近，及交通便利的地方，也無須乎要加多這個中

間的行政組織。所以我那時爲暫時權宜計，特於距離省會遼遠而交通困難之區，設置行政督察委員。因爲我認得前清的府道及民初的道尹，都是固定的官制，未免呆板了些。既經撤廢，自不必再行恢復。而廣西若干地區，在那時候，又確屬需要一個中間組織，以補省政府耳目所不及。經再三研究的結果，乃改用行政督察委員的名義，爲監督考察邊遠地區各縣行政的負責者。這實在爲現時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制度的嚆矢。不過那時的組織很簡單，祇是一個在特定區域設有機構的視察員而已。不料由我創立的制度，今日竟通行於全國。這個制度決定以後，即委張任民爲桂林行政督察委員，轄桂林、平樂各縣。黃勉爲柳州行政督察委員，轄柳州、慶遠各縣。鄭承典爲鎮南行政督察委員，轄龍州、太平各縣。馮冠倫爲田南行政督察委員，轄百色、思恩各縣。直到十八年全省的交通網大致完成後，始行撤銷。

整理財政 廣西是素號貧瘠的省份，前清一代，均賴廣東協餉以維持廣西的行政支出。民十以後，全省分崩離析，財政更混亂不堪，非經澈底整理，決不能平衡收支。尤其非稅收合理，不能減輕人民負擔，清除人民毒害。在十五年的時候，第一件重大工作，就是整理貨幣。第二件重要工作，就是統一全省收支，大致已如前述。但這不過是初期的基本工作，尚談不到財政本身的整理。到了十六年，我才決定廣西財政整理的方針。第一、採用量出爲入與量入爲出的平衡原則，就是說政府爲進行各種新建設，不能不有新支出，而這種新支出的來源，同時亦須顧到人民負擔的能力與收入最高的限度。第二、實行全省一次徵稅，裁撤重複的稅卡，停止重複徵稅。第三、廢除不正當名譽而害民之收入。第四、實行專賣及保護稅。第五、廢除包商及比較額，實收實解。第六、收入一律改用大洋，以毛洋加二五伸算。第七、預定新稅則，採用從價徵稅。這幾個重要方針，雖然決定了，但是在準備上，執行上，尚有很多的。於是首先成立整理稅務委員會，以財政廳長黃蘊爲主任委員，指定對稅收有成績有研究之稅務人員數人，及地方公正紳商人數人爲委員。於十六年春在梧州舉行稅務會議，研究討論，決定各

種進行辦法，於七月一日逐步實行。在實行以前，先由政府提出支出之需要數字，然後由各重要稅務機關之負責人，如白博九、黃子敬、蒙飛鴻、李德輔、黃仲庵等，就當時之稅則，加以整理，以測定收入之最高限度。如果尚不能適合政府之要求時，則按其差額，以爲加稅之標準。同時將全省原有三十個徵收機關，應徵之數目，併裁於十六個機關徵收。這十六個稅務機關，皆置於全省貨物進出之重要口岸，凡出入口之商品貨物，完納一次稅捐之後，即可通行全省，無稍苛擾，實爲省境統稅之濫觴。此辦法實行後，稅收增加一倍有餘，而人民負擔，並未加重，商民則皆稱便。在前清各種稅卡，徵收額均有規定，能徵收足額者，實所罕見，能徵解七八成者，已認爲達到要求。其實真正的收入，要比規定額高得多，超過定額之數，皆爲徵收官吏所中飽，爲數極爲可觀。陸譚時代，仍緣此例辦理，所以許多稅收機關，皆爲其親信獨佔，或作爲一二特別權要者之酬勞。所以那時候，一任收稅官吏，莫不夏屋渠渠，腰纏累累。我們在軍事時期，曾改爲投標商包，收入較以前比較額，超出一兩倍，因比較額皆爲前清光緒年間所規定，現時商業發展，其應收數目，自不止此也。那些稅務的包商，大都是與我們的幹部有關的人，他們的盈虧，我是很清楚的。盈收的數目，有的比繳解政府的數目還要大得多，真正虧負的是絕少的人？我見如此情形，乃決定廢除包商，實行實收實解，嚴其人選，密其監督。在那整理的期間，曾經槍斃一個人，監禁了好幾人，然後始獲良好的效果。我記得有一位素爲我敬仰的先生對我說：「水清則無魚，官清則無人，你如此辦法，恐怕無人肯爲你辦稅務了！」我說：「我情願水清無魚，決不任他們混水摸魚。」亦可知那時一般人對於辦稅的觀念是怎樣了。但是這個說話的人，他却是善意的。

創辦捲烟專賣與保護稅 其次，是實行專賣保護稅。這件事舉辦以後，就牽涉到外國商人的身上。我們辦理專賣事業，先由紙烟做起，將所有入口的紙烟，一律交由政府貼從價百分之七十的專賣印花，再交烟商分銷出去。那時廣西的入口紙烟，以英美烟草公司的出品，占大多數。而華商的出品，如華成

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僅佔一小部份。這個辦法，一經施行，英美烟公司就派代表來質問。我回答他說：「捲烟專賣各國都有此辦法，即使沒有前例，我認爲這是財政上的合理措施，也要如此做去」。他說：「我的烟已在上海納了統稅，不能再納第二種稅」。我說：「你納的是上海稅，我收的是廣西稅」。他對於我這種強詞奪理的態度，竟毫無辦法。最後帶着要挾的口氣說：「我的公司要撤退了，聽候帝國同你中央去交涉吧！」並送我一箱三炮台香烟，因爲我好吸此烟，好像表示英美公司撤退之後，我就沒有三炮台烟可吸了。我說：「謝謝你：你們如果真的撤退，我就自己開廠，自己製烟，不再需要你的出品了」。結果英美烟公司自動撤退了；華商屈服了，我自己的菸廠，也開設起來了。委蘇汝芬爲廠長，出了兩三個牌子的香烟，後來因爲專賣也等於收稅，反而要貼許多印花，費多少手續，索性改收保護稅，值百抽七十的稅率，比以前增加十倍有奇。這是在稅收上首先戰勝外國人的一件事。但是外來烟稅收得那樣重，而我們自己的菸廠，並不因此發達起來，也不能大量賺錢，這完全是管理與技術及原料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要求自己工業的發展，對於保護稅的實行，固然是要緊的事，而講求科學技術與工廠管理，實爲最基本的條件啊！

火油征稅 再次，則爲火油納稅。我在梧州的軍事時期，對於各種貨物通過，都要收保護費。因爲各處的土匪甚多，沿途設「卡」，商人付了「行水」，才可以通過。我之要收保護費，就是用武力保護商貨安全通過，不許土匪勒索「行水」。但不許土匪收「行水」，而自己反收起保護費來，似乎是換湯不換藥的做法。其實我收的費很輕，而且是有規律的，負責任的，因此商民都很願意繳納。即當時的外商火油公司，如亞細亞、美孚、德士古起初亦對我抗議。我說：「問題並不是我一定要收保護費，而是你們要不要平平安安的做生意？」他們聽了我的話，也都樂意繳納，歷年都無異議。可是到了政局統一整理財政的時候，我要正式征稅，他們就不願意了。又向我提出抗議。我說：「你們以前不是一樣的繳

納的麼？爲什麼現在又要翻悔呢？」他們說：「以前因爲有土匪，才收保護費，現在時局太平，爲什麼還要收費？而且保護費是臨時的，稅是永久的，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答應」。我說：「假使你們堅持不肯納稅，時局馬上就會不太平。無論那一個國家，商民納稅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時局太平，惟有時局太平，才可以賺錢呀！隨後我又說：「假使你們不願用保護費或稅的名目，最好是將全省經銷火油的代理權，交我政府辦理，我可以在那裏加價，抵補這筆數目。他們一想，這樣更不合算，便要求國府命令制止，我仍不予理會，爭持到最後，他們是屈服了。我不過在稅律上減輕一半，終於獲得了勝利。

捲烟專賣和火油徵稅，兩次對外國商人交涉的勝利，固然由於我蠻幹的結果，同時也因爲那時候香港發生罷工風潮，漢口發生交還英租界的問題，大英帝國對中國革命政府讓步了。所以我才能見風使舵，給他一個硬幹，畢竟得到了勝利。可見一個國家的外交，確是需要民氣和國力做後盾的。

禁烟收入爲廣西大宗財源 那時廣西財政的最大來源，要算禁烟的收入了。所謂禁烟，仍是軍閥時代寓禁於征的辦法。鴉片來源，並不在廣西境內，因廣西土壤氣味，不適宜於種植鴉片。在西南方面，烟土產地，都在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牠的出路，一是由長江銷行下游各省。一路出廣西，銷行珠江流域，甚至港澳南洋各地。所以百色、龍州，柳慶都是雲南烟土必經的要口，全年通過各路路線的，總在二千萬兩左右。歷年加以整理，收入達一千萬元以上。這兩千萬兩的烟土，如以兩廣四千多萬人口來分配，平均每人可得半兩，爲害之大，可想而知！飲鴆止渴，雖知其害，而竟樂爲之，其造因固不自今日始也。鴉片戰爭爲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侵略之開始，而提倡種植鴉片，則爲中國民族自戕之開始。以林文忠公則徐之卓識遠見，竟不能挽黑禍之橫流，豈獨滿清政府應首負其責，即民國紀元後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亦不能辭其咎也。敘述至此，不禁悚然自愧！

田賦之清理 在前清時代，廣西的田賦收入，不過五十萬兩。及民國四年六月，舉行全省清賦，以

財政廳長田承斌爲總辦，朱新模爲駐局總辦，各道尹爲會辦。取銷以丁折米舊制，改兩爲元，厘定產谷百斤，征銀一角，雜糧百斤，征銀六分，（旋將雜糧免稅）實爲廣西田賦改革之開始。經此次改革之後，每年增稅一百五十餘萬元，至十五年全省田賦收入，全年亦不過二百餘萬元。此種改革，不過征收方法之簡化，尙談不到地籍之整理，田畝之清丈，而歷年來因人口之增加，新闢之土地，亦不在少數。我任內，鑑於各項不正當之捐稅，將來必須廢除，不得不在田賦方面加以澈底之整理。乃於十七年八月間，成立清理田賦總局，以財政廳長黃蘄任局長，全省清畝所經費預算，約在二千二百萬餘元。係用實地丈量法，預計三年內完成，不幸十八年政局變動，清丈工作亦就中輟。但在南寧局部清丈所得的結果，並不十分正確，蓋創始辦理，技術與經驗，皆尙欠缺也。就我現時所知，全國各省對於土地之清理，皆以財政爲目的。所用之方法，如土地陳報，土地編查，皆係速成辦法，而非科學的根本辦法。一面要省經費，一面又要省時間，既不儲備人材，又無精密機械，草草從事，錯誤至多。照此辦法，不知何年何月，全國才有正確的地籍呢？

廣西財政，自經十六年後之不斷整理，已日上軌道。至十八年，我離職以前，都能維持必要之支出，而使各種建設，得以齊頭並進。二十年後，仍本此基礎，維持迄今，使廣西建設得更進一步之發展。飲水思源，實不能不歸功於當時的財政廳長黃蘄氏呀！

增籌教育經費 廣西教育，素稱落後。在民十以前的陸譚時代，既不重視教育，民十以後，又經過五個整年的軍事擾亂，匪特不能進步，反多所摧殘。到十四年省政統一，乃於十五年召開全省第一次教育會議。這個會議，開創了廣西教育的新紀元，除了討論恢復原有的學校之外，即爲力求擴展與充實。因此寬籌教育經費，便成爲會議中的重要問題。當經決定在全省田賦內，附加一部份，充作教育經費。這個主張，出席人員，自然一致贊成。而在政府方面，因爲這是國家的百年大計。也就毫不考慮的核應

了。廣西的田賦額，本來很輕，加了一倍，也並不覺重，所以在人民方面，亦認為這是應有的負擔。會議閉幕以後，接着舉辦教育行政人員養成所，將各縣教育局長召集訓練，期由教育行政基層幹部的健全，以促進地方教育的發展。

創辦廣西大學 十六年的冬天，我在省府會議提議，創辦廣西大學。當時雖有人以廣西的中等教育尚未發達，似不宜即辦大學為言。但我覺得一省裏面沒有一所大學，以領導促進文化的責任，總是一個缺憾。而且廣西學生要進大學，非到廣東或北平上海不可，也就太不經濟太不體面了。所以我不顧他們的議論，而逕行決定。先成立廣西大學籌備委員會，我自任委員長，教育財政建設各廳長，及省內外的桂籍有名望的人士為委員。由省政府即撥一百萬元為建築費，五十萬元為設備費，一切建築都是新的，絲毫沒有利用舊物。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咀的蝴蝶山，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學生皆可順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亦可溯西江而直達。同時因為那裏是我進兵梧州的登陸地點，可作為廣西改革之紀念也。十六年三月間，我親到梧州，舉行奠基典禮，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是年九月間，大部建築已完成。乃聘馬君武博士為校長，盤珠祁碩士為副校長，於九月十日舉行開學典禮。第一期招收學生二百八十餘人，內分農學院，理工學院及礦冶專科，文法學院則付缺如，因廣西貧瘠，亟欲由農工礦之發展，以救濟其窮也。學校雖係初創，然以建築之新穎，設備之完全，加以馬校長之學術名望，不特可招致省外之教授，且可吸引外省之學生。抗戰後，校舍一部份被敵機炸燬，乃分遷桂林柳州，並由省立改為國立矣。我每到桂林，校中必請我講話，我亦樂於前往。卅二年到桂林，馬校長已逝世數月，我到良豐，佇立於他巍巍的墓碑之下，默念這廣西第一個出洋留學生，第一位德國工科博士，第一任廣西大學校長，他為革命而努力，為學術而努力，為「西大」而努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感念之餘，實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而「西大」已由嬰兒而少壯而成長，育成之材，亦已數百千人，為地方為國家，必能繼馬校長之遺志而努

力。馬校長九泉有知，亦可以瞑目矣！培育後生，本爲前人應有之責任，我不敢以此居功，但回憶往事，亦有足以自慰者。

幾項重要的教育文化活動，是年夏間，省政府在桂林舉行夏令講習會，聘請省內外學術名流，隨往講演。並命各中等學校校長、教職員、各縣市教育局長，前往聽講，各界民衆，亦可自由參加。桂林山水甲天下，廣西又是正在革新的省份，所以到來講學的名流學者很多。如馬君武、邵天華、黃寶虹、丘景尼、唐慶捐、陳欽仁、陳定模、陳鍾凡、陳桂、姜琦、白鵬飛、鄒彰成等，皆不遠千里而來，實開桂林文化運動之新紀元。他們對於草萊初開的廣西，寄予無窮之希望。秋間，又在梧州舉行第一次全省運動大會，到各縣運動選手千餘人，廣東及駐在梧州之外兵，亦派選手參加表演，情形至爲熱烈。以上所述，都是廣西革新初期的教育文化活動。中間雖經十八、十九、二十三年的軍事行動，而稍有停頓，但風氣已開，基礎稍立。民二十年以後的廣西當局，更加努力進展，尤其是提出「萬將於學」的呼號，實施中等以上的學生軍訓，實開全國國民軍事教育之先河。但廣西現時的教育，量的方面，尙可步武各先進省份之後，而在質的方面，則相差尚遠。據我所知，即以「西大」而論，每次招考新生，外省學生錄取者日多，本省學生考取者日少，這就是表示廣西省中等教育的缺點。又聞各級中學招考時，投考的學生，非常之多，而可能錄取者則甚少，這也足以表示廣西小學教育的缺點，而有待於今後努力改進者。

公路建設的開始。廣西的河水，都是由西北向東南流的。廣西全境面積六十餘萬方里，地面上的水流，都是經梧州出口，甚至貴州南部雲南安南東部的水，也都是經由梧州出海的。所以梧州水位的漲落，相差甚鉅，最高紀錄爲民國二年之七十三英尺，其餘五六十英尺，三四十英尺，也都是常見的。這樣鉅大的水位差，不但使農田人畜釀成極大的災害。即在交通方面，水漲則船隻難行，水漲則覆舟傷命，

予行旅及貨物運輸，以極大的困難與威脅。且因河流的方向，都由西北而東南，所以由西北至東南的交通，尙稱便利，而東北至西南的交通，就十分困難了。我對廣西的建設，首從發展交通着手，關於全省公路網計劃之決定，一方面是根据省內河道交通的分佈，另一方面是根据隣境之需要。如上述省內河流情形，對廣東方面的交通，暫且利用西江，尙稱便利。而對於湖南、貴州、雲南、安南則非開發陸路交通不可。在陸諫時代，全省公路，僅有南寧至武鳴之五十餘公里，及龍州至鎮南關之五十餘公里，這兩段短短的公路，與我們當時的需要，相差很遠。因省會在南寧，就以南寧為起點，決定建築四條大幹線：(一)東北幹線，自南寧起，經賓陽、潯江、柳州、荔浦、桂林全縣，直達邊境黃沙河，與湖南銜接。中間以柳州為中心，一經宜山、河池，南丹直達桂邊之六寨，與貴州相銜接。一經沙浦而至長安。(二)至石龍，達柳江之干流。一以荔浦為中心，一經蒙山至潯江，與西江水運相接。(此路現尙未通)而平樂，而至賀縣，八步。再一方面接至廣東之連縣、陽山。(此係抗戰後才修通)一方面經信都，而至梧州。(此路與江不久即修通)一由東向幹線，由賓陽、經貴縣、玉林、容縣而至梧州。中間以玉林為中心，經陸川而達廣州灣。一由玉林至博白。一以容縣為中心，經六陳大安至武林，以溝通西江水路。(三)西後幹線，由南寧經綏寧、思恩、樂寧、明太平而至龍州。(四)西北幹線，由南寧經武岡、都安、果德、思林而至百色，再由百色接至貴州之坡脚，雲南之富州，與雲貴兩省銜接。此路在我任內，並未動工，民二十五年後，由現政府築至百色，但尙未至雲南邊界。以上所述之計劃，除西北幹線外，其餘皆在十七年歲末十八年初完成通車，約長五千多里。除一小部份係由人民自辦者外，其餘皆係政府撥款辦理，由建設廳長伍展空主持其事。記得有一次我在廣州政治分會報告廣西築路情形後，戴季陶先生說：「古稱有道之邦，廣西現在真可算得是有道之邦了。」的確，那時候廣西的公路，要比同時期的任何省份為多。又有一次，一個美國駐華的商務參贊安德森氏至南寧考察，他對廣西兩公路本週

面的斷崖，他就徘徊不捨的在那裏察看。終日不是拾石子，就是檢泥巴，好像一個鄉間頑皮的孩子，又好像一個地理先生。他平時那副文質彬彬道貌岸然的樣子完全變了。我聽了也覺得有些好笑。丁先生考察回來，我和他作過一次詳談。他說：「廣西的地下，各種礦苗都有一些，可是樣樣都不很豐富，尤其是沒有很豐富的好煤，也沒有豐富的好鐵，而且分佈得非常散漫。這於將來工業的發展，不免受到阻礙。金礦雖有很多地方發現，但粒小脈微，還不能用機器大量生產。而且金礦在世界上並不佔重要的地位。錫的藏量，僅次於湖南，但用途小，價格低，目前尚無開採的價值。只有錫的藏量，雖不算很豐富，但集中易採，是目前廣西最有價值的礦產」。他還說：「廣西一定要修築幾條鐵路。一條由桂全至湖南。因為長江以南的煤田，以湖南寶慶為最有價值，可用火車運到廣西來應用，或者銷到廣東香港去。另一條北由柳州經河池、南丹而至貴州、四川，南經貴縣、玉林而至廣州灣。四川出海的鐵路，以此線為最近，全程不過二千多公里，而且工程上比任何一線為容易。四川的農產都很好，貴州的礦產亦有希望，如果這條鐵路成功，對於廣西經濟上有很大的益處」。我聽了這番宏論，總覺得有些近乎迂闊而玄妙。我心裏想：「你這樣在地面看一看，難道就可知道一切了麼？你的眼睛難道可以看透地層？」我問他：「會不會在很深的地層下面，發現同煤礦一樣多的金礦，或其他重要豐富的礦苗？」他笑着回答道：「也許會有，但是世界上尚未有過這個例子，也許現在的地質學，尚未研究到最深的地層裏面去。但是目前的地質學，在一般原則的應用上，是可以作為開礦的指針，當不致使人們亂投資本而得不到效果」。我對於地質學自然是一個門外漢。他也知道我是一個老粗，不願多爭執，祇是婉轉的對我解說，使我領悟。最後他說：「我不過勘察了一個概況，而且南甯以西的地域，還沒有看過。那裏的山脈，來自雲南，和安南，安南與廣西交界不遠的地方，有很好的煤礦，可能的在南甯以西，留有很大的希望。最好組織一個地質調查所，從事詳細的調查，便能明瞭一切」。現在我回想起來，很佩服他的學問見解，

與儒雅的风度。可惜他早已死了，真是國家的大損失！

初步的建設事業 在農業方面，那些專家也提出了兩點重要的意見：第一、廣西的地層，多半是石灰岩構成的，（尤其是柳州一帶）下面滲漏的太厲害。廣西的雨量，本來並不算多，所以土地很容易受到旱災的威脅，而且所施肥料，都被滲漏而不得積聚，不但不能變換土壤，反而一年年的枯瘠下去，所以廣西的農產品，大多數是不很豐厚的。第二、柳州的土壤多半是石山的風化層，酸性太重，有些植物不能長成。而且害虫甚多，不易治理。要補救這個毛病，惟有人工儲水與大量的製造化學肥料，因為天然肥料很缺少，不夠土壤的消耗也。當時我們本想利用梧州的硫酸廠的硫酸，作為製造化學肥料的基礎，但是省內又無燒酸礦石，終於不能實現。這都是一般學者所謂廣西先天不足的原因。至於那些回國考察的華僑，論調可不同了。他們本來都是不學無術勤儉起家的人，所希望的，是馬上可以賺錢。而一個將要開闢的局面，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很多的顧慮，當然也不願他們辛苦得來的一些資本虛擲下去。他們在以前，都是隻身冒險到南洋去謀生活，好容易從豬仔（被賣身的華工名曰賣豬仔）苦力的地位，掙扎起來，變成一個小資本家。自然是小心謹慎的，不再像以前一無所有的時候，具有冒險精神了。他們認為那時候的廣西，尚不夠投資開發實業的條件，便都望望然回去了。我們站在政府立場，不管先天不足也好，後天失調也好，並不因此灰心，而仍舊是勇往直前的做去，希望人定可以勝天。所以對於他們的種種說法，均當他是不正確的批評，而不自誤意志。在那短短的時間內，工業方面，完成了三酸廠，酒精廠，機械廠，製革廠，機器廠，磚廠，紙廠。農業方面，成立了全省農務處，各區設置墾荒局及兵農委員會，實行兵農政策。以伍展空氏担任兵墾工作，並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為縣長的考成。全省的公務員，均須身體力行，首由省級公務員做起，我親自率領墾地植桐，在南甯開有一個廣大的公務員桐場。全省上下，熱烈進行經濟建設的工作。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當我們與

高采烈的時候，突於十八年春，接到廣東方面的電報，說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立刻到廣州去。當時我正率同成千以上的公務員，揮鋤掘地，立刻拋下了鋤頭，踏上了汽車，放棄了一切的工作，重複走入政治戰爭的漩渦。廣西建設的工作，便從此停頓下來，又受了幾年的磨折。這不知是廣西的損失呢，抑或是國家損失？是一方面的罪過，還是多方面的責任？這問題就難以解答了。

所幸這種初步的經建基礎，尙未摧殘淨盡，二十年以後，仍由現在的廣西當局繼續舉辦起來，並有許多擴展。在生產上，無論是公是私，都得到了利益。三十三年我與黃旭初伍展空到柳桂一帶去視察，「西大」的農學院師生要我講演。我說：「一個人無論讀書或做事，都不是單純爲了自己，爲了目前，而是要爲了衆人，爲了將來，這樣才有偉大的成就。現在假使我是附近的老百姓，來批評今日在座的人，我一定首先擁護伍廳長，惟有他是最成功的一個。因爲沿公路幾十里的大樹，幾百萬株林，幾萬畝農田的水利，都是他十幾年前犁開種植經營的成就呀！但是在當時，政府說他用錢多，而不見速效，老百姓說他霸佔牧地，壟斷水源，幾乎弄得他無處容身，而苦求擺脫。現在呢，綠樹成蔭，沃野阡陌，這個地方，不但成爲很好的農業區，而且成爲一個幽靜的文化區。這不是他偉大的成就麼？現在他雖然不在本省作事，我想好多人一定在懷念他。古人說：「前人種樹，後人遮蔭」，我們何必一定爲了自己要遮蔭，才去種樹？我想凡是學農的人，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那末將來他的事業，才有所成就」。

主桂四年的三個感想 自十四年的九月到十八年的五月，我主持廣西政治，一共三年九個月。以一個年青而又無政治經驗的軍人，來負担全省的政治責任，這是何等不合理的事情？縱然自己有勇氣來負責，但從老百姓及旁觀的人看來，一定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不但爲我個人擔憂，更爲他切身的利益而害怕。而我呢，祇是一面學，一面做，戰戰兢兢，小心謹慎地幹着。還算僥倖，在這三年零九月的時間，不但沒有阻越，還勉強得了一些微小的成就。這些成就，祇可以說我在政治實驗學校所得的一點試

驗品，而不是一列正式技師的製造品，其粗糙拙劣，不美觀，不合用，自然可想而知。但是以一省的大地方，一千多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來作一個武人的試驗場，真是太危險太不經濟了！古人說：「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我們既是馬上得之，而更是馬上治之，其不致顛覆者，亦幸矣！這等情形，在革命初期，固屬必有的事實，而今後之建國工作，其艱鉅必十倍於往昔，國家固然要培植保健全的政育人材，個人亦更須力求本身之充實健全，珍惜其用重大代價所獲得之經驗，而配合國家之需要。否則革命時代之損失，就無從補償了。這是我寫完本章的第一個感想。

在革命的過程中，一方面是用革命的方法來破壞，一方面是用革命的方法來創造。創造的力，超過了破壞的程度，革命才能成功。中國國民革命的破壞工作，我覺得是不夠的，尤其是對於舊的觀念方面，未曾澈底掃除而竟致妥協了事，因而創造的力量，亦無由發揮盡致，使以後的建設工作，受到極大的障礙。廣西在革命初期，雖將舊的人物完全剷除了，但是社會上一般的舊觀念，依然存在，新的創造的觀念，事前既未培養成熟，脆弱的革命銳氣，一經舊思想的衝擊，便漸漸的衰退下去，而仍舊捲入循環內戰的漩渦，不能堅持創設的意向。縱然在一時期內有若干的進展，也祇是曇花一現而已。而在那一時期的進展，的確是革命力量所推動的濤浪，可惜這濤浪沒有繼續的力量去推動他，反而變成一個相反的方向，在那裏不斷的波動。中國歷史上，每次鼎革之後，都有一番安定的工作，這個所謂「安定」，並不是進步的，而是消極的。並不是利用破壞力量來領導進行更大的創造工作，而是想要求這般力量，停止不動，大家坐享太平。結果不是消極的無為頹廢，就是不幸的漸漸的走上新的破壞過程。這種傳統的舊觀念，今日還深印在人們的腦海中，成為中國國民革命不能迅速成功的主因。這是我寫完本章的第二個感想。

廣西本來是一個經濟貧瘠文化落後的省份，要以自己的財力，自己的人力，來完成革命的建設，本

來是不容易的。因而在創造財產培養人材方面，必須特別注意。在那天下未定廣西先定的時期，國內有很多技術學術的人才，來到廣西，願意參加我們的建設工作，這是廣西建設最好的機會。可惜我們祇延納了一部分，不能儘量聘請。而這一部分的人才，又因十八年的事變而星散了。至於培植本省人才，雖然仍在努力，但是這努力的程度還不夠。廣西人不免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理，既不能很迅速的接納人家的長處，也不能很迅速的求自身的進步。在革命初期，人家尙未着手建設的時期，正可以借用外才，盡一時的努力，以完成初步的建設。若到了人家也同樣進行建設的時候，就無人可用，而日見落後，這正是很可惜的事情。至於先天不足，生產不豐，既不可心存失望而自餒，自應加倍的自奮自勵，盡其在我的力量。同時追求他人之所長，補救自身之不足。能如此，則再經若干時期之努力，未始不可與他省作進步的角逐。我雖然離開了廣西的工作崗位，但就我往昔在廣西工作的許多實際經驗，加以體會，和現在從旁觀地位，清晰觀察，認為本省還要十年以上的艱苦工夫，才可以奠定堅實的基礎，這是我寫完本章的第三個感想。

五
十
回
憶

九 十五年的黨務及當時民運情形

梧州初期的黨務，我出兵到梧州，除了受命孫總理的討賊軍總指揮名義之外，對於黨務尚未發生一些直接的關係。以前廣西的老黨員，如馬君武，劉玉山，劉震寰，劉燾，楊恩公等，不是在廣州擔任軍政的要職，就是任在廣州或其他的城市，也未嘗直接辦過廣西的黨務。後來梧州一帶，入了革命軍的掌握，同時當十三年春天，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那些老黨員，也好像是有些落伍的樣子，而代以一班未見經傳的新進青年，首先成立的梧州市黨部，是中央直接派人辦理的。因為當時廣西尚未有省黨部，這就算是廣西最早的黨部了。他們不但與我不發生什麼關係，即在粵軍第一師方面，也不見得有若何的關係。當時在梧州辦黨的人，現在可以記憶的，男的有周濟，甘立申，龍啓炎，李血淚，李家驥，黃昌佐，粟羊，女的有李立華，李聯華，李愛琴，黃若珊等，是社會上活動的份子。同時并辦理一個梧州民報，亦要算在廣西最早的黨報。在當時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之下，一切的工作人員，還都是很親愛的同志。雖然知道其中很多都是紅色朋友，但一時亦不感覺得有若何不安地方。而在工作方面，怕以盡力發展農工的组织為中心，而尤以工會的组织發展更為迅速，所以要求加增工資與罷工的問題，就不斷的發生。這都是由廣州而傳播到各方的運動，並不是梧州獨有的事件。

收回梧州英領事署，在十四年的「五三」慘案紀念日，很多的羣衆，對駐梧英國領事署，作了三個示威的大運動，所有在英領事署工作的華人，一律都辭退出來，弄得英國領事署驚慌的逃下兵艦，退回香港，以後一直不敢回來。英政府因此常川派有兩艘小兵艦，駐在梧州，保護他的僑民。十五年六月間，駐梧英國海軍司令費志傑，因為要派兵艦搭拉士拉號到南博游划，須僱用帶水（即內河的領江人），我們

工會禁止工友去受僱，因此不能開行。我志傑大怒，乃用武力將梧州港口封鎖，斷絕交通二十四小時，後來經雙方協議，以後帶水工人，要由工會派定，兵艦不能自由私僱，價錢亦由工會規定，這事才算解決。自此以後，梧州以上的領江權，就操在我們的手裏，而外國兵艦到內地游划的機會，也就少了。因爲工會派出的帶水，他們不很相信，防到這等帶水的人，萬一有意將他的兵艦向階礮岩石上撞去，可以使他們發生很大危險的緣故。我爲此事，曾把志傑武力封鎖梧州的經過，親自撰稿在一張搭拉士拉號的照片上面，分發全省機關團體，作爲一個國恥的紀念，以資策勵。但此事梧州雖然遣了英人一個極短的時期的武力封鎖，對方也並不見得有甚麼便宜。可見民衆組織的力量，作非武力的抵抗，在某一時期，是有效力的。英國領事署的案件，英政府雖屢次向我交涉，但是理由總說不過我們。因爲我們的民衆，並沒有直接侵害他們的行動，而祇是在外面示威。在領事工作的中國人，也是自動的退出，並沒有什麼脅迫的情形。那時的英國領事，一方面因爲害怕，一方面因爲沒有中國人的幫助，尤其是住在那相當高的山頂上，食飯挑水，都成問題，即使不退，也無法在那山上生活，所以兩年多都不敢回來。房屋圍林，沒有人管理，一日日的崩敗荒蕪起來。到了十七年年底，廣州的英國總領事，到我廣州葵園的公館，同我交涉，願意將梧州領事署交還中國，但是要廣西省政府貼補建築費港幣三萬五千元。並說：「這都是二、三十年的積債，有當時軍閥爲惡，沒有一點浮報。」我因事件總有六日要解決，英方既願當讓步，即等於英國的政治勢力退出廣西，豈不是外交上三件很有體面的事麼？隨即命隨從人員當面點交港幣三萬五千元，中間着五百元的一百元，十元的小錢元的，包成六天包。他覺得很難爲情。要我改用支票，我說：「鈔票和支票，不是一樣麼？而且這都是隨豐銀行發行的鈔票，不會有假的，你也省得到銀行去支取，豈不更便利些？」其實我那時的確沒有款項存在外國銀行，那裏開得出支票呢？他很怔怔的收下了，於是大家簽了字，我並收回了地契。他臨行時對我說：「平生交涉的案件，這是

最痛快的一次。當場現貨成交，好似一場買賣。他這些話是譏諷我罷，還自是的確的事實，那也用不着研究了。我打開地契一看，一條當時一個燈棍所寫，僅得了二、三十斤銅錢的地價，就把三個山頭一大塊土地賣給外國人了。我想這等事體，豈但廣東如此，就是全國各省，何嘗沒有同樣情形？那些教會洋商，都是利用當地的痞棍，來偷買土地，所費的價值極少，而得的地面很大，當時的政府，還蒙在鼓裏呢！唉！以往中國的政府，辦理對外交涉，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啊！

廣西省黨部的成立，到了民國十四年，史英對於廣西的黨務，才有具體的辦法，派李德輝和我爲廣西省黨務特派員，指導廣西全省的黨務進行。並派覃超、梁六度、周錫楨、黃家植、陳立亞、劉百揆、石楚琛、覃時宜、陳勉恕等爲籌備委員，分別組織黨部，指導民衆運動，宣傳三民主義。並在梧州辦了一個宣傳工作人員養成所，以楊文昭爲所長。招收青年學生，加以黨的訓練，作爲黨的基層幹部。畢業後，分派到各縣，從事宣傳組織工作。到了十六年，又改爲黨務學校。我自兼校長，李天和、馮少傑先後擔任教育長。

去五年二月，召開全省代表大會，會中最重要的決議案，爲撤銷省議會縣議會，而以省黨部縣黨部代行其職權。理由是：這些議會，都是陸諱時代遺留下來的機關，內容太腐敗了，既不足以代表民意，還不如乾乾淨脆代之以省縣黨部，工作方面，也比較順利一些。這事，並沒有法律的依據，大約是根據本黨總章，「省代表大會即爲省的最高權力機關」那一條產生出來的。雖然解釋得很勉強，但爲遷就事實起見，也沒有什麼人提出反對。省縣黨部成立之後，就將以前省縣議會的經費，會址，移轉過去，不用另外籌劃，一切都很利便。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我和陳立亞、陳協五、黃家植、覃超、梁六度、陳勉恕、劉百揆、周錫楨等九人當選爲廣西省黨部第一屆執行委員，李宗仁、黃植深、張任民、麥煥章、陳錫光、雷沛濟爲廣西省黨部第一屆監察委員，並由執行委員互選我爲組織部部長，兼宣傳部部長。陳

勉恕爲青年部部长，陳協五爲農民部部长，黃家植爲工人部部长，陳立亞爲商民部部长，劉百揆爲婦女部部长。但劉氏却並不是一個女人。

初期廣西黨務的複雜。在當時，廣西省縣黨部的幹部和黨員，多半是雜湊起來。一部份是以前曾經與黨（同盟時代）發生過關係，但是後來又脫離或中斷了的。二部份是省縣議會的議員，臨時投過來的。一部份是十三年廣州方面派來的。我們在以前終年都是打仗，對於黨務根本就不很注意。到了那時，雖然形式上是我在領導，但是內部意見，非常紛歧。太凡曾經與同盟會發生過關係的老黨員，就倚老賣老的，在那裏講資格，稱前輩。與中央接近的，就以中央爲後盾，在那裏談革命。議會派的，倚仗地方士紳勢力的背景，專講法律問題。彼此之間，已顯然有了很深嚴的壁壘。我記得在梧州會議時，譚祖庵私自對我說過：「廣西好像一張白紙，你們要寫什麼文章，畫什麼花草，都由你們自己作主，要是弄得複雜，將來問題就多了。」蓋有感於廣州黨務的複雜情形而發的。但他却那裏會知道廣西當時的情形，已複雜得和廣州差不多呢？

當時的工農運動。那時候的黨務，自以宣傳與組織兩項工作爲首要。宣傳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義爲依歸，但是在當時真正了解三民主義的，是沒有幾個人。中央黨部對於主義的宣傳，亦沒有系統性的指示。而且在中央方面的情形，比廣西還要複雜得多。派到廣西指導視察黨務的人，各有各的說法，使得我們實有無所適從之概。所以在廣西各地的宣傳工作，也就極不統一了。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言論更爲歪曲。譬如對工的宣傳，就以勞工神聖爲他們唯一的宣傳口號，認爲其他各界都不及勞工地位的高貴。我記得在某次民衆大會裏，一個女同志出來演講。她說：「工字是不出頭的。工人一向吃人家的虧。現在是工人世界，工字要出頭了。以前是資本家說話，現在輪到工人說話了。」我站在旁邊聽了很好笑，我想：「工」字如果寫出了頭，不是成了一個「土」字了麼？其幼稚的情形，概可想見。在農民方

而，自然以「耕者有其田」爲最重要的口號，好像一切土地的所有權，全應屬於耕田的農民。於是打倒地主土豪劣紳的口號和行動，就隨而發生。弄得社會上很不安起來。在十五年七月間，因爲北伐軍急於出發，需要的伙子很多，軍隊一時僱不及，在南甯附近，就發生拉伙的問題。（按：廣西軍隊，在省內作戰時期，拉伙是極少的事）。有個土運同志，名叫陸幾沉的，奔走駭汗的來報告說：「因爲軍隊拉伙，工友非常憤恨，就要罷工暴動，請立刻設法制止」。我說：「你們沒有盡到僱伙的責任，使工友很踴躍的担任革命北伐軍的運輸。我現在就派你負責辦理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盡到這個責任，就不能禁止軍隊拉伙。因爲他們是爲了革命北伐，而急於出發，爲完成革命工作，而勉強少數的人去担任運輸工作，那是應該的事情阿！」他說：「他們要暴動怎麼辦呢？」我說：「暴動！這恐是你說的話，或者是你要他們暴動。你不要以黨的立場來打擊黨的最重大的革命工作，更不要拿這些話來恐嚇我，我不是這些話可以恐嚇得倒的呀！」自此以後，工人的氣焰，（其實是那些工運人員的氣焰）低了許多。在農運方面，就更成問題了。廣西貴州邊界上的東蘭縣，有一個名叫韋拔羣的，一向在廣州中學讀書，受過農運的訓練，他並不經過廣西省黨部省政府的許可，暗地回到東蘭，組織農民協會，並且慘殺地注，實行土地農有的辦法。那時廣西軍事，剛才平定，這種突起的異罪，我祇好派兵進剿。由駐百色的劉旅長派團長龔受儀與縣長黃守先將縣城收復。韋拔羣退入武篆山內，仍舊在那裏煽動農民，等到軍隊撤退，重複集合千餘人，再陷東蘭縣城。並以東蘭農民協會名義，電國民政府，說是：「土豪劣紳勾結縣長，壓迫農民，槍殺黨員，要求中央電令廣西省政府查辦。其實那裏的土豪劣紳，已被他們殺的殺了，趕的趕了，縣城也被他們佔領了。在當時容共農工兩大政策，正在實行的時候，不但廣州方面對他們這種舉動很爲重視，就是在本省的黨部裏面，也有很多人與他們表示同情的。我爲審慎處理起見，乃由省政府省黨部第七軍軍

部各派員組織調查委員會，前往調查，共同處理。並定出解決東崗農民協會羣拔等之農紳鬥爭辦法八條，這八條辦法的全文，現在雖然記不清楚，但總是遷就農民方面利益的居多。這等辦法，無非爲息事寧人，不顧事體擴大，求得一時相安而已。自從東崗農協問題解決之後，其他各縣的農民協會組織，乃有加擴展。尤其是特別武裝的組織，着着進行。南寧附近的農協，是直接受省黨部農民部指導的，常將幾百幾千人，肩着刀矛鋤頭，到南寧來開會。農民部長陳協五，是前清末科的一個舉人，已經四五十歲了，終日背着一頂草帽，穿着一雙草鞋，扮成農民模樣，同他們混在一起，他對我說：「農民已經武裝起來了，你有洋號，我有螺角；你有洋槍，我有刀矛，不但地主豪劣紳奈我不得，就是上萬幾千軍隊，我們也不怕！」他這種說話，好像是對我一種示威和恐嚇。我心裏想，你怎會變得這樣快，又怎會有這樣的幼稚？我有六七年來的鬥爭經驗，難道就被你嚇倒了麼？因爲他是一個鄉黨的前輩，他正染着了民衆萬能的狂熱病，我祇好笑笑，不和他分辨什麼。

宣傳鬥爭的激烈。黨的宣傳工作，都以民衆爲對象，而事實上無論口頭的宣傳，文字的宣傳，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却是彼此針鋒相對地，在那裏爭論。民衆聽了宣傳者的講演，有沒有了解所講的意義和發生什麼感想，演講的人也未必知道。但是民衆都是一樣的拍掌，一樣的吶喊。有人說：「民衆的意識和行動，多是被動的，盲從的，宣傳的效果，就是從這裏發生出來」。這話不無相當理由。梧州的民團日報是中共份子龍啓炎、周清主持的。對於黨工政策，自然竭力宣傳。後來省黨部宣傳部又辦了一根農民日報，好像是專門以農民爲宣傳對象的報紙，但是大家就打着筆墨官司來了。大家都以宣傳黨工政策爲中心，而說法却完全兩樣。南寧的民團日報，起初是中共份子陳勉恕主持，因爲祭孔的風潮激怒了。省黨部改派毛飛去當社長。他的太太唐竹村及現在東南日報的社長劉湘女，都在那報館裏擔任工作。宣傳理論的衝突，是國共分裂的先聲。我記得有一次何民魂寫了一個宣傳的小冊子，封面的標題上，作

了一個這樣符號似的「十」圖案，在省黨部委員會議裏，陳立亞委員就提出質問，說這是右傾的宣傳表示。我那時正担任宣傳部長。對他說：「不是不是它的内容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他說：「不管內容怎樣，那東西向右，就是表示右傾，廣州方面出版的冊子，那東西「十」都是向左的，他要宣傳部將封面式樣改過。我說：「你立在正面上看，不是向左的麼？」我不管他怎樣，把他發行出去，弄得他們很高興。其實我心中並沒有左和右的問題存在。寫的人也未必有左右的意思存在，而他們就在這小問題上着眼，好像汪精衛醉後要我向左邊走，走到路不通行一樣的有趣，這就可見那時鬥爭的尖銳化了。

新舊思想的衝突 青年運動也是那時候的一種社會狂潮。不過知識青年畢竟是理智的，他們雖然是力求思想的解放，但是除了少數地方發生罷課風潮之外，都沒有很大的問題。而且解除禮教束縛的運動，已不自那時始，在社會上也不覺得怎樣稀奇。不過一班男女青年工作同志，對於戀愛問題，要比以前更解放些。記得在梧州北山公園，有兩個青年男女同志，因戀愛行爲，被人撞見，起了一次很大的風潮。老一輩的人，尤其是反對本黨及各種民衆運動的人，都起來抨擊。甚至駐在梧州的軍事重要幹部，也捲入糾紛的漩渦，這本是一個私人的平常問題，但是廣西的風氣，比不得他省的開通，更比不得外國的開通，男女雙方，公然在公園裏發生戀愛的行爲，總不免有些驚世駭俗，難怪會鬧出很大的風潮來！自從這個問題發生之後，無論工農和青年，都有一個新舊對峙的壁壘。尤其是農民地主士紳來得更厲害，他們不但有勢力，而且有武力，政府若不善爲處置，則像東蘭那樣流血的事件，就可以到處發生。我處在這種環境當中，應付頗爲困難，費了許久的考慮，認爲應先就領導的人事上，予以調整，則下層的糾紛，自可減少。於是不動聲色的選擇那些最易引起問題的人，組織一個北伐軍的慰勞隊，不論其背景如何，一起放在裏面。由第七軍政治部主任黃日葵率領他們出發，到武漢去慰勞，順便就留他們在前方工作。這樣，在本省境內便少了許多事情。但是仍有許多不肯出去的，他們是沒有什麼名義，而仍是隱藏

在工農的羣衆裏，更積極地繼續幹他們的秘密工作。

我對於中共份子的態度 那時，廣東方面的情形，比廣西更爲複雜。北伐軍雖然佔領了武漢，而國共的裂痕，更因此加深，已經成爲公開的事實了。我在廣西方面的態度，對人，無論國民黨的同志也好，共產黨的同志也好，我都是一樣的親近。除了他自己公開承認之外，根本不去研究他的背景。對事，祇要是合理而做得通的，我也不論誰的建議，都一樣的採納。所以中共份子，有許多關於他們內幕的話，也肯對我說，也許是有拉攏和利用我的企圖，存乎其間。當武漢鬧得最厲害國共分裂以前不久的時候，有一個中共的份子秘密對我說：「你不想比蔣介石享受更大的名譽，得到更多人的擁護麼？」我聽了愕然不知所謂。他說：「現在具有完全統治一省能力的人，祇你一個，廣西內部的問題，一切都由你主宰。你要如何做，就如何的做，祇要你下一個命令，實行 孫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則廣西極大多數的人，都要真誠的擁護你。你簡直同蘇聯的列寧一樣的伟大。而且廣西是一個貧窮的省份，現在一切經費的來源，以烟賭捐的收入爲大宗，這在革命政府的財政上，是不應該的。如果不要這種收入，又無其他的抵補，則廣西建設，即絕無發展的可能。如果能夠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由農民手裏徵收百分之三十的生產稅，農民一定是很願意的。廣西全年土地的生產額，照人口推算，約爲五千萬担至六千萬担。則政府每年至少可收一千五百萬担穀子，每担以三元計算，可得四千五百萬元，比你現在的收入要增加兩倍，豈不是一切建設的財政問題都解決了麼？」他這番話，乍然聽了，不無相當理由，並且是相當動聽的。我並不立刻回絕他，祇是拿事實問題來反問他。我說：「廣西全省有幾多地主，有幾多自耕農，有幾多佃農，你可知道？」他說：「不很詳細，但據估計，總是佃農最多，自耕農亦不少，地主最少。」我說：「地主主要反抗這個政策，是不必說了。就是自耕農，也不會服從的。因爲過去的租稅，至多不過十一之徵，現在忽然要徵到十分之三，他們願意麼？這班自耕農，多是與地主站在一條戰

線上的，他們的力量，也是不可輕視的啊！」他說：「各地農民協會，多已組織了，爲他們本身的利益，一定能夠受我們的指導，而拚奮鬥。此外，還有政府的軍隊，作他們的後盾。那些士兵，都是佃農的子弟，也一定要爲他本身利益而努力。所以這種政策的推行，是沒有問題的。」我說：「據我所知，廣西的自耕農很多，要是和地主聯合起來，總要佔全農民的半數，而且他們本身的勢力武力，比到佃農，不知要強到多少倍。士兵當中，也不能說完全是佃農子弟，還有很多自耕農的子弟。同時，士兵們對於階級鬥爭是毫無認識。歷史養成的服從長官命令的德性，一下子那裏就會得改變過來。至於官長呢，十分之九是家裏有幾畝田的小地主子弟，其餘十分之一沒有土地的長官，既然當了官長，也想置幾畝田，作他下半世的生活基礎。必不會盲目服從我的命令，去毀滅他們既有的生活基礎與生活的希望。甚至因防我剝削他們的權利，而仇視我，反抗我，到那時候，我又怎樣辦呢？我本來也是一個小地主，縱然我能超階級的不顧成敗的做去，他們就肯跟着這樣做麼？恐怕於事無濟，反要弄到遍地流血，全省紛擾，比民十至民十五間的情形，還要混亂得多呢！你要知道，我們經過五年的苦鬥，才得到今日這個局面。萬一因此而再鬧出四分五裂的慘禍，這個責任，我能負得起嗎？」這番話，說得他無話可說。但我對此事，祇當作一番有價值有興趣的辯論。對他本人，根本談不上什麼善意惡意的。

與李任潮秘密赴上海 到了十六年的二三月間，情形更惡化了！東蘭韋拔羣的案件，雖定了八項的處理辦法，祇能夠苟安一時。至是他更露骨的宣傳共產主義，實行共產主義。本縣及鄰縣未曾參加的人，都紛紛電請剿辦。我仍令縣查辦，得到許多事實的證據，與他們電控的事實完全不同，而我們的黨內意見，更爲紛歧。無論那一個民衆團體與政府機關都暗地形成兩個戰線。我個人站在兩條陣線的上頭，可以說那時候雙方都擁護我，雙方都懷疑我，因爲他們都不能透澈明白我的最後態度，大約是十六年四月的二二日，李任潮有一個急電給我，要我立刻到廣州去。我不知發生什麼急變，亦不能查問甚麼理

由，便立刻專輪到達廣州。那時，我的妻子正是生產大兒德芳不久，住在珠江頤養園。所以我到廣州，並不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到後與李任潮見面，他很秘密的出示蔣先生由南昌來的電報，要我們到上海和他見面，商量重要問題。電文內雖不說明什麼問題，但問題的輪廓，我們都已知道了。李任潮問我的意見，我將廣西內部現時的情形告訴他。他說：「到香港上海的船票，都準備好了，下午就要動身」，並關照我行跡要非常秘密。我回家對我妻子說明要立刻秘密去上海的話，他說：「你那滿面的長鬚，那一個不認識你？掛一個招牌在面上，還說什麼秘密的行動呢？不如就將鬚剃去吧！」我聽了她的話，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匆匆忙忙的將鬚剃去。這六年多相隨不捨的東西，至是不能不割棄了。心中不免有些難過。我對妻子說：「把牠保存起來，作爲一個紀念物。」她說：「還保存什麼，投到江中就是了。」他的心中好像同我是另外一個想法啊！

在上海舉行清黨會議，我上了省港輪船的泰山號，李任潮已在船上了。同行的似乎有馮竹萬、陳孚木兩人，此外還有一兩個隨從，開船後，夜裏十點多鐘就到了香港，當時就船過船的搬到比亞士總統號船上。我自民國四年冬天南回時，經過了香港，已經是十二個年頭，沒有再到此地，不知它現在有了什麼進步？又不知在大罷工風潮之後，受到什麼影響？可惜沒有機會去玩，祇能站在九龍碼頭船上甲板，遠望香島的山光水色而已。船在第二日十點多鐘開行了。我當學生時代，來往港滬，坐的都是太古仔（粵語太古一二千噸的小船）。一出鯉魚門，就感覺顛簸不堪，現在坐在一二萬噸的總統號船，比較平穩舒服得多。一方面是物質的進步，一方面是生活的變化，就覺得前後完全兩樣了。船上的侍役告訴我們：「洪兆麟就是在這船上被刺死的，這行刺的烈士，叫做韋德，他刺洪之後，就舍槍自盡。他刺洪的動機，有的說是激於義憤，有的說為報私仇，究竟爲的什麼，他已身死，也就無從確定了。」他的同行們（侍役）都非常敬重他，在他們公共集會的場所，還懸着他的小照。輪船到了上海，大約是四月的七

八號，船尚未靠碼頭，就有上海市長張伯璣（定璠）乘了一個小火輪，並有些武裝兵到來接我們。我們過了小火輪，他說：「現在情勢非常緊張，不可到租界裏去住，以免發生意外！」即將小火輪一直開到到高昌廟的碼頭，然後乘汽車到兵工廠內北伐軍東路軍白劍生的前線總指揮部裏面。李德鄰也住在那裏，大家見面之後，自有一番歡敘。那時蔣先生亦已由南昌秘密到達上海，駐在什麼極秘密的地方，沒有人知道。不久，蔣先生也到東路前敵指揮部會面。當時，除了我們報告一些兩廣的情形之外，對於清黨問題還未有如何的決定。約摸是第二日或第三日吧，就在離法租界不遠的舊市政府內，舉行清黨會議，由吳稚暉、蔡子民、張靜江、李石曾等四監委提出一個對共產黨破壞兩黨團結的彈劾書，作為法律上的根據，決定舉行清黨運動。並否認武漢的中央，另在南京召集中央全體會議，組織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當日參加這個會議的人，除蔣先生外，可以記憶的，中央委員是吳稚暉、蔡子民、張靜江、李石曾、陳果夫、李任潮、李德鄰及我，不過十來個人，另外還有軍事的首長，如白劍生等數人。會議的形式很簡單，也沒有什麼辯論，就很快的決定了。

廣西首先實行清黨。正在開會的那時間裏，李任潮和我，接到鄧演達由漢口發來的一封信，大意是責任潮同我，身膺革命後方疆圉重寄，未奉中央命令（指武漢中央），擅自參加非法的會議（指上海清黨會議）要我們顧全革命的歷史，不要違犯了黨的紀律。含有責難和規勸的語氣，我覺得他的用意，未嘗不誠懇，但大局已經決定，以後的友情，已化為敵意了。我們亦不予答復。清黨會議結束以後，我就打電報回廣西去，將情形告知黃旭初伍展空等。因為我離省後，一切的軍事問題，都是他們在那裏支持。他們接得電報之後，在四月十二日立刻就開始行動，將梁六度等十三人逮捕，並通緝黃家植等數人。所以廣西的清黨，比其他省份還早三天。在這十幾個逮捕的人之中，照我平時的觀察，除了少數幾人之外，大多是投機份子。就他們的歷史，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政治慾望，他們的生活行動來看，都不像

是實行工農專政的人物，而是要藉此造成他們的社會地位，進而獲得政治上的地位，以遂其私圖。因為他們過去同軍政方面對峙得太尖銳化了，自然是首先被注意的目標。所以在軍部方面，不等到我回來，就將他們處決了。也許怕我回來之後，其中有好幾個人，我會把他們釋放了。在一個時代方向大轉變的時候，往往有許多無辜的人被犧牲的。這是他們的不幸，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幸運，因為替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名字了。同時上海方面南京方面，都開始行動，一時那些叫囂市上的烏合組織，好似蠅萃一樣，一趕就散，並不要費很大的力氣。

赴蕪湖軍次處理第七軍政治工作 大約是四月十六七號，蔣先生邀我們同車到南京。這時，南京克復未久，劫後離亂痕跡，隨處都可以看到。我們由下關一直乘汽車到前清總督衙門（即以後的國民政府），沿途狹隘的街道，還與我十二年以前見到的一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就設在那裏，連普通的陳設都沒有。我和朱一民參謀長住在一個空闊的大樓上，除了兩張床鋪及兩張辦公桌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實在寂寞得很。這時，第七軍駐在蕪湖附近，蔣先生與李德鄰都希望我到部隊去說說話。因為我是七軍的黨代表，一切政治工作人員，直接間接，均與我發生關係。而那時候軍隊的政治工作，的確是部隊的潛力發動機，在一個重大變革之際，官兵心理，總不免有所動搖或迷惑的地方。所以要我去對他們說話，正是希望使軍心安定的意思。我乘專輪到了蕪湖，同夏煦蒼、胡宗鋒、鍾祖培、李明瑞等團營長以上的人，都見面了。我除了對他們慰勞之外，並將清黨的意思向他們說明，他們對我說：「在未聽得到黨代表報告以前，一切情形都不很明白。軍長（即李德隣）又不在軍中，突然接到清黨的命令，大家都很懷疑，現在才明白了。我們對兩公都是一樣服從的。現在兩公的意見一樣，我們就放心了。」他們又說：「自從這個問題發生之後，部隊的軍風紀都渙散了許多，真是可惜！」我隨後將政治部應留應去的人員決定了。應留的叫他們安心工作，應去的亦不為難他們，使自由離開。在人情上，這些罷努力其

患難的人，一旦將他們無情的拋棄，不免感到難受，這樣的處置，總算是一個公私兩全的辦法。我在蕪湖工作完畢，仍舊回到南京，將一切情形，向蔣先生及李德鄰報告，他們都覺得很放心。

風雨中驅車遊西湖 我在南京，既沒有什麼名義，又沒有什麼工作，頗感苦悶。便要求回到上海走走，但說明仍回南京來的。到了上海，住在東亞酒店。我於十二年前經過上海的時候，大馬路的三大公司，正在打地樁，開始建築，不料現在已經是樓接雲霄，遊人羣集；成爲上海或中國那時最大的建築物了。其他的地方，也正在積極的進展中，與以前已多不同。在那時候，廣西屢次電促我回去，我就發電報告蔣先生，不再回南京去。蔣先生命王世和同志帶了一封親筆的信給我，信內大意說：「革命正在危殆的關頭，萬一不幸，則國族淪亡，吾等皆負其責。」無非要我急回南京的意思。我當時也的確困難，我負有廣西一省黨政軍的全部責任，在這個大變動之下，不知廣西變成如何的狀態，心中頗爲憂念。於是我將必須回去的理由呈復蔣先生。趁着未起程前，抽空赴杭一遊。在滬杭路南站上車，買的是頭等票。車廂上的沙發椅，不知是那方面的軍隊，將那皮面扯去了，祇剩下一個鐵架子。窗子上的玻璃，也打碎了。在風風雨雨中到了杭州。車中遇見杭州市的公安局長章烈，是我的同學。我清楚的認識他，他好像也有些認識我，但是我因爲行動的秘密，時間的短促，不與他招呼，恐怕引起無謂的應酬。到杭後正值大雨，雇了一輛汽車，沿西湖各處作了一個極迅速的巡視，並到街上買了些綢緞，在舖子裏吃了一頓飯，就乘下午的火車回上海去了。雨中坐汽車遊西湖，它是怎樣一副面目，實在弄不清楚，也算是我平生一個有趣的故事！

廣西二全大會的三項重要決議 我匆匆趕回南寧，大約已是四月下旬，所有事務，他們都處理得很妥當。除了十幾個人遭遇不幸之外，其餘都不加追究了。自此之後，廣西的黨務政治，在人事和組織方面，都有些更動。省黨部因爲第一屆執監委員會任期已滿，依照本黨總章的規定，三月間召集第二次全

省代表大會，檢討過去黨務工作，並選舉第二屆執監委員。因為兩黨時有鬥爭問題發生，所以人事必須調整，人事的調整，亦可以說就是清黨的先聲。

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我和黃旭初、伍展空、盤珠祚、黃華表、葉光燾、俞作柏李偕年、黃同仇、曾象賢、馮冠倫等十一人，當選為執行委員，蘇民、劉嘉彤、葉樟青等三人為候補執行委員，黃蘇、朱朝森、陳錫光、蒙民偉、黃崑山等五人為監察委員。執行委員會除第一屆分設各部之外，並加設訓練部，專負訓練黨員之責任。當時互推我為訓練部長，黃華表為宣傳部長，盤珠祚為青年部長，俞作柏為農民部長（俞不久辭職以伍展空繼任），黃旭初為工人部長，馮冠倫為商民部長，劉嘉彤為婦女部長，薛文為組織部長，在這一次代表大會裏，有三個重要的決議案：第一，是將全省的田賦附加一倍，作為教育經費，這是全省人民非常擁護的。因為廣西教育，素稱落後，若不寬籌經費，將無從發展，而且當時廣西的賦額很輕，附加一倍，並不為重，這是廣西教育的奠基石。第二，是澈底的整理黨務，將所有跨黨份子，並那些投機份子土豪劣紳一併清除出去。整理的結果，全省的黨員，減少了一半，大約不到兩萬人。此後黨的糾紛，以及黨政的糾紛，就大大的減少了。第三，是澈底實行本黨的二五減租政策，此事當時無論在黨政方面，或社會方面，都有些人會替地主說話的。以為清黨之後，是不必再為農民做這個工夫。我對於這種意見，很不以為然。因為清黨運動，僅是對共黨的制裁問題，我們二五減租的政策。並不因而改變，更惟有使農民能獲得真正的利益，然後可以安定社會人心，免致中共藉口。所以我對於這個意見，非常堅持，絕對不肯放鬆。我並會另訂一種辦法，另由一個委員會去處理。並為顧慮梧州、潯州、玉林各屬，地主多，租額過重，糾紛必更多，特派李偕年同志主持其事，務必澈底解決。地方上見我如此堅決，也就很順利的進行。所以我很願慮會發生問題的那個地方，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這是我衷心引為快慰的一件事。不久，省黨部的執監委員奉中央派赴各區任指導的工作，政府

方面亦因黨的問題而局部改組。俞作柏辭農工廳長職，出洋考察，由蘇民代理。旋將農工廳撤銷，關於農工行政，歸併於民建兩廳辦理。雷沛鴻辭教育廳長職，出洋考察，由黃華表代理。

東蘭的韋拔萃，自清黨之後，又大爲活動，政府雖屢經派兵鎮壓，仍未能杜絕根株。到了十八年以後，廣西政局變動，遂與李明瑞、俞作豫等連爲一氣，在左右江一帶組織蘇維埃政府，完全揭露其真面目。然因此反而大失各地民衆的同情。後被省軍壓迫，不能立足，而挺走江西，與中共合流。這股廣西的「土共」，卒爲江西的中央所解決，這是後話。

赴南京參加中央特別會議 大約是那年的五月底，我又到南京去參加中央的一個特別會議，及徐州軍事會議。因爲自四月十二日清黨之後，南京方面，僅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與武漢形成軍事的對峙形勢，中央黨部及中央政府的重大問題，尙未解決。在政治方面，武漢仍舊擁有多數的中央委員，與中央的名號。在軍隊方面，寧方有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第七軍、第十軍及兩廣後方之四、五、七等軍的實力，漢方則有第四軍、第八軍、第九軍、第十一軍的實力。馮煥章（玉祥）的西北軍自參加革命之後，雖然出兵到了洛陽鄭州，但是對於清黨問題及寧漢兩方尙未有顯明的表示，情形還是狼狽。經過了一段的時間，有好多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也就回到南京來。究竟到了多少，是否過了半數，我就記不清了。於是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在南京成立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並奠都南京，與武漢方面形成政治上的對立。但軍事上，仍未至破裂衝突。這時孫傳芳在山東，張作霖在鄭州以北，兵力尙很雄厚，大敵既當前，內部又是糾紛重重，情勢頗爲險惡。於是遂有人提議，寧漢雙方，同時出兵北伐，南京沿津浦路出兵，武漢沿平漢路出兵，先解決了當面的敵人，然後再解決內部的糾紛。因此乃有徐州的軍事會議。蔣先生及許多與軍事有關的人都到了徐州，希望馮煥章親來參加，而馮氏并未親到，結果並不十分圓滿。尤其武漢方面的謠言很多，說寧方已與孫傳芳勾結，藉口派兵向長江下流壓迫，孫傳

芳部亦着着向南進迫，遂無結果而散。以後遂有南京龍潭之大戰，與西征之戰事。這都是徐州會議所演變後的結果。

我回到廣州，害了很厲害的肺膜炎症，留在廣州養病。那時廣州的兵力不敷分配，李任潮要調兵到廣東。不久武漢清黨，四軍分裂，葉賀回粵，我又奉命率兵迎擊葉賀，而連續不斷的作戰，直至民國二十年，我方跳出了這個漩渦。這都是國共分裂的前因後果，回憶起來，真是國家歷史上一個大慘劇呵！

回憶辦理黨務經過的感想 我自入黨而當選中央委員，而辦理黨務，到現在已經廿二年了！我在宣統二三年至民國十二年這一個階段裏，雖有革命的意志與行動，但都是本着個人的良知良能，並未參加了黨的組織，與接受黨的訓練，直到十二年，才加盟入黨。不久，就被選中央委員，可以說不是先有個黨的意識，參加黨的組織，而後才有革命的行動。而是我個人先有革命的行動表現，然後才加入了黨的組織。關於這，不但我個人如此，就是現在黨裏很多的高級幹部同志，也大都如此。但因此，就很容易使個人的意志行動，影響黨的意志行動，這種情形，雖然在一時事實上不可避免，而在事後必須設法予以補救。照我辦黨的經驗來說，本黨所吸收的黨員，僅僅是注重他入黨前對於黨的傾向和認識如何，而不注重入黨後之改造與訓練，所以一個黨員在未入黨之前，與既入黨之後，他的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分別，這便是缺乏訓練的緣故。尤其沒有統一的進步的指導和訓練。在清黨運動之後，雖然各省黨部有訓練部的組織，但不久又撤銷了。在廣西曾經開設過黨務學校，訓練黨的幹部，但並沒有訓練過黨員。姑不論黨校的內容怎樣，而就表面上觀察，確已收到了若干效果，現在廣西好些黨的幹部，都是那時候訓練出來的。這可證明訓練的效果，也可反證沒有訓練的缺點。

黨是一個政治團體，要求他能不斷的進步，黨的成員，必須不斷的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甚至要不斷鼓舞其鬥爭的精神。古人所謂廣收、慎選、勤教、嚴繩四個用人的原則，黨的人事方面，是同樣適用

的。黨員的廣收，我們是做到了，候選却未能做到。我記得汪精衛在梧州宣傳工作人員養成所講演，曾舉洪兆麟的笑話。他說：「總理要陳炯明部下軍官入黨，有一日，洪兆麟向總理報告，說是全師都入黨了」。當將黨員名冊呈上，就是他全師官兵的名冊。到後來，背叛總理襲擊總統府的，也就是洪兆麟這一師的官兵」。可見廣收而不慎選，已不是良好的辦法，若不能勤教嚴繩，就是慎選得來的，也要發生問題。過去本黨對於黨員未能做到慎選、勤教、嚴繩的工夫，不能不算是組訓工作上一個極大的缺點。

十六年的清黨運動，固然是本黨的不幸！亦是國家的大不幸，如果一面清除共黨，同時復將本黨裏的腐化落伍份子逐步淘汰了去，則黨的進步，必非淺鮮。可惜結果並不如此。因為清除共黨的緣故，反將許多腐化落伍份子吸收進來。這樣的做法，雖然亦曾得到一時之利，同樣的也受了不少的害。因為這樣兼容并包的結果，政治上經濟上便不能有顯明堅定的政策，來策勵黨員，推進革命，而含糊糊的過了十八個年頭。黨在這種狀態之下，表面上雖然很平靜，未嘗發生什麼糾紛，然而暗潮仍是到處潛伏着。為顯慮黨的糾紛發生，凡事都是遷就敷衍，不敢積極進行，連黨的本身應行的幹部選舉，或是工作批評，都停頓了好久。現在可說是祇有黨部而無黨員，祇有上級黨部的意志，而無黨員的意志，我總覺民主選舉制，不但可以促起下級的進步，亦可以促起上級的進步。可惜這十幾年內都未澈底實施，進步三字，又從那裏談起呢？

十五、十六、十七這幾年間，省黨部對於各同級政府之執行黨的政策，都是處於監督的地位的。政府對於黨部的地位，也相當的尊重。在這種新的關係之下，彼此各盡其應盡的責任，政治便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自此以後，黨政關係，逐漸改變，這不是說政府漠視黨部，亦不是說黨部不與政府合作，而是成為彼此相對的迴旋，不是平行的激進。在這種狀態之下，不但政治無進步，黨務的前途，更不可樂觀

。我們必須在黨的實質上及推動的方法上，急謀改進，然後方可挽救當前所隱伏的危機。

總理的三民主義，及其他遺教，不能視同耶穌的聖經，而是進步的政治指導原則。這些遺教，產生到現在，雖備僅廿多年的時間，但在變動劇烈的現代，這許多指示，與現實情形已經有了很多出入的地方。本黨黨員，應該本着總理指示的原則，悉心研究，在實施的方法上，尤應隨時加以補正，使其隨時代的演進而產生新的政策與辦法。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黨員對主義的認識，與時代的認識，一方面並可刷新社會之觀聽，獲得大眾的擁護，而能迅求實現。可惜二十多年來，我們都是拿它作引證的典據，不是拿它作更進步的基礎。

以上所述，是我寫完我辦理黨務工作的回憶以後的第一個感想，並不是我對於任何方面的批評和不滿。

自從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將共產黨員容納在國民黨的裏面，而國民革命同時有了很大的進展。許多人說：「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展的迅速，是容共的效果」。我認爲並不如此簡單，而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裏面。最重要的，還是由於時代演變，迫使軍閥自趨於崩潰。我們檢討民元以後，至十三年以前，北洋以及各省軍閥的崩潰，都並不是受某一個政黨直接攻擊的影響。廣西陸譚的崩潰，時在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之前。陸譚的消滅，也不是全靠黨的力量。打擊陸譚的主力，是在那個時代中自然產生的一種新力量。這種新的力量，是應乎時代潮流而起，隨時可以接受某一個政黨或某一個政治集團的正確領導，完成其時代所賦予的使命，並不是一件很希奇的事。所以我對於國共的分裂，以國家的立場看，好像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但在時代潮流上看，却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因爲本來是兩個政黨，兩個主義。除非某一個黨將它的組織取銷，將它的主義取銷，或可作比較永久的合作。否則，總是很快就要破裂的。在容共時代，共產黨中人，對於革命的工作，不能說是不努力，然而國民黨的同志，又何嘗不努力？不

過各有各的主張，各爲各的目標而努力。中間有一時，雖然努力的目標，是完全趨於一致，但過了那個階段，便又各幹各的。好像一艘沿途搭客的船，同船的乘客，在某一段行程上，路線相同，但是過此之後，就分道揚鑣，能夠共同到達終點的人，却沒有幾個。不但兩個政黨如此，就是同屬一黨之內，又何嘗沒有這種情形呢？晚近各民主國家的各黨合作，僅是政治上一時的各黨協議的分工，而不是各黨澈底的溶合。但各黨政治上的協議，是臨時的，而各黨組織的存在，却是永久的。

國共的合作，並不是兩黨有政治上的協議，而是兩黨組織上的混合，其間誰想佔便宜，誰不想佔便宜，誰含有惡意，誰不含有惡意，我都不去追論他。廣西早在十五年的一月，就有韋拔萃的佔領縣城，反對政府，以後更不斷的擴大起。當時雖有黨政軍三方派員調解，而終無結果。平心而論，韋拔萃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也許不能不有此種作風。但與我們的政治體系，互相抵觸，無論如何，不能容許他這樣的胡幹。我對於好些中共的同志，在未破裂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到了兩黨真正衝突的時候，彼此的友誼，就無法維持了！黃日葵同志（第七軍政治部主任）臨死的時候，對人說：「假使不是黨的關係，必不致和我分離，而真誠的願意爲我始終努力的。」在我又何嘗不是這樣的感想呢！可見在感情上講政治，往往會陷於不幸的悲痛。流血的悲慘，與感情上的痛苦，都是同樣的不幸啊！現在正值國家危難的時候，團結是必要的，合作是必要的。以前的痛苦與不幸，已經飽嘗過了。我想要團結合作，定要抱定不破壞統一的目標，在避免流血不重感情上去講求，才有希望。這就是民主精神的真諦，亦是全國人士所早夕漸求者也。這是我寫完以前辦理黨務經過後的第二個感想。

五
十
回
憶

十 新粵桂戰事

標題的詮釋 這裏所謂「新粵桂戰事」，自然是因爲以前曾經有過舊的粵桂戰事，所以特別標出一個新字，以示區別。蓋自民國五年以後，一直到民國十二年，這七八年間，不是廣西的軍隊去打廣東，便是廣東的軍隊來打廣西。在這種循環的內亂當中，我們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是分不出甚麼正統與叛逆，是非與曲直，而祇是歷史事實的蛻變，社會現象的反映而已。關於以往的事實，因爲我沒有主動的參加，祇能在前面作概略的敘述，爲使寫作界限明顯起見，名之曰「舊粵桂戰事」。自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兩廣的戰事，仍舊繼續的循環的發生，雖然作戰的地點不限兩廣，而擴及於湖南江西，但考其戰事發生的原因，總由於兩廣問題而引起。作戰的雙方，亦是兩廣的部隊。因此我仍本着前面所說的立場與觀點，名之曰「新粵桂戰事」。這是我在追述這一段事實的經過以前，要首先聲明的。

兩廣自民國十五年革命之後，似乎不應該再有戰事發生，而事實上戰爭又延長四五年之久。這不但局外人不易了解的謎，就是我們局內人，亦祇是莫名其妙打來打去。現在追想當時所謂原因與理由，不過是一種正面的直覺的臆觸，此外還有很重要與很微妙的因素存在裏面。此種因素的醇發，正好成功那些正面的直覺的劇本演出的原因與理由。

殲滅葉賀之役的經過 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底定南京，因國共分裂，發生了清黨運動。但是共產黨在廣東方面的潛勢力，還是很大。尤其是在東江方面的海豐陸豐等地，在他們操縱之下，各處的農民組織，已普遍發展，繼而發生了武裝的暴動。這時廣東方面的國民革命軍，大多數已出發北伐，後方非常

空虛，本黨廣州政治分會的主席李任潮，并負坐鎮革命後方根據地的責任。我也是政治分會委員之一，因患肺膜炎，在廣州養病。李任潮因為廣東情形複雜，兵力不敷分佈，是在年四五月間，要我派兵一師到廣東增防。當時廣西內部，很是安定，除了李總鄰率領第七軍北伐之外，後方還留有伍展空、黃旭初、呂煥炎等三個師，及幾個獨立團，担負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自綽有餘力。我在公館上，私情上，都不能不接受李任潮的意見。於是派黃旭初一師到廣東，駐在北江附近。這時武漢方面，汪精衛與共產黨已經鬧翻，第四軍各師亦在九江、南昌附近分裂。張向華（發奎）、黃琪翔一派的部隊，沿贛江由贛回粵，陳真如（銘儀）、蔣光鼐、蔡廷楷一派的部隊，由贛東轉入福建，葉挺、賀龍、周士棣一派的部隊，與第三軍之朱德部合流，公開共產旗幟，由撫河入粵都、瑞金、會昌、鄒都、鄂烏、蕉嶺、平遠、下湖梅進駐東江，與海陸豐之農民軍會合，進圍廣州。當時廣州方面，對張向華之回粵，自然表示歡迎，而對於葉賀等，即派隊阻擊。由錢嘉尹（大約）率領兩師，進駐會昌，黃旭初一師繼續向粵都前進。錢部在會昌趨敗，退至信豐。黃師在粵都初戰亦不利，轉守會昌以南之筠門嶺，與之再戰。葉賀見我有備，乃由筠門嶺轉入福建之長汀、武平、上杭，有由大浦縣折入湖梅之勢。李任潮見前方失利，要我加兵向贛南增援，並要我担任第八路前敵總指揮名義，親往指揮。那時我正當大病之後，尙未完全恢復健康。但局勢嚴重，亦祇好勉強出發，親率呂煥炎二師，續向贛南挺進。行至南雄，知葉賀部隊已轉入圍境，於是我命黃旭初師退至鄒烏附近集中，錢嘉尹部經三南至梅縣附近集中，我親率呂煥炎師，經信豐，進駐鄒烏，以防葉賀由蕉嶺、平遠折入梅縣。同時廣州方面，亦令陳伯南、薛伯陵兩師進駐興寧、五華。我到鄒烏後，繼續進駐平遠、蕉嶺。因情況不明，仍派營長黃鶴齡率兵一營，晝夜兼程前往大浦，實行威力搜索。據報：葉賀全部皆由大浦三河壩沿水路直下潮州、汕頭，三河壩僅有朱德、周士棣等部留駐。該營並擄獲彼政工人員男女數十人，訊問之下，情況至爲明瞭。我得此情報，即全部進駐梅縣，計

劃除以錢蔭尹部由梅縣進至松口鎮，牽制朱周在三河壩部隊，並掩護我之側背外。我率黃呂兩師，越過潮州與梅縣間之高山，鰲魚嶺，直趨豐順縣，然後東進佔領潮州與三河壩中間的留隍圩（距潮州六十里），將潮州三河壩間水路交通線韓江截爲兩段，使葉賀前後不能呼應。同時並要在潮令陳薛兩師進駐湯坑、揭陽，與我軍會同向汕頭、潮州攻勢。廣州方面對於我這計劃，認爲太冒險，蓋慮萬一葉賀再有部隊由三河壩向梅縣進攻，則我腹背受敵，勢難應付。並引以前戰例，凡進入潮汕不守梅縣者，無不失敗爲言。殊不知我在前方，情況非常明瞭，葉賀幾乎全部由水路下潮汕，陸上必不注意，我乃圍而襲之，必有致勝把握。幾經爭論，始照我的計劃實行，果獲全勝。此役成功，當以黃營情報準確，爲重要關鍵，由此可見情報與作戰關係之密切！

我於計劃商定後，即由梅縣出發，這完全是一條山僻樵徑，平時很少有人行走。山上羅衣至下羅衣中間四五十里，都是崎嶇險峻的山嶺。加以風雨霖霖，人馬擁擠，墜崖傷斃者，時有發現。由梅縣到豐順縣城地崗上的距離，雖爲九十餘里，直到次日黃昏，始得達到。當晚在嶺上露宿了一夜，實爲我生平作戰行軍最艱苦的一次。到豐順後，次日，即東向進攻留隍圩。預料葉賀對此要點，必留兵據守，不意到達時，固無一人。我仍將水路阻絕，以斷其交通。並悉葉賀僅留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及政治人員輜重等在潮州作爲後方補給根據，以防我軍襲擊。其主力則趨揭陽，希圖先將陳伯南、薛伯陵兩師擊敗，與海陸粵軍聯爲一氣，然後回師再與我軍作戰，冀收各個擊破之效。殊不料我方動作迅速，反將彼各個擊破也！

我軍到達留隍圩，次日拂曉，即沿韓江右岸急進，於十二時左右，即到達潮州附近。敵軍在潮城北方高地，築壕固守。我以呂煥炎全部及黃旭初師之一部，向正面攻擊。另由許副師長宗武率黃師一部，繞至潮州城西南火車站，以防其由汕頭方面增援，於是展開激烈之爭奪戰。在這時候，適接陳伯南通報

，謂已於前一日在湯坑、揭陽之間，與葉賀主力接觸，戰況非常激烈，希望我派兵協助。我軍亦因戰鬥正殷，勢難分兵，唯有激勵將士，猛烈進攻，早日攻下潮州，然後分兵向揭陽方面增援。幾經衝殺，至黃昏時候，已將潮城完全佔領，守城敵軍除傷亡外，皆被繳械，並俘獲其大批政治人員，及全部之械彈輜重。次日，即向揭陽方面前進，以夾擊其主力。葉賀等知前後受敵，軍心動搖，亦已為陳伯南、薛伯陵所擊敗。並知潮州已失，不能退回，仍轉向揭陽以南，沿海而西，向海陸豐潰竄，復為陳薛等部追及包圍，全部繳械。其在三河壩附近朱周所部二千餘人，見大勢已去，乃隱竄入湖，投依范石生。蓋范朱皆為滇人也。此時所剩僅千餘人耳。葉賀自南昌出發南下，沿途脅迫民衆相從，號稱五萬之衆，而實際上不過兩萬餘人，至是我全部消滅，這是殲滅葉賀之役經過的概要。

汕頭的社會風氣 我到了汕頭，有一種情形，使我至為驚異！當我們初到的時候，地方士紳都殷勤前來探問，要籌多少軍餉？我說：「我的部隊，政府都有一定的餉項，無須在地方籌餉。」他們聽了我的答覆，好像爽然若有所失的樣子，我當時莫明其妙，何以不就地籌餉，反使地方紳士不高興呢？後來才知道其中內幕。原來汕頭是廣東富庶出名的地方，過去初來汕頭的部隊，多不攜餉項，而是就地籌給。於是就地籌餉，就成爲一種通例。此例一開，就有一般熱心爲軍隊籌餉的士紳，應運而起。他們并不是真心樂於幫助軍隊，而仍爲他們自己的荷包打算。譬如軍隊要籌餉十萬，他們就向商民攤派二十萬，除了交給軍隊十萬之外，其餘都是他們的好處。如果你責問他「何以要攤派二十萬？」他就回復道：「籌餉是沒有一定把握的，需要十萬，必須加派十萬，才可足數。」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是以此爲業的人，就故意誇張其詞，借此機會，混水摸魚，收取他們的盈利。這種陋弊，不但那時候的就地籌餉如此，就是現在各縣攤籌各種經費，何嘗不是如此？公家所得者五，人民所出者十，中間人的好處，實在太多。難怪他們會推波助瀾，歡迎機關部隊，在地方攤派經費或實物了！

據說汕頭是全國白蘭地酒銷數最多的地方，這話也許是就人口比例銷售白蘭地數量而言。因為在那裏一切應酬宴會，白蘭地是一種必需品，由此可見汕頭的富庶與奢侈。所以從前的軍隊，都以得到這個防地爲無上的幸運。但同時在這個地方駐防久了的部隊，又沒有一個不被消滅，也幾乎成爲一個定例。我到了這裏，見地方環境如此惡劣，如果久住下去，不但軍隊本身要日漸腐化，而受天然的淘汰。就是對於友軍之間，也要發生磨擦。況且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一些磨擦的現象，於是我心將部隊調回。

回師廣西 第四軍自葉賀公開分裂之後，下層潛伏的共黨分子，還是很多。他們不得志於軍事，便用挑撥離間的手段，希望內部發生問題，可以獲得利於活動的機會。尤其因爲我是消滅葉賀的人，更仇視得厲害，種種問題，暗地裏都集中到我身上。所有張黃方面的人物，表面上雖然和我仍舊融洽，而心裏已經發生極大的誤會。我見此情形，心裏私忖，若是我的軍隊長居廣東，必定要發生不幸的衝突。而且我軍入粵，原是奉李任潮命令而來，係屬帮忙性質，對廣東根本沒有什麼野心。現在客觀的情勢上，既無駐兵的必要，而又生出許多是非。爲公爲私，都不合算。於是決心將部隊調回廣西，首先令黃旭初師由西江調梧州，呂煥炎師亦陸續集中北江，準備調回。我自己於八月間回桂。當時以爲如此處置，以前有些誤會，縱然不能當面解釋，事後亦必可得人原諒，孰知退讓的結果，仍不能避免戰事，誠出我意料之外。

汪精衛的陰謀 我回廣西後，大約是八九月間，汪精衛陳公博等因爲不容於寧（南京）漢，（漢口）也就逃回廣州。彼以北伐前在廣州及北伐後在漢口政治會議主席的地位，廣州的政分會，自然要表示歡迎。第四軍素來擁汪，支持更爲積極。但是廣州政分會的權限，祇限於兩廣區域，以汪精衛的野心，自然志不在此，而是要另開黨國的全局場面，像民國十五年以前那樣的開府廣州，以與南京的中央政府相抗衡。但因李任潮與第四軍有長遠的歷史關係，未便使用激烈的辦法。故一面製造空氣，說廣州

是太腐敗了，太不革命了，要求革命的真正成功，必須改造廣州的政治環境。一面與李任潮商量，要他自動的改革，也就是要他讓汪精衛在廣州開府的意思。此種內幕的醞釀，我回廣西後，一些也不知道。民國三十三年三月間，南岳會議後，我同李任潮張向華吳梧生（奇偉）同車回桂林，還談起這回事。張向華說：「向任公說盡了話，繼以流淚。」李任潮說：「我始終不知道你們對我說的話，用意在什麼地方？」我想李任潮不是不知道他們的用意，而是不贊成汪精衛再開府廣州，以免破壞北伐的成功，破壞黨國的統一。我又問吳梧生說：「假使我被你們拿到了，會怎樣處置呢？」他說：「恐怕對不起！」我說：「爲什麼恨我到這樣地步？」他說：「在我們看兩廣的問題，你是一個幕後人，所以要先對付你。」我說：「豈不冤枉也？現在你可明白了呢！」大家大笑起來。

十月上旬，我在廣西忽然接到汪精衛的電報，說有種種問題要我到廣州去面商。我在那時以前，對汪不僅毫無惡感，而且相當的敬仰。所以接到電報後，也就毫不懷疑他有什麼惡意，立刻覆電「等輪前來。」並買了很多廣西的土產，如菓子狸海狗魚沙田柚之類，奉送他們，以表情意。十七日中午到達廣州。汪精衛約我下午四點鐘到大沙尾葵園的公館裏見面。我很誠意的依時到達，總以爲見面後，一定有很多重大問題商談。可是到了他的公館，見汪派許多人都在座，祇作見面的招呼，態度非常沉默，似含有極嚴重的心事。尤其是陳公博何香凝的面部，表現出憤怒而張皇的樣子。我覺得情勢不好，又發現李任潮亦不在座，就開口問道：「李任潮不到會嗎？」汪回答說：「任潮急於要赴上海，已乘飛機兵艦起程，我等方才送行回來。季寬先生初到，路上辛苦了，一切事情，待明日商量吧。」我祇好與辭退出。一路上暗自猜想：「李任潮一定被他們用手段趕走了，又把我召來廣州，看他們那種情形，說不定會玩出什麼花樣對付我呢！」當時我這樣的想着，事變之後才知道在葵園時，就有人主張把我扣留，也許汪精衛礙於情面，不便在他的公館內動手，橫直我到了廣州，已成籠中之鳥，釜內之魚，還能逃得出去。

嗎？所以安心放我出門。事後回思，當時我如果被他們立刻扣留，那末除了束手待斃，還有什麼辦法？與念及此，不覺毛骨悚然！

深夜的事變與脫險經過 我回吉祥路家中，就立刻想設法離開廣州，但是省港輪已經開行，陸路更走不通，祇好等待明早再說。那時內子蔡鳳珍產後數月，仍在廣州居住。我倆晚飯後，在陽臺上閒談，忽見馬路上不斷有汽車環繞我的公館遊行，速度很慢，車中的人時常向我公館顧盼。我對內子說：「氣候已很涼爽，為什麼還有人遊車河？（即乘汽車兜風）說時，我心中已有些疑惑，恐怕是他們派來暗中監視我的。我倆談至十一點鐘，已經就睡，忽然馮竹萬進來要求接見。侍從人告訴他，我已經入睡了，可否明早再見？他說：「無論如何，要立刻叫醒一見！」我在樓上聽他的口氣，知道有重要事情發生，於是披衣下樓，兩人在扶梯上相值，他不及上樓，就說：「得到確實的消息，他們今天晚上將有舉動，目標完全在你身上，不管確實與否，今晚一定要避開為妥。我深夜冒險到來，就是為了告訴你這兩句話！」說完，便匆匆下樓回去。我平日對馮竹萬頗敬重。彼處世持重，不苟言笑，說的話自然使我相信。加以今天日間所見的情況，判斷他報導的消息，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會在晚上暗算我。於是急急改裝出門，連我的妻子都沒有好好的安頓，使她們受到極大的恐怖與危險，也就想見我當時急迫的情形了！這正是深夜十一時四十分鐘。

個人走出了公館，茫無所之。後來才想起石祕書楚琛住在西關很僻靜的地方，於是跑到他家裏去，兩人相對默坐，聽候情況的變化。並時時打電話到我的公館去探問，亦沒有事情發生。到了兩點鐘，東北方的槍聲，好像鞭炮一般的響了起來。我家的電話，再也搖不通了，就知道不幸的事件已經發生。我雖然一時脫了險，可是如何逃出廣州，遠成問題。而且在石寓也是一個危險地方，他們不難搜查我辦事人員居住的地方。因此再行改裝，成一個鄉下人模樣，預備黎明就逃走。正在那個時候，就有人來報告

；我公館的衛士，除死亡外，已全數被繳械，我的妻子尚被看守在樓上，辦事處亦被攻擊繳械。我得報後，心裏盤算，必須向江北逃走。因為我尚有師人駐防在那裏，到了部隊，才有辦法。於是同石楚琛向西村車站走去。到站一問，據說：「今天火車停開」。也就知道他們對於北江方面，已有防備。就是三水上路，亦必是同樣的情形。於無可奈何之下，便轉到南澳（西村附近小鎮）石楚琛友人姓胡的家中，耽擱了大半月，想想終不是個辦法。必須轉回長堤方面，看看港輪船的情形，設法逃到香港，才是生路。走到十八浦，見有一班士兵，在那裏警戒檢查坐汽車通過的人，我一手夾雨傘。一手提一包藥材，士頭士腦的走過去，他們竟然毫不留意，被我揚長通過。但是離下午四點鐘開船的時間，還很長，西堤地方，耳目衆多，固然不宜久留，就是在任何地方停止等候，都易啓人懷疑。祇好在馬路上低頭緩步，一面察看他們對社會表示是怎樣的。行經永漢路，見那些政工人員，正在那裏張貼五顏六色的標語。第一條是「歡送李主席北上」，第二條就是「打倒黃紹竑」。以下各條，無非是列舉我種種罪狀，非得驅除不可的意思。反正我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是不會也不可能抗辨的。我於是恍然明白他們所玩的，原來是這一套把戲，覺得好氣也好笑！想我在西南的政治舞臺，本來不過是個次要的角色，現在倒弄得我名聞全國，這也算是他們在替我捧場吧。我看了之後，仍回轉西堤，在離碼頭不遠的一個水菓攤上徘徊着等候船上開船的號令。就要抽吊橋的時候，三步併作二步的，跨上輪船。在船上，碰見熟人甘心衛，他已不認得我了，我以肘觸他，大家才點頭示意。輪船徐徐開動，離開了岸邊，好像一條大魚，擺脫了膠邊的吊鉤，脫險游入大海一樣。而我呢，也正似一隻籠中飛鳥，已破籠凌空，獵者又何從弋獲呢？甘君秘密引我到一個房間裏，我的妻子及家人面現着憂思，在那裏歎坐着。瞥見之下，真說不出是悲是喜！在十幾個小時之內，居然演出這種離奇曲折的情事，是做夢呢，還是在做戲？真連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了。

內人告訴我，昨晚自我離家後，大家非常不安，但又不肯外出。到了兩點鐘，槍聲大作，向衛兵駐所及我臥室射擊。她自己唯有緊抱着小孩，臥於床下。幸樓板係洋灰石子所造，不致穿透，得以保全性命。衛兵繳械後，槍聲停止。即由官長上樓搜查，搜遍全屋，找不到我的影子，大失所望。乃向她查問我的行蹤，她回答說：「一晚飯後出去，並未回來」。直到次日下午，她仍被監禁着，於是對那看守的連長講革命應如何的遵守紀律，這種政治鬥爭，不應涉及婦人稚子的身上。一面將她的金銀首飾，及箱內萬餘元的積蓄紙幣，都交與那連長保管，要求准她與小孩自由外出。連長至此，心為之動，遂准她母子離宅。她帶着孩子，狼狽的逃到船上，遇見了熟人，及那些家人，最後竟又和我團聚了。我聽了她脫險的經過，對她那種鎮定的態度，動人的言詞，與機妙的方法，終能打動對方，脫離虎口，使我衷心起了很深的敬佩！

在港發表談話暴露事變真相。我逃到了香港，起初住在港商陳佐衡的家內，後來又搬到鄧彥華家中（前任廣州市公安局長），繼又自賃房屋，在半月之間，遷移了四處地方。無非使行蹤秘密，免再被他們暗算的意思。到港後三日內，廣州政治分會的委員，如戴季陶鄧元沖等，以及李任潮各親信幹部，都避到香港來。並有飛鷹艦長舒宗鑾乘艦武裝衝出虎門等要案。我於是將這次事變的前因後果，作了一篇很長的談話，在香港各報發表。社會人士才知道事實的真相，各方面對汪精衛的反感，便日甚一日了。首先是吳稚暉先生撰文斥責汪精衛等受共產黨的利用，並指他們是灰色的共產黨，認這次事變，完全是為葉賀洩憤，以後必有更重要的演變，勸國人注意。

我在香港，見各方反應良好，急想回廣西去。但西江已被封鎖，檢查非常嚴密，不易通過，仍繞道安南，由龍州回南甯，隨下柳州，部署軍事。這時駐在北江的我軍，皆已退回梧州，彼此就在西江形成對峙之勢。可是雙方都沒有什麼名目，可以開始打仗，祇是在那裏磨擦擦掌，等候導火線的燃燒。

廣州大暴動與汪派的離去。十一月中旬，廣州的大暴動發生了。係由共黨領導第四軍的教導團，與廣州市工人，乘着汪派部隊向各方佈防，廣州市內空虛，發動了一個空前的大暴動。雖然由他們回師將暴動平定了，但是廣州已遭了空前的浩劫。社會上無論知道內容與否，把一切責任與罪過，都歸到他們身上。於是在福建的陳真如軍，（十一軍）和南路的後方四軍各師，及江西方面的我軍，都有了打仗的題目，一齊向廣州進發。南京中央政府並派李任潮回粵主持這一次的軍事，汪精衛等首要見形勢不佳，也都離開了廣州。隨後他們在軍事方面，把廣州也放棄了，全部向東江出發。據我的判斷，他們見廣州處於四方包圍的地位，作戰至爲不利，想以全力擊破東江方面的陳軍，然後再回師擊破我軍，及南路部隊，萬一不利，即折入江西，另謀出路。因此我軍由西江直趨廣州，而廣州已是一個災後的空城，這時正是民國十七年的元旦前後。

我軍到達廣州，不稍停留，即會合南路徐景唐的十三師，急向東江追躡。這時四軍已與陳真如軍在五華岐嶺等地接戰，陳軍爲其所敗。我軍追至河源縣譚落鎮附近時，適與彼回軍相遇，於是發生非常激烈的戰鬥。我軍及十三師共有四個師的實力，對方亦有四個多師，全面展開大戰，歷時兩晝夜，卒爲我方及十三師擊敗，雙方都死亡七八千人，實爲內戰以來最激烈的一個場面！事後回想，在國民革命軍中素以善戰著名的四七兩軍，自己火併起來，那種敵愾精神，比較對反革命的軍隊作戰，一定賣力得多，真是一齣可悲可痛而又可恥的武戲！四軍方面的勇將許師長志銳，就在那次陣亡了，黃師長鎮球受傷。我前年到曲江時，曾參觀過規模宏大的許志銳的紀念學校，廣東的將領，無論在當時爲敵爲友，都捐款爲他建築紀念館。我心裏想：「如果張向華要我捐款的時候，想起了以前和現在的情形，內心是如何的矛盾呢？」我有一次，笑問黃鎮球（前四軍師長）「你腿上的子彈是那個送給你的？」彼此相顧大笑。這是兒戲呢？還是歷史之神在那裏導演呢？我欲問天！

這次戰事結束了，我也由東江回到廣州，廣州又是一番新的現象了！我的軍隊除了一部之外，大部都開回廣西，我也於四月間回廣西，繼續我那些饒有興趣的建設工作。滿以為這次是粵桂最後一次的內戰了，從此，好好的把廣西建設起來，悔禍未晚，桑榆可收。誰又料及歷史的主宰，還在那裏導演第三第四幕的武戲，我們這些演員，又是不由自主的在幕後從事準備的動作，這真是不可逆料的慘劇！

全國編遣會議後的不幸事件 十八年一月間，中央在南京召開全國編遣會議。問題的核心，固然在長江黃河一帶，但是兩廣也不能例外的。而受到召集的李任潮，對應否出席會議，頗費考慮。他回到自己的家鄉大坡山鄉下，躊躇未決，要我前去商量。馮竹萬、鄧益能、李民欽、張文，都在他家裏，參加商討。有主張出席的，也有主張不出席的。我到後，竭力主張應去出席。我認為必須裁減兵員。國家才可談建設，革命才可告成功。同時因為我自己正在廣西進行地方建設工作，也不願發生意外的阻礙。李任潮採納了我的意見，遂動身赴南京。這個難題解決之後，我也很愉快的回到南寧，安心致力我的工作。不料到了三月間，武漢北平問題發生，第四集團軍解體，李任潮在南京不能自由。問題的核心，一轉就到了兩廣。廣州方面電邀前去商量應付的辦法，並派專輪到梧州迎接。我連夜趕到梧州，乘南強小輪，前赴三水。到三水時，第八路總指揮部副官處長李少毅，正在火車站守候，形色張皇，不似前來歡迎的樣子。他一見到我，即拉我到一個僻靜的處所，秘密對我說：「廣州局勢已變，陳真如、陳伯南已就廣東省政府主席及廣東編遣主任的新職，白劍生昨晨曾秘密到過廣州，旋即遁返香港，請你趕緊搭商輪回梧州，切不要到廣州去，自投羅網！」我見情形如此，自不能再前進，時適港梧大明輪進口，就搭船回梧。真是無巧不成書，在船上，忽然發現白劍生，他很秘密的躲藏在一個房間裏，相見之下，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說起。原來他是前數天從天津搭一艘日本的貨輪，秘密的偷過上海。當船到上海時，南京方面派人上船嚴密搜查，他伏在船主房內的衣櫃裏，未被發覺。前天到達香港，當晚即乘船入廣州，

昨天早上到廣州，而廣州局面已變，由公安局長鄧益能調停，方得自由轉回香港，卽由香港乘這船回梧，適巧和我相值。在船上，除了談一些武漢北平的經過外，也沒有什麼積極的決定。回到梧州，一兩日內，李德鄰亦祕密到來，數年以來的患難朋友，聚首一堂，雖然是在失意的局面之下，而大家都非常歡洽。此時廣東的局面雖變，彼此感情，尙未完全破裂，往返的電報，都以和平建設爲言。我們在梧州逗留不久，卽回到我家鄉容縣，召集重要的幹部會議。廣東方面並派香翰屏代表到來商量，表面上仍是息戰審人一套老調。他們除了答應我駐粵部隊自由撤回之外，其他政治問題，實無從談起，一切祇有靜候時機的演變。我對於內戰，確已早生厭倦的心理，但是在一個團體裏面，個人的意志，是很容易表示出來的。記得有一次，我因事到了離城數十里的小鄉下，住了兩日，就有很多電話，催我回去。但是回來之後，並未有若何重要問題，等待解決。後來才知道我到鄉下去，引起了德鄰劍生的誤會，以爲我有意隱避。的確，在當時那種形勢之下，本來有容易引起誤會的可能。其實我雖有厭戰的心裏，却不願違背團體的意志，因爲不願團體的個人行動，是會使團體陷於不幸的分裂的。在那時候，譚祖庵、何敬之有一個電報給我，要我顧全大局，勸解息爭。可惜措詞不甚妥切，字裏行間，並感覺有令人難堪和不夠誠懇之處，我自然不能單獨用我的意見去答復他們，而是要參酌大家的意見。商量的結果，認爲首先要恢復李任潮的自由，與德鄰、劍生的名義。復電的語氣，亦不示弱。南京方面正在「六合統一軍解甲」的樂觀時期，我們提出這種要求，與崛強的口氣，當然不會得到結果。從此與南京往來斷絕，成了一個僵局，無法再行轉圜。而外間的謠言很多，不是說廣東的軍隊集中肇慶，就是說湖南的軍隊，集中永州，對廣西將實行武力解決等話，空氣日趨緊張。廣西的民性，是不輸最後一口氣的，你迫得他愈厲害，他就不顧一切的和你蠻幹到底。洪楊末期，很多全軍被殺，不肯投降的情形，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到這時候，戰爭的主動，遂移到我們這一方面了。

戰事失敗出走安南 李德鄰因為要作政治上的活動而去香港，廣西的内部，由我同白劍生主持。這時也想不到出師的名義與理由（後來才起了一個護黨救國的名義），就先發制人的指揮軍隊，由西江向廣州攻擊。在一個憤激的情緒之下，會把打仗的問題，看得太容易，而不顧一切的向前衝去，希望以戰事的勝利，來轉變政治的環境。但是我們兵力究竟有限，一共祇有十三四個團，雖然在大塘、蘆包，獲得了初期的勝利。可是到了白坭、銀盞坳，就兵力疲乏，不堪再戰，而向西江敗退下來。此役，黃旭初在陣上受了重傷，幾至喪命。後來到香港休養了很久，才始恢復。這時候湖南劉恢先的軍隊，已由全州乘虛攻佔桂林，逐步向柳州前進。於是趕忙把由廣東敗退梧州的殘餘部隊，調到柳州去抵禦，將其擊退至全州附近，雙方對峙着。這時柳州無兵防守，門戶洞開。俞作柏、李明瑞、楊騰輝等率領在武漢解體的第七軍各師，及廣東方面的部隊，乘隙進佔梧州。並沿江上達桂平，直攻南甯。我方已無兵可調，勢難抵抗。我見情形如此，雖柳桂方面，一時獲勝，究於全局無補。同時我更覺得俞、李、楊等所部皆數年來共患難同生死之袍澤，雖然在政治上一時意見相左，一時不致與我作正面的武力衝突，若能適可而止，善意處之，免致與省內力量相火併，則廣西元氣，尚不致受重大損傷，仍可保持整個的強大力量。而俞、李、楊等偏私躁進，必不能長久維持，待時局之演變而善為運用，仍可入我掌握。我乃決心退出廣西，並電白劍生回南甯。這時彼尚在柳桂處理各項未了軍事，遲遲不能成行，我迭電催促，有云：「一走百事俱了，不走百事不了，何必多所留戀？」迨彼回南甯而俞、李、楊等，亦已進迫貴縣，我等將省内部隊，交由師長梁朝璣、呂煥炎統轄，由其與對方妥協。這時南京方面，已任命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為廣西編遣主任，楊騰輝為副主任，我留民政廳長粟威在南甯辦理省政府交代，以示清白。隨即與白劍生乘輪經龍州，而入安南。此為當年陸、譚出走的舊路。我們竟在數年之後，步其後塵，誠不禁感慨系之！這是十八年六月間的事。

一個年富力強素喜做事的人，一旦置身國外，雖說一走則百事皆了，實則百感交集，積鬱的意念與消極的意念，同時在我的腦海裏起伏着。消極的想法，是如何安排生計，消磨光陰，終老異域。積極的想法，是如何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以重握政權。這兩種意念，除了年老力衰者外，最後總是積極的意念得到勝着。尤其是客居在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耳聞目見的恥辱，親自經歷的痛苦，都是激發革命情緒的酵母，所以暫時蟄居租界或殖民地的失意軍人和政客，沒有一個不是積極思想，在那裏等待機會，策動變化。而這些機會與變化，在多亂的中國，是不斷的發生的。這班在野人物，遂也乘時而動，免起鶻落的在舞臺上演出種種悲歡離合的活劇，這就是中國數十年來循環不已的內亂發生的主要原因。

俞作柏的異動 我們在安南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去。因為香港是兩廣政治活動的後台，我們要求政治的出路，就不能不到那裏去。俞作柏向來左傾，在十六年的時候，就同我們分離。他之所以服從中央，無非是想取得廣西的地盤，掌握廣西的軍隊。自從當省政府主席之後，其左右都是那些左傾或共黨分子，終日包圍着他，要他有所舉動。就職不到兩三個月，遂自稱為×××軍總司令，公開反對中央，與廣東對峙起來。他這一種舉動，不但我原來在廣西的部隊，接受我們的意旨，全體表示反對。即李、楊由武漢帶回的部隊，大多數也和我們站在一條陣線，一致反對。南京方面乃將俞、李免職，並任命呂煥炎為主席，兼編遣主任。俞作柏走香港，李明瑞、俞作豫率領少數部隊，逃入左江，和共黨韋拔萃、黃飛虎等聯合，張開赤色的旗幟。這一次的離奇變化，前後不到一個月，是歷次政變中最短促的一頁。經此次事變之後，廣西的實力，無形中又在我們領導之下，互相團結，暗地裏等待時機到來，續演以後的一幕。呂煥炎雖也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祇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領導全部，因此他雖受了南京的任命，實際上仍舊受我們的指揮。

第四軍與我們言歸於好 汪精衛自十六年在廣州失敗以後，對中國政治，始終不能忘情，尤其不能

忘情於廣東。俞作柏變動的內幕，我雖不能詳悉底蘊，但與汪始終有很大的關係。俞既失敗，廣西的力量，又轉回到我們手裏。素來擁汪的第四軍，又遠在長江一帶，雖掛着中央的旗幟，仍想同我們聯合一致，由唐孟藩（生智）的介紹，進行協商。一日，在唐氏家裏，我與汪氏再開始見面，對飲一瓶一百年陳的拿破崙白蘭地酒，彼此言歸於好。政治的活動，原來祇計利害，不擇手段的。昔日是讎仇，今日是朋友，在局外人看來，雖覺得難以爲情，而在當局者，則視爲勢所必然，無足爲怪。這時第四軍張向華等因爲移防改編的問題，又與中央脫離關係，由宜昌經湘西、廣西，希望再回廣東。於是由政府合作，進而爲軍事的合作。大家都主張我先回廣西去，統一領導廣西的部隊，免與第四軍衝突。再與四軍合力攻取廣東，廣西內部亦派人來，願與四軍合作，要我回去領導。這時廣東方面正增兵至平樂、荔浦，堵擊四軍，情形十分緊張。我對於回去，雖有決心，但並未商定何日動身。

離港返容 我在香港居住，本甚安適，忽然有警政司派人要我前去談話。我即派代表前往，據云：「有人控告黃先生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礙及治安。」我的代表答辯不得要領而回。越數日，警政司又來一件公文，限我於三日內出境。處在帝國主義者勢力之下，受到這種不可抵抗的壓力，心中非常憤慨！我固然恨香港政府，尤其恨當時廣州的當局，爲什麼要借外人的勢力，來壓迫我呢？我立刻下了決心，要吐這口怨氣。我想：「英人既不許我住香港，自然也不許我到他所屬的其他殖民地去，上海是不敢去，安南及其他地方，我又不願去。最合理的，還是回廣西去，開闢我的自由天地。」於是我祕密準備了到廣州灣的船票，除了同行的妹夫吳柱文外，連我的妻子與兄弟都不知道。在一天的下午，兩點鐘，法國的「網球四騎士」，在香港表演，我還去參觀。廣州方面的人物如陳策黃騷都在場上碰見，彼此都是很熟的舊朋友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彼此祇作會心的微笑，不交一語。看完網球表演之後，急急改裝，並告知我的妻子，要她在三日之後，才通知李德鄰白劍生汪精衛等。在傾盆大雨中，默然與我的妻子

告別，跨上了法國的輪船，啓程向廣州灣進發。

到了廣州灣，我化裝一個汽車夫，吳柱文化裝一個車行老闆，兩人隨便買了六些汽車零件帶着。次日，僱車經廉江陸川而至玉林，沿途祇同那車上的司機攀談，並幫他駕駛了一段路的車。這種做法固無非是要他認我們作同行，以免沿途盤查時露出破綻。一路過去，平安無事。一直到達玉林，下車後到了一個小客棧裏去找住宿地方。忽然後面一個士兵跟踪追問：「你不是黃主席嗎？幾時回來的？」我聽了，大爲驚奇！雖然此人對我，未必即有惡意，此地亦未必有多大危險。但這時候我還不能露出我的真面目，祇好低頭急行，假裝與我沒有相干的样子。可是他還在後面連聲說道：「真像啊！真像啊！」我進了小客棧，即上床下帳，瞌頭而睡，假裝害病，查夜的軍警盤查，一切都由吳柱文應付。次日，乘車回到容縣，隱居在我的一個小房子內，絕對不與外人來往。然而熟人太多，形跡終於暴露出來。縣長封鎮南，首來求見，他是本縣人，而又是老世交，舊同事，自屬誠意。並且介紹他的族侄駐容縣的旅長封克魯來見，表示絕對聽我的命令。我遂拍電到南甯，要呂煥炎、楊騰輝、梁朝斌、黃權、梁重熙、呂競秋、張任民、蒙志、楊義、黃翰齡、黃韜等到賓陽見面。第三日，我即乘車到賓陽。他們已先到達，不但我指名邀約的都到齊，就是不指名，不邀約的，如梁武恆、周炳南等許多人，亦都到來參加。我離省雖不到半年，大家相見之下，都覺非常難過，有的甚至感動得對我流下淚來！我將來意說明，希望自己團結一致，與四軍合作，同下廣東。他們一致贊成，無稍異議。當時即令各師秘密向平樂梧州前進，與四軍合擊在平樂一帶的廣東軍隊。我雖然沒有什麼名義，但是我的命令已經發生效力，這可說是一種內心的效力，乃是心悅誠服的偉大表現。

慈親之死，我因爲尚在準備秘密行動期間，卽日仍回容縣，並下鄉省視我垂老的慈親。母子久別重逢，至情流露，當時彼此內心的感觸，自非筆墨所能形容。兩日之後，我又向她叩別。她低聲喚我的

乳名，戀戀不捨地問我：「你這樣決又要出去了嗎？」我那時真是沒有一些理由可以答復她的問話，亦無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言語。臨行，她送我出大門，望着我坐上轎子，還捨不得回去，我忍痛的走了。天呀！這便是我母子最後的一面了！祇此一面，竟成永別！我當時却那裏預料得到呢？事後回想，她那龍鍾的老態，盈盈的眼淚，無言地望着的情景，宛在眼前，在那時她的心內，是如何的痛善啊！而且她是爲我而死，因爲事前我不能將她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十九年粵軍佔領容縣，派兵到我家鄉搜查，她老人家幾經搬遷躲避，祇有我妹子普安在她身邊照料。衰老的身體，怎禁得這樣的恐怖，遂因驚悸過甚而昏迷，而很淒涼的死去！我兄弟無一人奉侍在側，親視含殮，事後聞報，真是遺恨終天，悲痛無極！古人說「忠孝不能兩全」，我自問，忠在那裏？孝在那裏？這一個極大的激刺，也是後來厭戰的主因！

重組軍政機構。我離家之後，匆匆趕到南寧從事護黨救國總司令部的組織。李德鄰任總司令，我任副總司令，兼省政府主席，白劍生任前敵總指揮。八年以前的老調，又重新彈起來了！爲與汪及四軍易於連絡起見，任用陳翰譽爲參謀長。這本片子的序幕正式揭開，德鄰劍生亦陸續由香港趕回，當我秘密回到廣西，在賓陽召集會議的時候，粵方卽已知道，趕忙將在平樂方面的部隊，連夜撤退，並未受到若何的損失。我迫近梧州，彼亦放棄梧州，於是廣西的全境，又重新歸我掌握。我到梧州後，卽趕赴黎木根（梧州東北六十里小鎮）與張向華約會。新事正待合作，舊事自然不再提起。照我的意思，桂局轉變，未到一月，諸事都要重新部署，俟四軍在廣西境內稍爲休息整頓，再會師東下。但張向華的意見，則以爲應乘其不備，一舉東下，卽可佔領廣州。否則對方準備完畢，必難獲勝，其實廣州方面，早就準備很強固的工事。而四軍師行四省，直下廣州，已犯勞師襲遠之戒，且自信過甚，認對方不堪一擊，同時暗示卽使廣西軍隊不能協助，亦可單獨獲勝，則又蹈了驕兵之忌。廣東方面，此時不但集原有粵軍力量，並且調了好多北方部隊到來，所謂「乘其不備」云云，亦正與事實相反。但他決心甚堅，大有一滅此

朝食」之慨。我雖不贊同他的意見，亦無法將他阻止。同時又不能袖手旁觀，聽其自敗。於是除留呂煥炎率其一部留守廣西外，其餘全數東下。四軍由廣籌四會清遠入花縣崇化，担任左翼。七軍十五軍由西江經肇慶，攻擊軍田粵漢鐵路正面。並分兵一部，攻擊三水。四軍在左翼作戰，起初甚爲順利，將近廣州的時候，粵方發動反攻，來勢頗猛，乃向琶江敗退。七軍十五軍久攻正面不下，四軍既退，左側背即受極大之威脅，故各軍皆由四會廣寧懷集，退往信都賀縣一帶。本擬扼守梧州，再行作戰，但梧州空虛，在我軍未到信都前，已爲粵方海軍陸軍襲取，乃轉向平樂荔浦，集中整理。此次作戰，前後不到一月，其進也銳，其退也速，除上述主因外，首爲步調不一致。次爲第七第十五兩軍頻經變動，戰鬥力已減。再次則爲對方有空軍參加作戰，予我軍以極大之威脅也。

再度出兵 我們退集平荔後，同在患難之中，彼此乃謙抑反省，更加團結，力量反比以前加強許多。這時粵方分兵向平樂荔浦進迫，而呂煥炎則叛變投敵，據南寧、玉林、桂平等處，絕我後方。敵之實力，數倍於我，而我又兼有內憂，情勢至爲惡劣。我們會商決定以七軍及十五軍之一部，在荔浦附近，拒止當面之敵，由德鄰、劍生指揮。我同向華率四軍及十五軍之一部，回師解決呂煥炎，以固後方。由荔浦經修仁象縣，下武宣。復分兵出貴縣桂平，銜枚疾走，每日行程皆在百里以上。出其不意，襲取貴縣桂平，呂煥炎幾爲所擒，乃退守玉林。南寧方面呂部團長覃興、楊振昌反正，將呂氏親信驅逐，於是後方較平。我復以四軍分路欽（州）廉，（州）轉進高（州）化，（州）十五軍以一部監視玉林，大部沿西江東下，襲取藤縣，佯攻梧州，並再分兵轉入撫河，斷粵軍之退路。粵軍見情勢危急，連夜撤守梧州平樂方面，僅留北方調來朱一民所部進攻荔浦，幾經激戰，卒爲我軍擊敗，逐出桂境之外。

北流戰役的挫敗 粵軍退集梧州後，見我軍兵力不多，且分散各處。同時我許宗武部久攻玉林，急切難下，敵方乃進佔藤縣，並以主力沿容蒼公路前進，希解玉林之圍，收內外夾擊之效。我乃急調四軍

由高州進入容縣楊梅附近，以阻其前進。但主力未到，敵已迫近，不得已退至北流附近，再行拒止，以免其與玉林城內呂部會合。此時前有強敵，後有阻礙，情勢已極不利，如任其匯合，則我軍各處部隊，更難集中應戰，遂不得不在北流以北地區，進行決戰。四軍與十五軍各部，不是由前方撤退，即係由桂平高州武林等處遠道集合，兵力疲憊，緒續參加，苦戰四晝夜後，卒至敗北，兩方死傷，皆甚慘重。我乃退至貴縣，憑江防守，滇軍亦不積極追擊。這是十九年一月間的事。

北流的戰敗，關係於我的氣勢太大了！事後自然有好些人要埋怨我指揮的失當。我自己檢討一下，也確有很多的錯誤。當我很順利的襲取貴縣桂平，佔領藤縣，進兵撫河，威脅粵軍，逼迫其倉皇退回梧州的時候，忘記了自己的部隊是新敗之餘，實力不厚。同時指揮四軍，分進欽廉高雷。粵軍見我兵力那樣分散與單薄，並且玉林圍而不下，遂大舉進攻。我們要將散在數百里地區內的部隊，迅速集合起來，又何等的困難？而粵方力量集中，佔着優勢，雖然李白在平樂方面獲得勝利，但已成強弩之末，不能再進攻梧州，以牽制粵軍的前進。我方處在前後受敵的情勢之下，被迫而進行決戰，自不能僥倖得到勝利的啊！我們遭遇了這一次和上次在廣州附近的二度損失，各軍的實力大減。四軍的各師，每師剩下的實力，都不過一團。他們的師長都改爲團長，團長都降爲營長，十五軍各師的情形亦是如此，可是官長的奮鬥精神，仍和以前一樣的旺盛，絲毫沒有頹喪，這却是值得稱道的。

自此之後，兩方隔着邕江對峙，而從事整理與佈置，等待戰事的繼續發展。這時退入右江的李明瑞見我軍失敗，即開始向南甯方面進迫，其前頭部隊，已到達離南甯二百餘里的隆安縣以南。我不得不轉回南甯，部署抵抗。乃率領在南甯反正不久之覃興楊振昌兩團，向隆安進擊。在隆安附近，經過了兩次激戰，將其逐退。我進駐平馬，（即恩隆縣）他們退入東蘭附近的大山內。因為他們對當地民衆，曾予以相當的組織和訓練，所以我們要繼續深入進攻，是有相當的困難。記得有一次，我集合平高附近的民

衆講話，在滂沱的大雨之下，還是靜肅整齊的，聽我的話。這並不是因為我歷年在廣西的地位和威望使然，而是已受了李明瑞部組織訓練的結果。我在平馬住了一個多月，不能將李部澈底解決。他們則時以游擊戰術出擾，使我不得安寧。正在那裏相持的時候，忽接我母親逝死的噩耗，我不禁痛哭起來。想起不久以前臨別時的景況，以及因我在政治上的關係，而使老人家受驚致死，不孝之罪，百身莫贖，竟使我悲痛萬分！甚至心灰意懶，不願再在政治上有所作爲。我曾經有電報給德鄰劍生向華等，向他們引咎辭職。他們回電，給我懇切的安慰。四軍將領並將北流戡敗的責任，負在自己身上，認爲由於他們作戰的不得力，以解慰我內心的不安，這也是值得我感激的事情。

進退湖南的經過 四五月間北方的擴大會議事件發生了，閻馮一致參加，引起了更大的內戰。李白張等在南甯舉行會議，決定出兵湖南，要我放棄右江，率兵回南甯，一同出發。我雖然沒有親自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但是團體的決定，我必得服從。右江放棄之後，李明瑞仍舊恢復原來的態勢，一直到了二十年之後，始將其逐出桂境。李明瑞率部千餘人，由湘桂粵邊界竄入贛南，與共黨合流。但不久因共黨內部李立三路線與毛澤東路線的鬥爭而被殺，所部亦完全消滅，這是以後的話。

我回到南甯的時候，部隊已集中桂林，進入湖南境內。粵軍因我軍北進，乃乘虛進佔桂平貴縣，並迫近貴縣賓陽間之梨塘圩我在南甯匆匆佈置，以韋雲松率領一部守備南寧，其餘皆隨同出發到柳州桂林，除留置一小部隊據守各個城池，以作最後的據點外，其餘一概放棄，或以民團扼守。十五軍的三師，除梁朝毅已出發外，許宗武蘇祖馨兩師，由我與黃旭初最後率領出發。這時前方李德鄰白劍生張向華率領之四七軍及在湖南合作之唐生明第八軍，已佔領衡陽，長沙，大有直搗武漢之勢。我軍北上，粵軍並不向廣西深入尾追，却另行折回廣東，由北江出衡陽。我與十五軍到達零陵時，衡陽已爲粵軍佔領，將我軍截爲兩段，我見兵力單薄，一時不能將衡陽奪回，即用電報與前方商量，回軍擊敗衡陽粵軍，再

行北進。於是前方各軍由長沙向耒陽撤退，我率十五軍向常寧前進會合。到達常寧時，粵軍佔領耒陽常寧間之秧田圩，切斷我的進路，乃展開激戰。十五軍稍受挫折，停頓於常寧附近，適前方各軍已退至耒陽，粵軍亦撤回衡陽，固守不出。我親到耒陽會議，偵得衡陽工事堅固，不易攻擊，而且是年湖南歲荒大飢，軍食極成問題。於是決心由常寧以北地區渡過湘江左岸，據守祁陽熊飛嶺及寶慶零陵各處休息整理，度過荒年，再求進展。而衡陽粵軍見我軍撤退，遂向洪橋出擊。我等在洪橋會議，共認乘勢反攻，奪回衡陽，比較消極的撤退為有利。即下令翌日向後反攻，雙方又展開大戰，十五軍置於右翼，左翼為四七八軍主力。我回到駐地時，部隊已逐步推進，情況頗為順利。從第一日起，一直到次日下午四時，我的正面尚沒有甚麼變化。但是左翼方面，情況非常沉寂，自次日上午八九時起，已聽不見他們的槍炮聲音，並和我們得不到連絡。當時我深為詫異，不知是勝利的前進呢，還是失敗的退走。但我深信白劍生在作戰時對連絡工作，素來是非常注意，尤其當敗退的時候，他必用盡種種方法，通知友軍，以免受意外之損失。這次也許是急於前進追擊，而不及通報。這樣左猜右想，一直到了下午四時以後，等我派出去的連絡員回來報告，才知道他們在今早為敵人反攻，已經敗退。敵人在上午十點鐘通過與我並行的某地，正向洪橋前進。這次左翼退却所以不通知我們，到後來才知道是送信的人，中途遇見一個軍官，送信人向他查問我的所在，他答復不知道，並且說「想早已退却了」。以致就誤軍機，這情況是多麼危險呀！此時左翼的敵人已超過了我大半日的路程，而我們的右邊，隨着一條正在漲大水的湘江，不易過去。另一方面又得到報告：一部份追擊我軍的湘軍劉懷先所部已到達常寧白水市，向零陵方面急渡。萬一左翼的敵軍，先我到達祁陽，遮斷我的後路。或者知道我未能退出，由洪橋向左轉來包圍，則我將全部被俘。於是火急下令，向大營市祁陽方面撤退，連夜向左翼敵人並行的後方轉進。在一日夜之間，走了一百八十里路，次日黃昏時候，到達祁陽城，而敵人也過了熊飛嶺，離祁陽不過二十多里的地方。

，與我的後衛部隊對峙着。祁陽自然又不能再留，早早的吃了一頓晚飯，當夜渡過湘江南岸，向零陵退却。連日連夜作戰敗退下來的隊伍，未曾經過收容整頓，秩序極爲紊亂。我除了身邊一個衛士隊之外，幾乎都失了掌握。向來我遇到軍事不利，必須退却的時候，自己一定是支持到最後才退走的。這一次我的身體實在太疲乏了，走一段，睡一息的，慢慢向後轉進。團長周雲很匆促的跑來，向我報告：「後面已無自己隊伍了，離敵人先頭不過二十多里，請副總司令趕快走路吧，不然，敵人快要到了！」情勢緊急，可以想見。次日午後三點鐘，我到達零陵城，得悉由白冰市向零陵城追擊的湘軍，離城已不過四十里。如果繼續前進的話，黃昏時候，也可到達城邊。我進城的時候，看見的部隊，或在睡覺，或在覓食，在那麼炎熱的夏天，經過四日四夜長距離長時間作戰潰退下來的部隊，到了一個比較後方的城市以後，精神的疲勞，及秩序的混亂，是必然的現象。所以我無論怎樣命令他們，督促他們，退到道江對岸佈防，都不能辦到。他們好像是一羣失了知覺神志昏迷的醉漢，這一個起來。那一個又睡下去，我着急極了，假如敵人在黃昏後，或明天拂曉時到達，這些部隊的官兵，一個個都要變成俘虜。因為零陵是一個背水的城呀！我在萬分困難之下，祇有命令我的衛隊長莫世才，將那百餘個衛士，分佈在六七個城門，緊緊的把守着。萬一敵人攻城，一定要堅守到明天上午九時，掩護城裏的部隊退過對岸，才能撤退。當晚我也過河，到對岸宿營，同行的祇有張伯璇戴石浮幾個人。次晨，仍向全州方面退却。起行不久，就聽到零陵城方面的槍聲響起來了。我的衛士隊，一直抵抗到九點多鐘，城裏的部隊，全部退完了，才撤退。雖然犧牲了三分之一以上人槍，但他們能使很多的部隊，脫離危險，確是一場值得稱道的後衛戰！

退集桂境後遭遇的危險，我到了全州，李德鄰、白劍生張向華已先一日退集那裏。他們是由湘江北岸，經東安退回來的。左翼的損失，非常重大。第七軍的師長梁伯蔭！第四軍的副師長李漢炯，都在五

塘前線陣亡。士氣頹喪極了，敵軍還在後面緊追。我軍除留一部在全州佈防外，主力仍向桂林撤退，便能補充整頓。到了桂林，據報有些向來反對我們的份子，受了對方的任命，糾合土匪散兵，進擾柳州。同時得到滇軍萬餘人圍攻南寧，並與賓陽貴縣粵軍聯成一氣的消息。在這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而我軍僅保有桂柳兩處很小的地方，幾面受敵，情形是危險極了！於是桂林方面，由劍生等在那裏佈防久守，我率一部回防柳州，將那些反動的雜軍肅清。湖南方面敵軍到了全州，不再前進。因此我軍的主力，亦移柳州，籌劃如何去解南寧的圍。

決心離開廣西 我到柳州後，因身體衰弱，又回到桂林去休養。在一個大勞動大刺激之下，得到一個靜息的機會，自然會有許多感想發生。我覺得這幾年的內戰，是太無謂了！於國家有什麼益處？於人民有什麼益處？於自己又有什麼益處？於是我決心退出這個內戰的旋渦。本來我於退到全州的時候，一天晚上，在清湘寺內，已對白劍生提出這個意見。他恐怕動搖軍心，竭力勸止我，我也不再堅持。的確，那時我若離開這一個集團，士氣方面，是極易受到影響，我當然不能不顧念大局，而接受他的勸告，中止自己的企求。現在我去志復萌，並更堅決，於是不再徵求他們的同意，即將辭退的電報發出。同時並有致南京方的電報（馬電）發出。他們見到這兩個電報，非常驚異，不過除了復電勸阻之外，亦不能十分勉強，祇有各行其是而已。自此以後，我雖然還未正式解除軍事政治上的名義，但實際上已完全不負責任。不久，我又回到柳州，與他們相處一起，彼此的政見，固已分歧，但私交上仍是一樣的純篤。我那時因為不能出省，在柳州開闢了一個很大的林場，種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從事生產工作。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黃旭初去參觀這個農場，當年所種植油桐幼苗，今日已喬木參天，十五年前好像是一個無聊極思的玩意兒，今日則成為社會上一宗很大的財產。比到十餘年來你死我活，此起彼仆，那些「奪帥印」「取成都」的活劇，意義深長得多，使我對於以往的一切，引起了無限的感想！

南甯之圍，終於解開了。在優勢的敵人四面包圍之下，能以劣勢的部隊，從一個空隙中衝進去，完成裏應外合的形勢，將重圍打開，並將敵人擊敗，真是戰爭史上一個奇蹟。這固然是守將黃旭初、韋雲淦等能堅苦固守，亦確是白劍生指揮成功的一個傑作。此後還在右江方面進行好幾次的戰鬥，使廣西的局面，得到一些回旋的餘地，這都是值得稱頌的事實。因為這些戰役進行的時候，我均未曾親自參加，其經過的詳細情形，不敘述了。

南甯解圍之後，滇軍退出桂境，粵軍亦退出貴縣以下，南甯終於恢復了他原來省會的重要地位。一切軍事政治的重心，迅速的轉到移那裏去。我與李德鄰亦由柳州回到南甯，在我的菓園舊窩內，渡過了我三十七歲的生日。他們很熱烈爲我祝壽，勝利的情緒，與誠摯的友誼，都融和在杯酒裏，使得大家沉醉。不久，我提出決心離開廣西的意思，這時他們也不再勸阻，在臨行之前，和各重要幹部還開了一個會議。他們希望我出省以後，仍爲團體而努力，務使團體的精神，永生而不斷的發展。白劍生發言：「廣西人是不會投降的！不但現在不投降，即使將來的環境比現在更困難，也不會投降的！所謂爲團體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則之下，使團體的力量，更大更強更堅固。」我在那時候，雖仍是很消極，並未考慮到以後的行動，但是我已堅定我的決心：第一是不再破壞國家，第二是不再破壞團體，這是我以後行動的原則，可以說是以後爲人做事的最高準繩。在當時，彼此的言語間，或者有不甚愉快的地方。但在彼此的立場上，就不能不如此申明我的衷心。在那時候雖未必爲他們所完全諒解，但是到了廿五年統一以後，已得到事實的證明。這是一幕團體政見與私人友情矛盾衝突的表演，最後終於得到善美的結果。在這一段內戰史中，可算是一個特別的鏡頭了。

寫完這段事跡後的感想，我寫完這一個事跡的經過，心中發生了很多的感想！我們在當時，對於北洋軍閥的互相火併，尤其是近在目前的舊粵桂戰爭，自然有許多不良的批評。但決料不到這個悲劇，

竟由我們自己來重新表演一次。可是我們重演這個悲劇，決不是有意的，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表演的舞台，幕後自然有一個導演者，在那裏指導我們的演出。這導演者並不是那一個人，而是歷史的社會的背景，因為這一幕一幕的戲，是歷史的社會的演進必然的過程！假使我不是害病，那會長期的留在廣州？因此或者可不參加葉賀的戰事。沒有葉賀的戰事，就不會有對第四軍的戰事，沒有編遣會議，就沒有十八年的粵桂戰事，沒有十八年的戰事，就沒有十九二十年的戰事。但是這不過是我事後的推想，即使這些事實都沒有，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引起不幸的戰爭麼？即使沒有這些原因，也必有別的動機。因為戰爭的起因，往往當初都是很細微的，而這些細微的起因，又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等到醞釀已久，形勢日漸擴大，遂至一發而不可收拾。雙方當局者，如果能注意這些細微的地方，而及時消滅其禍機，也許可以免却許多無謂的損失。但是這種防微杜漸的顧慮和辦法，不是很容易的。譬如我在十八年，決然回香港，和潛回廣西，召集舊部，參加戰爭，實由於對方欲借外人勢力，壓迫一個失意的人，使他不能安居，而加以侮辱。在主之者不過是接受了一個腐淺的建議，而在受之者，則認為是一個奇恥大辱，不得不挺而走險，以謀相當的報復。我們嘗讀吳梅村譏評吳三桂「痛哭六軍皆縞素，一怒為紅顏」的詩句，總覺得吳三桂因小忿而忘大節的可痛可恨。可是檢討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內戰，當事者雖然不是一怒為紅顏，而一考其起因的價值，兩兩比較起來，往往相差無幾。這是個人的悲劇，也就是國家社會一個極大的悲劇啊！

論這次新粵桂戰爭的悲劇，我雖然中途下場，而劇情的後半，還是由其他角色繼續表演下去，仍是一個極可悲傷的回憶。然而我讀了三國演義的頭一句話：「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三個原則，覺得這種歷史的演變，總是避免不了的慘劫。無論是分是合，是正是反，都有一定的理由。任何一方面的道理，都有他的處和非處，並不是絕對的是，和絕對的非。是和非衝

突之下，乃產生另外一個是非，這就是合的道理，也就是一個進化的道理。雖然一個歷史的演變，要犧牲很多的生命和毀滅很多的物質，然而誰又有這樣大力，能殼挽回這種莫之為而為的定數呢？這在佛家的說法是劫運，用辯證的說法是必然。無論劫運也好，必然也好，事實既無法抗禦，過去亦不必追悔。反正祇是在歷史的演變上，留下一個供後人參證的資料，和憑吊的痕跡罷了。

十一 海外的閒散生活

閒居香港 十九年的冬天，我在南甯，與他們分別，到了龍州，又到安南去。這是廣西政治人物下台的一條好路徑，我已經走過兩次了。外國人在中國各地，爲中國軍事上政治上的上台人物，安排了許多「逋逃」式的藪安樂窩。廣西雲南的下台人物，可走安南，廣東的下台人物，可走香港，在長江一帶的，可走上海，在華北各省的，可走天津，在東三省的，可走大連。真是天無絕人之路，你一到外國的租界，或殖民地，祇要不妨礙當地的治安，當局者無不表示相當的歡迎。因爲收容政治犯，是國際公法所允許的。所以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到了不得已時，也可拿國際公法准予收容政治犯這個規定來作護身符。而某一種野心國家，卽憑此規定，保護鄰國的活動分子，使鄰國的政局不安，以便乘人之危，圖漁翁之利。

赴南京後一個小風潮 一個剛下台的軍政要人住在外國的殖民地，或租界裏，自然會引起許多方面的注意。他們是本着人棄我取的原則，用種種方法來拉攏，來酬酢，利用你剩餘的力量，作爲他們政治資本，以達成他們政治上的目的。我一到香港，已有人在那裏等候，向我遊說，勸我到南京去。南京，我是準備去的，但我雖然離開了我的團體，却不是因與團體內的中堅份子感情破裂，利害衝突，而失意出來的。我仍愛護我的團體，更沒有破壞和利用的心理，而是想調和團體與國家的衝突。我之決意赴南京一行，是想實行我的和平統一的主張，並非受了一般說客的聳動。換句話說：要去南京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我在香港逗留不久，就動身赴上海，轉赴南京。我自然不須什麼介紹而逕自晉謁 蔣先生。這次見面的情形，與十五六年初次見面時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使我最感動的是蔣先生待遇我們這些會

經反對他的人，和以前是一樣的誠懇，或者更密切一些。這種情形，想就是促成中國統一的因素吧！我將自動退出廣西的原因，詳細陳述，深得他的嘉許。他即以廣西善後督辦的名義，命我回去，收拾廣西的局面，這好像是結束內戰必有手續。但我之不願再參加內戰，和不肯作勾結破壞的工作，而祇願在整個方面爲和平統一而努力的決心，是他所瞭解的。所以我在南京的短時間裏，許多向來反對我的人，就在我所住的旅館大貼標語。說我是「破壞統一的禍首」，「實行苦肉計」，「實行緩兵計」。要求中央懲辦我，並要求出兵討伐廣西，我祇好付之一笑。這個風潮，一時頗爲激烈。經由警察彈壓，才得平息。我在南京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廣西內部知道了這個消息，也同樣的起了一番騷動。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對我加以攻擊。並牽累及省內以前與我關係比較密切的幹部。在那個時期，廣西的幹部，除了第四軍之外，李白以下的軍事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曾爲我的直屬部下。其政治幹部，更不必說了。要分又何從分起？要去又如何去法？後來李白見內部情勢不安，乃通電爲我解釋，說明我是厭職，自動離桂，並未破壞團體的行動，更與那些幹部無關。經過了這樣的解釋以後，廣西的局面，始行安定下來。我在香港，也就很安閒的住了好多時候。

漫遊海外的動機 二十年的春間，胡展堂先生在南京被扣留，孫哲生、鄒海濱、古襄勤都離開了南京，秘密南下。有一日，早上，我遇見陳真如，他很狼狽的由輪船碼頭下來，邀我到香港大酒店裏密談。說是廣東的政局又變了，陳伯南聯合廣西，反抗南京，他隻身逃來香港。變動的主要原因，自然是爲了胡展堂被扣。我聽了這個消息，覺得政海風波，真是不可逆料。不久以前，他同我還是敵人，現在異地相逢，時勢變換，又相親密起來。而在另一方面呢。兩廣的軍隊，正是槍口互相對峙的時候，忽又團結起來了。不久，汪、胡、孫、古、李、白、陳、張諸人，相繼在廣州出現，彼此前嫌盡釋，重新開府嶺南。這一幕滑稽戲，我雖不曾參加，但在旁看得非常清楚，也特別感覺有趣。

我在香港開住，預料他們必然的要來邀我參加。果然，不多幾時，李德鄰、白劍生也到香港來玩，大家相見，作了很多時間的懇談，絲毫沒有隔膜。他們要我回廣西去，我也頗想回去看看故鄉的情形。他們又要我參加這次的活動，我祇答應在地方經濟建設上努力。我們到了南寧，起草了一個五年經濟建設大綱。這一個大綱的內容，當然是很空泛的，即使實行起來，亦未見得會收到多少的效果，尤其是在那時「軍事第一」的狀態之下，又那裏有從容的時間與大宗的款項，去進行這樣不濟急的工作？祇好作爲我那時回到南寧的一點抒情表現吧了。過了些時，汪精衛、孫哲生等到了梧州，我與他們在梧會面。他們在中山紀念堂一個大會上，邀我講話。我所講的意思，與他們口味，頗有不合之處，大家弄得很難爲情。隨後，他們示意，要我擔任廣西的經濟督辦，並且希望我同到廣州一行。我答應回到香港後，再加考慮。於是我乘船直回香港，他們也回廣州。我回到香港，想了一想：中央委我爲廣西善後督辦，他們又要我當廣西經濟督辦，我還是督辦善後好呢？還是督辦經濟好呢？在香港再住下去，一定糾纏不清，難以應付，不如早日離開爲宜。去上海，去安南，都覺不妥。還是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去走走，使耳目更清靜些。於是計劃先到菲律賓，再到台灣，轉赴日本美國。在太平洋上作一次長途旅行，考察各地的風土情況。一則可以免除無謂的麻煩，再則可以增進自己的見聞。在這匆促的情形之下，辦好入境手續，與盤斗寅（珠那）二人，匆匆離開了香港。

菲島首都馬尼拉 菲律賓首府馬尼拉距離香港不過六百四十哩。大郵船航行三十六小時，即可到達。人口六十多萬，商務非常繁盛，爲亞美兩洲航線之起點。當輪船入口之後，首先就遭遇到國際間種族不平等的待遇，白種人很自由的就登陸了，剩下的是日本人及中國人，必須經過許多嚴格的檢查手續，中國旅客被檢查的次序，更挨到最後。我們登陸後，住在馬尼拉旅館，這是馬尼拉最大的旅館，建築與設備，都相當宏偉。我們到那裏的時候，正是氣候最炎熱的季節，白天的溫度，總在華氏九千幾度以上。

。很多長期的旅客就跑到碧瑤去避暑。所以旅居在那裏的客人，並不很多。華僑在菲律賓有很長遠的歷史，並能刻苦耐勞，所以在經濟上頗佔勢力。各種營業都有，尤以經營珠網店（即雜貨店）者為最多。一九三〇年以前，有人曾估計全島珠網業，由華僑經營者，約佔總數百分之六十，可見他們經濟力量的雄厚。華僑中以福建人最多，經濟力量亦最強。廣東人次之。近年來日本移民日多，經濟勢力亦日漸擴展，幾有凌駕我僑胞之勢。原因是僑胞經營之貨物，除一部為國貨外，多半為販賣日貨。並以航運噸位之限制，運銷變方，都發生很大的困難。日人則是直接經營，又得航運之便利，與國家之保護，自可獲優厚之利益也。

菲島的商業管理制度 菲列賓政府對於捐稅之徵收，非常周密。那年正施行會計管理與機器計帳制度。華僑商店（其他商店想亦如此）必須雇用曾經政府訓練，對過政府負責之會計人員為會計，一切薪給費用，皆由商店負擔。就收機關不費一文，而對於各商號的營業收支與盈虧情形，社會經濟狀況，無不瞭如指掌。所有營業稅利得稅等之徵收，均甚便利，絕對不致有隱漏短少的弊病。凡較大之商店，必須置備計算機。每日收支，皆以機械紀錄為標準，以防會計人員通同作弊。自此種制度實施以後，政府稅收大增。而僑商則多以為苦。蓋華僑積習，皆認私人經營之帳目，為私人的，祕密的，如今被迫化為政府的，公開的，不但於習慣不便，亦不能作隱瞞政府逃避稅捐的行為，自然認為不利的事。但是我們客觀的為政府設想，此種商業管理的制度，極為完善，在中國元有澈底做行之必要。

菲政府的同化政策 菲列賓的法律規定，外國僑民，無不動產（如土地）的購置權，僑胞為購置不動產，大都與土女結婚。因為土女及土生子，皆有購置不動產的權利，故久居菲島之僑胞，其家庭大多已為土人所同化。我在一個僑胞的宴會上，遇到一個菲政府的農林部長，據說他的祖父即為華僑，第二代為土生，第三代即完全土化了。不過此人對中國的印象尚好，自認為中華血統。其他類此者很多，則

皆認為菲律賓人，不願說是中國人，對祖國的觀念已淡忘無遺。我想此種法律，完全是一種同化政策，我國若不能積極設法挽救，則數十年後，在菲華僑，將盡為其所同化，而不復自認為中國人了。

馬尼拉沒有什麼名勝古蹟，唯有麥哲倫的墳墓，足供憑弔。這一位世界航海偉人，航行一三〇〇九海里，由西方到達東方，不但證實了地圓的學說，而且將西班牙的勢力，引到東方來，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三百六十餘年，將西方的文明移植到菲島上面，可惜國力不振，於一八八九年割讓於美。美國治理菲律賓，於今已五十餘年矣。

馬尼拉的社會情調 馬尼拉社會的情調，非常複雜，乍看好像是全盤美國化的，但仔細分析起來，便知道並不是那麼單純，西班牙的流風餘韻，在那裏還佔很重要的地位，西班牙語言，亦是重要方言的一種。古老而宏偉的教堂，都是西班牙神父在那裏主持着。我曾參觀過一個教堂，它對於當地的天文氣象，貢獻甚大。教堂內置有一種地震儀器，能夠將地震的情形預先報告出來。據說：「菲律賓是太平洋上大震源之一，亦是大風源之一，因為地震，以致氣象的劇變而釀成大風，菲律賓上的大風，便著名於世界。」西班牙式的古舊橋樑，到處還可以見到，橋身彎的很高，兩頭寬，中間窄，有些像江浙橋樑的樣子。汽車在上面經過，有一種不同的感覺，汽車伏就會告訴你：「這是西班牙橋樑」。

菲島上的華僑，大都還保持着中國的情調，什麼「興」，什麼「隆」，中國字與外國字並用的商店招牌，隨處可以見到。會館與祠堂還保留着中國固有的建築型態。華僑辦的學堂，用的是中國課本，教師們講的國語，也很好，可是一般僑胞子弟，認為學習國語和學習外國語，是一樣的難易。而生長異地，反以學習外國語為有興趣，也許是比較適合實用的緣故。我在碧瑤，遇見了個姓陳的僑商，據說是當地木業的領袖。他同他的夫人，都是中國古老的裝束。他本人已經六十多歲了，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講普通話，祇懂得西班牙話和福建漳州的土話。我們同行的人，既沒有會說西班牙話的，亦沒有會說漳州

士話的。大家相見，祇是心會，彼此同是中國人，而竟無法用言語來溝通情緒，真是莫大的憾事，這位僑胞，可算是西班牙時代的華僑的典型了。

菲島的社會風尚 菲律賓還有一種尚未開化的土人，無論男女，都有堅強的體格，全身除了一條小布遮蔽下體之外，是一絲不掛的，他們大部居於北部的山上，房屋的構造很特別，四條柱子架搭成一間小屋，屋頂用葵葉覆蓋，代替瓦片，遠遠望去，好像一個鳥窠似的。他們有一種原始的木刻玩具，是遠處來遊歷的旅客所樂購的紀念物，也就是菲島土人原始文化的代表作。土人的戲園鬥雞場，我都去參觀過，完全是東方情調，沒有一點西洋色彩。菲律賓各地，均有電影院，放映的片子，都是美國出品，終日開映一個片子，循環不已，不分場數，隨時可以入場，隨時可以離場。有的是從頭看到尾，有的是從尾看到頭。祇要你願意，接連看兩次也沒有問題。這是與我們國內電影院習慣上不同的地方。菲律賓人對於音樂，具有特別天才，不但國內以此為職業的很多，就是大郵船上以及上海香港，隨處皆可以見到非人的樂隊。菲律賓的民主政治，是美國化的，我到馬尼拉的時候，適值議會選舉，街道上到處可以看見競選的宣傳標語，五光十色，引人注意。投票期間全國一律禁酒，預防酒後滋事，影響治安。那次選舉的結果，奎松獲得了最大的勝利。

菲島的文化 美國人對於菲律賓的教育，可說是完全成功了。他們統治菲島，不過五十餘年，培成了美國式的菲律賓文化，不論小學、中學、大學，在外表上說，都是美國式的建築，就內容上說，都是美國的課本，美國的教法。大多數的菲人，都認識了英文，學會了英語，菲人本來祇有極簡單的文字，與極複雜的語言，現在突飛猛進，幾乎完全變成美國的文化了。有人認為這是菲律賓文化的滅亡，我則認為這是菲律賓文化的改造。因為那些原始簡陋文化，本來是不值得去保存的呀！

菲督府裏的大油畫 我們考察了馬尼拉社會的外形與內幕，進一步還想去參觀菲政府的許多重要建

設，如海軍基地、砲台、大水利工程、大水電廠、金礦等。但非得菲督的許可與介紹，是不能達到目的。於是我們到總督府裏去會見總督，在會客廳裏看見一幅很大的油畫，畫的是西班牙政府時代用絞刑絞死主人的狀態。被絞的人，肌張睛突，正在作垂死的掙扎，絞手也在那裏竭其全力，以盡殺人的責任。兩個人一為求己生而掙扎，一個為謀人死而努力，這種矛盾的殘酷的景象，表現得非常深刻。這幅酷刑掛圖，佈置在督府客廳之內，不知是要暴露以前西班牙政府之虐政呢？還是作為現政府施政之警惕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菲島的避暑勝地——碧瑤 菲督已到碧瑤避暑去了，我們空跑了一趟，殊覺失望。菲島地處熱帶，那時正是炎熱的暑期，政府及海陸軍的美國人員，大都到那裏去消夏，衛署兵營，差不多都變成了一座空屋。我為達到我參觀的希望，同時馬尼拉的氣候，實在熱不可耐，也就到碧瑤去走一遭。由馬尼拉到碧瑤，大約有一百多公里，先由馬尼拉乘火車北行，至仁牙因港附近一個小站，約摸兩小時的時間，沿途是很平坦的田地，都是甘蔗園及蕉蔴園。糖是菲島的名產，沿途見到很多規模宏大的糖廠。蕉蔴亦是菲島的特產，形似芭蕉，而不結果。蕉皮可製成韌長而潔白的蔗絲，菲列寶草帽與草蓆，都是這種蔗製成的，並不是尋常的草蓆。浙江的餘姚、黃岩、溫嶺一帶製草帽的原料，就是菲島所產的蕉蔴，我們在一兩個小站下了火車，換乘汽車，折向東行，約摸四十五分鐘，就到達山巔。霎時間，宛如身出火坑，進入清涼境界，心神為之一爽。

碧瑤原是一座荒涼的高山，並無什麼名勝古蹟，山上原始的松林，極其茂密，拔海在三千尺以上，比之我國廬山的牯嶺街，還要高些。他的氣溫，比馬尼拉低得好幾度，開關的歷史，並未很久，當美國人初佔菲島開始經營馬尼拉的時候，氣候炎熱，惡性瘧疾，流行甚劇，美國官兵病亡者頗多，於是用科學方法來撲滅瘧疾。我在馬尼拉曾參觀過美國煤油大王以一百萬美元捐築之瘧疾館，那裏有許多人在培

養研究由野外採集來的各種各色的蚊虫，他們曾放映一張關於瘧之研究的影片，由瘧蚊卵子的孵化，幼虫之生長，瘧蚊之長成，及瘧蚊如何吮吸人血，瘧菌如何傳染人體，原虫如何發展，血球如何破壞，疾病如何變化，從頭到尾，一目瞭然。在十數分鐘內，將瘧疾的原理，說得清清楚楚。科學之造福人類，真是偉大極了！但是科學能破滅瘧疾，還不能改變氣候，爲求比較適應人類生活，還祇有在大自然的環境去找尋。碧瑤這個山地，正是理想的目標，既可避暑，又可避瘧，開山闢路，經營建造，美國政府爲完成這個嶄新的美國型的避暑勝地，曾費了很多的金錢。邱陵起伏，地形頗爲開闊，不似廬山黃山那樣的峻拔，而另有挺秀的風緻。那裏也有操旅館業菜館業以及種地種菜的華僑，他們多半都是廣東人。我住在一家華僑開的華盛頓旅館，據說在我到達不久以前，我國府主席林公，曾寄寓於此，可惜時機不巧，未能在此見面。

我在碧瑤，曾參觀一所非人辦理的初級農業學校，擁有面積廣大的農場。學生一進學校，即分組分授耕作地畝，教師一面授課，一面教以實作。並由學校供給種籽，貸與資本，肥料，每年收穫，即運至市場銷售，所得之值，除歸還學校資本外，即爲學生所有。一個學年的收入，可得百餘菲元，四年之後，學業既成，資本亦有著落，儘可以自謀生活。我覺得這個辦法，非常完美，如有機會，很希望在國內試行一下。我住在碧瑤不久，即去會見菲督，請求備文介紹參觀其他的重要地方。在他簡單的別墅內，亦是他辦公的地方，作了二十分鐘的晤談，我們的談話完畢，他的女書記已將各種介紹函件用打字機打好，經他簽字之後，即封好交給我，完成了我的要求，外國人辦事的簡單迅速，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一個偉大的水利工程 我得到菲督的介紹信後，即下山回到馬尼拉。首先去參觀一個偉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這個工程的地點，離馬尼拉城約四十多公里，係將二條很大的河，截斷了，設有利用水力自動升降的水閘。在河的左岸，開築一個水門，總渠長二十多公里，支渠數目甚多。灌溉的面積，約有七萬

多赫特（赫特約等於中國三畝）。據一個菲律賓工程師告訴我們：「這完全是美政府投資建設的。一切的工程設計，都是美國人主持，建設完成後，則交由受灌溉田畝的居民，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保管，並逐年攤還政府的資本。現在這個工程的資本，已經還清，工程的所有權，已為地方人民所公有，美國人也不再顧問了。從前這個地區，易遭旱荒，自從水利辦好，不虞此等災歉，因之生產日增，民間富力日強，土著對於美人，無不表示感激」，這位工程師並云：「水利工程的最基本工作。在灌溉地區的水準測量之正確，因為一切水利工程設計，都要拿他做基礎，往往因為水準測量不正確，以致工程完成後，有完全不能上水或局部不能上水的事情發生，或有水量不足之虞。那時更要修改，就費事了。所以他們在全部工程實施的過程中，水準測量的工作，佔了大部份的時間，其他工程敷設的時間，則並不很長」。他並表示，如果中國要辦水利工程，菲律賓有很多的專家，都願意到中國來服務，而且保證技術的完善。我很感謝他的誠意。

參觀水電廠 第二個參觀的地方，是馬尼拉市東北八十五公里卡科來谷附近的偉大水電廠。這廠設在一個很大很高的深山谷底下，負責的是一個美國工程師，他曾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教授，招待我們非常殷勤。我們在水頭入口處他的臨時住宅內，進了一頓午餐。據他說：「這個水電廠，可發動七萬多匹馬力，是菲律賓最大的一個電廠，就是在整個亞洲，目前也要算是數一數二的了。所發電力，除了供給馬尼拉全市及沿線附近各村鎮應用外，尚有餘剩。」電廠的全部工程，是新近才完成的。現已開始放電，那個作為水源的小河，流量並不很大，而且山雖高，山水構成的瀑布，一個個不相連接。我便問他：「這麼小的水源，何以能利用它發生這麼大的馬力？」他笑着那破舊的板屋說：「我在這裏，已經住了三年多了。第一個工作，是測量雨量。第二個工作，是工程設計。這條河流的水源，雖不很長，但是這帶山脈的雨量，是非常之多的。一日之間，總有一兩次的大雨，或小雨。每年平均雨量，總在三千六

百種之間。(按：我國雨量，以福建西南部為最高，平均不過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種，)是菲律賓雨量最多的地方。河水每日至少要漲一次，你們今日很幸運，沒有遇到大雨。」說到這裏，他又手指對山的烏雲說：「你們看，不久大雨就要來。」果然，不到一會兒的工夫，雲霧滿山，大雨傾盆而至。倏後，他領我到水頭入口處參觀，見一條直徑三公尺的大鋼管，將全溪的水，導入管內，大鋼管係由山腰打通，直通至山腳的腳底下，成爲一個人造的大水柱，並不須利用天然的瀑布。由入口處到谷底電廠，水位差爲六百多呎。隨後至一個升降站上，進入升降箱，係懸在兩山間架設的鋼纜循環軌上。用電力將升降箱移至電廠的上空，再徐徐下降，到邊電廠的下面。要上來時，則徐徐上升，仍回到原來的地方，比上海世界飯店二十四層樓的升降機，要高出兩三倍。發電廠在深山窮谷之下，汽車火車都不能通行，一切機器及建築器材人員等都賴這個升降機來運送，亦算是一個奇觀了。機器日夜在那裏轉動着，電力不斷在那裏發生着，使百十萬人得到了光明。我們不禁又想起愛迪生的偉大，科學的萬能，我問他：「萬一天時大旱，打破了你的雨量紀錄，又怎麼辦呢？」他搖搖頭，指着天空，對我笑笑。

美國駐菲的海軍基地 第三個參觀的地方，是小呂宋烏卡維特省的美國駐菲海軍基地，距馬尼拉市水路是十哩，陸路是二十哩。我們向菲督的一位副官，乘坐小汽輪前去參觀。那裏有設備完全的海軍醫院，電力強大的無線電站，海軍陸戰隊的營房，修理船艦的乾船塢，與修理場停泊場。我們均經一二參觀，並在那裏午餐。距此西北方十多海里處，有一個柯里幾多島，是控制馬尼拉灣入口的要塞。柯里幾多島的北面二三里，即是巴丹半島，亦爲海陸軍的重要根據地，爲一九四二年麥克阿瑟將軍最後抵抗的據點，亦可見形勢的重要了。我所能參觀的地方，可說是比較普通而可以許可外人參觀的軍事基地，覺得沒有很大的價值。於是要求再到柯里幾多島的要塞上去參觀，却被提督畢特婉言拒絕了。他說：「時前恐怕來不及，而且風浪太大，小汽輪會發生危險」。自然，我也知道那個地方他不會允許外國人前去

參觀的，而他謝絕參觀的言辭，却絲毫不露痕跡，使人感到很滿意。他並且說：「美國因為華盛頓條約限制，且菲律賓不久要獨立，美國不便在菲律賓積極設防」。這也許是實在的情形。那時畢特提督已六十多歲了，將屆退休的年齡。民國廿五年，他的後任提督到中國來游歷，我在漢口接待，問起畢特的情況，那位提督回答說：「他在紐約替一個寡婦管帳」。我聽了，不勝驚訝！問他：「一個地位高貴的提督，怎麼會願意屈就寡婦的帳房呢？」他說：「退休的提督，能有機會替一個有錢的寡婦管帳，倒也不大容易，也可說是幸運的事」。這個回話，使我深深感覺到人生職業之可貴，宦海浮沉，又有什麼價值呢？

美英法三國的殖民政策 我曾住過法國的殖民地安南，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這三個殖民地的宗主國，比較起來，美國可說是開明的，他對於菲律賓的態度，是友愛的，善意的，用美國的教育方法，來提高非人的知識，用美國的科學生產，來發展非人的經濟，以期逐漸達到平等解放的境地。我們可以說，美國對菲律賓，是父子兄弟的關係，不是主人奴隸的關係，這是美國偉大的地方，也是他成功的地方。英國對於香港，就不同了。英人的秉性，富於保守，對殖民地的設施，也是保守的，雖然在物質建設上很努力，而於教育文化之促進，及風俗習慣之改良，並不注意。固然不能說這完全是惡意，但英人之不願殖民地人民有長足的進步，是無可諱飾的。法國對於安南，更不同了，她對於安南人，正以強大的控制力，阻礙他思想學術經濟的進步。因為不如此，惟恐安南人不甘馴服，而起來革命。社會上一切惡習慣，隨處暴露，毫不取締，而任其滋長。我們又可以這樣說：「法國對安南是壓制的，英國對香港是蠶食的，美國對菲律賓是解放的。所用的方法既不同，而所收的效果亦各異。安南的革命運動必有爆發之一日，目前的馴服，不能算是法國的成功，正是法國的隱患啊！」

開住殖民地的感想 一個下台的軍政人物，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做寓公，表面上好像很安閒，而實

實際上並不盡然。既不能討好於這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設法親近你，拉攏你，甚至有許多人原來的立場各不相同的，因為大家都成了失意者，往往就在「失意」的這個相同點上，漸漸接近起來，另作新的利害結合。我與汪精衛方面，本來是敵對的，後來大家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因此逐漸接近，而大談其團結。租界地殖民地真是一個融化萬流的大壺呵！租界殖民地的士紳，對於失意的軍人政客，應酬也特別殷勤。表面上好像是對你表同情，其實是「燒冷灶」，完全為求日後往來親密着想。至於軍火商人，買辦階級，為預謀將來的利益，亦各獻其殷勤。是以往來應酬，就幾無虛日了。

日本對於隣邦政治失敗者的陰謀，英法殖民地政府，一向是採取「治安第一陸鄰第一」的方針。失意的軍人政客，祇要不煽動他的民衆，妨礙他的治安，他也很放心很寬大的讓你居住下去。他也不想利用這些人，來擾亂鄰近的地方政府，他對於鄰近的地方政府，祇要不損害他的利益，便見神就拜，固不問其是那一種偶象。但是日本人就完全不同了，日本駐在中國租界內的領事，特務武官，平時除了治理正面的工作之外，對於政治失敗者的幫助聯絡，是無微不至的。如軍人政客逃亡時，他可無代價的盡保額與收容的義務，祇要你求於他，無不盡力辦到。在中國近代的內亂史上，不論是南方北方，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這是日本一貫的政策，他保護這些份子，是要造成中國不斷的內亂，以完遂其吞併中國滅亡中國的陰險企圖。甚至想收買這些份子，為他日後的傀儡。現在偽組織的大小漢奸，在失意時，沒有一個不與日本人發生過關係的，這就是日本最後的收穫。我要旅行日本的消息，被日本人知道了，於是廣州的日本領事矢野真，香港的日本領事清水，都來找我，替我辦護照，寫介紹信，打聽船期，請酒餞行，說不盡的殷勤週到。日本藝妓的情趣，牛肉鍋的滋味，我也都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嘗試到的。

香港人愛好運動之一斑，香港這一塊「維多利亞王冠的寶石」，她有明媚的山光水色，有清潔整齊的市街，有安定的秩序，有便利的交通，一切內地所沒有的物質，一切內地所沒有的自由，假使你有錢

看開的話，都可盡情的享受。香港人對於運動，有特別的興趣，足球一項，獨開我國風氣之先，技術亦為全國之冠，球員終年在球場裏踢球，市民們也終年在那裏觀看，而不覺有片時的厭倦。每當環球大賽的時候，入山大海，搖旗吶喊，各有聲譽，有如對敵作戰的情勢。賽馬是大眾公開的賭博，為實辦階級的高尚娛樂，馬注高坐看台，密切注視人獸最後一刹那之勝負，勝者則視同拱璧，敗者則棄如敝屣，此種運動，已失提倡尚武之初意矣。游泳在香港更為普遍，不但海水清潔，場所衆多，而且設備完全，一到夏季，男男女女就以海灘作為他們的消遣地方。既可健身，又極經濟。有人估計，香港的夏季，每天有五六萬人浸在海裏，約佔全港人口十分之一，可見香港人愛好游泳之一斑了。

有趣的香港政令。香港政府的行政，有好些是值得我們稱道的。我最覺得有趣的，是獵狗規則與禁止虐待動物的規定。獵狗規則裏規定，某種鳥在某個季節裏內，才准獵取，到某個季節，即行禁獵，倘果違犯了，就得受相當的處分。此外並且劃出一個區域，作為禽類安全棲息的地方，任何季節，都禁止在那裏打鳥雀。如果牠們有知識的話，飛到那裏，就是快樂的天堂，牠可以大膽的立在獵人的面前，獵人亦祇好對牠望環，而無可如何！

香港人到菜市買來供膳食用的鷄鴨等活東西，都得像抱嬰兒一樣，把牠抱回，才可宰殺。禁止兩脚朝天，倒吊着拿回。否則警察看見了，就要干涉，或處罰。理由是這樣：倒提着會使牠難過，而成為虐待的行為，我有一個朋友，打得一個受傷未死的鳥，警察看見了，要他立刻處死。據說：「牠已受傷，就不願使牠多受痛苦。」那個朋友與他爭辯，結果，被罰了三元，這是有法律根據的。因此我想起中國也有過「秋斃多狩」，「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名言。但是實行的政令，却見諸外國。同時我又覺得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人類，受虐待的情形，恐怕比鳥類厲害的多，不知他們立法的時候，也曾想到及此否？

回籍安葬先母靈柩。我在菲島考察了一個多月，本想由那裏轉赴台灣，再到日本去。因為接到蔣先

生的電報，要我不必遠離。同時先母又定於八月間安葬，於是復經香港返籍，完成先母的喪葬之禮。先母自去年逝世，因我兄弟皆遠在外鄉，停柩在室，已一年多了，而今兩廣軍事已局部停頓，我乃得有回里奔喪的機會。人亡愀在，觸目傷心，人子之痛，今猶未已！

「九一八」事變發生，葬事既畢，本擬在鄉小住，忽閱報章刊載「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晴天霹靂，觸目驚心！我雖閉居，而雲恥救國的責任，無容諉卸，乃匆勿離鄉，先後在縣城及梧州召集大中學學生及當地機關人員，勉以放棄內爭團結救國之大義。本着內心義憤，發為激烈言辭，不意反增各方之誤會。乃赴香港，從事奔走陳說，冀作萬一之補。

中國自華盛頓會議之後，朝野上下，多認為處列強均勢局面之下，可以苟且偷安。於是內戰循環，此仆彼起，幾已不知有敵國外患矣。「九一八」事變發生，一時間，雖驚醒了國人的迷夢，而倚賴國聯的干涉，冀望事愆不致擴大，得如十七年日軍佔領山東旋復撤回之故事，仍為一般同具的心理。故奔走呼號者，雖不乏人，終不易激發麻痺着的人心。大勢既屬如此，我祇好墊居香港，隨俗浮沉，而內心的憂憤痛苦，固與時俱積也！

廣西代表團赴滬共商和平統一「統一團結，共禦外侮」。這一個全國一致的呼聲，響徹海內，終於使分裂的局面，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兩廣方面，派了代表團，到上海去商量和平統一的問題。代表團以汪、孫為領袖，我既不是兩廣方面的代表，亦未負有中央方面賦予的使命，而是以私人資格從中奔走的一人。他們邀我趁及臣總統號輪船一同北上，船在中途遇我生平未見的大風浪。我對唐孟謙說笑話：「假使這隻船沉沒了，國家一定可以減少許多的糾紛，大家既不能「同舟共濟」，若能「同舟共葬」，亦是「樁好事」。船將近黃浦碼頭，就見到一艘小汽輪，張了一幅大黑布，上面寫着：「上海各界歡迎各方代表」十個大字。「團結禦侮」，「和平統一」，這一類的標語，更是五光十色的，佈滿了船的

四赦。表面上看來，似乎非常莊嚴非常熱烈的一回事，可是大家上了碼頭，便一哄而散，各走各的路了。代表團在上海，與中央方面的代表，舉行一度會議。雙方商定，重行分配中委名額，由粵方就現有地區召開代表大會，加選中委。粵方中委選出後，再召集中央全體會議，實行統一。這次會議，我並沒有參加，等到粵方中委選出後，我也隨同赴南京，出席第四屆一中全會。這次全會，關於中央政制上，有一個重要的決議，就是修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以年高德劭的同志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並不兼其他官職，而另以行政院負責實際行政責任。這個修正書的原則，也是上海會議時商定的，全會不過提出作成正式法案而已。本來此種修改，是不合於國難嚴重的時勢之要求的。於法亦無依據。按照訓政時約法的規定，國民政府主席是享有實權的元首，五院院長，均由主席提請國府任免。經過這次改制後之主席，則不負責實際責任，無任免五院院長之權，由實而虛，兩法完全抵觸，這完全是遷就當時情勢的不得已的措置。根據這個決議，選任林子超先生為國府主席，汪精衛為行政院長，數年來分裂的局面，至此在表面上總算告了一個段落。和平是實現了，但是否真正統一，還是一個謎。

「一二八」事變期中的香港民衆運動，我於全會閉幕以後，又回到香港。不久，「一二八」的淞滬砲聲響起來了，在華南的人聽到了，自然要比「九一八」的瀋陽砲聲驚心得多。十九路軍及第五軍的英勇抗戰，引起華南人民極大的興奮。但因實力相差太遠，終不免於敗退，使閩北成爲廢墟。香港人民因此更起了一次極大的衝動，對於住在香港的日本僑民，加以激烈的攻擊，日本商店的玻璃窗，都被打個粉碎。數十個日僑，或受傷，或擊斃。香港政府對中國雖表同情，但爲了治安及外交責任，不得不出而彈壓。一方面通知日本人居家不出，暫避羣衆的怒潮。一部份日本人更自動的回國去了，以往那種目空一切的傲慢態度，也改變了許多。這一次對外的民衆暴動，雖然有幾個中國人進了英國的監牢，但日本人的槍砲，始終不敢向我射擊。被打死傷的日本入，也無法取得優越的賠償，可說是中國對外的民衆暴

動最便宜的一次。不過暴動的地點，不在自己的國土，而在英領的香港，究竟算不了什麼體面的事。

劫後淞滬一瞥 戰事至三月初，因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之退出閩北而告結束。中日雙方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我既不出國，就不能長久開往下去，國家正在統一的時候，也急於趕赴南京，擔任一種工作。當港滬輪船進了吳淞口的時候，同船的人，無論男女老幼，無不羣集船舷，引領眺望。由吳淞口以至閩北一帶地區，真有偌大的吸引力，吸引了我們的視線。那些斷垣殘壁，瓦礫廢墟，甚至為刺目，比這「吊古戰場」交，不知要傷心多少。這便是「二二八」戰役所賜予的啊！我到了上海，曾僱開船車到閩北吳淞一帶，對這個新戰場作了一帶巡禮。昔日的繁華，於今盡成灰燼。而被難的英民，又紛紛在廢墟之上，重新建立其生活的根據地。我試問那個軍快說：「假使十九路軍不抵抗日本火，上海是不是可以不致弄到這步田地？」他說：「假使我們的軍隊不打，這些地方的房屋財產，自然可以完全保存，但是國家的體面，却要喪失光了。現在僅僅是這個地方受損失，而國家的體面仍得保存。依我看來，還是打的好。」他的語氣中，似乎對我的問話，表示一種驚訝的不滿意的態度。可見國民的認識是正確的，這些勞動階級的認識，實在比有產階級要清楚得多，因為他們沒有自己利害的關係呀！

十一 內政部工作時期

中央統一後之國府新陣容。二十一年的春天，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在首都南京舉行，兩廣方面所有原來和新添的中央委員，都到來參加，這是數年來分裂後統一的實現。國民政府也就在這時候實行改組。林公子超，以年高德劭，被選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孫科任立法院院長，居正任司法院院長，戴傳賢任考試院院長，于右任任監察院院長。行政院各部的人事，亦隨之變動：我任內政部長，羅文幹任外交部長，何應欽任軍政部長，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朱家驊任教育部長，顧孟餘任鐵道部長，陳紹寬任海軍部長，陳銘樞任交通部長，陳公博任實業部長，陳樹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這是和平統一後，中央政府的新陣容。但胡展堂先生在廣州，仍有他自己的作風，兩廣依舊和中央對峙着。可以說這次國民政府改組，祇是中央表面上的統一，而尚未達到全國真正的統一。

這個中央統一的新陣容，基礎並不十分堅固，在三四個月內，行政院內部首先發生了裂痕：交通部長陳真如（銘樞）提出辭職。他辭職的原因，非常微妙而複雜，當時我不很詳細知道，現在更記不清楚，但知中央對他的辭職，既不好斷然的批准，又不好堅決的慰留，結果是給予出洋考察的名義而另行派人兼代，這個代理人必須得到三方面的同意，作為過渡的橋樑，等到兩方面都上了岸，然後再將這橋樑拆除，中國政治上的人事問題，類多如此解決。這次陳真如辭職，我是被認為適宜的橋樑，而代理他的職務，一直等到兩方面的人事都安排好了，才解除了兼代的責任。

不久，汪精衛又向中央提出辭職，並且立即離開南京，回到上海。這次的風潮比陳真如的辭職大得

多了！當時行政院的各部會首長，因為院長辭職，同時都向中央提出辭呈，表示責任內閣關員共同進退的意思，這次的風潮，我又是從中奔走斡旋的一個，這個軒然大波，隨後由林主席出面，對全體分別予以慰留，但同時解釋行政院並不完全是責任內閣制，暗示即使院長辭職，各部會長也應繼續負責，不能全體辭職，致陷國家於無政府狀態，我記得蔣先生亦有電報分致各部會長回京繼續供職，可是有的是立即回京，照常辦公；有的仍逗留上海，汪精衛更由上海遷居莫干山休養，表示政治的病態。我被推到莫干山去向汪氏問候，並勸駕回京。這個任務，雖未完成，而我却無意中遊覽了浙江的一處名山——莫干山。這裏是滬杭富有人士避暑消閒的地方。山雖不高不秀，而建築佈置却充分表現出人工的技巧；尤其是萬竿翠竹，綠葉生涼，為他處所不及。山上有著名的肺病療養院，據說整個莫干山的氣候，都適宜於肺病的療養。但是汪精衛的病，却是肝臟病，是否適宜，就難說了！我去見他的時候，他躺在床上，好像有很重的病。陳璧君一見我便說：「汪先生病得很厲害，醫生要他靜養，你切不可同他多談話，使他心裏不安！」並且同坐房內，好像監視一般。我將來意陳述，並轉達了南京方面的意思，請他早日回京主持政治，他手指着自己的肝部說：「據醫生診斷，肝臟已經腫脹了好多，病情非常不好，不但一時不能回京工作，而且要到外國去作長期的休養。如果病好了，一定還要回來與大家共同努力」。他不肯和我談政治問題，祇是說些病症及多謝南京方面同人關心的話，弄得我無從開口，而陳璧君又頻頻要我到外面客廳裏去坐，祇好告辭出去。本來要人病多，時時都有些不易根治的病症帶在身上，政治上二不如意，就會發作起來。我既不是醫生，自然無從診知他病的真假輕重。於是毫無結果的回到南京，他不久也就出國休養。一直到二十二年春長城的戰事發生，才回來實踐他「共赴國難」的口號。

軍事時期的內政部是一個冷衙門。內政部是在糧道衙門的舊址，民國元年，我在那裏入伍當小兵，不料二十年後，我又在那裏主管一部的事務，實不勝今昔之感。衙門是舊建築，破壞不堪，沒有其他各

部的堂皇美煥，一望而知它是一個冷衙門。但是內政部在行政院各部會排列的順序上，居於首位，足見立法的初意，視內政是很重要的工作。古人所謂「作內政以寄軍令」，可知內政自古就認為是建國的最基本工作。可是因連年戰事頻仍，為適應當前需要，自以軍政、財政為急先之務。加以國家未統一，軍事未停止，內政的工作，實也無從設施。所以歷來內政部等於閒衙，部長好似院內的備員而已。自十七年四月一日成立以來，在四年又一個月的時間，已更迭了十個部長。第一任為薛篤弼，第二任為閻錫山（未到部，由次長趙戴文代理部務），第三任為趙戴文，第四任為楊兆泰，第五任為鈕永建，第六任為劉尚清，第七任為李文範，第八任為汪精衛（兼任），第九任為馮玉祥（未到部，由次長彭學沛代理部務），我已是第十任了。在行政院中可算是最冷落最不令人注意的衙門了。革命政府之下的機關，仍不免有些北洋政府時代的習慣。即是有錢的非常闊綽，無錢的窮苦萬分。我記得有一年尾，很多有錢的部，不是發雙薪，就是給獎金，這些冷衙門的屬員看了，自然很為難過，很為不平，我為感情所驅使，不能不向他人請求幫助，在當時固然覺得非常難為情，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難過。在革命政府之下同一的機關工作人員，為什麼有這種不平的現象，而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當時雖說是國難時期，有錢的人或有錢的機關，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總免不了公私應酬，各樂其樂的。我們那個窮衙門，自然談不上如何的闊綽，在二十一年過年的時候，那裏同仁，大家湊集一些錢，作一次聚餐，並且由擅長遊藝的同志舉行一次歌詠會，凡是同人及其眷屬都去參加，情形也相當熱鬧，也算是窮人過年苦中求樂的辦法，而南京的某小報竟大肆譏評，以為在國難期間是不應該如此。弦外之音，似乎想借此題目，有所發揮。事情鬧到汪精衛那裏，汪精衛說：「共赴國難，並不是如喪考妣的痛哭悲號，臥薪嘗胆，不過是後人的形容詞，難道真是夜夜臥薪，時時嘗着胆麼？」這話，我倒頗同意他。同時想起社會上私人及公共的娛樂，不知要比我們部裏一年一度的聚餐及歌詠會要奢華得多少，為

什麼就沒有人看見，就沒有人說話？

內政部的涵義是太廣泛了，幾乎把全國的行政都納在一部的範圍之內。且組織法上規定構成內政部的單位，爲民政司、警政司、土地司、禮俗司、統計司，還有衛生署，全國禁烟委員會。每一個司、署、會、廳的事項，都是全國普遍性的，必須全國統一，而且要很多的錢，很多的人，才可以將工作展開。在民國二十年以前，全國各省正忙於分裂的內戰，即使中央有很多的錢，很多的人，也無法展開工作。所以那時一般人對於內政部看法，僅是中央組織上一個形點式的綴品，並不見得是行政工作上的急要部門，一直到現在，這種情形還沒有完全改變，中國因內政的基礎不穩固，而影響到其他的行政工作都不能有條理的順利的進行，真是革命建國期中的一個重大缺憾。蔣先生在「中國之命運」上說：「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國民自己的掌上。」就是這個意思。抗戰勝利之後，建國工作更爲繁重。近年以來，內政部原來主管的衛生、地政、水利等雖已分別獨立，而剩餘的工作如地方自治、戶政、警政、禮俗、統計等，其在國家行政上的重要性仍是非常顯著，實有加強努力的必要！

我在內政部的作風。我到內政部後，雖說在那種情勢之下，不能十分開展我所主管的業務，但我的工作興趣並未減少，每日按時到公，按時退值，將過去部員開散的風氣改變了許多。那些例行的文書工作，固然有很多是無補實際的，但許多實際問題，亦須從這些上面探討出來。在我代理交通部的時候，汪精衛曾對我說過：「不如你就真除交通部，而把內政部讓出來」。我說：「我仍舊喜歡做內政部，因爲我不是交通人才，而且那邊情形太複雜，恐怕應付不了」。其實，我又何嘗是內政人才呢？汪精衛說：「不料季寬先生對於內政部的工作倒覺得有興趣」。他的意思是這種工作，於我過去工作的歷史不甚接近，未必是我所願意的。也可以表示那時各部的輕重，不是以事業爲標準，而是以收入的多寡及人

的關係爲標準的。我隨將內政的重要任對他陳述，望他以後加以注意。我對於用人方面是取量才器使的宗旨。當時部內除了新調一個次長甘乃光，一個總務司長黃祖培及幾個庶務人員之外，其餘都是原班人馬，並不出乎當時那些部員意料之外，並且打破了當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風氣。因爲中國政界的陋習，往往一個長官更調，部屬亦大部隨而調動，所以到任的時候，各方介紹人員的八行書比公文書還多，應付非常困難，有些長官在到任之後，多在報紙上大登啓事，以局面狹小，粥少僧多一類的話謝絕各方對於人員的介紹。我既不願登報，而對於介紹書信，除了必須答復者外，祇好投諸紙籠，因此可省去許多的麻煩，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我這種作法，不但在內政部時如此，即在交通部及各省也是如此。而我的收復，即是隨處都可發現有能力的幹部，爲國家効力，爲個人分勞，比較吸引自己有關係或視爲親信者要得力得多，而我每當職務交卸的時候，又省却了爲所謂有關係的親信者善後安置的麻煩。我常說：「一個長官如果認爲某一個公務員是自己的人，無異是侮辱了這個公務員的人格。某一個公務員如果自己認爲是某個長官的人，亦無異於自己侮辱自己的人格。一個公務員職位的保障，要在國家的制度上，自己的工作上去建立，不能在人的關係上去追求，這才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光明現象」。

我在工作上所遭遇的兩個阻礙，我對內政部的工作，除了整頓內部之外，首先想明瞭各省實際情形。因爲我覺得中央與地方的隔閡，必須溝通。往往中央立法，因不明各地方的實情，以致制頒的各種法令，地方無從奉行。因地方之不奉行中央法令，遂引起中央與地方意見之分歧，由彼此意見的固執與擴大，而演成中央與地方之對峙分裂的形勢，很多不幸的重大問題，其起因都很輕微的，若能從這些地方着手注意，於國家之統一，政令之推行，未嘗不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於是我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增設內政部簡任視察人員，派赴各省視察政情，以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政情，但因這種工作，不是低級人員所能達成任務。於是會議席上有些人因爲不明白這種作用，以爲是增加高級人員太多，經費的支出太大

，而不予通過，使我非常失望！我又鑑於全國水利機關，如華北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導淮委員會、太湖水利委員會等，有的是屬於內政部，有的是屬於其他部會或者是無所隸屬的。內政部組織法上既有掌管全國水利行政的明文，自宜設法統一，以便管理。我曾將這個意見，呈蔣先生，蒙他採納，准用他的名義提案提出中央常會討論。但是因為人事利害的衝突，雖然原則通過，而無形擱置，無法實行，這是我在內政部工作時期首先受到的兩個阻礙。我才感到全國各省的真正統一固然很不容易，就是在首都的範圍裏，要求各部門工作的意志與步調的統一，也很困難！

召開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 在廿一年的十一月間，內政部召開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全國各省的民政廳長，省市警察局長，都來參加，即當時尚在對峙中的廣東、廣西的廳長、局長，亦都到來，情況空前熱烈。不僅會議本身的收穫良好，而會議以外的政治的收穫，尤為偉大。中國的政治問題，是最複雜的，在統一中，有矛盾，在矛盾中有統一。比如在分裂時期中，司法是統一的，郵政是統一的，海關是統一的，教育也有一部份是統一的。在陸軍大學裏，各方面的學生都在一個講堂裏面，一同學習各種作戰的方法。畢業回去之後，就站在各人的立場上敵對作戰，好像戰國的時候孫臏和龐涓同師鬼谷子，後來各事其主，而互相殘殺，歷史的事實真有遺傳的麼！這次的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也就充分表現矛盾中的統一。這種情形真有些令人費解！

這一次會議的內容，雖然很複雜，我們是設法使它簡化。比如民政、警政、土地、水利、禮俗、衛生、統計等都是先由部裏作成各種詳細而具體的方案，在提案審查時，將各省的提案研究其是否可行而分別歸併在某種方案之內，再提出大會討論，使各方面的提案均成為大會的提案。因為過去一般人對於各種會議的性質，尚未能認識清楚，不論任何會議，都以為同國會的性質一樣，某人要爭某人提案的通過，某地代表要爭某地提案的通過，某黨要爭某黨提案的通過。國會的會議，就是政治鬥爭的舞台，這

種鬥爭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是行政會議的性質就不同了，它是施政的方針與方法的決定，並不含政治鬥爭的意義，並且應該設法避免含有政治性的鬥爭，如果在這種行政性的會議而含有政治性的鬥爭時，不但這個會議的本身得不到好的結果，而且要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政治統一問題，因為那時候國家的統一，尚在動盪之中。我之採取這種辦法，固然是會議上的技術問題，亦願慮到政治上的問題。所以第二次內政會議，不像其他會議決議了幾十件的提案；或通過了某人或某地的提案，而是得到推進各種業務的幾個完整的方案，可算是一種創作，也可算是這次內政會議的一種收穫。我以後在各省任內所舉行的行政會議，都是採取這種方式而逐步加以改良。現在各省各地舉行各種業務會議亦多採用這種方式了。

在內政部掌管的幾項主要業務，我現在回想起來，尚有分別作比較探討的必要。一方面固可明白當時內政不能進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為今後推進內政工作的參考。

縣政建設問題 最重要的是縣政建設問題。國父在建國大綱上規定縣為自治的單位，也可以說縣為國家的基石，一切內政設施都要透過縣的組織，才能開花結果。縣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但是自民元以來，縣的制度是破碎了，各省有各省的作風，一地有一地的辦法，還比不上滿清時代在形式上——人事與組織——倒有一個統一的規模。各省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單就我所經歷的廣西來說，在民國十六年以前，就不知變了多少花樣。這種變化，多半是根據主管人的意見，及當時財政的狀況而決定的。在我的任上——民十四五年間——曾行過縣政包辦的辦法，即每個縣政府，僅由省政府委了一個縣長，規定其每月應用的錢，至於組織如何，人事如何，省政府就不再過問，省所要求於縣的，亦僅是田賦的收入，治安的維持，其他的問題，就視為無足重輕了。所以在那個階段裏，當縣長的，對上級政府僅是系統的關係，人和財的關係，而對地方的行政設施，可以憑着各人的良心與見地，為所欲為的做去。

有若干人的確爲地方里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貪污枉法或是無所建樹的人也太多了。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於十七年九月公布縣組織法，十八年六月，修正重頒。這個組織法的內容，與各省實際的情形相差太遠，實施的結果，成效不著，而且有很多顯著的缺點，以致不能完成建立縣政規模奠定自治基礎的功能。

那時候政府對於建立縣制的情形如此，在野的人士，却很有些人各就其理想，致力縣鄉建設的研究實驗工作。他們的動機，也許是因爲對於現行地方政制的失望，而想在縣以下的鄉村，作爲研究實驗的對象，然後進而普及於一縣，以探求地方建設的途徑。所以那時候是談村政的人多，而談縣政的人少。如河北的定縣，山東的鄒平，河南的鎮平，都是在野人士從事村政的實驗基地，這對於以後縣政的演進有很大的關係。我爲了要明瞭各地實驗研究的情形，以爲改進縣政的參考，特先去定縣作實地的考察。

定縣的實驗工作，是晏陽初、陳筑山等領導的，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爲領導的組織。他們認爲目前中國人民所患的病症是貧、弱、愚、私四個字，要醫治這四個病症，必須從教育着手；以生計教育治其貧，以衛生教育治其弱，以文藝教育治其愚，以公民教育治其私。他們是完全站在教育的觀點上來從事鄉村的改造的。他們所用的經費，是美國煤油大王洛氏基金捐助的，並且還有一個美國人參加這個工作，因爲煤油大王同情於中國無教育的人民，在他賺來無數的金錢中，撥一些出來作爲一個慈善的試驗。數目的多少，雖無從知道，但我想總不會比他在中國賺去的錢百分之二還多吧！

我在定縣參觀了兩日，城裏鄉下都到過了。站在教育的立場來說，確有好多地方是相當成功的。他們要我批評，我說：「在現社會裏，如果離開國家的行政系統，想從旁得到政治上的成功，是不可能或是極不容易的事。平教會的目的是政治的改革，所用的手段是教育的方法。想單獨用教育的方法來達到政治的改革，就是有政權的關係，亦屬不容易，若果離開了政權的關係，那就更困難了。」我希望他們

要進一步的透過了政府的關係，以期收到更偉大的效果。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士，認為自己都是清高的，官吏都是污濁的，而不知道清高的人士不肯積極參加行政工作，擔任政府官吏，可以使行政界中，愈加沒有乾淨的人。同時這些所謂清高的人士，一旦作了官吏，是不是能夠長久保持他的清高而不同流合污起來，也是一個問題。

鄒平、錢平的研究工作，都是以鄉村建設為基礎的。我因時間的關係，未曾前往參觀。他們的作法不同，收效各異，不能相提並論，却都引起了當時社會上的注意，因此產生了實驗縣的設置：定縣方面，是崔六丁擔任實驗縣的縣長，廣西方面亦設了一個實驗縣——賓陽實驗縣，由定縣平教會聘去的湯茂如擔任縣長。山東的鄒平、荷澤等都陸續改為實驗縣。以後他們所收到實驗研究的效果怎樣，不得而知。更進而有江甯實驗縣，蘭谿實驗縣的設置，各省亦有相仿的設施，這就是當時縣政演變的情形，也是我國縣制改進史上的重要過程。

派員赴各省籌備地方自治 實施憲政為本黨革命建國的終極目標，地方自治的實行又為實施憲政的前提，一個自治之縣，必須完成建國大綱第八條所規定的條件。所以在訓政時期的縣政工作，就以完成地方自治必備的條件。但在當時（廿一二年）有好些省份，剛脫離軍政時期，有好些省份還在軍政時期，要整齊劃一的同時實施起來，當然有很多的困難，而在內政部的職掌內，自治是首要的工作，若等待全國各地訓政時期的完全到臨，而再同時開始自治工作，不知等到什麼時候。我以為不管怎樣困難，準備的工作，總應該先着手進行。在全國第二次內政會議之後，我就決定由內政部委派各省自治籌備委員，協同各省政府籌備自治工作的進行。在當時部裏要直接委派人員到各省去籌備自治，也有相當的困難，因為有些省行政當局，認為自治與官治是衝突的，至少認為自治時期尚未到來，所以在人選的方面，就大費斟酌。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找到各省可能接受的人。結果總算還好，選派去的人員，沒有被擋駕

回來的。有的人到省以後，工作進行非常順利，有的人在省裏開着沒有事做，但在當時的情形，也祇好任其如此。派到各省去的人，我都記不起來了，祇記得派到浙江的是許蟠雲。

自治與保甲 從廿一年至廿四年間，正是中共在作歷史上大流血的時候。爲對付他們在地方行政組織上，恢復了古舊的保甲制度，表面上看起來，保甲與自治是衝突的。所以當時在南京，就有自衛與自治之爭，好像保甲是自衛的組織，是自治的工具，與自治根本不相容。但事實上，保甲制度因爲組織的嚴密，與法令上的嚴厲，對於人的控制，事的進行，都發生很大的效力。所以當時又有先辦自衛，復辦自治的折衷論調。其實保甲組織與自治組織，在形式上並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方法上一個是自上而下的要求，一個是自下而上的發展。而在當時的形勢與需要，自下而上的發展的效率，是比不上自上而下的要求來得迅速有效。所以在那時候的環境與需要，實施保甲制是必要的。就在抗戰的期間，保甲制度亦發揮了偉大的效果，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當時持反對論調的人，一方面僅是在表面上立論，同時還受到另一方面影響。因爲這種嚴密控制的組織，是反對中央統一的人所最不利的。於是就在自治的理論方面借題發揮，做出他們別有用心文章來。

報紙刊物的審查問題 內政部的職權，好多是分割裂的。如報紙、刊物的登記檢查，圖書、雜誌的審查，電影戲劇的審查，依照規定都是內政部主管的，但這些事項，當時真正的管理權卻不在內政部，而在黨部及其他的部會裏，內政部對於這種工作就好像一個備員，並不十分過問。我到任後，覺得這個情形，不甚允當，總得認真去辦理才是。縱然不能完全由內政部掌管，至少亦要與其他機關有同樣的努力，才不負了應負的責權。我確定了這個工作態度，起初就不免着與其他機關發生爭執的地方，最有趣的，是電影檢查，他們以爲這是專門的技術，至少要懂得英文才行，內政部恐怕沒有這種人材，所以就由他們作主了，但是內政部派去的人，英文程度也還不錯的。

禮俗問題 禮俗也是內政部主要的職掌，專設一司來主管其事。我對於禮俗，基本上就沒有研究和興趣，尤其是這一司的主管人員不易物色。老的一派人，他們所知道的是古禮舊俗；新的一派人，他所知道的是洋禮洋俗。我覺得在那時候或是現在，我國的古禮舊俗，是否值得維持或恢復，而洋禮洋俗是否適合中國的需要，都成爲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雖然並不成爲社會上的爭端，亦因爲不成爲社會上的爭端，所以就這樣的馬馬虎虎下去，不但內政部無改良與規定，就是中央最高當局，也未決定若何的原則。所謂禮俗司，就是一個極無作用的機構。禮俗原是社會上通行的一種生活習慣，生活習慣是自然演變的，而不是硬性的規定，更不能作永久的規定。在世界交通發達，國際關係密切的現代，必須在國際之間探求一種適合國情，適合世界的良好的禮俗，我們若果還拋棄不了舊的東西，而「敝帚自珍」，那我們就躋不上國際之林，而且要影響到種種思想物質的進步。

我在內政部的期間，是兩年又八個月——二十一年五月至二十三年十二月。自國府設置內政部以至我卸任時止，我算是任期最長的一個。但是我覺得自己對於內政上的貢獻太少了，這固然由於我個人沒有內政的研究與經驗，而當時環境的限制，亦是重大的因素。這個首席部直到現在，還是不怎樣爲人重視。我在這兩年又八個月中，真正致力職掌內的事，實在太少，大部份的時間都用在東南西北的奔走中過去了。我見另章長城戰役宣慰內蒙籌備遠征新騎，這種奔走對於國家有沒有益處，是另一問題，而我個人則增進了很多的認識。因此有人說我不是內政部長，而是內交部長。

每當我去奔走的時候，部裏的工作，都由甘次長乃光主持，他是留學美國研究行政學的，他爲提高行政效率想將研究所得從部裏着手實施，而推及於各省。首先實施的是公文處理程序的改革，他會費了很多心力研究出普通機關處理一件公文從收文到印發，至少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並提出如何簡化程序，以節省時間的改進辦法，這於行政效率的增進，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內政部主管新聞雜誌的登記

圖書的審查事務，全國各地所出版的各種報章刊物圖書，無一不須送到內政部備查的，以前各省的省志縣志存在部裏的也不少，是以內政部實爲全國出版品芥萃的中樞，可惜二十多年來沒有人把牠整理保管而任其散失。廿次長對此却極爲注意，親自督導整理，成爲一個擁有十餘萬冊的圖書館。這件事於以後資料的保存及行政研究的參考具有極重要的價值。內政年鑑也是我任內着手編纂的。我交代的時候，這些事物也算是交代成績的一個重要部門了。

我的後任是黃膺白先生。他是長城戰後北平政務委員會的主席，那時他曾邀我當政務委員會的委員，我因內政部長的身份不便應許而婉辭了，後來北平政委會改組，他奉改任內政部長，內政部就好像內外大員停轉的傳舍，亦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他未到任就因病去世了。

十三 長城戰役

國聯調查團來華 自九一八之役，東北軍事當局因不抵抗而喪失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土地。至一二八一役，上海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奮起抗戰，予日軍以相當的懲創。結果，雖仍是失敗，但因此而使日人知道中國尚不可輕侮。同時他們也還顧忌到上海為世界各國在中國之最大市場，恐怕引起國際的干涉，不得不接受英美各國之調停，而成立了淞滬停戰協定。經此二役之後，我政府及社會人士，既感不抵抗之足以亡國，又鑒於抵抗亦不能勝利，乃要求國際聯盟，出而制裁。這樣一來，却弄得國聯左右為難。他們對於制裁日本，自覺無此力量，對中國合理合法的請求，又不能置之不理，乃以拖延敷衍之計，冀免拆穿「紙老虎」。他們的辦法，是以調停為名，組織國聯調查團，由英國李頓爵士率領。待淞滬戰事風平浪靜，才由歐洲動身東來。先到日本，取得他們的同意，然後再到中國來。他們在上海，在南京以及在北平，都受到中國官方空前的盛大歡迎。一個被強盜劫掠的人家，強盜還盤據在他的屋角，正作繼續洗劫的計劃，事主亟向政府報告，請求緝辦，而政府不馬上派兵剿辦，先派委員來調查實情，已屬非常滑稽。而這被劫的人家，反要對這調查的委員作盛大的歡迎，希望他能夠秉公辦理，驅逐匪徒，追回失物，那更可憐之極了。我那時雖在南京，有參加這種歡迎貴賓宴會的資格，但是由於內心的驅使，也不願前去湊熱鬧，所以對於這強顏歡笑心痛肉麻的一幕劇情，也就無從描摹和記述。後來我在津浦路的火車上，同那些辦鐵路的朋友，偶而談起。他們告訴我這麼一段故事：「因為歡迎國聯調查團北上，把全國鐵路上所有最漂亮的花車，都集中起來，加以整理消毒。唯恐外國委員發現臭蟲，要笑我們鐵路辦得不好，而影響到調查工作，將會不利於我。由調查團北上到回來，祇津浦北甯兩條鐵路上

的員工真是小心翼翼，比之侍候前清的皇帝，坐火車出關，還要週到哩」。即此一端，可見我們對於國聯調查團的重視，與對國際聯盟會的信賴。不錯，他是解決國際糾紛的權威，也是收回東北的主宰。我們希望因不抵抗而失去者，仍從不仗而收回。對於他們所派遣的調查團，自然應該待之以上賓，敬之如神明。然而中國畢竟是失望了！調查團來了之後，不但東三省收不回來，反多花了大筆招待費，所得到的，不過是一本不啻邊際燒棧其詞的李頓報告書。「賤了夫人又折兵」，真令人哭笑不得，下台不得。自己沒有國力，而一味依賴他人，結果總是靠不住的啊！

東北日軍得寸進尺，日本人在東三省，一面是以濟食敷衍調查團。一面是用武力去「肅清」馬占山蘇炳文義勇軍，給調查團一個不好看的顏色。等到調查團離開遼寧之後，他們的「肅清工作」，也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並且漸漸逼近熱河的邊界，準備繼續向關內進攻。中央見事趨愈趨緊急。一面令張學良所部，準備抵抗，並調集華北部隊，準備應援。那時中央大多數軍隊，因受江西中共牽制，無法調動。至廿一年冬初，蔣先生乃命我同訓練總監部的徐副監唐南下，和廣東當局商量。希望他們能出兵江西，担負剿共任務，好讓中央的軍隊，抽調北上抗日。我們到了廣東之後，與他們商量應酬了好多日，都得不到要領。有一天的早上，廣東當局邀我去談話，很坦白的表示：「不但現在的情形，廣東方面，不能出兵。就是日後情形再惡化一些，廣東也不能出兵」。我得到他這個答復，固然是很失望，很憤喪，但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很誠懇的。此公同我是多年的朋友，也可以說是同過生死患難的老朋友。他開頭就說：「我同你是老朋友，無語不可以直說。如果我用假話來敷衍你，不但對不起老朋友，而且會就誤了中央的計劃。我所以不能出兵的理由，想你也明白，不必我細說了」。我得了這個失望的確實答復，祇好離開廣州，匆匆回去復命。他派專車送我們到香港。我同徐景唐說笑話：「二十塊錢的頭等特別快車不坐，要我們坐專車」。因為我們急要離開了這個失望的地方，恨不得立刻就走。坐專車要遲慢一

小時多的時間，真感得太慢了。而且還要給侍役賞錢五百元，才不失坐專車大員的體面，這筆開支，由那一個出呢？豈不是太不合算麼？在車上，愁顏相對，作菓子戲消遣。說期誰負了，誰出賞錢。結果我是贏了，作了大好佬，錢却是他出的，這也是百無聊賴中的一件趣事。

奉命北上指揮長城戰事。我回到南京，祇好據實報告。這時熱河的戰事，已經發生。中央仍是調軍北上。但數量不多，僅徐廷珩一軍第廿五師第二師第八十三師。而東北軍及孫殿英的部隊，都陸續的由熱河邊境，及赤峯方面敗退回來，長城的情勢，日緊一日。蔣先生命何部長張敬之主持北平的軍分會，指揮長城作戰的軍隊，並且組織一個參謀團，要我担任參謀長。我對於這種對外戰爭的工作，無論任何名義，甚至沒有名義，都是願意担任的。就隨同何部長北上，同行還有宋部長子文，他表面上好像是籌劃北方作戰的軍餉，而實際上恐怕還有其他的秘密活動。我們是由南京乘津浦路火車到徐州，再轉隴海路東段平漢路北段而達北平。這樣繞道行遠，是惟恐經過天津的時候，日本的駐屯軍，會對我們發生不利的舉動。我們到了北平，都住在南海的居仁堂內。這時候的北方軍事，都是張學良負責指揮，但東北軍是節節的敗退下來了。他雖然很告奮勇的要率領他駐在北平附近尚未作戰的部隊，到前方去，與敵作戰後的決戰，以洗雪他不抵抗的聲名。但是他的身體實在太壞了。我們曾在顧承王府見到他，差不多每隔一二小時，就要注射一次嗎啡針。每日要在中午十二時以後，才能起床辦公。這樣的人，要上前線去作戰，身體能否支持，固然是個疑問。此外新近調來的西北軍、中央軍，是否肯接受他的指揮，也成問題。所以張氏的下野出國，便成了長城戰役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了。數天之後，蔣先生到了保定，何部長張學良和我，都奉召赴保定。蔣先生除了指示軍事的部署之外，並決定了張氏出國的問題。我們回到北平的次日，張氏即自動辭職，出洋考察，而且即時離開了北平。何部長才正式接收北平軍分會，我也開始執行我的新任務。

我們的軍事部署 這時的敵人已經佔領響驛、承德（熱河省會），平泉、陵源、陵南各地，繼續的向長城推進，分向古北口、喜峯口、冷口各要隘進攻。但榆關（即山海關）的正面敵人沒有什麼動作。第一個原因，是山海關的天險，比較難攻。其次喜峯口、冷口攻破之後，山海關的後路，已被切斷，可以不攻自破。我方的戰略，則在固守各要口，依據萬里長城古代築成的國防要塞，與天然的險要，阻止敵人進入關內。以徐庭瑤軍担任古北口方面，以宋哲元軍担任喜峯口方面，何柱國、王以哲軍担任冷口及山海關方面，並調山西綏遠方面的部隊，由傅作義指揮，担任張家口一帶防務。這種部署，可以說完全是被動的，並無積極的企圖。因為這並不是全國整個性的有計劃的戰爭，而祇是局部的消極的應戰。而在敵人方面呢，亦是乘着蠶食中國的大陸政策，希望完成首先佔領東北四省的企圖。並掌握長城各險要，以為日後繼續佔平津之準備。我們的部隊，除東北軍孫殿英一路由熱河作戰下來之外，其餘都是由各方陸續調來，各部隊到達長城各口的時候，敵人也到達口外了。

各口的戰爭 在古北口方面，我們廿五師就和敵人在那裏發生了遭遇戰。關師長受了傷。他是此次中日戰爭中首先受到陣傷的將官。他回到北平協和醫院來醫治，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代表，以及機關代表，向他慰問致敬，幾乎哄動了整個北平城，這真是他的光榮，也就是國家的光榮。古北口雖然失去了，但在口內的要地，仍舊支持了很長的時間，第二十五師有一連人在一個山頭上作戰，大多陣亡，祇剩下十多個人，敵人要他們投降，那個最後率領的班長拒絕了，並且拚命搏鬥，殺傷敵人一百多，結果是一個個都光榮的戰死。敵人隨後為他們立了一個碑，題曰：「中國的勇士」。日本人的確做得出。他不但對於勇敢的敵人表示敬意，而因此給予自己的士兵，一個很大的鼓勵。其實為保衛國家而勇敢光榮的戰死確是值得任何人敬仰的啊！其實可歌可泣的故事還很多，不一一記述。要之在這方面的戰事，要比其他方面激烈得多，這是中央部隊精神的表現。

在喜峯口方面，我們先佔有地利，敵人進攻，比較困難。宋軍（西北軍）素來是以能守著名的。敵人攻擊多次，均被擊退。有一次，在夜裏大舉逆襲敵人，獲得很大的成功。聽說俘獲了他們坦克車與大砲，及許多的戰利品。西北軍每個士兵，都佩有一把大刀，雪亮的鋒刃，柄上纏着紅綠相間的毛絨與紅布，好像戲台上耍武把戲一樣，確是鮮艷奪目。軍中刀法操演，與槍法的操演，同樣重視。不知他那次逆襲的勝利，究竟得力於大刀呢，還是得力於槍炮呢？這祇有他們自己才明白，而全國的報紙上，尤其是上海各報，就為大刀隊大吹大擂，寫得活龍活現，說是敵人個個被大刀砍死。因而敵人望見大刀隊，就害怕得發抖。上海婦女慰勞會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蓮兩女士，還特地到喜峯口去慰勞，並且手捧着大刀，攝了一個相片。她倆到北平來見我，同聲的說：「這把大刀，還有敵人的血，留在上面呢！」我聽了實在有些好笑！她們好像祇知道喜峯口的神秘大刀隊，不知道其他各口的部隊，同樣的在那裏作壯烈的犧牲，而不去慰勞。我說明了，她們還覺得驚異。停戰後，我在上海與申報館的老闆史量才談起報紙鼓吹大刀的問題。我說：「新聞界不去鼓吹正規軍的新式武器，而來鼓吹大刀隊，不是又要演出義和團的老把戲了麼？」他說：「新的沒有得吹，祇好把舊的來吹吹」。我當時嘆了一口氣，我們的抗戰如此，我們的新聞界也是如此。

處理孫殿英部 其他各處，也有很激烈的戰鬥，但是比之古北口與喜峯口，規模要小一些，所以也不為人所注意，我也不能十分記得清楚了。軍分會的命令，本來是要孫殿英的部隊固守多倫的，但是他退下來了。據說：「祇遭遇敵人的少數騎兵飛機轟炸，就潰退了，情況很不明白，軍紀極壞」。何部長要我前往視察處理。我由北平乘火車到張家口，這時傅宜生（作義）駐張家口，我就同他坐汽車經張北縣沽源縣，到達多倫西南，約一百公里平地腦包，適孫殿英來面談。因為他的部隊，都退到了那附近的地方。據孫氏說：「多倫在地圖上雖是一個大地名，但是人烟稀少，給養困難。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

，無險可守，就是沒有敵人到來，我這兩三萬人，也不能久居那裏。既沒有兵站，又沒有積儲，不待敵人來打死，也必餓死。所以說我軍紀太壞，事實上我是不能不承認，因部隊自開多倫之後，就沒有接濟，不由自己就地徵發，那來得食呢？至於說不見敵人就潰退，請部長看看我那些傷兵，那裏來的呢？務必請部長將我的實情，轉報何部長，並且妥為處理，我一定服從命令，絕無二心」。我聽了他的話，認為也是實情。在那個株樹不生的平坦地形，正是飛機坦克車騎兵發揮威力的場所，不要說是孫殿英那種部隊，就是極好的隊伍，如果沒有足以抵抗的裝備，也是不能固守的；至於他沒有二心，我也無法判斷。在那時却不能不先整頓他的隊伍。於是我答應撥給他四十萬塊錢，四萬袋麵粉，並指定他在沽源獨石口對北對東佈防，這事處理完畢，我就回到北平來。

遊覽古宮與古物南遷 北平是中國的古都。民國四年，我在北苑入伍的時候，雖也到過，但那時不過入城訪友，及聽聽京戲，吃吃小館子，就度過了一個星期的假日。而且北苑離城還有二十多里，一來一往，已經費了好多時間，又不是每星期都可以出來，所以好多地方，都未曾經歷。而那時也還有好些地方，尙未開放。這次在軍事稍暇的時間，就想到以前未曾到過及不能到的地方去遊覽遊覽。古物陳列所，是內政部的附屬機關。我當一個主管部長，自有前往視察一下的必要。那些古物名稱，種類實在太多了，那時我對於這些古董，根本不發生興趣，不過問問他們保管的情形，也沒有工夫去注意牠，考究牠。同時又去參觀故宮博物院，這裏的古物，比古物陳列所還多得多，並且更名貴些。除此之外，我還到各處宮殿去瞻仰瞻仰。在這次遊覽中，我最感覺興趣的，就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洪憲的寶座，與他的儀仗。洪憲寶座是用紫檀木製成的，和廣東最古老的酸枝木大椅差不多。但是四條腿很短，坐的地方很闊，雖有好多精緻的花紋。如果沒有人告訴你是洪憲皇帝的寶座，你一定不會知道他的價值和用處。後來我才想起袁世凱的腿子最短，身子很胖，所以要這個怪模怪樣的東西，才合他的身材。可惜他尙

未坐上去，就倒下來了。我想：「如果他真的坐上了這樣一個笨傢伙，究竟是否舒服，倒也是一個有趣的謎」。這幾件東西，是不公開展覽的。據說：是恐怕有失民國的體面。其實還是恐怕洪憲時代的舊人看到了，有些難爲情，倒是真的啊。這次參觀，使我覺得驚異的，就是古物陳列所所長問我：「要不要帶一兩樣東西回去？」我聽了這話，非常難過。便責備他道：「這裏陳列的東西，可以任由你送人，任由長官來要的麼？可見你們保管的不盡責任了」。他聽了我這樣的話，就轉口說：「並不是這裏已經陳列的東西，而是有些比較次等，認爲不必陳列，且沒有登賬的東西」，這些保管人都是以前傳下來的，中間的弊病很多。據我所知，可以拿假的東西，來換真的東西，所以陳列的東西，是真是假，外人無從分別。而那些保管人又是社會上所稱「考古專家」，他們說是真，那一個同他辨別呢？不久，古宮博物院的盜寶案就發覺了，當北平軍事最緊張的時候，南京方面要將這兩處寶物南遷。而北平方面則以北平地方的繁榮，全靠這些寶物來鎮壓，紛紛起來反對。終以「國寶」應該由國家來保存，決定遷到上海的四行倉庫去儲藏。這是因爲恐怕自己的國力保護不了，還要借租界外人勢力來保護的意思。因內政部有保存古董的責任，爲慎重起見，對南遷的事，特地會同各方辦理。派來辦理的部員，到了北平，就向我們來請示，那時候軍事正忙，我對他們說：「整個河北、整個北平、就要去了，他的代價，不知比寶物大得多少倍，我必須用全力去保護這些土地，那裏還有心機去管寶物？我是重人重地不重物的，隨你們怎樣辦去就是了」。這就是國寶南遷的經過。「八一三」之後，這些寶物不知遷到什麼地方去。反正都是一些歷史的殘餘，我覺得並沒有很大的價值要保存牠，還是積極充實國防建設，才是正當的辦法。不然的話，國土喪失了，國家滅亡了，即使留得那些國寶，又有什麼用處。而且國之不存，寶將焉附，東京柏林的博物院裏，存着好多中國的古董，不是庚子年從北京搬去的麼？

頤和園的天鵝 我有一次同何敬之逛西直門外的頤和園，這是北平最著名的名勝，那裏的景物，的

確是太美麗了！我最愛的是排雲殿的雄偉，長廊的爽直，站在萬壽山上，全園的美景，都收入眼簾，真是心曠神怡，幾忘却長城邊上的連天炮火！我們想到慈禧太后那時的國難情形，也和現在差不多。她居然有這樣偉大的魄力，移鉅大的海軍經費，來造頤和園。把整個國家的大海，築成園內的小海，把整個國防巨艦，改建遊玩的小輪，這個設計，真象徵着當時燕鯨魚的朝政，這等苦中作樂的精神，千古能有幾人？但未知這位太后以及後來遊覽的人，有沒有受到這種象徵的暗示，而發生和我們同樣的感想呢！我們到了這小海岸邊，看到成千論百的白色天鵝，正浮游於泮冰綠水之間，玩味那春天的樂趣。牠們萬不料在這洞天福地之內，會蒙到狙擊的危險。何敬之與我，一向都好獵，隨行都帶有獵槍。我們見了天鵝，獵興大發，便動着射擊的念頭。事前曾問過管園的人，可不可以射擊？你想一個是軍政部長兼北平軍分會的委員長，一個是內政部長兼軍分會的參謀長，要射殺一兩隻天鵝，那裏會成什麼問題。於是我們便開始射擊。轟！轟！這是牠從來未曾聽過的槍聲，於是驚飛滿天，好似白雲朵朵的盤旋在海子上面，徬徨着不知所往。等到槍聲止後，牠們又飛了下來，真像一羣從未經過戰事的民衆，乍然聽見警報，就驚慌萬狀，一到警報解除，又似燕雀處堂，呢喃自得了！我們兩人前後一共射殺了四個。天鵝是一種貞禽，牠的伴侶，是終身不變的，萬一雌雄中，有一方遭遇不幸，則另一方不能再有所歡，而永遠過着牠悲慘的孤獨生活。所以當我們射殺這一隻的時候，那一個就不避危險的宛轉悲鳴，前來救護。有的是和他的伴侶，同歸於盡。這種愛的勇敢，值得我們感動。於是就停止射擊。次日，何敬之請客，就以天鵝肉作名貴的佳肴，所有那時華北的高級將領，及重要的政治人員，都嘗到了天鵝肉的滋味。中國社會流傳一句話：「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其實天鵝肉非常不好吃，簡直同老牛肉差不多，吃在口裏，索然無味，不知爲什麼流傳的俗諺會形容得那樣美法。也許當日我們那些人不是癩蝦蟆，所以就覺得不好吃了！這是我們在北平時時候一件趣事，但也是一件煞風景的事，到現在，我還是耿耿不忘！

北平的新價值 有人說：「北平實在太好了！中西合璧，貧富咸宜，各安所安，各樂所樂，有很多為別處所找不到的特色」。其實這都是一種消閒享樂的君法。她沒有一些蓬勃的生機，而祇是深沉的暮氣，籠罩着偌大的城垣，在歷史上不知埋葬了多少的英雄豪傑，不知消磨了多少志士青年。他祇是葬送歷代皇朝的墳墓；而不是開基創業的源泉，雄偉的皇宮，雖值得景仰，而淪落的皇子皇孫，尤令人悲哀不已。煤山的柏樹是縊死崇禎的工具，南海的瀛台，是困死光緒的監牢，歷史上的悲劇，無一次不在那裏演出，殘渣剩滓那裏值得贊美和留戀。然而就中國地勢講，北平的重要性，是不能磨滅的。他是控制東北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外蒙古對外軍事交通的樞紐，是我們國防上的重鎮。同時河北省境內儲藏有相當豐富的鐵和煤，四隣各省，無論礦產與農產，都以此為集散地。故在經濟上，亦為適宜於建設輕工業重工業的區域。因此我對於北平，不是重視牠的陳舊靜止的歷史，而是重視牠重新創造的將來，但不知這個希望，何時才可以達到呢！

德國軍事顧問 同我在北平担任作戰的指導工作的，還有德國的顧問團總顧問弗而采將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軍官。據說：曾經担任少將級的職務。他們對於作戰上的規劃，並不見得有若何特別高超的見解，而都是我們可以見得到的戰略上或戰術上的一般原則。並且有好多地方，因為他們不明白中國軍隊的情形，而在計劃上，就與我發生參差的意見。例如在同樣大小的區域內，他認為用同等力量的若干個師就夠了，而我認為這一個區域不夠，那一個區域都夠了，甚至還有多餘。又如這一部份軍隊，他認為應該放在另一區域內，因為他不明白中國的軍隊在指揮系統上，有人的關係，在戰鬥力量上，編制的大小，武器的精劣，訓練的久暫，幹部能力的強弱，也各有不同，但他們以德國的眼光來看中國的軍隊，也同德國的軍隊一樣，來擬定作戰的計劃，就不免發生種種的錯誤。但這不是他計劃見地的錯，而是我們軍隊內容的特殊，沒有一定的標準的單位力量，可以用科學計算的方式，求得正確的結果。而

是要計劃者熟悉內幕一切的情形，用感情的神秘的方法，來指揮調度。我對他說明之後，他才恍然大悟。他說：「爲什麼不把他們統一起來呢！」這話，我可難以答復了。他又對我說：「要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增加，不但要充實武器，嚴格訓練，同時還要在服裝方面去改進，有很好的服裝，才可以養成他們的自尊心，不但軍風紀可以進步，戰鬥力量，也可以大大的增加。因爲要發揮至高無上的戰鬥精神，一定要能自尊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啊！」我覺得他這種見解和理論，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隨後他回德國去了，中央又聘了一位德國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將軍爲總顧問，他在德國當了很久的國防部長，他是凡爾塞條約後保育德國陸軍的慈母。有一次，在廬山蔣先生公館內相會，蔣先生提出很多問題來問他。他的答復，我覺得是很謹慎，也很平凡。談到對日的國防問題，他說：「最危險的是這條揚子江，必須沿江建築要塞，及設備很多的流動砲兵，否則一旦開戰，日本的艦隊部隊，就可直搗漢口，打擊到全國的心臟」。這種意見，難道我們都不懂得，而要一個德國的國防部長來當我們的顧問麼。所以我認爲充實中國的國防建設，而聘請外國高級的理論顧問，實在有些不切實用。因爲中國歷史傳統下來的戰鬥理論，戰鬥原則，如孫子兵法等等，都是相當正確，也可以說世界上談兵的理論和原則差不多都是同樣，沒有很大出入的。但是此等談兵的理論，也僅僅是一個最高的空洞的原則。要實施起來，還需要極大的物質，極多的技術，與執行的堅強幹部。現在我們所缺乏的不是最高的空洞的原則，而是物質技術與執行的幹部。由民國十三年以後聘請的蘇聯顧問德國顧問法國顧問意國顧問，茲又回到蘇聯顧問，恐怕都犯了這種的錯誤，而得不到多大的好處。

戰事失利北平告急 戰爭雖在長城各要口穩定了一時，但以我們劣勢的裝備，單憑官兵的勇敢犧牲精神，與那個數千年遺留下來的古老而頹廢的萬里長城，總經不起敵人飛機的轟炸，和坦克車大炮的衝擊。到了四月間，各路部隊，都漸漸的敗上來了。最初是冷口方面的敵人，進佔遵化，宋軍乃不得已而

退守玉田豐潤以北之線，古北口方面敵人，更逐步進佔密雲懷柔，逼近順義，離北平的地方，不過是四十多里遠近。這時候雖已調到山西軍隊的一部，由昌平方面出擊，亦不發生很大的效果。後方又無軍隊可抽調，而且遠水不救近火，北平空虛已極，人心恐慌萬狀。同時接得情報，已有人在平津醞釀類似偽組織的活動，並且還有一些不願再向南方撤退的部隊，參與其事，形勢惡化，已到極點。一天的下午十二點鐘，軍分會的機構已準備撤離北平，並在馬廠的小站上，準備了火車，各人的行李，亦已包紮好了，等待命令一下，就要上車。何敬之黃膺白張岳軍王崑李擇一和我一共六個人，在那裏作最後之會商及部署，據黃膺白報告：「由日本駐北平武官方面所得消息，如果中國方面肯派軍使向關東軍要求停戰，便可立即停止進攻北平，用外交方式，來結束此次戰事。並希望在夜裏二點鐘以前，給他們答復」。我們會商了許久，有主張撤退以保存北平的，有主張先進攻東交民巷的日使館及駐軍，而背城一戰的。有主張派軍使商量停戰的。因為事體重大，那時北平的長途電話，與南京廬山，尙未能通達，無法向蔣先生請示。因此不能立刻決定採用何種主張。最後我提出意見，調兵增援，既不可能，前方部隊，又正在潰退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自難收獲很好的戰果。萬一我們撤退，而敵人利用正在活動偽組織的人物，組織傀儡政權。即以他們作對手，而訂立協定，作為這次戰事的收場，將關東軍撤回關外，並不佔領平津，那時我國家的損失，更為重大。所以我主張一面佈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軍使商量停戰。萬一停戰不可能，我們再行退出，就在北平作最後的抗戰，亦未始不可。這件事責任雖然很大，但蔣先生既要我們來負這很大的責任，在情勢緊張而無法請示的時候，我們應當就當前的情況，作適當的處置。萬一以後蔣先生不同意時，我們祇好大家共同負責，聽候國家的處分，萬不能再遲誤時間，而無所決定，使後果更不堪設想。我這番理論，多數都以為然。惟王崑憤憤地說：「我就調炮兵上中華門，對東交民巷轟擊，不管他日本人也好，英美人也好，一概把他轟死，橫直也不過丟了一個北平，使英美旁觀者，也

受到影響。他們吃了這個虧，然後對日本方有所責難，誰叫他們同住在一起呢？他這些話，自然是義憤的流露，終被我們勸止了。他就走上樓去睡覺，不再下來。這是當時一幕緊張沉痛而又帶些滑稽的好戲。

在停戰談判之前，有一天，九架日機飛到北平的上空，飛得很低，機上的太陽徽及駕駛人的面目，都可清楚的望見，那時既沒有防空警報，也沒有防空設備，我和何部長聽到了機聲，才跑出居仁堂到室外的假山石下去躲避。我們的高射炮隊曾經格格地放了幾聲，但敵機並未投彈就飛回去了。似乎是示威性質，事後英美外交界方面，深不以我們的高射炮隊的射擊為然。他們說：「日機不是來轟炸的，向牠射擊之後，倒會引起牠的轟炸或掃射」。揣測他們的意思，好像這種無希望的抵抗與無代價的犧牲是不值得的。但敵機轟炸不轟炸，祇有天曉得，也許祇有他們外交人員才先得了消息。

那時在北平的日本武官的居住和行動，都是無限制的。當情況最緊急的時候，我們調了一部份部隊到城裏佈防，入夜即戒嚴，有兩個日本武官深夜在很僻靜的地方，亂闖亂撞。我們負警戒責任的士兵喊口令，行檢查，本屬尋常之事，可是因此却引起了對方嚴重的抗議。說是我們的士兵拿大刀來侮辱他們，迫他們下跪，作殺頭的樣子。我想這一定是他們憑空捏造出來的，其目的無非要我們的部隊撤出北平城。日本人的扯謊，真可說是不耍本錢的，其中有一個武官，第二天帶了兩個武裝的步兵一同進來要求見何部長，這種武裝求見，在外交上是從來沒有的事。他的理由，說是恐怕生命沒有保障，所以要帶槍兵同來。經再三拒絕而不得，我們不欲多生枝節亦勉強答應了。這種情形，比鴻門宴還不如，實在有陸難堪。這個武官的姓名，好像是酒井隆，真是一個壞蛋，何部長對他痛恨極了。那時候，日本的武官在北平耀武揚威都好像犯了高度的瘋狂症失去了理智似的。

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的經過 黃膺白得到何敬之的同意，就同李石一與北平日本武官商量，到了兩點

多鐘的時候，才回來報告說：「日本武官答應調停，並已電商關東軍的同意，希望我方立刻派定軍使，明日就同北平武官到順義前線去商量停戰」。這事雖然有了一個頭緒，但是派誰去充軍使，更比派誰單獨去衝鋒陷陣的人選，還要困難。因為這是一個忍辱負重的任務，無論辦得好與不好，在個人方面，不免受社會重大打擊，甚至有性命之憂。在中外的歷史上，已有過不少的例子，而在人的條件方面，既要能忍耐，又要能折衝，無論言詞儀表，學術地位，都要相當，才可勝任。於是選派參謀團的徐處長燕謀充任我方軍使，起初他是極不願意的，後來經大家再三勸勉，才啣命而去。由北平到順義，汽車行程，不過一個鐘頭。他於次日一兩點鐘的時分，就回來了。據說，「在順義附近一個村莊內的日軍司令部，舉行了一個接待軍使的儀式後，才開始談判。談判的內容很簡單，由雙方決定，即時停戰。中國軍隊撤退若干里，然後於三日內（時間與日數記得不是很清楚）雙方再派正式代表，在塘沽舉行停戰協定會議，簽訂停戰協定，由駐平日本武官作為見證」。這件事的第一個階段結束了。第二個階段，即須繼續進行。我方以後的代表人選問題。要比以前的更費斟酌。最後決定派熊哲民充任，日方則派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郎為代表。（即現在指揮華南華南敵軍最高指揮官）這是當時北平軍分會處理長城戰役及塘沽協定的經過。這種前方權宜的處置，雖不斷有電報報告中央，但詳細情形，非得有人回去面陳不可。而且對於數日後的塘沽停戰的方針，亦要請示機宜，於是派我在那日的下午五時，專車南下。過天津時逗留了一個多鐘頭，在子少侯主席處，匆匆食了一餐晚飯。並將情形面告，即時開車南下，除在濟南車站上與韓復榘主席作了一個短時間的談話，告知停戰的情形之外，沿途各大站，都準備有升火待發的火車頭，所以連加煤上水的工夫，都未耽擱。由北平到南京，僅費了廿二個鐘頭，真算是一個空前的快車紀錄。到了南京，蔣先生及各院院長都在廬山，本想即時乘飛機晉謁，但時間已來不及了。次日上午，即乘軍用機赴南昌。飛經黃山的上空，俯覽翠峯，宛如春筍，並不見有若何雄奇壯偉的地方，這也許是

心境不同，觀點各異的原因吧。到了南昌，在賀元敬家裏，吃了一餐午飯。又乘南潯路專車到九江，趕到牯嶺，已是午後四點多鐘。在牯嶺飯店的客廳內，瞥見蔣先生。在座有各院院長及中央要人。我在這一星期中，都是過的非常緊張的生活，又加火車的顛簸，飛機的震蕩，氣候的酷熱，精神疲倦，已達極點。一到廬山上面的清涼境界，愈覺昏昏欲睡起來。本來在蔣先生面前，雖不曾下過不准吸煙的命令，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吸煙，就等於受了命令禁止似的。我那時候的確是大疲倦了，好多的事，好多的話，都好像記不起來，說不出來似的。於是我要求蔣先生，准許我吸煙，並喝了一碗極濃的咖啡，精神爲之一振。乃將這一段的經過，逐一的報告，報告完了之後。並請予我們越權的處分。可是蔣先生和各院長聽完我的報告，除了各人補充的詢問之外，並沒有什麼討論與責備的地方。蔣先生並說：「你們這個處置尙得當，事實上也不能不如此處置，以後的問題，我另有電報給何部長」。這個重大的集議，就算完結了。而我呢，喘了一口氣，卸除了千鈞的重担。好好的在山休息了幾天，就回到南京，轉返上海的家裏，不久又回到北平。

日本的關東軍和平津駐屯軍 這次長城的戰役，想起來，不但可痛，又有些滑稽好笑！與我軍敵對的是日本的關東軍，在熱河及長城一帶作戰，而日本所謂華北的駐屯軍，却駐在我們的戰線後方，北平天津——同我們的高級指揮部駐在一起，彼此還保持着和平的態勢。日本駐北平的武官如酒井柴山之流，還不斷同我們互相往來，好像和關東軍是兩個國家的軍隊一般，一個同我們作戰，一個在旁邊守中立。其實彼此却在那裏唱雙簧。我們一方面要與關東軍作戰，一方面又要防備平津的駐屯軍，即使他不我們的後方發動武裝的行動，我們也必須作萬一的準備。平津是他們特務機關的大本營，他們數十年來養的漢奸間諜，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們無論軍事上的一切情形，不但平津方面的日軍，明眼自白，同時關東軍方面，也清清楚楚。關東軍所有的情報，都是平津方面送給他們的呀。我記得因爲冷口被

敵人突破，不得不令何柱國在山海關的部隊，退回灤河以西。那天夜裏下的命令，第二天早上，平津的頗天時報，就把這種消息登載出來了。恐怕敵人得到這個消息，比我們軍隊接到這個命令還要早一些。這種仗，如何打得下去。至於平津一帶的地形，駐平津的日軍，比我們的軍隊還熟悉得多。他的軍隊可以在附近一帶演習，以前陸軍大學（在北平時代）有許多日本的軍事教官，現在都是部隊裏的旅團長了。陸大所有的參謀旅行或演習，都在灤東北平一帶舉行的。這些日本教官率領中國的學生去研究實習，就是他們今日帶了日本軍隊來攻擊我們的準備。駐平津的日本武官亦無一不是時刻準備着這種工作。據說：「土肥原賢二在平津的時候，曾經數次徒涉過永定河，（即無定河水勢變化無定極難徒涉）試驗在何種水量之下，是何種的情形居心叵測，概可想見。總之「七七」以後，侵華的日本將領，大抵是以曾經在中國擔任教官顧問使館武官之流為基幹的。松井板垣東條岡村磯谷酒井等就可作為此軍的代表了。

日本是四重軍事 世界人士都知道日本是兩重外交——軍部和外務部——却不知道日本是四重軍事。陸軍有陸軍的做法，海軍有海軍的作法。而陸軍方面又有關東軍的作法，與平津駐屯軍的作法。甚至軍部的作法與派遣軍的作法，亦有不同。簡直可以說是「五重的軍事」。但是各個的作法說法在表面上雖並不統一，而事實上則互相表裏。祇要與他國家有利，就各別的發展，變出各種的花樣來，作為烟幕，以欺騙我們。可憐我們許多日沐暄，及一般社會人士，還以為人家是不統一的。這糊塗來走這個路線，那個又走那條路線，結果條條路線，都是人家有計劃的布置，最後都是通到東京。我們不知上了多少的當，受了多少的騙。就拿長城戰役來說吧，這是關東軍發展的階段，他的目的，是要把關東軍的勢力，完全掌握東北的四省，所以到了佔領長城之後，他的計劃，就算完成了，並不是他的力量，不能佔領平津，而是要留一段文章與駐屯軍做做。所以駐平武官一說，就可以停戰，塘沽協定一成立，他就退到長城邊上。顯然的，他們是彼此分定界限，顯然的他們是做好圈套，讓我們自己踏進去。廿四年的所謂何

梅協定，廿六年的蘆溝橋事變，就是駐屯軍發展的階段。由此演進爲整個的向中國武力侵略的階段，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實麼？唉！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早在三四十年以前，我們却不知不覺的睡在鼓裏，外交上那得不吃虧？軍事上那得不失敗？長城戰役，祇是猶個悲劇劇中的一幕而已！

長城戰役中的一個插曲 一個國家，打了敗仗，同敵國訂立好像城下之盟的停戰協定，不僅是國家的恥辱，而是每一個人民的恥辱。所以在歷史上，一個國家滅亡了，一定有好多遺民義士，不是自己殉國而死，便是號召忠義，作最後之抵抗，如田橫的五百烈士入海自殺，以殉齊國。鄭成功唐景崧劉永福的繼續抵抗滿清和日本，都是歷史上昭人耳目的壯烈事蹟。

馮煥章先生（玉祥）在革命的人物中，是我久仰大名的，但以前未曾會過面。自北平擴大會議之後，他就隱居泰山，不肯下來。以避風雨的侵蝕。「九一八」「一二八」之後，國內大團結，他才到南京來。我和他初次相見，一身藍色的棉襖褲，襯着他高大的身體，與緊張的面孔，響亮的口音，令人見了，就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感想。後來他又回泰山去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才又遷住張家口。我有一次去拜望他，他請我吃了一頓粗豪的飯，雖然沒有大碗的酒，却有大塊的肉，與很大的饅頭。在長城戰事正在緊張的時候，他在那裏號召抗敵，所有以前西北軍及國民軍的將領，及其散在各地的部屬，都到那裏集結。此外並羅致好些抗敵的文人，成立了一個國民抗敵軍總司令部，他自任總司令，方叔平（振武）孫殿英任副總司令。塘沽停戰協定成立後，這個名目，還存在着。後來經了好多的商量，才取銷了。他仍舊回到泰山去。當他車過北平的時候，好多新聞記者去見他，問他對於時局的意見。他說：「這個年頭很難說話，請大家嘗嘗紅菓（即北方的花紅菓）的新鮮味道」。蓋當時爲二十六年內六月間，正是花紅上市的時候，這又是長城戰役中一個有趣的鏡頭。

南下訪問兩廣舊友 塘沽協定成立了，北平的政務委員會也成立了，在打敗仗之下，簽訂的協定，

那裏會得到滿意的條款？那些不參加打仗的人，及不明瞭當時情形的人，對於政府，自然表示極大的不滿，而加以抨擊。尤其是兩廣及福建方面，離開平津更遠，更不易了解事實的真相。因而謠言紛起，似乎又要發動什麼新花樣了！因此中央又要我到香港去走一趟。這次的南行，並不指定什麼商談的範圍，而是以私人資格，訪問那方面的友好。把華北折衝情形，向他們解說。但是當謠言正熾的時候，新聞記者對於我的行動，非常注意。我爲避免他們的麻煩，很祕密的就上了船。並不是我懶講話，實在是深愧沒有話可以對他們說，但越是如此，而他們便越以爲有重大的祕密的問題在裏面，而越加增多了猜測和注意。我到了香港，很多的好友，都在那裏。我很坦白的將塘沽協定的內容，及我們當時在北平的情形，向他們說明。自然他們在軍事上都是諒解的。尤其是對我個人方面，不會發生什麼誤會。但是政治上的問題，許多不是表面上的原因，而是另有其他的文章，不能在表面上點出題目來。所以我這次南行，根本上就無所謂有結果與無結果。因爲原來就是一個半私半公的行動，大家見見面，談談天，洗洗海水浴，吃吃館子，就算是結果。

赴山西觀光 我在香港逗留了半個月，仍舊回到北平去。因爲我在軍分會，還掛着一個名義，不能不回去結束一下。那時北平已經回復了歌舞昇平燈紅酒綠的景象。三四個月以前的緊張情形，和戰時氣氛，誰也不再放在腦海裏。這時閻伯川先生正在山西進行他的三年計劃。我就借此機會，到山西去觀光。同時因爲「兵工統一」與「同蒲路軌」這兩個問題，受了軍政部鐵道部方面的委託，也要與閻先生解釋。因談起山西的經濟建設計劃，大家都非常興奮。山西人的頭腦，素來以計算周密著稱。省內所有一切的建設，都由閻氏親身掌劃，力求經濟，而不稍浪費。我提到同蒲路（大同至蒲城由山西省籌款建築太原至大同一段已興工甚久）的路軌問題，他說：「如果照標準軌道建築，不但經費一項，山西省負擔不起，而材料亦無法取給。時間方面，更不經濟。照我的計算，建築窄軌輕磅的鐵路，每公里祇需

款一萬餘元，而建築標準軌的鐵道，每公里至少需要五萬元。經費增加五倍，現時那裏有這種財力。至於材料方面，除鐵軌機車卡車要向外國採購外，其餘的一切，均可就地取材，而無須仰給外國。如果要採用標準軌道，則本地許多材料，都不能適用了。我原來預算，三年內就可全部完成，如果一定要用標準軌道，不知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通車。照現在山西地方經濟情形，在運輸上說，此種窄軌的運輸力，至少還可以維持二三十年，正太路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麼？他並指出日本的鐵道建設，也是由輕軌窄軌而逐漸改成標準軌，確是最經濟的辦法，值得我們仿效的。他這種理論，單就山西地方情形着眼，自然有相當的理由。如果就全國的觀點來看，就不見得合理了。但他已堅持那樣做，而一切的計劃，都是照窄軌來準備，怎能把他改變過來呢？在那裏，我參觀了他辦理的許多工廠，有已成的，有未成的，而以太原兵工廠規模為最大。自民國元年經營起，直到那時，已經二十二年了。由他一手經營，逐漸擴充。據說中國的兵工廠，規模之大，首推奉天兵工廠，其次便是太原了。這裏，一個月可以製造三千多枝步槍，若干枝機關槍，二十多門大砲（口徑大至十公分半），數百萬槍彈，數萬砲彈。新近對於砲廠及藥廠，還在那裏擴充。據說藥廠是最新式的，而且產量甚大，我曾經參觀過漢陽兵工廠，但規模遠不及此。那時中央提出「兵工統一」這一個口號的要求。第一是制式的統一，因為太原兵工廠造的是「三八」式的六五口徑步槍，與中央的規定不合。第二是要由中央統一辦理，不能由各省自辦。並且要太原廠南遷。第一個問題，據說為機器所限制，不易辦到。第二個問題自然更有為難的地方。我因問題難以解決，祇盡了轉達部方意見的責任，一切由他們自己去解決，不願多參加意見。

太原的古董商場 太原乃三晉的故都，在這新時代裏，他仍保存着好多古舊的遺跡。榆次縣太谷縣就是古董的集散場，每年都有定期的市場。北平、天津以及上海、漢口的古董商人，都到那裏去採販。其實這些古董，一部份是山西本地古代遺留下來的，一部份是太谷等縣破落富家拿出來拍賣的。在二十

餘年以前，全中國的金融，操在山西人經營的錢莊票號手裏，太谷人就是經營錢莊票號的巨擘。他們不但把各省的現銀賺回家裏，鑄成「沒奈何」，使封掠者望而興嘆。而且把各省名貴物品，賺了回來，以供家人之賞玩。所以在那裏可以買到精緻的廣東象牙雕刻，紅木傢具，也可以買到福建的有名漆器，與江西的名貴瓷器，這都是那些富家的收藏物。民元以後，山西的錢莊票號倒閉了。在整個農村經濟破產之下，他們也漸漸破落了，不能不拿這些東西來換錢糊口，看到太谷縣城裏，一望渠渠的破敗大屋，便可想見他們當年全盛的景況。還有一部份古董，是就地仿造假充的，銷路也很不差。這等山西古董大多數都是轉到北平的外銷市場，許多外國人，都到北平來購置中國的古董。據說每年古董出口的價值，總在數百萬元以上。外國輸入的是現代的機器產品，而中國輸出的，乃是古代的手工產品，這個新舊時代生產技術的對比，是多麼深刻而動人感想啊！

大同的佛像 我在太原遊覽了十多天，就順道由晉北轉向綏遠一遊，汽車越過雁門關，這裏好像是古代對北方的第二道國防線。（第一道在大同以北）雁門關在歷史上更是有名的要隘，舊廟上表濟楊家將的英勇故事，所指的地方，就在這裏。這齣名劇的流傳，使得社會上的婦人孺子，無一個不知道這個地名。但自現代交通發展以後，這裏的地形，便不見怎樣險阻了。我同傅宜生、趙承綬在古代長城的廢堡之下，進了一些粗糙的午餐，拍了一個照片，就向大同前進。當晚，宿在大同。大同爲晉北重鎮，不但在古代的軍事上，有重大價值，速在現代也是同樣的重要。二十六年日軍對山西攻擊的主力，就是由大同發動的。就經濟的觀點來說，大同也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列爲平綏線上四大要鎮之一（即張家口、大同、歸綏、包頭）自從同蒲鐵路完成後，更成爲現時中國西部縱貫線的樞紐，將平綏、隴海兩大鐵路連貫起來，他的地下，蘊藏着極好的煤。據云：「不但品質甲於全國，而且數量亦極豐富。凡是遊歷過大同的人，一定會想到雲崗的石刻佛像，在那裏的居停，必然很興奮的，引導你去遊覽。雲崗石窟在

大同城偏西三十里的雲崗鎮附近，乘汽車祇要大半個鐘頭，就可以到達。是一帶石灰岩的山崗，傍山開窟。這個石窟中的岩石，雕成一個極大的佛像，熬個的石窟，就好像天然的佛窟，以避風雨的侵蝕。在窟壁的各方，亦雕有無數的小佛像。此外尚有露天的大小佛像，係就山壁雕成的。佛像的數目，固然無暇計算，就是那個石窟和大佛像的高度，也無暇丈量，約略估計，總在六七丈以上。我們二十多個人，站在他的肘上，拍了一個相片。我們的身體，和佛像比較起來，真覺得太渺小了！我引用水滸傳上潘金蓮的兩句話：「一竿頭上立得住人，胳膊上走得了馬」來形容他的偉大，實在有些確當。據說：「這個大佛像的雕塑工程，經營了一百多年，才告成功。」此外大同城裏寺廟的壁畫，也很有名。尤其是那個健碩而美麗的半裸體女像，最為壯觀，富有西洋藝術的風味，這是北魏的偉大遺跡。

在歸綏懸吊昭君墓 我們離開大同，繼續北上，經平地泉，轉向西行，到了綏遠的省會歸綏。綏遠自設省以來，進步甚速，在四個內蒙特別區所改設的省份（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之中，要算是最進步的一個。考其原因，可以說一半是得之於天，牠有相當肥沃的土地，與可以灌溉的河流，所以物產頗為豐富。一半是得諸於人，晉省當局在那裏經之營之，不遺餘力，所以他的教育文化政治，都有相當的基礎。綏遠的古跡也不少，最著名的青塚，即王昭君墓，亦在那邊。我們震於昭君大名，也不能免俗的前往一遊。詎知到了目的地，却大失所望。塚在黑河的旁邊，祇是一個大土堆，長着萋萋的荒草，除了一個碑記之外，別無其他的建築物，想不到這位歷史上不幸的女人，千載之下，竟有如此的吸引力，使到達綏遠的遊客，都會到她墓前去憑吊一番，我當時曾吟憶江南兩闕，以紀其事。其一云：

「來憑吊，正值寒鋒高，野草年年燒不盡，夕陽紅照一荒坵，情往水空流。評漢史，千載有春秋，衛霍幾人攘外患，紅顏白骨付胡收，愧對女兒曹」。

參觀民生渠 綏遠省肥沃地區，全在黃河的河套一帶，所以北方人說「天下黃河富一套」。河套就

是陰山以南黃河彎曲的地方。在西爲臨河五原兩縣所轄，在東則爲包頭薩拉齊托克托轄，都是便於灌溉生產豐富的地方。薩拉齊托克托境內，有新近由華洋義賑會所築成的民生渠。我和傅宜生主席同往參觀，先乘火車到磴口，（磴口有兩個，一個在綏遠境內，一個在寧夏境內，按磴口是水入口的意思，這裏是指綏遠的磴口）。然後沿渠流而下。此處原來有一個舊渠，已因年久而淤塞了。華洋義賑會乃以工代賑，捐資修築。全渠長約五六十公里，灌溉的面積，估計總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這渠既名爲民生渠，所以那灌溉區，也叫做民生灌溉區，可惜工程設計，不十分精密，有些地方，不能上水。舊渠改了新渠，尙未見其利益。所以人民甚爲懷疑。因此我想起了非律賓參觀水利工程時，那位專家的話：「灌溉地的水準測量，是農田水利工程的最基本工作」。民生渠就是犯了忽略這個基本工作的錯誤。

一個以教會勢力爲中心的市鎮。中午，我們在一個外國教士主持着的教堂裏午膳。這個市鎮，就是以教堂爲中心，而形成的，他們初到的時候，僅有少數的人家，初來此地的傳教士，亦祇有幾個人。因爲他們根據不平等條約，握有治外法權，不但可以保護他們自己，而且還濫用權力，來保護他的中國教友，中國政府不能奈何他。他有自衛的槍枝，可以保護村坊，土匪也不能奈何他。他有醫藥，可以施恩於平民，他有金錢，可以放高利貸，可以屯積居奇，可以高價購買很大的土地，他有學堂，可以施行奴化教育，自前清咸同年間，他們就到來了。拳匪之亂，亦未曾受到若何影響，反而更威風起來。所以信教的人，一日多於一日。不但這裏如此，其他各縣，亦多如此。據說薩拉齊一縣之內，差不多有半數以上的人信教，其力量可想而知。這簡直不是傳教的行爲，而是以政治經濟文化力量殖民的方式。這種力量，從多方面滲入民間，比武力侵略，還來得狠毒而可怕。那時和我們同行的，還有清華大學剛畢業來此旅行參觀的男女學生。他們也很注意這件事，一個姓蔣的女生問我：「這是內政部應該管理的事，不知黃部長有何感想？」這話，使我窘於應付。我們回到歸綏，就動身回北平，這就是我參加長城戰役的

五 十 回 憶

尾聲。從此之後，我就解除這方面的一切責任，而從事另一個工作。

十四 宣慰內蒙

內蒙改省改縣後的情形 內蒙在中國地理上，現在已僅是一個歷史的名詞。昔日內蒙的區域，包含哲理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六盟。除哲理木盟原屬東三省（遼吉黑）外，其餘五盟，已於民國三年劃為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別區，各以都統總理其軍民兩政。迨民國十六年，本黨奠都南京後，為遵奉總理「民族平等」之遺教，復將三特別區分別改為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卓索圖、昭烏達兩盟，在熱河境，錫林郭勒盟在察哈爾境，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均在綏遠境。自東北四省淪陷後，內蒙的範圍，僅餘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三盟，及察哈爾十二旗羣，（歸察省府直轄）歸化土默特旗左右翼兩旗。（歸綏省直轄）盟之下為旗，為內蒙行政的基本單位。各盟所轄之旗，多寡不等。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人，旗長稱札薩克，是世襲的，為該旗之封建領主，如有過犯，仍得削其爵位，另擇閒散王公之有功績者繼之。盟長副盟長由政府擇其盟內札薩克之賢明者任命之。這種盟旗組織，創自滿清，是清代統治蒙古重要政策之一。自從改省之後，靠近南邊土地肥沃人口衆多的盟旗區域，已經改為縣治，祇剩極北荒漠人烟稀少的地方，尚未改縣，仍以盟旗稱呼。同時為安定蒙人起見，不但盟旗的王公、貝勒、貝子（內蒙札薩克之爵共分六等一曰親王二曰郡王三曰貝勒四曰貝子五曰鎮國公六曰輔國公）等封建稱號，依舊保留，就是地方行政的實權，也仍操在他們手裏。又不僅盟旗如此，在已設縣治的地方，他們對於蒙古族人尚有一部份之統治權。不過前者連滿漢一併受轄，後者則僅是他們自己的蒙古族人。所以在設縣治區的蒙古人，不啻是受到兩重的統治，即省縣政府與盟旗兩重政治組織的統治。

最近漢蒙的惡感和德王的政治慾 本來改省改縣，都是減削盟旗王公封建勢力，及改善蒙民生活的政策。但結果，王公勢力雖受到打擊，而蒙民生活，不僅未見改善，反而感受許多新的痛苦。（詳見下文）於是氣憤不平，而正好作爲王公貝勒貝子輩煽動利用的機會。自革命政府奠都南京，對於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口號，竭力宣傳。起初僅對於宗教的首領，如班禪活佛章嘉活佛等加以羅致，後來對於內蒙的王公貝勒貝子等亦竭力拉攏。民國廿一、二年，如德王（錫林郭勒盟副盟長）等都到過南京，並列席過中央全會的會議。宗教領袖班禪活佛，祇希望中央能援助他回藏，此外並無利害衝突的地方。可是盟旗王公，就不同了。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歡迎席上，德王曾發表演說，其大意如次：「我們到南京來，希望中央對內蒙問題有一個解決的辦法，不意到了南京，終日都是被邀參觀赴宴，或是被請表演騎馬，對於內蒙政治，一字不題，實在使我們感到失望」。他並陳述內蒙自改省縣後，蒙民所受的種種痛苦。當時因爲語言的隔閡，語意的簡單，好多人都以爲是一種應酬話，並不十分注意。而我內心上，就體驗到德王是個政治慾望很高的人。內蒙不久就會發生問題。問題的核心，就是德王的強烈的政治慾。

內蒙要求自治的內幕 日本對於內蒙，早圖染指。侵略內蒙的準備工作，亦早已開始。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此種工作，更加積極。廿一年長城戰事發生，其軍事力量，已侵入冀察兩省的邊上。這當然是內蒙王公所認爲時不可失的抬頭機會。果然，在廿二年六七月間，內蒙自治問題爆發了。當初，平津報紙所刊載的，不過是事實的表層，尙末知道他的內幕，是有強鄰日本爲其背景。他們在表面上是要求自治與自衛，自治要組織自治政府，脫離省的關係；自衛要組織軍隊，獨立抵抗日本。其時正當國軍在長城新挫之餘，許多人因不滿於塘沽協定之成立，與北方政治上的缺點，對於內蒙之自治自衛運動，自然博得一時輿論之重視而有些過份同情的地方。殊不知此種運動，是直接間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動與指使，而爲一個脫離國家統治的獨立運動，這可由此後反復的經過，與抗戰後德王附敵的行動，作爲確

切的證明。

奉命宣慰內蒙 內蒙古自治運動發生後，中央派我担任宣慰內蒙的工作，同時解決內蒙古自治的問題。並派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次青先生襄助辦理。我以內政部長的身份，而對北方的情形比較熟悉，趙為蒙藏會副委員長，而又係與管省方面有關係之人。中央對此事人選，可謂慎重已極。我於奉命之後，即着手準備。並向中央及蔣先生請示方針，均以相機處理，隨時報告，並須與管綏方面閻伯川先生取得密切聯絡相囑咐，但未有具體的腹案指示。中央派員宣撫邊疆，過去未有成例。我們此行，不過是代表中央對蒙民宣示中央德意，與慰問的意思。有人說：「以前滿清派大員至蒙藏，必須置備很多的禮物，饋贈當地的王公與貝勒貝子，如圍龍花，古銅色或黃色的綢緞，銀質的茶壺酒壺酒杯筷子及手錶之類，都是蒙人最喜歡的物品」。我們也都購備了些。各項工作辦理完畢，隨即動身北上。這時已是十月下旬。同行除趙副委員長之外，有李松風、賀揚靈、楊君邁、楊文焯、譚錫吾、池中寬、林競等十餘人，均由中央各機關調派。到達北平後，中外新聞界都非常注意，尤其是外國記者，對於我中央處理內蒙態度，訪問十分詳盡。這事在國內一部份開明人士，雖然感覺到這是一件邊疆重事：究竟深切關心的，却不過幾人。而國際方面，則認為是中國民族間嚴重的政治問題，因為這時，正當東北淪陷，傀儡政府出現之後。而內蒙有類似獨立之要求，實非其他單純的內政問題可比。我當時對中外記者發表談話，認為實行地方自治，是中央一貫的主張，內蒙要求自治，祇要不違反地方自治的原則，中央自然可以允許。不過內蒙王公所要求者，似已逾越地方自治之範圍。中間經過及背景如何，須親到內蒙巡視之後，方能明瞭，然後報請中央決定處理方案。天津大公報，為澈底明白內容起見，特派記者汪君松年同行。蒙方知道我們已到北平，特派代表吳鶴齡（蒙人改漢名者）到來歡迎。這時天氣尚未很冷，但是南方人初到北方，精神上總有點冷的威脅，何況要到內蒙去。而且不能預期什麼時候才能回來，這種威脅，自然更大

。於是我們全體人員，在北平担擱數日，準備寒裝後，纔乘平綏火車向歸綏（綏遠省會）出發。火車上了八達嶺，地勢漸高，氣候漸寒，到張家口，已是口外，塞北風光，迎人隨處，秋高萬樹，葉塵嚴霜，益增羌笛春風之感。張家口爲察哈爾省政府及察哈爾十二旗萃總管公署所在地。我們在此停留一日，晤見察省府各委員及十二旗萃總管尼瑪鄂索爾等。百靈廟蒙古王公方面，派來歡迎之代表包悅卿（蒙人改漢姓的）等，是日亦抵此。我們一度聚談，對內蒙各項問題，稍作詢問後，次日即登車繼續西行。經大同而至綏遠，火車繞行長城兩側，古代國防之偉大遺跡，今日一變而爲旅行中寂寞的伴侶，令人發生無限之感想。車到歸綏，與傅主席宜生及黨政軍首長相聚，交換內蒙方面之情況與意見，對於蒙古自治問題之內幕，知之更詳。

德王發動的自治運動 此次內蒙古自治運動，發生於綏遠境內之百靈廟。這是一個很大的喇嘛廟，地以廟名，位於歸綏西北方的二百五十餘公里，爲北通庫倫，西通齊夏新牆，東通察哈爾北部之陸路交通要點。除了那個大喇嘛廟及數十家多爲漢人所營的小商店外，其餘都是臨時集散的蒙古包。倡議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王公等，皆在此集合，小小一個鎮市，因此成爲內蒙古政治運動的中心，而聞名全國。在這班集合的王公中，有察哈爾省轄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王，綏遠省轄烏蘭察布盟長雲王，伊克昭盟盟長沙王代表副盟長阿王，寧夏省轄阿拉喜靈頓特旗代表以及各旗的貝勒貝子數十人。其中以德王爲主幹，雲王老者庸弱，無所主張，阿王沙王皆傾向中央，內心並不贊成這次的自治運動，不過格於歷史上名義上的關係，不能公開反對。德王當時不過三十多歲，有蒙人強健之體格，有漢人靈活的頭腦，性情狡獪，政治慾望極大，皆以現代的成吉思汗自命。他羅致了好些蒙古知識青年，其中有在中央軍校受過軍事教育的，也有在其他學校受過政治教育的。內蒙古自治運動，雖由德王發動，而這般青年，也是其中推波助瀾的重要因素。

自治運動癥結所在和德王叛國情形 現在內蒙各盟旗，皆在察哈爾綏遠兩省境內，即錫盟十旗，察哈爾旗中之東四旗及四牧羣屬於察哈爾境內；烏盟六旗，伊盟七旗，歸化土默特旗，及察哈爾八旗，其中之西四旗屬於綏遠，在這兩省境內各盟旗的蒙古人口，正在銳減中。去年調查的人數，與今年的實際情形有極顯著的差別。況且歷年又無正確的統計，所以欲指出內蒙人口數，極為困難。但據一般調查所得，最高的估計，不過三十五萬人左右。在察綏兩省人口總數內，僅佔百分之八弱。其分佈狀況，在已設縣的地方，十分之九均為漢人；在未設縣的地方，漢人亦多前往經商者。這些十分之九的漢人，都是歷年從外省移殖而來，尤其是平綏鐵路通車後，外省移來的人口，更是迅速增加。這少數的蒙古人，自然感覺到生活與生存的威脅。他們一向以游牧為生，自改省改縣之後，受到政治法律之束縛加多，這與他們一向的生活習慣，頗不相容。而且放棄的土地日多，他們游牧的範圍，遂日形減少，這是蒙民感受威脅最重大的一端。加以蒙民不善經商，彼此貨物的交換，必須假手漢人。商人惟利是圖，對於他們不免施行種種之欺騙手段，使他們經濟上受到很大的損失。以前有一家規模很大的商號，叫做「大盛魁」的，在北平、張家口、歸綏、庫倫各地都有他的分支行號。內蒙外蒙的經濟權，差不多都是操在他一家之手。內外蒙獨立後，蘇聯嘗以「大盛魁」為背景，作為一個劇本，到處演出他的把戲。由此可見蒙古人所受經濟上的痛苦，比政治上的痛苦，更為嚴重。所以他們之要求自治，其目的在解除經濟之壓迫，恢復游牧的生活。而在王公方面，於未改省改縣以前，整個盟旗就是他們封建的勢力範圍，可以予取予求，不受什麼限制。現在有了省政府縣政府，他們的權力與利益，就日漸減削了，雖然名號尚存，而實際所有，已不及過去十分之二三。所以王公之要求自治，其真正目的，乃在恢復其封建時代的權益。而恰好與一般蒙民，以不同之目的，作同樣之要求。昔人有同牀異夢之說，如今蒙古王公和這班蒙民竟成了異夢同牀了。

綜上所述：種種複雜原因，不但蒙古本身有要求解決的需要，即中央對於國內少數民族的痛苦，亦有應行從早解決之必要。因為蒙古人民生活，若能解決，則德王等決難利用機會以背叛國家，完遂其個人之政治企圖也。可惜數年以來，我們僅僅在宗教領袖及王公方面，做了一些表面上的應酬工夫，而於蒙民之實際生活，未能注意改善，成爲本黨執政以來內政上一大缺憾。不過此次內蒙自治運動，主要的要求，是造成一個獨立的政權，並且對於省縣制度竭力反對，主張將省縣所轄的土地，併入盟旗，而於經濟問題，却極少提及。在當時雖未必即有敵人之背景，而事實上不啻予蓄謀侵略之敵人以可乘之隙。試觀廿四年後，德王曾赴長春見溥儀，並到東京去見日皇。抗戰之後，華北淪陷，德王即受僞命，爲內蒙政府主席，其造因未始非爲廿二年之自治運動也。

斯文赫定博士對於我國邊疆的研究和著作 我在歸綏稍作逗留，先派李松風、賀揚靈等到百靈廟與對方洽商，然後再斟酌情形，親自前去。我在歸綏時，會到一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博士，這人在帕米爾高原及西藏青海新疆一帶，從事探險工作，已歷三十年之多。因高原地帶終年積雪，他在雪光映照之下工作，日久月深，神經異常，必須在白天裏睡覺，黑夜裏才是他工作與活動的時間。這個奇怪的客人，學術造詣很深，對於中國邊疆上的特殊智識，尤爲豐富。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翁，但是精神體力還很飽滿強健。外貌上處處表現出一位經過風霜雨雪長期鍛鍊的老探險家，他把在新疆青海西藏的工作情形，向我陳述，並希望中國政府對於這些地方，多加注意。臨行他把所著的「我的探險生涯」與「萬里長征記」二書，簽名贈我。並說這書已有十多國文字譯本，在學術上、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很重要的價值。我送他出門，隨即把「我的探險生涯」翻閱，文字生動極了，雖然內容大多數是記述在雪山或是沙漠中極乾枯寂寞的生活，却寫得十分有趣，處處引人入勝，使讀者不忍釋手，好像自己親歷其境一般，並可由此得到很多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激發開闢疆土的勇氣。我在兩個晚上，將這兩大本書讀完，引

起了許多感想。斯文赫定是一個外國人，他爲什麼肯費三十餘年的精力，在中國的邊境上，作這種探險的工作？中國的邊疆，實在太偉大了！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這偉大的邊疆，應如何注意加緊開發才是呀！我看完了這兩部著作，在宣慰內蒙途中，不期突發遠征新疆的念頭，這可以說是斯文赫定博士的偉著，鼓起我的興趣來的。

歸綏百靈途中 三數日後，李、賀來電，報告商洽的情形，尙屬順利，請我早日到百靈廟去。我將他們接洽情形，告知傅主席，再與他一度磋商，密取聯絡，並將各種手續辦妥後，即與趙次青先生徐月祥軍長等，一同前往。由歸綏到百靈廟，可通汽車，即綏新汽車路的首段路程，但要越過陰山山脈。在包頭以東，土人叫做大青山；在包頭以西，土人叫做狼山。陰山最高處，海拔二千五百公尺。山上產大角羊，又名青山羊，體重三百餘斤，其角大而彎曲，極爲美觀，外人多用爲室內之裝飾品。羊毛長三寸餘，粗而硬直，但底絨極厚，禦寒力極強，即貂狐亦尙有不及。據聞：「大角羊於大風大雪之時，必至山巔迎風而立，以爲快意」。可見其皮毛抗寒力之強。且氣候愈冷，愈覺溫暖，彌可珍貴。自歸綏行五十公里至武川縣，與東邊之陶林縣西面之固陽縣同在一線，爲綏省山北之三縣，亦是該省極北之縣份。設治時間，皆不甚久。過武川，綏沙拉毛林召，黑沙廟，即到百靈廟。自武川以後，沿途愈行愈荒涼，除一二召廟之外，人烟極少。數次經過小水溝，皆向北流，隨地沒入沙磧之小泊內，道路荒蕪難行，歷七八小時，方始到達，已燈火黃昏矣。

蒙古招待貴賓的禮節 蒙人習慣，遇有迎送大典，必於迎送站所張設蓬帳，爲遠客未到時自己休息之所。蓋荒漠之地，風沙襲人，舍此別無可資坐立之處也。我到達時，各盟旗王公及廟內喇嘛，皆分別設帳等候，已有半日。德王、雲王及各貝勒貝子等，着滿清朝服，紅藍頂戴，髮辮後垂。廟內喇嘛，着大紅袈裟，白塵禮帽，禿頭半露，兩相輝映，另有風趣。我等宛如置身異國，已不復見漢家範度矣。彼

等趨前向我表示歡迎之意後，即各回篷帳，我即依次到德王雲王等帳內答謝，稍作寒暄。至是賓主之禮乃成，各自撤帳歸還寓所。我的行轅，即設於百靈廟內之別院。次日，彼等到來謁見，並獻哈達（哈達，乃長五尺淺藍色之薄綢，上有花紋，爲蒙人見面時表示敬意之禮物）。我亦親到各王寓所，照樣回敬，並將所帶之銀器、綢緞、手錶、茶葉等禮物，分贈各人，蒙人每早初見面時，開口即問：「爾嘗昨夜有沒有着涼？」蓋彼等以爲南人畏寒，故以此相慰問也。是晚，各王公等設饗招待，用蒙俗全羊席。這是蒙人最原始最鄭重的席面，必須有大典禮有貴賓方始舉行。其制，就羊羣中選取最肥最大之羊，宰殺後，煮個用白水煮熟，各賓客盤腿環坐，於客廳四側之炕上，主賓坐於正上方，主人拾全羊置於廳中，先由蒙民唱歌，伴以短笛及蘇拉，其聲高亢而蒼涼。歌聲一起，全場不禁嚴肅起來。歌的意義，據說係祈祝豐年，並爲衆人祝福。歌完，主人德王割羊頭肉一塊，用刀尖挑獻給我，從人並獻奶酒。我右手接肉，左手接杯。主人復依次獻給其他客人，照例不能不受，並須隨即食完，方爲誠敬。我等皆爲南方人，酒酸肉羶，極難下咽。我勉強盡了一獻，以表誠意，幾至嘔吐。其餘諸人，都不能着口。主人見此情形，亦不作二次之獻。隨將局面撤換，改用漢席。席間德王語我：「這是蒙古風俗必有之儀式，明知南方人不慣，故於舉行儀式後，即改用漢席，否則，本爲敬客者，反以困客矣。」民國廿六年，我在武昌招待英國大使許閣森氏，談起蒙俗的全羊席，他也說一個南洋的故事給我聽，他以前在南洋某部落工作，與會長頗相得，有一次，他的生日，會長很誠懇的奉送了一份祝壽的禮品，這禮品不是別的，而是三個血淋淋的人頭，全世界各民族，各有其風俗習慣，如果主客兩方習俗相距過遠，往往主人是表示十分的敬意，而客人反感到十分爲難，上述情形，都是一個例子。

住在百靈廟的班禪活佛。班禪活佛這時卓錫百靈廟，我到時他曾派代表歡迎。據說，佛是超人的，滿清對於活佛，皆敬而不臣，所以他不親自參加王公等有政治階級性的歡迎會。次日，我去答謝他，他

也來我的行轅回拜。這本屬普通友誼上的禮節，當然是平等的。當我到他廟中的時候，其門前地上，放着一塊大木板，有一蒙古人在那裏朝拜，拜法與我們通常所見不同。跪下後，將胸部靠地，手足伸直，然後以頭叩板打響。叩頭後，再行起立，重複照前跪下叩頭，想即是五體投地的意思。如此終日不息的拜，一直拜到活佛出見爲止，才算達到目的，了却心願，若活佛摩一摩他的頭頂，就是無限榮幸的事。這人是由外蒙遠道過來朝拜，已經拜了數日，班禪活佛送我出門時，特別給他摩一摩頂，他就將身上帶着的銀子及其他貴重的物品，盡量獻給活佛。據說有的祇是與活佛見一見面，得不到摩頂的榮幸，也就盡獻其所有了，朝拜活佛的人，所得的結果，各有不同，那就祇能怪自己的誠心不誠心，不能怨佛緣的厚薄了。這裏終年有人前來朝拜，所有獻銀收入，也就非常可觀。據熟悉內幕者云：佛緣之厚薄，與獻銀的多少，頗有關係，獻銀的數目，至少是十兩，班禪活佛的行轅，有一定編制的佛官，並擁有一個一二百人的衛隊，還有一個軍樂隊。他的行轅規模之宏偉威風，比之南京的院部，有過之無不及。他的一切用度，中央都有額定之給予。但是他在盟旗裏面，無論是食的用的住的，無一不是毫無代價的取之於各盟旗，這也是蒙民極重大之負擔。不過在這極端迷信的社會裏，大家却安之若素，並不認爲這是痛苦的事。活佛在盟旗請客的方式，也與普通不同，在一個客廳裏，擺着一張桌子，祇有他和我二個人的座位，其餘的客人，另在一個地方，也另有人相陪，我們到後，他舉行扶輪金鋼法會，爲國家祈福，他請我去參加典禮，我當時頗費考慮，因爲參拜法會，要行三跪九叩禮，這是一樁不甚習慣的事，因此我託故請趙次青先生代表，並邀各同事參加，而活佛臨時將禮節變通，蒙人行三跪九叩禮，漢人行三鞠躬禮，在一個場合中用兩種禮節，亦是二件很有趣味的。

活佛在內蒙，對於宗教上，固然擁有很高的權威；但在政治上，一般王公都不尊重他的意見。據說，這是政教分立的緣故。百靈廟內還有二個由外蒙逃過來的活佛，外蒙自依附蘇聯獨立後，活佛的地位

，已經沒落，他祇好求食內蒙。否則生活無法維持，不免有變成「古佛」的危險。我會經過過，由外蒙到來拜佛的人，我們對外蒙情形，多不甚清楚，也許是不肯對我實說。我問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認識如何？現在外蒙人民得到了些什麼好處？他們的回答，都是支吾其詞。對於共產理論，可謂毫無所知，祇是說他們的牛馬羊等家畜，因為有了獸醫的設備，不致再有因瘟疫而成羣的死亡。這是因為牛馬羊是他們最重要的財產，是他們生命所寄，所以對這種獸醫的設施首先感到興趣。其次，則為現在已不再受中間商人剝奪其應得的利益了。我想這也許就是外蒙政府的一點小恩小惠罷。就政治觀點來說，此種恩惠，僅僅是一點消極的作用，根本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政績，但從眼光短淺知識幼稚的老百姓看來，已經是了不得的德政了！如何施以更有效的方法，從積極方面，發揮政治力量，使蒙古人民的知識水準提高。同時發展經濟建設，使他們得更大的實惠，這不僅是蒙古人民的幸福，對種族文化國防經濟，却有莫大的關係。而外蒙政治的煽誘伎倆，自更無從施展，這是政府當局最宜深切注意的問題！

蒙古人口銳減的原因 蒙古的人口衰退情形，至堪驚人。據我所知，外蒙的人口，不過九十多萬人，內蒙也不過三四十萬人，連各地的蒙古人統通計算在內，最多也不過二百萬人左右。我們回想到成吉思汗及忽必烈大帝的蒙古全盛時代，他們以武力統一中國，縱橫歐亞，必有極強盛的人口基礎，照現在的蒙民人口數量，即使回復到十三世紀，任憑成吉思汗與忽必烈是多麼英勇強悍，恐怕也不一定能統治支配歐亞兩洲廣大的地域吧！照我的推想，當時蒙古人口，必比現在多出數倍以上，總數當在一千萬左右。八百多年以來，何以減少到這個程度？其原因頗多：第一，蒙古人以游牧為生，他們沒有經濟，與文化的基礎，無論在蒙古區域的內外，都容易被有經濟文化基礎的民族所同化。中國就同化他們最大的力量。第二是地理氣候的壓迫，使其不易生活，而向外遷徙。中國古來的外患，都在北方。不是北方民族特別好侵略，而是北方的地理氣候壓迫，他們不得不南進，以求生存。中國是他們認為生活最舒適

的天堂，自然容易成爲他們略取的目的地。我在斯文赫定所著「我的探險生涯」及「萬里長征記」中，看出蒙古新疆境內，以前很多很好的土地，後來因爲沙漠南移，而變成現在的大戈壁，氣候亦隨而惡劣了。故沙漠南移，土地氣候變化，是促成蒙古人外移的主因，外移之後，遂被同化。第三，成吉思汗與忽必烈大帝的武力，不僅是軍隊的武力，而是民族的武力。據馬哥孛羅的記載，蒙古人的進軍，前面是戰鬥的鐵騎，後面跟隨着乘馬的男女老幼，所以蒙古兵到達的地方，亦是蒙古民族到達的地方。因爲武裝移民的結果，蒙古境內的人口，遂大量減少了。第四是滿清統治政策的狠毒。清廷畏懼蒙古，而欲消滅蒙古人，除了戰爭的屠殺外，特別提倡皇教。（卽喇嘛教）清廷用敬而不臣的辦法，來提高活佛及喇嘛的地位，設定種種優待。凡爲喇嘛者，除免除一切徭役外，並給以種種特權。活佛與喇嘛，一切所需，完全由蒙民供應，或給自府庫，使其不勞而獲，以引誘蒙民。並規定蒙古三男中，必送二人去當喇嘛。人民文化低落，易生迷信，經朝廷之惡意提倡，莫不以出家爲無上光榮。是以蒙民爲喇嘛者日衆，幾佔內蒙人口之半數。喇嘛不許結婚，而准許其任意性交，以絕其後代，增加其花柳病之傳染。從而人口繁殖力日漸衰弱。以上所述，皆爲蒙古人口銳減之原因也。

內蒙古自治問題的處理 我對內蒙古自治問題的解決，不採用會議的形式。因爲我的任務是巡視與宣慰，不是會議的代表。而且盟旗王公等知識甚低，根本上他們祇有一個自治的希望，而不能作成有條理有系統的辦法和條款，來提出討論。所以用會議方式來解決這個內蒙古自治問題，是不會得到結果的。王公中間，主張內蒙古自治的德王，便是一個中心人物。而且他幕後尚有若干激進份子，在鼓動着，所以我就以德王爲對象，進行問題的處理。先派李松風、賀揚靈等與德王等代表包悅卿、蘇魯岱等舉行磋商。彼方固執成見，談判難得結果。蒙方要求的條件要點：（一）組織內蒙古自治政府，其區域包括察哈爾省、綏遠省、寧夏省各盟旗，直隸於中央，經費由中央撥補。（二）凡是蒙古人，不論住在已設治地方，或未

設治地方，皆歸內蒙自治政府統治，不受各省各縣政府之統治。(三)內蒙自治政府得自行編練軍隊，由自治政府指揮調遣(四)保證盟旗王公名義永遠存在，並保證以後不再設縣，永遠不再開墾牧區。(五)內蒙自治政府得自行制定法律。我對於蒙方要求，考慮結果，認爲：第一是破壞了現時省的行政區域。不但違背國家既定的政策，即當時各省的當局，亦難通過。第二，在未設縣治區域之蒙人，自可歸其統治，已設治區域，漢蒙雜處，一地區內之人民，決不能同受兩個政府的統治。第三，自行編練軍隊，不但易與各省發生衝突，而且與中央正在進行中之軍事統一政策不符，更須顧慮其易受日本的利用。第四，盟旗及王公之名義，不適用於現代政治。而我即將所定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統方案，稍加增刪，於原案第一條後，增「蒙古原有各盟旗羣之組織及制度仍應保存」一款，於原案第二條後，增「前項地方行政委員會之經費，由中央酌量補助之」一款。並將原案第七條改爲「關於蒙古全體事項，及各地方行政委員會有互相關聯之事務，每年將開聯席會議一次，或由該會議召集全體蒙民代表會議討論之，其議決案呈請中央核准施行」。又於第八條末段，應由「省政府委員會」之下，增「與地方行政委員會」字樣。第十條原文刪去，「另改蒙古地方行政委員會成立後，各省政府，應即停止設縣或設治局」一條。我擬具了這個增刪中央指定方案條文的意見之後，詳電中央請示。次日即奉復電照准。但與蒙方所要求者，仍相去甚遠。中間幾經磋商，幾至破裂。蒙人最主要的目的，要在各省之外，組織蒙古自治政府，竭力反對各省分治。此與當時實際情形和國家政策，極不相容，如這一點能解決，則其餘各點，皆易商量，稍經數度磋商，允許其在百靈廟設立各省自治委員會聯合辦事處，俾資聯絡，其餘各點，大致尚無問題。但他們的內心，自然尚不滿意，而與各省政府之間，問題亦多。後來中央根據我們的報告，並經詳細商酌，特設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辦理盟旗地方自治事務，以示蒙事直隸於中

央，同時亦可調處各省政府與內蒙自治委員會間的糾紛問題。

蒙古人的遊戲和戰鬥生活 我在百靈廟，住有二十餘日，除了處理各種問題之外，並觀蒙人表演的各種特殊技能。最出色者為摔跤，乃人與人之角力。蒙人身強力健，一般均在內地漢人之上，其技術之純熟，亦極驚人。其次為套馬，即以套馬竿在野馬羣中捕捉所需要馬匹之方法，竿長數尺，上端繫極堅韌之索，索端繫小木棒，作成圈套。當日馬羣，約有馬三百餘匹，由我指定一匹，令其捕捉，表演者乘駿馬，手持套馬竿，馳馬向指定目標追逐，相距數十尺，即揮竿擲索，將指定之馬頭擡住牽來，百發百中，很少落空，堪稱絕技。我前在北苑入伍時，據曾經參加征蒙的官兵對我說：「蒙古騎兵除攜帶槍枝之外，還攜帶套馬竿作為武器。迨兩軍銜鋒接近時，即將套馬竿擡我士兵，為其活捉者不少。」此種游牧工具，竟利用為戰爭利器，亦屬至可玩味之事。此外尚有徒手捕馬之法，表演者不持套馬竿，徒手馳馬，闖入馬羣，突然下馬，將一匹正在奔馳的馬抱住，使其一步不能奔騰，其精神的勇敢與氣力的強健，至可驚人！蒙人射擊技術，亦甚精。一日，我與德王到野外遊逛，忽在約模二三百公尺之外，發現一狼，正在奔走，德王的衛兵，持步槍連射三槍，將其擊倒，經檢查命中兩槍，可謂準確已極，蒙古人本來是一個戰鬥的民族，他的生活與戰鬥條件是一致的。蔣百里先生說：「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這自然是指某一時代的戰鬥條件與某一時代的生活條件而言。蒙古人在數百年前，他的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是一致的，所以他能縱橫歐亞，所向無敵。現在蒙人的生活，還是數百年前的簡單的戰鬥生活。即以飲食而論，他們的食量很小，而且很簡單。每日祇是飲食少量的牛奶或羊奶馬奶及干酪（工製的旨士）等而已。穀類僅有炒熟的小米，是與奶類伴食的，並不是主要的食品。食肉雖較內地人為多，但亦不如我們想像那樣的多量。其食量雖不大，而此種飲食品類之營養價值則甚高，取給攜帶亦甚方便，所以他們有強壯之體魄，與迅速之行動。馬哥李羅說：「元朝蒙古的騎兵，可

以三日三夜在馬上作戰」。此於其生活之簡單，與營養之豐富，自然有極大關係。我想蒙古人既是中國國民的一部，他的內部各種問題，今後必須迅求澈底解決，纔能使蒙民人人能成爲中國國防上堅強之分子，這次世界大戰，蘇聯之勝利，不是得到西伯利亞軍隊很大的力量嗎？

蒙古的草原 百靈廟附近地方的土壤，亦適宜於農作物的生長。我曾經在一個小山谷內，發現很大的樹木。其他農作物的繁殖，當然也很可能。蒙古人因過慣游牧生活，不很需要耕地，而是需要廣大的草原。所以對於種植，就向不注意。不過蒙古草原，也快成爲歷史上的名詞，現在草原上的草，已不甚適於馬牛羊的食料，原因是馬牛羊都喜歡吃適口的草，在春夏時期，野草繁茂，自然可以得到充足的食料；一到秋冬，野草枯萎，畜類食料，便漸漸缺乏。蒙人又無儲藏牧草的知識與設備，因此嚴冬季節，畜類就要忍餓耐寒，嚼食覆在雪下的草根。草根既被嚼食，草類的繁殖，便受影響，於是好草一年少一年，蒙古的草原，日漸不適於畜牧。蒙古的馬與蒙古的羊，素著聲名的，可是王公們送我的幾匹馬，都是羸弱不堪，羊亦不甚肥美。其主要原因，即由於牧草不良，食料不足。可見專靠天然爲生活的人類與獸類，終久是要被天然所淘汰的。

政治問題的初步解決 內蒙政治問題，磋商了許久，終未得到具體的解決。氣候日漸寒冷，雖然沒有下雪，小河裏的水，却已完全結冰了。若到大雪之後，道路都被凍塞，必須等到第二年春暖雪溶之後，方能回來。而遠道到來的王公貝勒貝子，亦都因未帶過冬的糧食與工具，亟願早日散去，於是我通知他們，如果在三數日內不能遵照中央指示原則，商定解決辦法，我們決定回京復命，不再等候了。他們遂不再堅持，將我所提的方案，稍加修改，予以承認。並由各王公通電中央表示擁護，至是內蒙自治問題，才算獲得初步的解決，我們一行，即啓程回歸綏。車過陰山時，口占一詞云：

大陰山，朝夕跨，既牧牛羊限胡馬。蘇武留邊十九年，我今匝月歸華夏。（仄韻搗練子）

這時，已是十一月下旬矣，回到歸綏，復舉行漢蒙聯歡大會，閱兵、表演技術、演戲，一連熱鬧了一星期之久。各王公及蒙人到者甚多，洵盛會也！各種事務處理完畢，即乘車南下。由大同乘汽車，繞道太原，向閻伯川先生說明這次處理內蒙古自治問題的經過，再由太原轉北平向軍分會何委員長敬之報告經過情形後，返京作成詳細報告，陳明中央，這一個宣慰內蒙的任務，才告畢事。

五
十
回
憶

十五 籌備遠征新疆

遠征新疆的先聲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正籌議編遣裁兵的時候，忽聞白劍生將由北平率領國民革命軍五萬人赴新疆從事實邊工作的消息，我即去電表示贊佩之意，不料後來因種種關係，他這偉大的舉動，未得實現。連年內戰發生，這等事關國家邊防的大計，也就無人顧問，這真是一件值得痛惜的事情！「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淪陷，國人懷於敵國外患之嚴重，急謀團結禦侮的方策。但其目的多是指當前日寇而言，對於西北的邊防問題，還是很少有人注意。廿二年我北上參加長城戰役，深感新疆問題的重要，如果我們能夠及早措置，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始不可補償一點邊疆的損失。同時新疆的軍事政治，正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時期，實在有趕緊收拾的必要。

新疆的耕地面積 新疆是太偉大了！牠是中國最大的省份，擁有五百餘萬方里的土地，佔全國土地總面積六分之一，比浙江省大十六倍以上。雖然境內有很多的大山脈，與廣闊的戈壁沙漠，因而不能耕種的土地，要佔到三百萬方里之廣；但剩下來的二百餘萬方里可耕地，仍遠比其他任何一省可耕的面積為多。而新疆的人口，僅有四百萬，每人平均可得到半方里的耕地，（約為二百七十畝）這也是其他任何一省所不能及的。浙江全省的耕地，計田二千五百萬畝，地七百萬畝，山一千四百六十萬畝，蕩一百六十萬畝，合計四千八百二十餘萬畝。以二千二百萬人計算，平均每人得二畝二分。可是現在新疆已經墾闢的耕地，估計不過一千六百餘萬畝，僅佔全部可耕地千分之一五。如果二百萬方里之可耕面積，全部墾闢，可得十萬萬八千萬畝，每平方里以五百四十畝計算，假如以每人佔有耕地十畝計算，就可容納一萬萬多的人口，所以開發新疆，真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唯一的要策呵！

新疆的畜牧 新疆是兼寒溫熱三帶氣候的大地。農業之外，最宜於畜牧，自古即以牧業著稱。現在他的經濟基礎，仍建築於農業牧業之上。先說牧業：因為這裏有許多民族，如蒙古族、哈密族、索倫族、錫伯族、克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素來都以游牧爲生。牧產以綿羊及山羊爲最主要，全省約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頭，以其繁殖快，而獲利厚也。其次則爲牛，全省約有一百萬頭。牛有黃牛與羴牛之分，羴牛爲新疆與西藏青海三省之特產，新疆所產者，其身軀比西藏青海產者爲小，登山度嶺，任重致遠，爲他種牲畜所不及，實爲多雪山區之重要交通工具。再次，則爲馬，大宛良馬，已著名於漢代，現時則以伊犁、塔城、鎮西、焉耆等處較多，伊犁所產尤爲著名。伊犁的馬，體格高大，長頸修尾，聳耳怒睛，神采駿秀，適於騎乘。較之蒙古馬，優點尤多，全省約有二百萬匹。再次爲駱駝，即所稱「瀚海之舟」者，是沙漠地帶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汽車路未修通之前，更爲新疆與內地各省的唯一長途旅行工具。直到現在，還不失他的重要性。明駝爲駱駝的另一種，體格強大，耐久行速，勝於良馬。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似即指此也。

新疆的農產 新疆的農產，也兼有寒溫熱三帶的作物。哈密、吐魯番、鄯善的棉花葡萄等，均爲中外聞名的產品。南疆並產蠶絲。其他普通的作物，如小麥、高粱、稻米、包穀、青稞等，無一不因氣候之不同，而異其種類。境內雨水稀少，水利尙未發達，各縣產量，頗受限制。而這種原始的生產，已屬可觀，若將來興修水利，運用科學方法，予以改進，則新疆將成爲我國西北農業倉庫，實可比美於東北也。

新疆的礦產 新疆的礦產，雖然因爲遠在邊荒，未經地質學家的實地詳細調查，無從知道他蘊藏的種類與數量。但就已知者言，如阿爾泰、諾羌、于闐所產的金，和闐所產的玉，在歷史上即已著名。新疆土話「阿爾泰」，即是金子。阿爾泰山，即是金山的意義。又如迪化、烏蘇、綏定、塔城所產的石油

，多流於地面，而未經新式的開採與利用。這種現代工業與現代國防之必需品，多於天山及祈連山南北兩麓隨處發現，蘊藏的豐富，當可想見。這廣漠無垠的大地下面，給予我們無限的希望，而有待於吾人運用科學的技術，努力開發，以應建立工業化的現代國防的需要。

新疆是中國的生命線。新疆西北，與蘇聯為隣。而南與阿富汗及印度為隣。帕米爾高原，有一「世界屋脊」之稱，實為中國、蘇聯、阿富汗、印度四國的天然國界。在過去數十年的邊疆歷史中，英蘇兩國，對這世界的屋脊，起了不少的爭執，今後國際航空日形發達，帕米爾必將成為歐洲和亞洲航空交通的中心，誰能佔有這歐亞航空中心，誰就得到空中的優勢。故今後的帕米爾，必將成為中英蘇三國國防上紛爭的焦點，而值得吾人及早注意的。新疆的種族，也非常複雜，在四百餘萬人之中，詳細分析起來，有十四個種族之多，在中國數千年來，西域的外患，以及最近數十年來新疆問題，大都是由於種族間的衝突而發生出來，這種複雜的民族問題，如果不速謀合理解決，必將由中國的內政問題，而演變為國際的外交問題，這是吾人深為憂慮的一件事。綜觀新疆地理形勢之重要，物產蘊藏的豐富，民族情形的複雜，不僅成為中國之生命線，亦為內政外交變亂之源泉。我之所以要遠征新疆之理由，即在於此。我的志願雖未酬；而其重要性，則任何人所不能否認也。

民元以來之新疆政局 新疆的政局，自民元以後，一直到民國二十年，都沒有什麼波動。究其原因：第一、是由於與關內相隔太遠。在這廿年之中，雖然內戰頻仍，新疆仍能保持安定，未受若何影響。第二、近鄰的帝俄，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由失敗而崩潰。蘇聯革命之後，內部尚待整頓，而且常以和平不侵略為口號。故歷來多事的中俄邊界，亦得以相安無事。第三、光緒五年，回亂初平，全疆收復，國家聲威尚在，即有好亂之徒，一時亦不敢遽爾竊發。諺語「新疆六十年一亂」這正是將亂未亂之時也。

楊增新氏主持新政，十有七年，因有上述種種原因，故政局極為安定。其唯一的政策，為保守新疆

地盤，不被外來勢力滲入。他自己亦無意過問關內的政治。新疆省府廨大堂內，有楊氏自撰一聯：「共和實草昧初開，差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勝境，狃率南回北準，渾噩長爲太古民。」楊氏一生的政治懷抱，可於此聯語中見之。唯民國十一年，楊氏以阿爾泰地當邊要，且爲新疆北方之屏蔽，力請劃歸新疆管轄。蓋阿爾泰原屬外蒙之科布多，自改轄新疆後，不致隨外蒙而獨立。則楊氏之功，亦足多也。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楊氏被刺身死，金樹仁氏繼起秉政，率循楊氏政策，亦無新的建樹。「九一八」後，外患正殷，內亂未已，由東北而影響西北，由中原而影響關外，於是回亂復作，外力乘機侵入，新疆政局，遂陷於長久混亂的狀態矣。

新疆變亂的起因 近年新疆事變之劇烈，實爲前清同治回亂後六十餘年來所未有。其初則爲哈密纏民之變亂。纏民歷來皆受回王的統治，民國初年，因不堪回王的苛虐，曾經叛變一次。民國十九年，新疆省政府將哈密改設哈密、宜和、伊吾三縣。在回王方面，因封建勢力日削，常思恢復；在纏民方面，則因設縣後，回漢稅課不公平，且耕地常被漢人侵佔，積憤不平，回王復從中鼓動。纏民秉性剛良，平日甚畏政府，雖有怨憤，亦惟聯名電請省請願，尙未敢遽然爲亂也。而暴發之機，實由小舖守卜軍官強要纏女結婚一事而起。纏民因宗教關係，素不與漢人通婚，今見卡官誘迫成親，引爲奇恥大辱，於是激起公憤，羣謀反抗，乃於成親之夜，乘其不備，將男女殺死，並盡殺卡兵，奪其槍械。纏民既得武器，公然倡亂。這是民國二十年二月間之事。同時，他處纏民，亦皆起而響應，殺官奪械，達十一處之多，並將附近新由甘肅移來的漢族墾民百餘家，盡行殺死，埋諸土中，以示佔地的報復。

纏民既得槍械，復率衆攻哈密舊城。城陷，漢人無倖免者，省方乃派大兵進剿，纏民見官兵勢大，懼而請降，卒以省軍誅求過甚，纏民無奈，誓死反抗，一方到處煽動，使省軍疲於奔命，一面派員向馬仲英請援。

馬仲英爲甘肅回教徒，這時爲馬步芳所敗，正想另謀出路，遂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率所部四五百人，入新援助繆回，繆民以同教關係，尊他爲領袖，是爲回亂之開始。馬仲英與繆民進攻鎮西，駐軍開城投降，於是聲勢大壯，繼續進攻七堯井，迫近迪化。金樹仁派省軍迎擊，復爲所敗。後得白俄歸化軍二千餘人增援，始將其擊敗，馬仲英部退回甘肅之安西、玉門、敦煌等縣，繆民亦逃匿東山中。本可及時撫輯，以省軍處置過苛，仍四處散伏，與省軍抗拒。馬仲英亦派人聯絡，希圖再舉。省軍既無訓練，又無紀律，時爲繆衆所敗。於是南疆北疆各處繆軍，又都紛起響應，進圍迪化。幸經省軍及歸化軍竭力合禦，終於擊退。

「四一二」政變 民國二十二年春，東北軍蘇炳文李杜王德林等部，由蘇聯轉入新疆。因不滿金樹仁之所爲，乃與歸化軍聯合，驅逐金樹仁，而推舉盛世才（原爲金氏參謀長兼總指揮）爲邊防督辦，劉文龍（原任教育廳長）爲主席，卽所謂「四一二」政變是也。那個時期，也正是繆軍與馬仲英部第二次聯合進攻迪化的時候，繆馬部衆，復進佔哈密木壘河古城，俘獲甚多，聲勢大振，省軍欲議和，未成。中央兩次派員巡邊，中央鑒於新疆連年兵劫，民不聊生，乃派黃次長慕松來新宣慰，黃氏適於此時飛抵迪化，滿擬調和兩方意見，勸導他們一致服從中央命令。但雙方皆無和平誠意，戰事仍然爆發。省方得歸化軍及東北義勇軍之增援，復將繆馬擊敗。馬仲英率衆退走南疆，形成南疆北疆對峙的局面。省方將領多有傾向中央者，盛世才以爲於己不利，將省府秘書長陶明樾、參謀長陳中、航空處長李笑天逮捕槍決。此卽所謂「六二六」政變是也。黃宣慰使之行動通訊皆不能自由，不得不飛回南京。黃氏此行，可謂毫無結果，徒然加深中央與地方之誤會而已。

中央復於二十二年九月間，派外交部羅部長文幹氏巡視新疆，蓋中央對於已往俄人每趁中國內亂，對邊隅無暇顧及之時，卽乘機侵佔，深恐又蹈覆轍，所以特派羅氏以外交部長的地位，親自巡邊，表示

中央十分重視新疆問題，藉以引起強隣的注意，無形中消弭其侵略之野心。故羅氏此行，雖不能達到安內目的，對外方面，却發生極大的影響。

僞回教國的興滅 南疆之亂，自係受北疆之影響，而南疆獨回，又佔絕大多數，乃以宗教為號召，戕殺漢官及漢人。除極少數官吏及漢人平日為糧民所愛護者外，很少能夠倖免。禍害之慘，比到同治之亂，實有甚焉。時省軍因內部不和，屢戰不利，行政長馬紹武，招致黑黑孜族為助，黑黑孜本係以劫掠為生的游牧民族。不久，復為糧民首領鉄來耳所誘，與糧軍聯合，反擊省軍。於是南疆各城，卒為所陷。馬紹武等困守喀什漢城，被攻達七月之久，回衆推舉和闐王為首領，於二十二年九月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一國旗白布中嵌半月及星，並書回教經典標語，這是南疆獨立之經過。僞組織宗教色彩甚濃，不但反對中國，驅逐漢人，即由蘇聯回來之糧民，稍違教規者，亦處於死刑。故無形中成為反對中蘇親近英國的獨立組織，馬仲英因回教的關係，起初和他們聯合一致，後來見他們完全脫離祖國而獨立，乃率所部，於民國二十三年二月間，進攻喀什回教僞政府。糧回首領和闐王薩彼得及其政府官員，逃往葉爾光。回教國的成立，不及半年，即告消滅。馬仲英氏此舉，在國家民族立場言，實有極大之貢獻。此段經過事實，在國內知之者甚少，而在國際方面，則載之甚詳，可見國人對邊疆問題之忽視也。馬仲英既驅逐回教國，而省軍復臨其後，馬氏乃逃入蘇聯境內，解除武裝。至是，南疆變亂之局稍平靖。新疆在國防史上的重要 內亂與外患，往往是連貫的，內亂易致外患，幾成為中外歷史上一定的法則。一個國家的內亂，大之足以招致整個國家的淪亡，小之足以招致邊疆土地的損失，這也是一個不變的定例。

新疆自漢唐以後，疆土日開，到清初康熙征服準葛爾之亂，天山北路之四衛拉特，全部盡入版圖。而藩屬之效順者，有哈薩克、布魯特、霍罕、安集延、塔什干、布哈爾、阿富汗、與都斯坦等十餘國。

當時西域範圍之廣大，南及坎巨提，西至阿富汗，北逾齊桑淖爾，其疆域幾領有現在蘇聯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圖克門斯坦各聯邦。自漢唐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我國歷代對邊界土地，素不重視，加之疆吏愚昧，輿圖不全，即在承平時代，強隣暗圖侵佔者，爲數已屬不少。咸同時候，內亂嚴重，俄國乃乘隙而入。咸豐十年，同治三年，中俄兩次訂立北京條約，於是阿爾泰山，後阿爾泰諾爾，烏梁海游牧地，科布多卡倫以西，以及齊桑淖爾東岸愛古斯各地，全被俄人佔了去。同治九年，建立塔成界碑時，俄人又將察罕鄂博界碑移於中國境內，侵佔百餘里。光緒七年，中俄改變條約，而齊桑淖爾全湖與阿拉克別克河以西，蒙哈各游牧地，又被奪去，這是咸同年間內亂時期新疆北部失地的情形。

新疆西北之哈克薩部，乾隆時即入我版圖。當時邊陲之地，荒而不治。道光年間，俄人逐漸南下，追咸同年間，東南亂起，俄人於伊犁卡倫外邊之阿拉木圖地方，設立商埠。又遣兵至阿拉木圖以西的哈薩境內，建築砲台。復於塔城東北設斜米省，繼則奪取塔什干阿拉木圖，皆係乘我內亂的時機，或誘惑我藩屬，歸其統轄，或威迫我政府，訂立條約。同治三年，塔城條約成立，西界一變。同治十年，全疆淪陷，俄人入據伊犁至十三年之久，後經左宗棠督師西征，收復全疆，始於光緒七年訂立中俄條約，而西界再變。光緒八年，訂立哈城條約，而西界三變。統計前後訂約十餘次，每次訂約的結果，總是愛國削土，此種損失，真所謂不可道里計也。

新疆的西南，爲帕米爾高原，乃葱嶺之脊背，南北五百餘里，東西八百餘里，爲中、俄、阿、印四國交通之樞紐。帕者爲山脈，一縱四橫，羣山相間，分爲數區，各異其名，總名爲帕米爾。全地分爲八帕，而有大帕米爾小帕米爾之稱。上有乾隆紀功碑，其爲中國屬地，實毫無疑義。光緒五年，全疆收復，曾設卡於帕外，以防俄羅斯、阿富汗、坎巨提之入帕。日久防疏，遂不顧問。光緒十七年，俄兵進入

始境，揚言各帕均爲俄屬。英人聞之，亦倭人坎巨提，以開印度門戶。我雖向英俄力爭，英方說是防俄，俄人說是防英，實際都是覬覦這一座世界的屋脊。這是英俄爭奪帕米爾之開始。當時我若處理得當，未嘗不可作兩國的緩衝，無如正值中日多事，無暇西顧，反強已設之卡倫撤退，遂致英俄私定帕界，訂立帕米爾協約，公然置中國於事外，我國亦竟毫無與聞。今惟塔克敦巴什一帕，尚在蒲黎縣境內，其餘小帕米爾大帕米爾等七帕，均爲英俄私分而去。總計失地二十餘萬方里。

以上種種歷史的追溯，實足供我們國民的警惕，並啓發我個人對於經營新疆之雄心。

舊志遠征新疆，這個人到了塞外，極目遠望，一片無涯的國土，自然會引起遠征的大志。入晚聽到悲壯動地的胡笳聲，更不藉勃然發憤，躍然欲起。我在綏遠與斯文赫定晤談新疆的情形，並讀了他的著述，使我對於新疆的地理形勢及經濟價值，增加許多認識。又鑒於內蒙的民族問題之複雜，新疆的漢回糾紛，更加嚴重，所以我認爲新疆問題，中央必須派員，妥爲處理，而我就願意擔任這種工作。晉綏當局對於我這個見解及決心，都非常贊成，並允竭力相助。於是我就作成報告及簡單計劃，派陶鈞同志帶赴南昌，面呈蔣先生，當蒙採納。是年冬天，閩變發生，我尚在巡視內蒙途中，接蔣先生來電，命我赴建甌。即將內蒙事件迅速處理完畢，遑遑南京，轉赴杭州。由航空學校校長徐培楨兄派教員邢薩非君駕一架雙座練習機，送我去建甌。當時氣候嚴寒，彤雲密布，頗有寒意，飛行到江山附近，已大雪迷空，不能前進，乃折回衢州機場降落。高空風雲，寒冷異常，下機時手足僵硬，幾於不能行動。次日風雪更大，短時間內不能飛行，乃乘航江鐵路回杭州，（杭江鐵路此時僅通至衢州）適返南京。

遠征新疆計劃概要：回南京後，就將遠征新疆問題，詳加研究。我以爲白劍生兄帶兵五萬赴新疆的計劃，事實上是不易辦到的。這並不是說沒有五萬兵力可調，也不是五萬兵力尚不夠用，而是五萬大兵在二千幾公里的荒漠長途上進軍，需要極大的設備與極長的時間。在那時候，通新疆的汽車路，尙未修

築，汽車輸送，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能通汽車，五萬兵員的輸送設備，也太不容易，決非那時的財力物力所能辦到。若徒步進軍，則不知要費多少時間。時間過久，變化愈多，問題亦更複雜。而且沿途給養，如糧食、飲水、燃料等之補給，及宿營之設備，都是非常困難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第一、必須估計新贛方面反對的兵力，然後決定使用的兵力。據我所知，當時盛馬兩方的兵力，合起來不過兩萬人，但是總有一方是站在中央方面的，假定各得半數，則與我為敵的，僅有一萬人。而且械彈窳缺，訓練不精，我若磨精銳步兵一師，附砲兵一團，另附飛機若干架，及裝甲汽車若干輛，即使雙方合以抗我，亦可應付有餘，何況奉有中央命令，事實必不致此，則兵力更綽有餘裕也。第二、須克服荒漠長途行軍運輸的困難，爭取迅速的時間。二千公里的徒步行軍，即使沿途人力物力的供給，都十分容易，且無對敵的行動，亦須一百餘天（每日平均行廿五公里，每三日息一日）之久。左文襄經營新疆，費時數載，僅就進軍設備而言，如沿途籌備宿站、水站、及長途糧食，就不知費了多少精力與時間。現在這種簡陋之設備，僅能適用於少數旅客，若大軍進行，自非計劃增加不可，這樣在時間上所費更多。所以我計劃完全用汽車輸送，則一切空間上的困難，可以克服，並可爭取最迅速之時間也。

第三項籌備工作——購置車輛訓練司機——廿三年一月間，我將經營新疆理由，及計劃概要，呈報蔣先生，並提出行政院會議，請撥款一千五百萬元為籌備經費，皆蒙核准通過。為保守機密便利進行起見，並不發表何種名義，而是由我負責暗中進行。第一項籌備工作，為購置車輛及訓練駕駛人員。依我初步計算，全部官兵，約為一萬五千人。每人平均體重二百四十五磅，攜帶械彈裝具四十五磅，共為一百九十磅。全部官兵重量，約共二百八十五萬磅。如用三噸半的載重卡車，每輛平均載重量為七千磅，則用汽車四百另七輛，一次可以輸送完畢。故我決定購置各種汽車六百五十輛，其用途分配如左：

指揮車四十輛，以小包車及三輪卡車為主，專供各高級官長指揮傳達命令之用。

炊事車廿輛，每輛裝置汽汀鑿鍋六個，每半小時可煮飯一次，足供八百人之食。二十輛一次炊爨，即可供全軍之一飽。並用極少量之柴油爲燃料，可解除沿途燃料之困難。

修理車廿輛，車上裝置修理機械，專供汽車修理，及槍械修理之用。

醫療車二十輛，專供收容運送病兵傷兵之用，亦即移動的醫院。

裝甲車五十輛，供警戒作戰之用，平時亦可裝運士兵。

運兵車四百輛，專供運載戰鬥兵員之用。

補給車一百輛，專供運輸各種補給物品之用。

這種編制與數量，雖然尙不能達到現代摩托化師的要求。（現代摩托化師，官兵約一萬六千餘人，攜帶各種槍枝約一萬五千餘枝，各種大砲二百三十餘門，所需各種汽車二千七百餘輛）。但以那時中國一師的裝備，尙屬簡單，尤以各種的大砲數量，相差太遠，則所需車輛，自可大量減少，故就當時之部隊裝備，並與財力物力配合，這種編制與數量，已頗合於實際的要求，亦爲中國籌備摩托化部隊之嚆矢也。

各種車輛之購置，得財政部孔部長之幫助介紹，與廠家直接訂購。故能於三個月內在上海、蘇、交、尼，而且價格較市價便宜三分之一。又因汽車的裝置，必須適合於西北地帶的長途行駛。特親往上海參觀美國兵營的軍用車輛，並同若干專家詳細討論後，乃決定式樣，在上海楊樹浦設立汽車裝備廠，派林榮恩同志主持其事。林同志曾留學美國，對汽車裝置，學有專長，尤富於國家民族思想。廿六年（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奉命製造魚雷，轟炸黃浦江內的敵艦，失憶被難。長才殉職，我至今猶爲痛惜！

駕駛員的條件，必須具有國家民族的偉大思想，赴遠投荒的勇敢精神，與嚴肅的紀律，堅強的體格。我認爲現有的汽車司機，不但數量不夠，質的方面，更難適合要求，自非特別訓練不可。於是在北平

及督綏方面招考青年一千餘人，在綏遠設所訓練，由蕭仁源同志負責。

第二項籌備工作——儲運油料。第二項籌備工作，為油料之儲運。估計由綏遠至新疆迪化，全程約長二千里，最低限度，準備八千公里的油料，方可供來回兩次之用。沙漠行軍，至耗油料，每車每加侖汽油以行駛十公里計算，則每輛需準備汽油八百加侖。全部汽車六百五十輛，共需汽油五十二萬加侖。另附必需用之潤滑油。這樣大量的油料，決不宜用汽車運送，以加增消耗，而須事前用獸力或人力，將其繼續運至沿途各站，先行儲備，以便汽車行進時，隨時補充。

五十餘萬加侖之汽油，已經購到甘多萬加侖，不等購齊，即須陸續起運，運輸路線，分為兩條：北路由歸綏綏綏新汽車路西進，經雷夏之北郊，運到甘肅之酒泉縣。此路唯一的運輸工具，則為駱駝，每頭長途可負三百多斤，約等於五十加侖。運輸十萬加侖，就要二千多頭駱駝，幾乎把綏綏路上的駱駝都僱用完了。用駱駝運貨，每日至多需要裝卸兩次，普通五加侖的油箱，極容易因碰擊而滲漏，故須將油箱改裝厚鐵桶，每桶容卅加侖，方便駱駝，不致損耗。這種工作，均甚麻煩。南路係由西安經蘭州至酒泉，這路可利用驛車牛車汽車，比較北路要容易一些。兩路最後的積集地，都是酒泉附近，因為這裏已是甘肅省的極西端，中央的力量，尚可達到，過此則安全就有問題了。而且我的計劃，是將所有軍隊以及各種物品，均須於事前用各種運輸方法在酒泉集中完畢，酒泉以西始改用汽車輸送。蓋如此，可節省汽油之大量消耗也。此項工作，由陳勁節、程章玉兩同志負責。

第三項籌備工作——偵察路線地形。第三項籌備工作，為路線地形之偵察。這時綏新汽車，雖勉可通行，但在軍事上可能發生之障礙與應行補救之設備，仍非派有軍事專門知識人員親往偵察不可。至於地形氣候與戰略戰術之價值與影響，尤非實地考察，不能作正確之計劃。故由徐佛觀同志率領參謀人員，乘車由歸綏經百靈廟，向雷夏之居延海出發偵察，往返近月。歸來將考察所得，作成很詳細之報告。

以前我對於車輛在沙漠地帶長途行駛之各項技術問題，雖經詳細研究，但一經實地試驗，就有許多不合理的。新綏公路，並不是人工作成很合理的公路，而是利用天然的路線，稍加修理而成的。沙漠地帶，大風之後，路線往往爲塵沙所蔽。大雨之後，又往往爲積水所掩，通過十分困難。常須繞道探進，因此常有方向迷失之事。沙土路面，極不堅固，除了結冰時外，汽車的載重量較普通爲少。行駛速度，每小時平均不能超過十五公里。每日行程，至多一百六十餘公里，油量消耗亦較預想者爲多。每加侖汽油，僅能行駛八公里。大隊汽車同時行駛，非常困難，因塵土飛揚，後面的駕駛者，往往爲所障礙而不能開眼。故對汽車行駛時，前後應保持適當的距離，及防塵必須的設備。這些車輛行駛的問題，皆須研究解決。此外沙漠地帶，氣候變化，非常厲害，往往日中氣候昇至九十餘度，夜間降至零度，故在沙漠地帶旅行的人，必須隨帶夏冬兩季的服裝，才能適應日夜間氣候的劇變。因此官兵的被服，亦須有充足之準備，從而增加汽車運輸的負擔。沿途飲水，因汽車行程可以超過普通的驛站，雖不致發生困難，但有些地方，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夠供給大軍使用，於是擬購新式掘井機，將所到的站上，加掘水井。此種計劃，不僅足以滿足我們行軍時的需要，即爲便利以後永久行旅計，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玉門關以西，沿途原有的水井，多半是差文襄行軍時所開掘的。我們趁這個機會，多鑿水井，爲後人造福，亦是至有價值的事情。

我爲辦事方便，並與各方聯絡起見，特在北平設辦事處，由陶鈞同志負責。我自己並於廿三年四月間，前往北平主持。

通迪化的兩條路線：由內地到新疆省會迪化，有南北兩條路線。南路爲以前官道，由西安經蘭州、肅州、出玉門關，經安西、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魯番而達迪化，即左文襄西征時所取的路線。北路爲綏新間之駝路，亦北方商業交通之要道，由歸綏經武川百靈廟，沿陰山北麓之草原地帶，經三德廟轉

入寧夏省北部之阿拉善旗與額濟納旗間之草原地帶，而至居延海。再經徑稅山口至哈密後，繞出天山以北，經鎮西木壘河台奇，阜康，西達迪化。南北兩路的比較，如就往昔普通旅行着眼，則南路入烟稠密，物資豐富，氣候溫和，北路人烟極少，物資缺乏，氣候寒冷。我爲軍事着想，決定南北兩路兼用。卽於起初取北路，由歸綏至居延海，轉入酒泉，出玉門關，再沿南路西段，而至迪化。其理由有三：第一、當時由西安至肅州之汽車路，尙未暢通，而綏新汽車路則通行無阻。第二、在綏遠方面，進行各種工作，易於保守秘密。陝甘方面，則耳目衆多。第三、玉門關以後，須以哈密、鄯善、吐魯番等處爲對迪化集結作戰之基地也。

籌備竣事乘機飛蘭，各項籌備工作布置竣事以後，最後的問題，則爲部隊之派撥與編成。當時我還擔任內政部長，手下沒有軍隊可供遠征之用，事前曾請示蔣先生，奉諭候籌備就緒後，由胡宗南軍長處抽撥。這時，胡軍正駐在蘭州附近，派遣至爲方便，所需炮兵，我會商得閻伯川先生同意，由其指撥山炮兵一團。當時晉省炮兵甚多，其所指撥之一團，在四月間卽在綏遠點交，公誼私情，均應感謝。我在綏遠北平方面的各種布置就緒後，遂於四月中旬由北平乘機飛洛陽，再轉機飛西安。西安爲我前代故都，規模頗似北平，附近之名勝古蹟甚多。邵主席力子、楊主任虎城，曾留我遊玩。我因急於赴蘭州，進行我的工作，不能應邀暢遊，至今引爲憾事。次日，乘機飛蘭州，飛機昇空後，鳥瞰地面，關中形勢，盡入目下。渭河、涇河、洛河的流域，都係可耕沃壤，南西北三方，都有雄偉的大山，以爲屏蔽。東有流關依山界河，爲其門戶，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實爲我中華民族東進之根據地。周秦漢建都於此，固然由於地理形勢之險要，亦爲我中華民族初期發展時所必然。唐代以後，民族向東南進展甚速，遂不復再有在關中建都者矣。現在形勢雖已變遷，然在國防軍事上，仍不失其重要之價值。飛機由長安至蘭州，須越過六盤山，此山拔海三千餘公尺，飛行高度，須在一萬二千尺以上，空氣漸漸稀薄，呼吸頗

感困難。同行石楚琛同志等已覺疲憊不堪矣。

抵蘭時，宋主席一民兄等，均在機場歡迎，並接至省府後花園居住。此時由綏遠出發偵察道路之陳勁節同志，已由居延海經毛目、酒泉回至蘭州。由北平先期派來蘭州聯絡之黃劍鳴兄，亦於此見面，分別報告經過情形。

來蘭的兩個目的，我來蘭州之目的，第一是與宋主席商談新疆進行問題，並請其協助一切。因為我以後要在酒泉築中部隊，並積集許多糧食，以及各種必需的物品。這裏是甘肅省境，必須得他的同意協助，方能順利進行。他對於此舉，自然表示十分贊成。並檢出省政府所珍藏的左文襄經營新疆的文卷資料，給我參考。可惜我沒有時間，不能把這些寶貴資料，完全讀過。其次，是與胡宗南軍長商談使用他的部隊問題。此事雖尚未奉到正式命令，但我必須事前與他商量。一日，他集合在蘭州的部隊幹部，在省府開座談會，把我遠征新疆的計劃，逐一報告，希望大家奮勇參加，他們都一致贊成。同時因他們遠處西北，對中央及各省情形，未能十分明瞭，紛紛提出詢問。尤其關心長城的戰事，與塘沽協定問題，亦經我一一答復解釋，使他們獲得了解與安慰。

開發西北須先由國家投資。這時，國內輿論界對於開發西北的論調，唱得很高。宋子文先生及上海的實業界鉅子多人，亦於我到蘭後一星期來蘭州，並飛赴青海觀察。他們是以經濟開發為目的，甘青兩省地方人士，久苦貧困，對於經濟開發，特別歡迎。但就我個人觀察，西北的經濟價值，不是在目前，而是在將來。不是需要個人的投資，而是需要國家的投資。至於目前的情況，尚不免令人失望。因為今日的西北，並不是遍地黃金，而是到處貧苦與黑暗，要解決這普遍的貧苦問題，非由國家用很大的資本，很長的時間，大規模興修水利，開發礦產，改良畜牧不可。自前西北社會之經濟條件，是太缺乏了，人民的生活程度與文化水準，若和東南各省比較，恐怕要相差五十年的時間。移東南的人民，去開發西

北，實在是一種不合實際的理想。而且西北人民的現時生活，決非東南人民所能忍受。東北移民之所以成功，實由東北之生活條件，優於關內人民生活條件所致，二者決不能相提並論。故我以為開發西北，必須先由國家投資，然後再由個人投資，必須不顧目前微薄之利益，始能獲得將來優厚之利益也。

奉電停止遠征 我一到蘭州，即患腳氣病，左足趾潰瘍，疼痛不堪，鬱居近半月，不曾出省政府一步。故蘭州附近之名勝，未得一往遊覽。在開住中，忽奉 蔣先生來電，囑將遠征新疆計劃，停止進行，並命我即回南京。我奉到這個電報，宛如晴天霹靂，突如其來，惶惑懊喪，莫可名狀！此中原因如何，當時既不及知，亦無從探詢，而事實已不容繼續進行矣。西北氣候較遲，時令雖已殘春，園花却正燦爛爭妍，自己心病足病，兩難其行，於百無聊賴之中，偶吟浪淘沙一闕寄慨，詞云：

行不得哥哥，徒喚奈何！殘春况值客邊過，隔院鴉啼庭院冷，愁比花多。歲月苦蹉跎，萬里奔波，不因阻隔便情疏。引領長空西北望，天際黃河。

離蘭返京 那時，我已無留蘭州之必要，即乘飛機經西安洛陽而回北平。一個失望的人，對於一切自然現象的觀感，隨着心理的變化而發生很大的差別。當我去蘭州的時候，興致蓬勃，沿途景物，春意欣欣，怡心悅目，似予人以光明遠大之啓示。而歸途則烟雲慘淡，觸目生愁，一切感觸，都與以前相反。到了北平，精神疲倦不堪，幾至成病。勉強將各項經手事務結束，乃乘車南下。抵京後始知停止進行的原因，係恐怕引起中蘇外交上的衝突。因京中得悉蘇聯的志願軍隊，已開抵新疆邊界也。其實彼引狼入室者，早已與蘇聯有所勾結。照我的觀察，盛馬之戰，乃是個人地方性的衝突，中央既不顧問，蘇聯遂與之勾結，而以志願軍入境援助。若中央斷然出兵制止，則盛馬兩方，必有一方聽命中央。而蘇聯見我中央出兵干涉，自知師出無名，亦必有所顧忌，或不致與我發生國際的正面衝突。而新疆問題，却可因此獲得徹底解決，對國防經濟雙方收穫之大，當不可以數量計也。乃因顧慮太深，致放棄國家應有之

權利，不予過問，任其演變，造成十年來紛擾變化之局面。這不僅是我個人畢生的恨事，亦國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

我以失望之餘，對於政治頗覺消極，乃請假三月回廣西。原擬不再出來，卽在地方上辦理實業，稍盡個人力量，爲桑梓造福，在精神上亦可得到安慰。廣西當局各同志亦極同情我的遭遇，而願意協助。但當時兩廣尙未統一，謠言甚多。蔣先生電促我銷假回京，乃仍攜眷北上，在廬山住了兩個多月。身閒無事，終日徜徉於山水之間，宛如置身世外桃源，幾忘人間喪亂矣！

